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 95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 <http://www.7help.net>

MONEY AND DREAM



金钱与梦想

——走近乔治·索罗斯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金钱与梦想

——走进乔治·索罗斯

俞岱曦 张国梁 朱江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钱与梦想/俞岱曦等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1

ISBN 7-5034-0891-X

I. 金… II. 俞… III. 索罗斯-生平事迹 IV. K837.125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769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20000 册 插页: 8

版 次: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左图：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香港金融年会上。他指责索罗斯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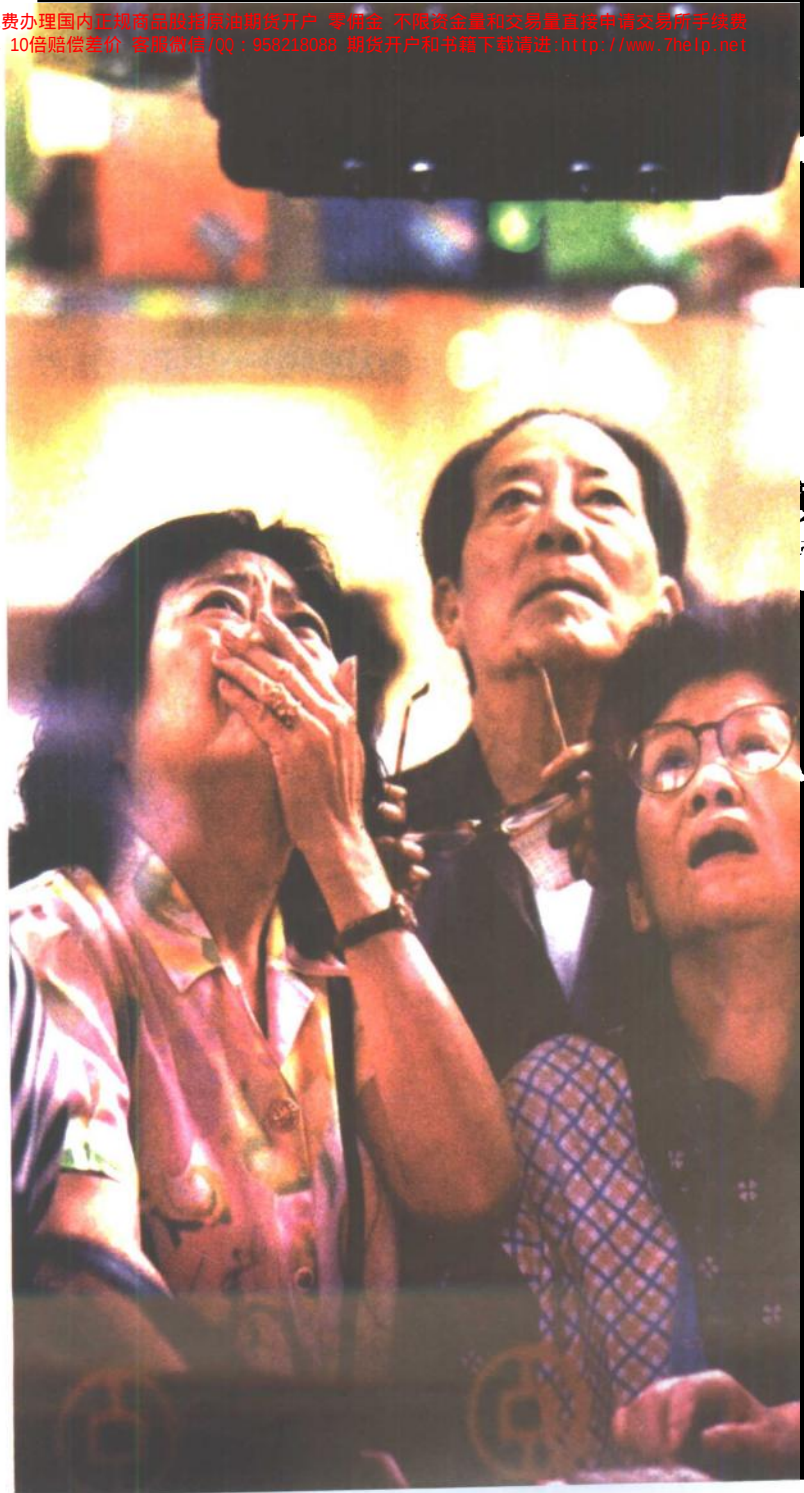
下图：10月26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街头，一群集会上焚烧索罗斯的模拟像，表示对总理马哈蒂尔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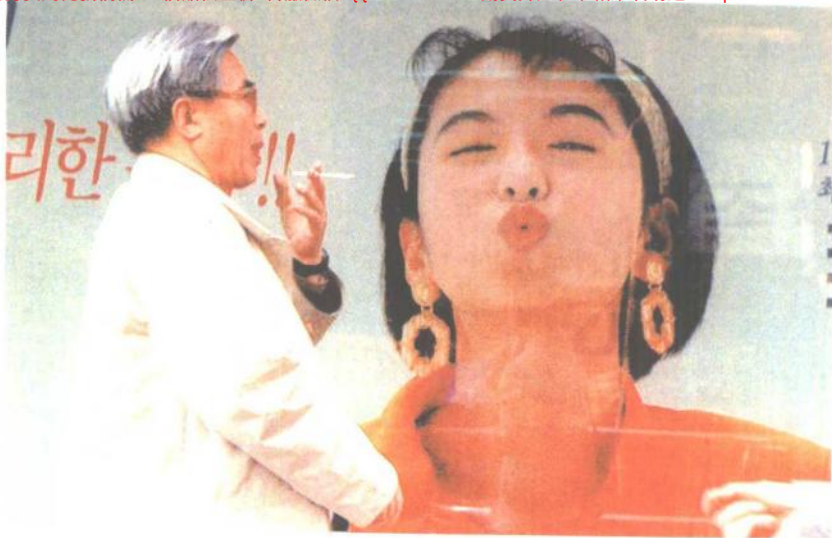




10月29日，受全球股灾影响，科威特股市跌破2790大关。
图为阿拉伯股民们聚集在科威特城的股票交易所内，神情十分忧虑。

10月28日，由于传言索罗斯攻击港币，港指暴跌14.3%。图为散户们沮丧地注视着交易所的电子显示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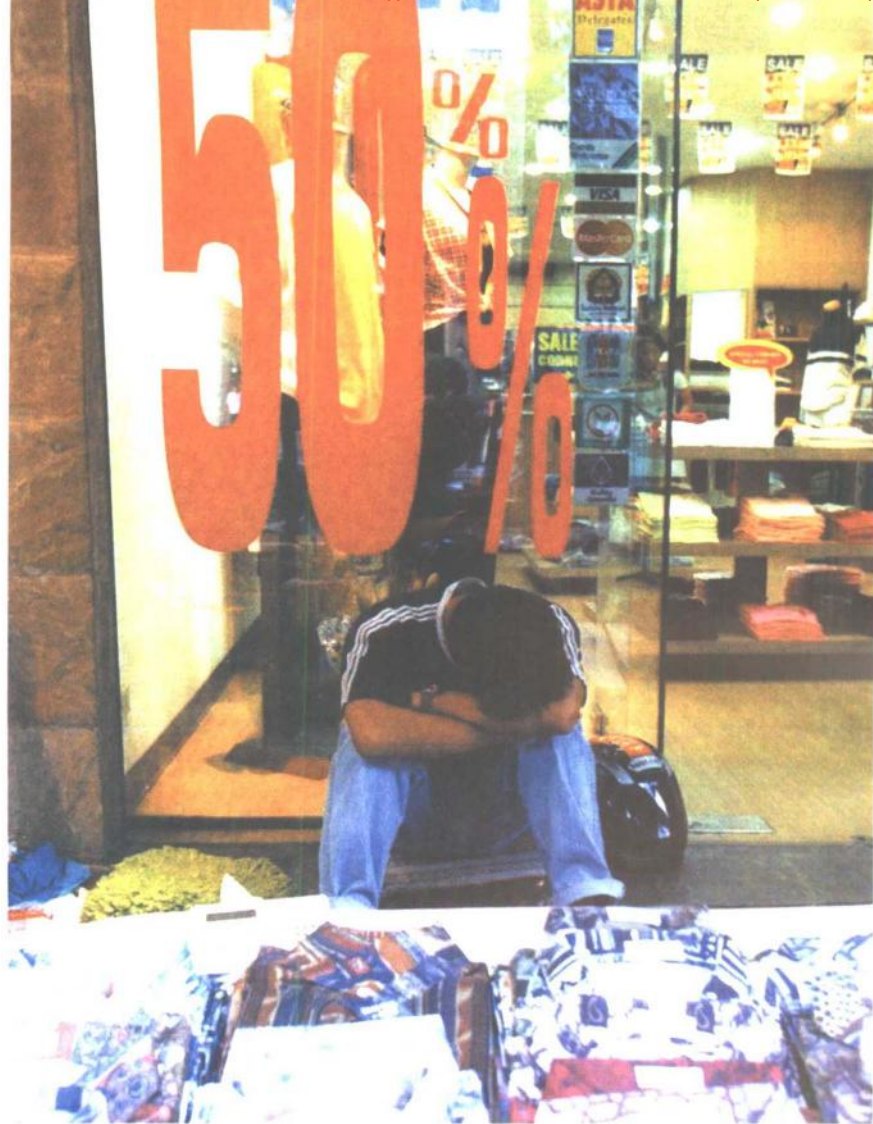
11月10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破1000比1大关。图为一男子走过一张银行海报，海报文字为“相信我，把你的钱交给我”



11月24日，一些韩国妇女在韩国外汇银行的一处营业所内将自己暂时不用的美元换成韩元，以帮助国家渡过当前的金融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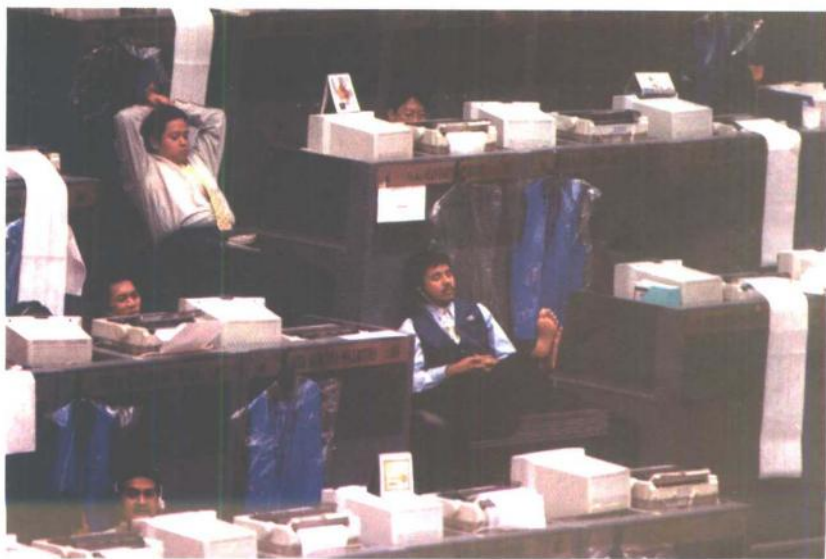
10月27日，道琼斯指数暴跌554.26点、美国一些股市被迫停止交易。
上图为休市期间，只剩下少数工作人员在芝加哥股票交易大厅内。



11月25日，一位在曼谷一家商店门前摆摊的商贩边打盹边等顾客。自泰国经济陷入危机以来，许多商店都采取折价出售商品的办法来加速回收资金，以便尽早偿还债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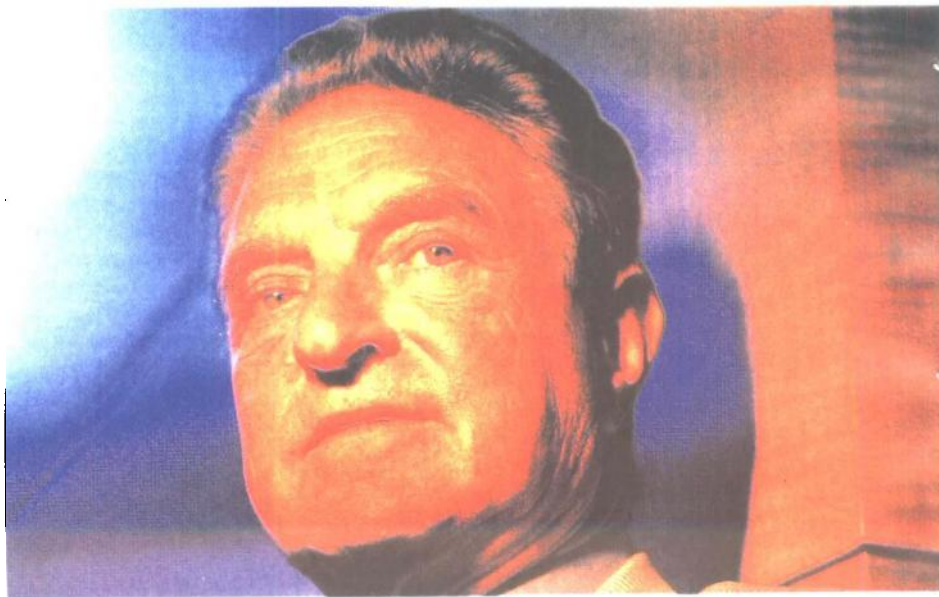
10月28日，巴西股市继前一天大幅度下挫后继续暴跌。由于跌幅过大，当天股市被迫停市一小时。图为圣保罗股票交易市场内的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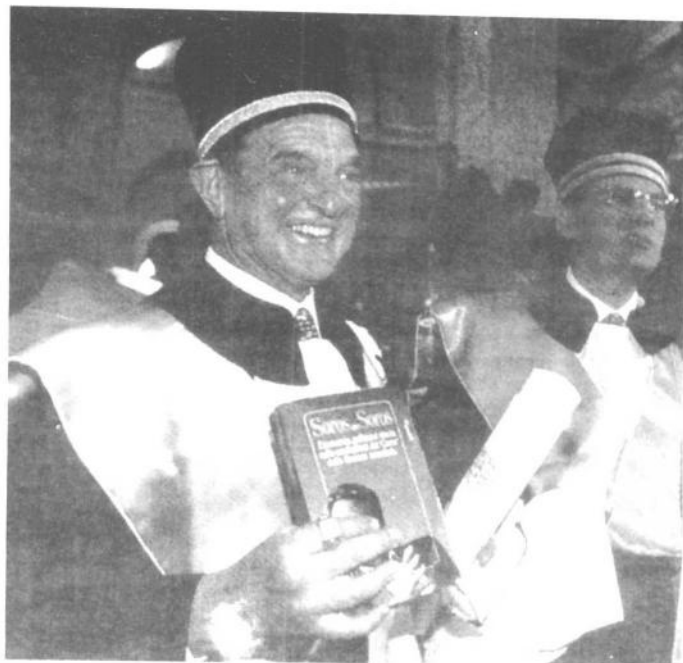
11月10日，雅加达股票交易所开盘后出现6.4%的跌幅。面对暴跌的股市，交易员们显得无精打采，昏昏欲睡。



96年10月，索罗斯在OSI
董事会陪同下，参观了计算机
联络与培训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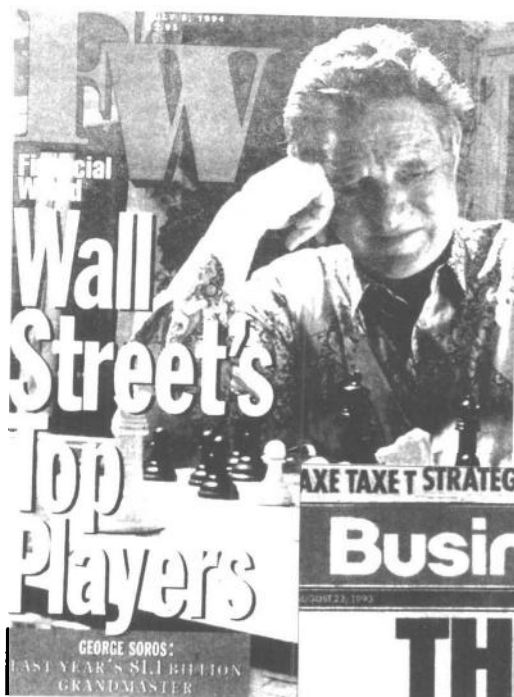
被称为投机家的索罗斯更像个哲学家



由于索罗斯在投资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剑桥大学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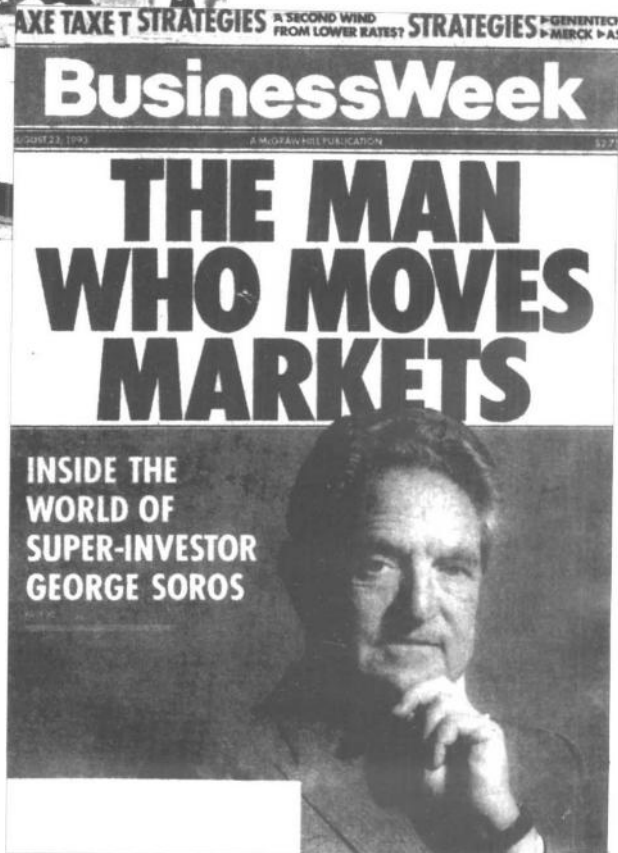


索罗斯急于展现“世界政治家”的形象，和南非领袖曼德拉会谈后合影。



高棋，索
手，但他但
解他解《金
读读《金
棋棋《金
局局《金
一一样》的
。的专
。的长
。的实
。的并
。的似
。的乎
。的想
。的洋
。的象

呼风唤雨的名声。类
这样的报道，使得索罗斯得到在金融市场





索罗斯长久以来是高深莫测的神秘人物，九十年代初却频频出现在新闻记者会上推广他的公益慈善活动。



索罗斯基金会积极援助各地 包括捐赠电脑给东欧国家的中学。



索罗斯捐款成立的中欧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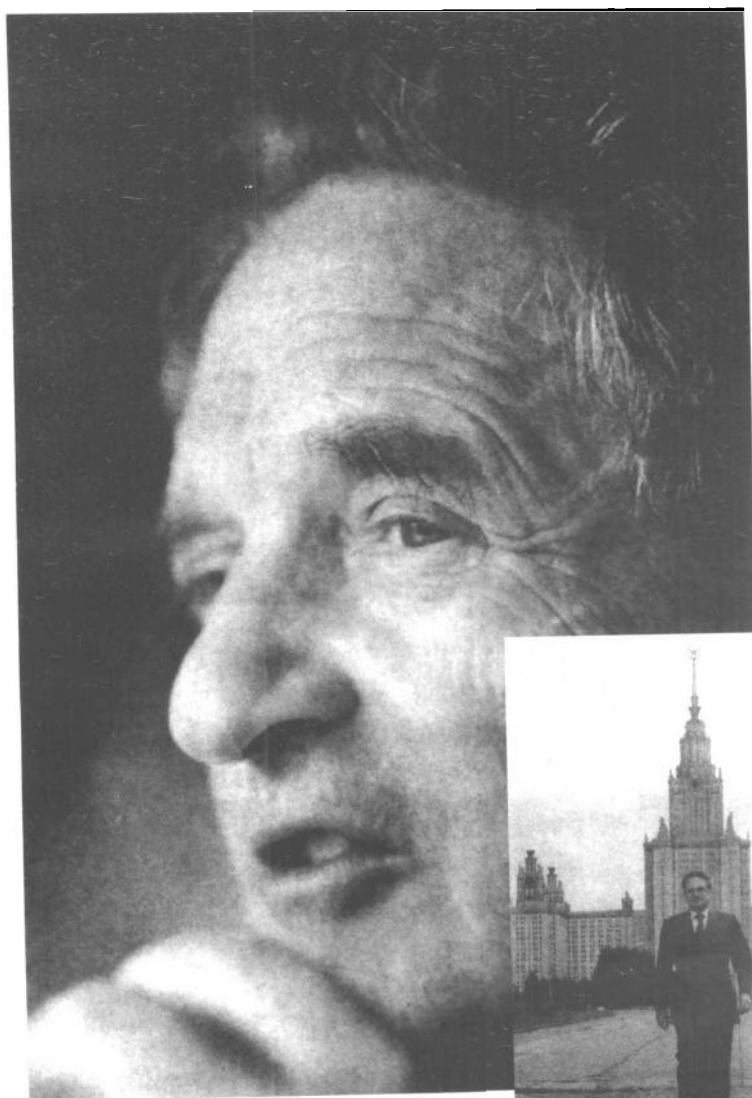
由于索罗斯在东欧和前苏联共和国各地大撒银子，被称为“莱茵河到乌拉尔山间最具影响力的公民”。



拜尔伦
伍恩



索罗斯多年来保持低调，**1992年**一举成名，
因为他对英镑发动“政变”，赚了约10亿美元。



索罗斯喜欢说：他发现赚钱比花钱容易。



索罗斯虽然担心俄罗斯的未来，但还是提供很多援助给这个国家。图为他摄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索罗斯和第一任妻子苏珊在家中。



虽然世界经济被索罗斯搅得一团糟，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应负什么责任。图为索罗斯和妻子苏珊悠闲地在海边度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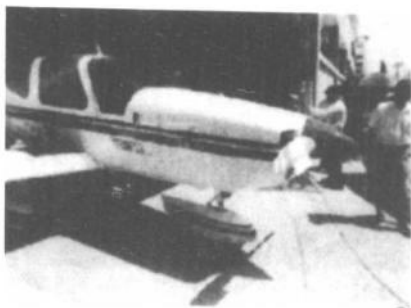
低，
十一月，韩元对美元汇率再创历史新高，
图为一女交易员的惊恐的神情。



索罗斯被称为全球最杰出的投资管理人，如今，他又将眼光瞄准了哪里？



泰国的金融动荡终于导致了政府危机，11月6日晚，泰国总理差瓦立正式宣布辞去总理职务。



金融危机爆发后，泰国富人的日子也不好过，这架刚买来两个月的私人飞机被摆到了拍卖场上，仅以半价出售仍无人问津。



为了缓解韩国的金融危机，韩国许多学生将自己攒的美元零花钱捐献给国家。



9月以来，由于股市跌荡起伏，香港股民密切关注股票行情。

目 录

引 言 (1)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香港年会上，
马哈蒂尔责难国际炒家“强暴”市场，马来西亚经济
倒退十年……

附：（一）《亚洲的机遇》节录——马哈蒂尔
（二）《我不是白痴》节录——乔治·索罗斯

第一章 少年救世主 (9)

少年索罗斯擅长赚钱游戏；九岁办报，理财天赋
初露头角。

求生有道，其父安度两次世界大战。为何索罗斯
小小年纪便妄言“我是上帝”？

第二章 伦敦寻梦 (26)

初生牛犊闯世界，索罗斯来到梦想之都，开始了
心灵的探秘旅程。

寻梦路辛酸，今日的亿万富翁忆及当年，仍不免
心有余悸……

2 金钱与梦想

第三章 投资天才…………… (38)

圆梦美国，索罗斯初涉金融场。“国际眼光”纵观欧美，华尔街无人能及。

60年代春风得意，索罗斯新婚燕尔。突遭打击……肯尼迪与“利益平等税”逼其退回哲学空间。

第四章 “量子”出击…………… (50)

“远离”金融街安营扎寨，潇洒工作，超前出击，索罗斯及其搭档独树一帜，卓然不群……

从“双老鹰”到“量子”，索罗斯的基金惊人裂变。从石油到武器，从科技到化妆品……索罗斯处处大赚其钱。

第五章 危机突现…………… (65)

华尔街的黄金拍档终于散伙，合伙人抽身而去，陷入困境的索罗斯开始放荡，并与妻子分居……

1981年的危机带来大麻烦，媒体的雪上加霜更令其倍感尴尬……

第六章 荣枯相生…………… (74)

里根政府带来发展新契机。索罗斯紧盯市场，发现了荣枯相生的走势……

“与一位总统共进早餐，晚餐又和另一位总统在一起”，索罗斯受益匪浅。

第七章 索罗斯太太 (106)

老夫少妻，53 岁的新郎官婚礼现丑态；“夫唱妇随”，苏珊厨房演风波……

第八章 选定接班人 (110)

索罗斯千挑万选，终于找到接班人。58 岁“退休”，金融杀手欲扮慈善老头儿……

一番阵痛，一番成长，德鲁肯米勒终于掌大权。量子基金飞速成长，金钱裂变，财富进入新纪元……

第九章 国际慈善家 (119)

从开普敦到布拉格，从东欧到俄罗斯，“失败的哲学家”用金钱构筑“开放社会”……

“挥金如土”，索罗斯戏说“补贴东方”。

第十章 英格兰，别为我哭泣 (149)

“黑色星期三”进账 10 亿美元，索罗斯投机规模震惊世界。

英镑暴跌，大英央行颜面扫地，被迫退出欧盟货币体系……

第十一章 呼风唤雨走天下 (174)

索罗斯身上有个神话：他能让货币和股票上涨或下跌，也能让相关的市场无风起浪。

4 金钱与梦想

政治家们满怀警惕，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附：《欧洲解体的前景》

——索罗斯于柏林亚斯潘学会的演说实录

第十二章 东京滑铁卢 (204)

1994 年情人节，量子基金惨遭屠戮。索罗斯极力维护理财魔术师的形象……

第十三章 市场卫道士 (215)

众议院决定调查索罗斯……

国会听证中，索罗斯否认操纵外汇，自诩为混乱市场的“卫道士”。

附：《避险基金与动态避险》

索罗斯在美国国众议院银行、金融及市场事务委员会所作的证言。

第十四章 犹太情无结 (234)

纳粹大屠杀提醒他莫忘出身；索罗斯一度羞谈自己的犹太血统。

以色列人感到生气；索罗斯不肯为同胞“出血”

.....

第十五章 九七年重拳出击 (243)

金融幽灵造访东南亚，“风暴”欲来风满楼，索

罗斯选择从泰国下手，推倒“多米诺骨牌”……

第十六章 泰虎落难 (258)

“天生体弱”，泰铢风雨飘摇，千百万财富自动消
失……

财长轮庄，个个无功而返，泰总理差瓦立引咎辞
职。

第十七章 马哈蒂尔和索罗斯 (276)

股市暴跌，马哈蒂尔指责索罗斯黑手操纵。

森林大火，飞机失事，印尼股灾之外厄运频频

……

第十八章 香港的秘密行动 (287)

港岛十大富豪的巨亿身家迅速“缩水”，千百亿
资产于股市自行蒸发。

“基金洗仓，港股四脚朝天”，“跌呀跌，散户忍
痛离场”……

索罗斯又成大赢家，至少卷入5亿美元……

第十九章 股市投资理念 (300)

人气为股市根本

利用股市的低效赚钱

不断审视市场预期

一般反射理论

勇气为股海沉浮三要素

6 金钱与梦想

大户应有别于散户

附录：（一）《来自资本主义的威胁》（320）

索罗斯发表于《大西洋月刊》关于其哲学思想的
最新总结。

（二）《反射理论》（335）

索罗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世界经济研讨会上的精
采演讲实录。

风暴并未止息（代后记）（343）

引言

公元 1997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国际金融界的 2000 多名官员，及知名银行家、资本家云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 52 届年会召开。

大幕拉开，两位世界级的聚焦人物相继粉墨登场。

这是一对不共戴天的冤家，又是两位世人仰目的强人：一位是当今马来西亚总理，位高权重，集一国之尊的马哈蒂尔；另一位则是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令国际金融界襟若寒蝉的乔治·索罗斯。

其时，距 1997 年 7 月 2 日东南亚货币金融危机的开始，已有百日之隔。

9 月 20 日，马哈蒂尔总理在年会的一次研讨会上，面对 400 多位银行家、资本家及政府官员，作了题为《亚洲的机遇》的演讲，借机再次抨击国际外汇炒家。尽管这次马总理没有指名道姓，大家却都心知肚明：马哈蒂尔对索罗斯早已恨之人骨！

两小时的演讲，精彩纷呈，席间掌声不断。

可以说，这时最着急的要数场外为数众多的新闻记者了。这次研讨会应发的 50 张记者入场券一早就已全部派光。可怜迟到者只好在场外通过闭路电视收看实况。来自香港会场的电波以各种频率向世界各地播散。

与此同时，那位乔治·索罗斯先生却还在美国悠闲地收看

2 金钱与梦想

着马总理的讲演。他心里清楚，再过几个小时，他将在香港年会上对此展开反击。尽管过去几个月中，他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并非光彩，这一回，他仍和以往一样充满自信。

在准备回击马哈蒂尔的同时，索罗斯已安排其基金会首席战略家，斯坦利·德鲁肯米勒率先发难。香港时间 9 月 20 日，德鲁肯米勒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索罗斯对马来西亚货币动荡不负任何责任，”他说，“更应为此负责的是那些放任信贷迅速扩张的政客和官僚，是他们为剧烈波动创造了条件。”

一场唇枪舌剑的大论战似乎已成定局。

索罗斯一如往日金融场上的狙击手，静静地等待着良机，他自信的内心是否也有丝许忧虑？

而同时，香港会场中，马哈蒂尔却多次声明，他坚决不同国际投机者见面。

当索罗斯听到这个声明时，失望中掺杂着些许的轻松，他知道，这是他整装前往香港的时候了。

当然，最失望的还是那些翘首以待的记者们。9 月 20 日下午，他们终于确认：马哈蒂尔只在香港逗留一天，而索罗斯 21 日才能乘机抵达。失望之余，记者们只好把更高的期望押在第二天索罗斯的演讲上了。

9 月 21 日，一大早，近百名记者就在组委会发放研讨会记者入场券的柜台前排起了长龙。这次的幸运者依然只有 50 名，迟到的只好另想办法。他们从机场到会场，沿路出击，一路追寻索罗斯的踪迹，就连外貌相似的过路人都要一一仔细打量。

下午 17 时 30 分，索罗斯终于在《朝着全球开放社会迈

进》的研讨会上露面，并对在座的 650 位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开始了题为《我不是白痴》的演说。在历时近两小时的过程中，整个会场笑语不断，高潮迭起。而组委会为了安抚场外，无奈中只好破例让部分没票的记者入场。

索罗斯反唇相讥，称马哈蒂尔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危险人物。他说，实际上，近两个多月来，他的基金并没有参与抛售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名称），甚至还在买进，可是林吉特仍在急泄——所以，他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能够左右汇市的升降。索罗斯近乎愤怒地说，马哈蒂尔才是马来西亚货币下跌的罪魁祸首。而他只是不幸地被当成替罪羊。为了塑造形象，索罗斯还在会上对受东南亚货币动荡打击的“穷人”表示同情。但他同时强调，他不同情马哈蒂尔，因为他是主要责任人之一。

9 月 22 日，星期一，东南亚汇市刚开始交易就急跌不止，马来西亚林吉特更是倍受打击，一度又跌创历史最低水平。

67 岁的索罗斯又一次露出了胜利的微笑，耳边回荡起少年时“我就是上帝”的狂语。

然而，这微笑，这狂语，带给英国、墨西哥和东南亚各国的却是苦涩难言的扼腕之灾。

4 金钱与梦想

附（一）：亚洲的机遇 〈节录〉

（马哈蒂尔）

在人们谈论亚洲龙和亚洲虎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我们想他们会崇拜我们的强大和（成功的）绝窍，我们忘记了日本和韩国的教训，当他们在追赶发达国家的时候，就发生货币贬值的危机。我们也忘记了墨西哥的教训，他们的经济突然爆发危机。当然，我们马来西亚人曾经嘲笑这样的忠告：我们的国家会遭受与墨西哥同样的命运。那怎么会发生呢！我们的经济增长很高，通货膨胀率低，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外债，我们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我们正在计划 30 年的增长战略，但是，不幸得很，我们重复了墨西哥的错误。

.....

货币买卖是没有必要的，是不事生产力和不道德的，是应该禁止的，并使之成为非法。我们不需要货币交易。……买卖货币用于支付国际贸易是正常的，但将货币单纯作为商品来买卖则是不可以接受的。国际上货币买卖的交易额比商品与服务贸易额多了 20 倍，但有关交易既没有创造就业机会也没有让一般老百姓享用到什么产品或服务，真正获利的只是外汇炒家，他们一年的平均回报率高达 35%。而且，无论指数升降，这些足以通过巨额买卖影响汇率的炒家都是稳操胜券，而他是通过使穷人变得更穷而攫取盈利的。……

这些亿万富翁其实并不需要更多的金钱，但他们却仅仅因为不愿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繁荣而进行极不道德的破坏。……最近外汇投机者对马来西亚货币的打击使我们的经济倒退了 10 年，这是对马来西亚市场的强暴。

东南亚一向以为外资是来帮助我们繁荣起来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当然，马来西亚还将会继续鼓励外资进入本国的金融与股票市场，但将分辨诚恳投资者和热线操纵者，对后者绝不欢迎。我相信，部分媒体及别有用心的人并不希望看到东南亚走向繁荣，他们短浅地认为别国的发展会削弱他们的财富。

……

世界上没有绝对自由的市场，民选政府有权控管市场。因为如果做得不好，选民将会让政府下台，但他们却没办法赶走外来的金融炒家……我在这里连他的名字都不能说出来……

附（二）：我不是白痴〈节录〉

（乔治·索罗斯）

让我从表白自己开始，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它的特征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除此以外，还有思想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它（资本流动）采取直接投资和金融交易两种方式。后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变得重要起来，尤其是最近几年，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在加速，直到它达到变动的均衡点，而这种流动使得各个国家的汇率、利率和各种证券价格密切关联。在这个方面，40年来金融市场的特征变化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我一直处在这个变动的过程中，所以由我来谈论全球经济，谈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更恰当。

毫无疑问，全球一体化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利益。但是，全球资本主义不是没有问题。我的发言大部分集中在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好理解。如果我们需要这个制度继续生存就需要更好地理解它。

金融市场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国际金融市场更是如此。国际资本流动由于它的兴盛——破灭的模式而声名狼藉。在兴盛时期，资本从中心流向外围，但是，当信心下跌的时候，就具有从外围回流的倾向。我40年都浸泡在国际金融市场，看到许多衰退、恢复、兴盛、破灭，我很清楚，国际资本市场的

特征变得越来越制度化，但是，需要更大的弹性。然而，在历史证明我错了以前，我不能相信现在的繁荣不会紧随破灭。

这种破灭的风险在迅速增加——由于我们对如何操作金融市场理论性的理解有个致命的缺陷。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基础上的，在我看来，在金融市场上没有均衡这样的事情，因为市场的参与者都在试图对未来贴现，或是由市场预期本身形成的，它给出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而且只有事情实际过程中的意外事件能够对普遍的预期作出反映。据说，经济本身给她们自己设计的自由放任思想仍然影响很深，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思想。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社会混乱。它提出的问题是：应该如何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马哈蒂尔先生在昨天建议禁止货币交易是不合适的，这不值得认真考虑。对资本的瞬间转换干预，象这样的处方是灾难，马哈蒂尔是其国家（麻烦的）责任者。

不过，亚洲市场最近的骚乱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如货币盯住、资产泡沫不充分的银行监督、金融信息缺乏，这些都不能忽视、市场不能留下被纠正的错误，因为他们可能反映强烈或过度，而且会以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方式表现。比如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不加区分就是严重的错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保持经济稳定、保障机会平等、提高社会保障上，国家的作用日益增加，尤其是在高度工业化的欧洲和美国。但是，国家寻求公民福利的能力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一直受到严重的削弱，它允许资本比劳工更容易逃税，资本倾向于避到这样的国家：那里的就业有很重的负税，或就业有高度的保护。它导致失业上升，这是欧洲大陆所发生的，我不为欧洲大陆古旧的社会保障制度辩护，它迫切需要改革，但是我关心欧洲、美国福利的削减。

8 金钱与梦想

如果社会服务减少太多，而它（社会）的不稳定在上升，这可能产生普遍的愤恨，并导致美国与欧洲之间新的保护主义浪潮。特别是如果在货币繁荣跟随着出现一些严重的破灭之时，这可能导致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破灭，就象 30 年代的大危机那样。

我要强调，开放社会在目前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信息自由。例如，我受到马哈蒂尔的各种伪造的令人讨厌的谴责，我成为他掩盖自己缺点的替罪者，他在给国内听众表演。如果他和他的思想容易受到马来西亚国内独立传媒的惩罚，他就不能逃脱掉。和世界其它地方一样，信息自由在亚洲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章 少年救世主

一个孩子自认是上帝！而几十年后，成为国际理财大师和慈善家的索罗斯发现现实和他的幻想是如此的贴近！

乔治·索罗斯 1930 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中上阶层家庭。具体的出生日期尚无从考证。对于一个目前叱咤风云的国际投资大师来讲，这一点颇令人不可思议，于是，本书的主人公便以这样一个神秘的面孔出现在读者面前了。

索罗斯的匈牙利名字是 Djichdzhe Shorash，到了美国以后，他在朋友的建议下根据拼音改名 George Soros。索罗斯的父母都是犹太人，犹太人的身份对其一生影响甚剧，索罗斯一度为自己的犹太血统而感到不自在，直到他立身成名之后才坦然接受这一事实，并宣称为自己的犹太血统而自豪。

童年的乔治并没有表出与同龄人的太多不同，整个 30 年代，小乔治几乎都在离布达佩斯不远的鲁巴岛上度过。鲁巴岛是多瑙河上的避暑胜地，在布达佩斯以北，可以坐船，也可以开车到达。小乔治长得娇小、漂亮，虽然看不出有什么天才的表现，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聪明，并且常常出人意外。10 岁时，小乔治自己编了一份报纸，取名《鲁巴喇叭》，里面充

10 金钱与梦想

满儿童眼中的世界和离奇的幻想，我们不知道他的在西伯利亚战俘营中并编过“木板报”的父亲给了他多大的帮助，但可以肯定的是报纸上的所有文章都是出自小乔治一人的手笔。这份报纸的销售对象是鲁巴岛上的 40 多户家庭。乔治童年的朋友费伦茨·内格尔还清楚地记得乔治以很低的价格向大人们展开积极的推销攻势。这是乔治·索罗斯最早的经营活动。

小乔治聪明伶俐，喜欢出风头，有很强的求胜欲望。童年的乔治喜欢玩一种叫做“资本家”的游戏。这位未来的理财大师从小就表现出非常的赚钱本领，他在游戏中每玩必赢。有趣的是常常同他一起玩这种游戏而且玩得最差劲的一个是乔治·李特温，这位在“资本家”游戏中表现得笨手笨脚的男孩后来成了历史学家。

屡战屡胜使游戏变得枯燥，而小乔治天生喜欢冒险和刺激，于是他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增加了游戏的难度，规则之一是游戏中出现了证券交易所，对于一个刚刚 10 岁的孩子来说这一做法简直令人瞠目。几十年后，也就是 60 年代，索罗斯回到匈牙利，又见到了费伦茨·内格尔，内格尔问索罗斯靠什么为生，已在金融界崭露头脚的索罗斯说着回答：“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玩的‘资本家’游戏吗？现在我做的就是这个。”

除了玩“资本家”游戏，小乔治还擅长运动，他身体健壮，动作灵活，虽然个头不高，但游泳、驾帆船、打网球都是他的拿手好戏。打网球更是他终生酷爱的运动。据说索罗斯举行第二次婚礼时迟到了，原因就是在此之前他在打网球。但不知为什么，他就是不喜欢英式足球，他认为那种活动不适合他。

虽然成人后的索罗斯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并宣称宁愿作个哲学家，但他在上小学时却看不出怎样出色，他自己不记

得自己特别喜欢什么科目，而他的同学也记不起他是个优秀的学生，或许他后来神话般的投资生涯与他的小学教育关系不大，但至少在学术上来看他是大器晚成。他的同班同学米克拉斯·何恩认为：“乔治不是特别好的学生，只能算中等，但他能言善辩。”而索罗斯一直引以为傲的投资专著《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却实在没几个人能看得懂，尽管他在记者面前滔滔不绝地加以解释，但记者们最多的反映则是惊叹：“这太抽象了，”“能不能再具体一点说明？……”有人说索罗斯很难把他的思想表达出来，而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只坚持自己的理论。

小乔治在功课上不怎么突出，但好斗和顽强的性格却已暴露无遗。乔治的学校把所有年级都分成两班，犹太人一班，非犹太人在另一班，这样的做法也反映了当时欧洲国家中的反犹太情绪。尽管孩子们未必懂得什么叫反犹太主义，但人为制造的两个集团之间的冲突却不断发生，小乔治也经常是殴斗中的干将。小乔治并非针对非犹太孩子，因为他有很多非犹太孩子的朋友，但打架对乔治是一种很刺激、能够满足其求胜欲望的游戏。何恩回忆道：“乔治非常大胆、外向……，他喜欢和其他男孩打架，真的，乔治知道怎么出拳，怎么防卫。”

恶作剧是乔治的另一个爱好，但他一般会注意分寸，因为如果被老师抓住可不是好玩的。波尔·泰滕义是乔治在州立学校的同学，1942年，他们俩同时报名参加童子军，在一次童子军会议上，他们要填一份单子，可小乔治拿着单子大笑着跑，就是不让波尔签名，波尔决定“给他点颜色看”，于是两人便打起来，当老师闻讯赶来时，两个男孩仍在椅子底下打得不可开交。结果，两人都收到了书面警告。

*

*

*

12 金钱与梦想

虽说多数场合小乔治与其他孩子表现无异，但如果认为他不过尔尔可就大错特错了。在这个表面平静的孩子的内心中一直激荡着一个不可抑制的念头，那就是“我是上帝”，一个孩子把自己想象成某个英雄也许并不奇怪，可能每个人在童年时代都有过这样的梦想，但把自己看作是救世主却不同，那意味着不仅相信自己有着超凡的能力，并且明了世界的苦难，这对一个孩子来讲未免太复杂了。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乔治只有九岁。由于那时纳粹德国对匈牙利并不构成威胁，所以布达佩斯一如往昔般平静，同一年，苏联军队开进芬兰，在匈牙利引起很大反响，当地报纸呼吁援助芬兰。让人惊讶不已的是小乔治跑到报馆，表示要拯救那个遥远国度的人们。惊异的编辑们为此还写了一篇文章，称赞小乔治的“爱心”。这次行动也许是索罗斯对“我是上帝”的理想的第一次实践吧。长大成人尤其是成名后的亿万富翁索罗斯是否仍抱着同样的念头我们不得而知，但许多和他熟识的人似乎都有一种想法，那就是把他拉回尘世。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朋友或同事认为他自己是上帝这件事情不太正常，而且似乎不妥，但这事发生在索罗斯身上，他们也不觉得太出格，毕竟，他太强有力，而且本身就具有某种神秘的气质，令人肃然生畏。

在索罗斯的一生中对哲学和对赚钱至少有着同样的兴趣，除了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期间受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尔的影响对哲学情有独钟外，在生意场不顺利时他也潜心研究哲学，并努力完成他的手稿《意识的负担》。完整的索罗斯至少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作为全世界最成功的投资家，他的量子基金以35%的年增长率增长，所积财富令世人眩目。他的另一部分就是他的心路历程：幼年时的救世主心理，求学期间及后来的哲

学思想发展，以及作为一个大慈善家的乐善好施……对于“我是上帝”的念头，索罗斯内心中也存在着矛盾，他在一本书中写道：“说真的，从孩童时代，我就存在相当强的救世主幻想，我觉得这事必须加以控制，否则可能因此惹上麻烦。”

同样的说法出现在 1993 年 6 月份的英国《独立报》上，他说：“当你认为自己是上帝，也就是万物的创造者时，那是一种疾病，但是我终于熬过来了，所以我觉得很自在。”

看起来索罗斯并不喜欢自己的这种念头，因此一直力图克服它，但实则索罗斯可能终其一生都难以摆脱这种信念，他把它看成是自己思想上的负担，但更主要的是他为自己的思想很难向人倾述而感到痛苦。一般而言，索罗斯对童年的心迹避而不谈，我们能够看到也是最能表现索罗斯的这种矛盾心理的是他在《金融炼金术》中的一段话：

“我承认自己总是沉溺于自视甚高的夸大观念里，对此读者应该不会感到惊奇——讲得坦白些，我把自己想象成为某种上帝，或者象凯恩斯那样的经济改革家，或者象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那就更棒了。我对现实有十分深刻的认识，所以我知道那样的期望过分高了，因此我象犯罪一样，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在我成长中的大部分时光里，它是令我相当不快乐的一个原因。而走进这个世界后，现实和我的幻想又靠拢得足够近，使我终于敢于承认自己的秘密，至少对自己坦诚。不用说，这样一来，我感觉快乐了许多。”

任何取得事业成功的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自我满足感。我们发现，作为理财大师和慈善家的索罗斯的满足来自于“现实和我的幻想靠拢得足够近”，也就是说作一个理财大师和慈善家相当接近他儿时自认上帝的幻想。

除了索罗斯自己外，恐怕不会再有第二个人知道他心目中

14 金钱与梦想

的上帝到底是什么，因此我们只好勉强得出上面的结论。索罗斯的朋友不愿相信他真的自认上帝，因此有人说，索罗斯的意思并非他“是”上帝，而是相信他能和上帝交谈：另一个人认为索罗斯这么说只是表达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自称是上帝，只是一种半开玩笑的表达方式，就像别人也可能拿自己和拿破仑比较。”

真的是这样吗？当然许多人宁愿是，因为把自己当成上帝或其他的什么救世主往往是一种很可怕的想法，它让人想起某些电影中的终极角色。

索罗斯自己也曾以此开玩笑，当一位记者向他表示，他应该生而当教宗时，索罗斯反问：

“为什么？现在我已是教宗的老板了。”

乔治·索罗斯是上帝——是谁灌输了这样的想法？也许是他的父母，更进一步说是他的父亲。

*

*

*

乔治的父亲名叫提瓦达，母亲叫伊丽莎白，他还有个哥哥，名叫保罗，长乔治两岁，这个犹太家庭在匈牙利本是中上阶层，如果是在和平时期，本应当安康祥和。但命运多舛，这个家庭的成员经历了许多磨难。乔治的童年时代，他们已家道中衰。

年轻的提瓦达是鲁巴岛的英雄，他拥有一副健壮的体格，黑头发、黑眼睛，被认为“相当英俊”。青年提瓦达热情、好动，雄心勃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瓦达参加同盟国军队同协约国作战，表现聪明果敢，不久升为上尉。但终于不幸成为俄罗斯的俘虏，被押送到荒凉的西伯利亚。然而在战俘营的日子里中提瓦达上尉仍壮志未减，他主编了一份叫做“木板”的报纸。当然战俘营里可没有印刷机器和工厂，因此他只好把手

写的报纸钉在木板上。“木板”之名便缘于此。为了提高报纸质量，他让文章作者们躲在木板后面偷听读者的评论。他的儿子乔治 10 岁时也编过一份叫《鲁巴喇叭》的报纸，或许就是受到他的启发，因为小乔治幼时曾看过他带回的“木板”合订本。

提瓦达在战俘营中的表现使他被选为战俘代表，负责战俘营中双方的联络工作，并尽可能地对战俘们争取一点权益。然而战俘代表并非美差，因为不断传来邻近战俘营中由于战俘逃跑而战俘代表成了替罪羔羊被枪决的消息。提瓦达心惊胆战，担心终有一天自己也在劫难逃。忽然有一天提瓦达想到，为什么自己不逃走呢？与其受累而死还不如赌上一赌，而且这对提瓦达来讲并非没有可能。提瓦达为人机警，果敢，并且富有组织才能，这些特质表现在他接下来开始实施的逃亡计划上。

首先，提瓦达仔细观察了战俘营及周围的环境，他断定一条岸边堆满木材的大河将是他们的“生命通道”。接下来是组织人手，逃出战俘营也许并不难，但在茫茫的西伯利亚荒原中生存却是更严峻的考验。因此提瓦达鼓动起三十多名战俘，其中包括木匠、伙夫、医生以及渔夫等等，各个身怀技艺。这是一只庞大的逃亡队伍，但却是绝对必要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准备逃跑用的工具、器械。总算提瓦达的队伍个个精明能干，过了不久，他们便秘密收集到大量绳索、食品和其他工具。

万事俱备。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支三十多人的逃亡队伍乘着巡逻队不注意之机，迅速潜出战俘营，集合在大河岸边，他们飞快的用绳索把木材连成一体，成为一艘巨大的木筏，很快，这艘大木筏便带着这群既紧张又兴奋的人们顺流而下。

逃亡计划非常成功，唯一的失误是由于地理知识的缺乏，

他们只知道河流的尽头是大海，到了大海便可再设法返回家园，但他们却不知道，几乎所有西伯利亚的河流都注入北冰洋，当几星期以后他们的木筏已接近极地，人们才意识到自己已远离了“文明世界”。于是他们弃筏上岸，开始了下一步重返家园的努力。时值俄国内战，红军与白军激烈交战，战火遍及整个西伯利亚，连他们误入的这片蛮荒之地也未幸免。两军不仅相互厮杀，也波及平民，提瓦达等人周旋其间，几经磨难，吃了无数的苦头，活下来的人几乎都是花了几个月才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回到亲人的身边。

逃亡的经历对提瓦达影响至深，回到匈牙利后，他整个人已彻底改变。一方面他再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年轻时的理想和锐气已消磨在西伯利亚的大森林和旷野之间。他现在需要的是享受没有战乱，没有恐怖的安宁生活；另一方面逃亡的经验使他更加自信，不再畏惧生活中的突起之变，他更加珍惜生命，也知道该如何保护生命。

提瓦达不再谈什么出人头地，回到家乡后，他很快结婚，妻子叫伊丽莎白，是个娇小的犹太女子。她们不久便有了两个可爱的男孩，哥哥取名保罗，比他小两岁的弟弟就是乔治·索罗斯。

无论提瓦达有什么缺点，他永远是小儿子乔治心目中的英雄。乔治长大后称他父亲也是一位大师，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求生之道”。提瓦达的职业是律师，同时他还靠发行一本世界语杂志赚钱购置房地产。但实际上，提瓦达讨厌工作，他把工作看成一种负担，但为了能够维持他的挥霍无度的生活，他不得不每天坐船到布达佩斯上班。费伦茨·内格尔还记得一个夏天的日子，提瓦达上班的情景。

“上午七点钟”，内格尔回忆道，“提瓦达听到船快来的声

音，赶紧穿上裤子并开始刮胡子。他手里拿着刮胡刀跑向码头，一路上还在刮，到了船上继续刮。这些，全都是为了睡到最后一分钟，难得看到这样的律师。他也一直十分滑头。”

这是提瓦达上班时的典型表现。乔治·索罗斯承认，“他的职业是律师，但他只做最起码的工作。”乔治还记得，在他小的时候，父亲经常要他去找他的主顾借钱，借到钱以后就带着乔治去滑雪度假，痛痛快快地度假回来后，父亲总会有好几个礼拜脾气很不好，因为他得设法赚钱来还债。

提瓦达不再是鲁巴岛的英雄，相反，他以拥有一辆活动摄影车，挥霍无度和没兴趣卖力工作而著称。有些人对提瓦达不屑一顾，而乔治对此则不以为然。“父亲不工作，只是在赚钱。”小乔治一向认为如此。

乔治喜欢这样。因为父亲是儿子心目中的偶像，他喜欢跟父亲在一起，更喜欢听父亲讲述的传奇经历。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很多东西，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很多他不了解的事儿，还有很多苦难。

提瓦达送给儿子的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对儿子的关怀和他的经验。提瓦达的自我价值观念对乔治影响很大。父亲的财富大增大减，小乔治根本不放在心上。“我学到一样东西，那就是为了赚钱而赚钱，终将徒劳无功。财富可能是沉重的负担。”多年后，乔治回忆及他的父亲时这样说道。

提瓦达不在乎钱，而他们在布达佩斯的生活也确实不富裕。乔治同样对积聚钱财兴趣不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日进斗金，父子对照，何止天壤之别。

两者的差别的根源或许在于：父亲不在乎钱，因此也不想去为赚钱而费神；儿子虽然也对钱财不以为意，但他却愿意去赚钱，因为他认为赚钱多少是衡量一个人事业成功的尺度，更

18 金钱与梦想

重要的是钱是有力的工具，他能帮助索罗斯实现他的理想。

成名后的索罗斯生活仍很简朴，但在慈善活动上他却一掷千金，应该说，索罗斯的价值观念受乃翁影响不可谓不深。

从父亲那里，乔治得到的另一份财富就是父亲的应世之道，乔治一生都很自信，这份素质是父亲所赐，而且一如提瓦达，乔治学会了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通常是不按传统牌理出牌。如此才能克服逆境，应付变局。在以后的投资生涯中，乔治·索罗斯得以大展身手，屡创奇绩——1984年英国民营化运动期间大满贯佳绩；1992年击溃英格兰银行；1997年推倒东南亚的多米诺骨牌……所有这些战绩的取得与自幼受父亲的熏陶而形成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胆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父亲教我应世之道，但母亲教我如何自省。”乔治·索罗斯说，对他的影响“不但来自我父亲，也来自我母亲，他们对我的影响力各有不同。我很爱他们……所以把他们的人格和他们之间的张力都内化成为我的性格的一部分，这种张力是我生命中一股很重要的动力。

乔治·索罗斯的母亲伊丽莎白与父亲提瓦达的性格截然不同，因此两人关系往往有些紧张。提瓦达外向，爱交际，凡事点到为止，但他妻子却喜欢宁静，乐于钻研。

从外貌上看，乔治·索罗斯更象母亲伊丽莎白，他们都有着金色的头发和蓝蓝的眼珠，这一点也使他不大象犹太人，索罗斯很愿意别人说他不象犹太人，这和他的家庭有关系，他的父母都不信奉犹太教，甚至可以说轻视犹太教，他们都尽量使自己看起来更象基督教社区的一员，当然这样的作法对在二战期间躲藏纳粹的迫害起了很大的作用。

伊丽莎白看起来很脆弱，头发稀少，身体单薄，是个传统的家庭主妇。由于丈夫不善赚钱、理财，又乐于挥霍，使这个

原本殷实的家庭也常常出现财政困难，经济上捉襟见肘，因此，生活的重担便很大程度上落在她的身上。乔治孩童时代的朋友休丽特·西蒙对乔治的母亲记忆深刻，她认为伊丽莎白的日子过得“不容易”，她要照顾两个儿子、料理家务，还要在丈夫入不敷出时想办法缓解财政紧张。伊丽莎白曾一度因为劳碌而患了胃溃疡，同时她也为没有自己的事业而感到自卑，但毕竟家庭的担子已经够她受的了。

忆及母亲，乔治·索罗斯曾这样说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她自己最大的敌人。由于我继承了她的性格，所以必须努力压抑这种自怜自艾的倾向。”

1981年，索罗斯的基金遇到困难，进入一段低糜期，他的思想也一度陷入类似母亲曾有的悲观，但随着事业的发展，索罗斯很快就摆脱了出来。

“1982年有一段时间我的内心波涛汹涌，这使我联想到了我的父母的性格冲突，也解决了承袭自母亲的一些苦闷；我把这些苦闷在阳光下摊开来，它们马上就烟消云散了。”

如果说提瓦达教了小儿子求生的艺术，那么母亲则传授给他艺术和文化气息。伊丽莎白喜爱绘画和雕刻、音乐以及文学，他也引导乔治对它们的兴趣，乔治喜欢素描和油画，对音乐则兴致不高。乔治的母语是匈牙利语，后来又学会了德语、英语和法语，并能熟练地和不同国家的人用不同的语言交流，有时则同时使用几种语言，令在场的同事和客人都惊叹不已。母亲对他的知性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乔治一生钟情于哲学，这一点与母亲的影响也有直接的关系。索罗斯认为母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几乎到了自我鞭挞的地步。她有宗教和神秘经验方面的倾向，而我没有；但她对存在的奥秘感兴趣，这一点我倒和她很相似。”

乔治热爱自己的父母，但总的来说，和母亲的关系更亲密。对父亲，乔治总是充满崇拜，直到长大成人他仍认为父亲是个“不平凡的人”。

的确如此，如果不是由于父亲的自信、从容和见机行事（或者滑头），乔治一家的命运在接下来的日子中将不堪设想。

*

*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部分时间，匈牙利都保持着平静，但到了1943年，敏感的人们却已经察觉这份安静已不会再持续多久。那时候，盟军已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偶尔有盟军飞机掠过布达佩斯上空，虽然还看不出这座城市有被攻击之虞，但蔓延几乎整个欧洲的战火迟早将延及匈牙利。布达佩斯能源紧张，学校也因为害怕空袭而停课。

在这场战争中受害最深的是犹太人，1944年春，欧洲各地犹太人社区已大半遭纳粹扫平。灾难在向匈牙利的100万犹太人步步逼近。

匈牙利是东欧诸国中犹太人口最多的国家，纳粹给在匈牙利生活的100万犹太人带来极大的恐慌，没有人知道纳粹的魔爪什么时候会伸到自己的头上，有关奥斯维辛大屠杀的消息不断传来，很多人已经坐不住凳子了。

虽然苏联军队正在向西推进，但没人知道他们能否击溃德国大本营，拯救匈牙利犹太人。

事实上，噩梦正在成为现实。

1944年3月19日，星期日。德国入侵匈牙利。

这是“和平”的入侵，不发一枪一炮，唯一的聲音是坦克的轰鸣和满载德国士兵的汽车的马达声。德军沿着多瑙河向布达佩斯迅速推进，此时布达佩斯城中已万人空巷，人们躲在自己的家中，向上帝祈祷自己的家人和这座城市能够早日度过灾

难。

乔治·索罗斯一家当时正在鲁巴岛上，晚些时候才知道布达佩斯已被占领，自己已陷入长达 12 个月的德国纳粹统治。

布达佩斯的很多人相信纳粹的入侵只是短暂的，因为在整个欧洲战场上，纳粹节节败退，似乎战争就要结束了。因此，很多人的判断是纳粹的占领很可能不超过六个星期。而对布达佩斯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躲在家里静观其变，噩梦可能很快就会结束了。

对于纳粹残害犹太人的传说的看法，布达佩斯的犹太社区分为两派：幻想派和务实派。幻想派抱着侥幸的幻想。3 月 19 日前的最后一刻，他们还相信希特勒的军队绝不会来，等到纳粹的坦克已经横行于布达佩斯的街道时，他们仍不相信犹太人会惨遭不幸。他们梦想着奥斯维辛的消息不会是真的，战争就要结束，和平就在眼前。

务实派的设想要糟糕得多。他们相信关于纳粹大批处决犹太人的报导，知道自己已经面临灭顶之灾。虽然战争就要结束，但鬼知道有多少匈牙利犹太人能活到那个时候。

提瓦达·索罗斯属于后一种人，他经历过上次世界大战，知道战争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他对纳粹政权也有深刻的认识，很早以前他就在忧虑纳粹的暴行会波及匈牙利，波及布达佩斯和他的家人。

纳粹的入侵给邻居和家人带来深深的恐慌，此时提瓦达在一战中磨炼出的自信发挥了作用。他发誓带领家人度过难关。在他身上看不到沮丧，他知道该如何应付局面，照顾家人，在恐惧与悲观、疑虑笼罩整个布达佩斯犹太社区的时候，他身上却洋溢着无比的自信，平静的表情象一束温暖的阳光使乔治兄弟和伊丽莎白感到安全。

22 金钱与梦想

费伦茨·内格尔那时 13 岁，他回忆起有一天他父亲泪流满面地猜测，有多少家人和朋友会消失不见。他最糟的预测是至少有一半；停了一会，他似有所觉地说：“索罗斯一家不会。索罗斯一家不会。”

事实验证了费伦茨·内格尔的父亲的预见，在接下来的 12 个月中，布达佩斯的 40 万犹太人被杀，许多亲友和邻居不见了，但索罗斯一家活了下来。

活下来的犹太人，包括索罗斯一家，经历了无数可怕的日子日夜夜。

提瓦达在这段时间表现得十分出色。乔治后来回忆道：“德军占领时期是我父亲最得意的时期之一，原因是他懂得应付局面，他对当时的情形很了解，他知道在德军占领期间，平常的规矩已经瓦解，以当时的情形而论，守法已经成了一种危险的陋习：要生存，就得违法。”

提瓦达郑重地告诉儿子：“这是无法无天的占领，正常的法则不再适用。你必须忘记在正常社会中应有的行为，因为这是异常情况。”

在这种异常的情况下，虚伪不实，甚至犯罪都是合情合理的。

为了让家人在“异常情况”下生存，提瓦达贿赂匈牙利政府的一位官员，这位官员的太太也是犹太裔，提瓦达的钱可以帮助她躲避纳粹的搜捕，而这位官员则允许他的儿子装成匈牙利农业部一位非犹太裔官员的教子。整个过程更象一场商业交易。为躲过纳粹的追查，身份证是关键，于是，提瓦达利用律师的身份为儿子买到了伪造的身份证。这段时间，乔治·索罗斯成了杰诺斯·吉斯。

纳粹当局曾交给布达佩斯犹太代表会一项任务：向犹太人

散发驱逐出境的通知，实则是将他们驱往集中营。犹太代表会把这件可怕的任务交由小孩去完成，乔治也是其中一员。

乔治从代表会的办公室拿到几张纸条，上面写着人名，并命令他们在隔天上午九点钟到希伯莱神学院报到，而且要带好24小时内用的毛毯和食物。乔治把这件事告诉父亲，父亲看着名单，面色苦痛：纳粹准备把犹太人一网打尽！

他告诉儿子：“去发通知，但务必告诉每一个人，这是驱逐通知。”

提瓦达贿赂的那位官员负责没收已被送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的财产。乔治跟着他到处出差。虽然有非犹太人的假身份证，但仍危险四伏。“如果要是被捕，只有死路一条。”多年后，乔治轻描淡写地描述那时的危险。

除了不得不露面外，犹太人最好是躲避起来。俗话说，“狡兔三窟”，此时又可以看到提瓦达的高明之处：索罗斯一家有11个藏身之处！一家人往往好几个星期躲在朋友家的阁楼或地下室里，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是否应该换个避难场所。最隐藏的地方要数石墙中的地窖。走近地窖入口，有一排弯曲、狭窄的石阶，地窖又分两间，如果有人查房，就躲到一个锁着的门后的另一间，这个更深层的藏身处更安全。

索罗斯一家躲过纳粹的追查，幸免于难，而且这一家人还对很多犹太人施以援手，尤其是提瓦达。根据乔治的回忆，德军占领期间是他父亲律师生涯中最忙的时期，很多人排队等候，请他帮助，“事实上，他的确救了好几十人的性命。”

乔治也曾帮过其他犹太人，当时匈牙利的香烟要排队供给，每人五支，乔治领完香烟后就分给那些当局限制不能离家的犹太人。

乔治的母亲也有过历险的经历，并在这个家庭中传为美

谈。

有一次她一人住在一间周末度假村的屋子里，邻居怀疑她是犹太人并向警方告密。“警方盘问她时”，乔治描述道：“她很冷静，神态怡然自得，超然于局外。据她说，当时就象从天花板冷眼旁观整个过程的人一样置身事外，因此她可以操纵自己，不露出什么破绽。但事情结束后，她才知道事态严重，才开始感到害怕、发抖。”

那是乔治·索罗斯一生中最危险的一年，他自己也这样认为，但他不承认自己有过恐惧。这主要来自于提瓦达表现出的自信。

乔治这样评价那段经历：

“那段时期可说是相当惊险刺激，现在谈起来仍记忆犹新，因为它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只是我很少提起它而已。最诡秘但也最重要的一点是，1944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间。这说法有点奇怪，也教很多人不敢苟同，原因是1944年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一年。但这是真心话。当时我只有14岁，我有一个可敬的父亲，他胸有成竹，不但知道应该如何行事，也帮助别人。当时的局势很危险，但我却深信自己可以幸免。一个14岁的孩子总以为自己是刀枪不入的。对一个只有14岁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当时的局面更紧张刺激？此事对我的成长颇有影响，原因是我从一位大师身上学会了求生之道。这一点甚至对我的投资事业也影响深远。”

在父亲的自信的激励下，乔治觉得自己就象电影中的英雄，对眼前的危险无所畏惧，这种冒险家的气质在乔治后来的投资炒作中多次表现出来。

对于求生的艺术，提瓦达总结出两条：

其一，不必怕冒险。

从西伯利亚率众逃亡，到在二战中的所做所为，对提瓦达来说几乎都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但不冒险就得不到安全。

其二，冒险时，除非万不得已，别拿全部家当下注。

一般来说千万不要拿全部家当来冒险，但战争时期往往别无选择，因此这条经验索罗斯只在日后的投资生涯中遵守。1992年，乔治·索罗斯如日中天时，对电视记者说：“我非常关心求生的必要性，绝不冒可能粉身碎骨的风险。”

第二章 伦敦寻梦

父子俩其实有着相同的打算，问题是去哪个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匈牙利人摆脱了纳粹的魔。1945年秋，乔治·索罗斯回到学校，此时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已不再分成两班。和乔治一样从纳粹的阴影中走出的孩子们看起来要成熟许多，但恐惧并没有消失，很多学生上学时带着小手枪，战争的创伤仍鲜活地留在许多学生的心中。

德国人走了，跟着进来的是苏联人，面对新的统治者，人们心中同样充满疑问。无疑苏联人比德国人仁慈得多，至少生活上已经趋于安定。鲁巴岛的居民，包括乔治一家又回到岛上。但对苏联人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谁也说不清，因此，离开这个国家念头在许多人心中升起。也许是因为对西伯利亚的经历仍心有余悸吧，提瓦达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为什么不在还有可能取得护照时一走了之呢？

乔治心中也涌动着同样的念头。战争结束了，生活归于平静，15岁的乔治开始觉得鲁巴岛的生活已太受局限，而且他也开始觉得受父亲的影响太大了。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对父亲说：“要一个15岁的人的想法象一个50岁的老头子，这不

是很自然的事。”

父子俩其实有着相同的打算，问题是去哪个国家。

“你为什么不自已打算打算呢？”父亲问儿子，“你喜欢去哪一个国家？”

乔治想了想，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去英国，乔治喜欢英国人公平竞争的观念，另外乔治也被收音机中英国的公正报道所吸引。另一方案是去苏联，乔治想“了解一下这个统治我们的新制度。”

起了决定作用的其实还是父亲，尽管这是乔治后来才发现的，并由此觉得父亲更值得敬爱。父亲这样建议道：

“我去过苏联，可以告诉你那边的情况。”

于是，乔治决定去英国。

要去英国上学，首先要找到一位在英国的亲戚，没人帮忙是很困难的，于是乔治按父亲提供的地址给一位亲戚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要去英国读书的愿望，但很久没有回音。这时父亲又建议他每周给那位亲戚寄一张明信片“提醒他一下”。乔治照做了，并且收到了奇效，几星期后，回信来了，并且附了一份入学通知。

申请护照也是一件麻烦事。匈牙利的官僚机构拖拖拉拉，眼看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提瓦达变得很不耐烦，并要儿子去投诉这群家伙。这次建议可不高明：乔治成了发照机关最不受欢迎的人之一。主管人员声称：“我把护照签给谁都可以，就是不给那个一天到晚投诉的讨厌鬼。”最后还是请了保罗的一位在政治警察单位工作的同学帮忙才费尽周折地拿到护照。

1947年秋，17岁的乔治·索罗斯独自一人远走他乡。哥哥保罗为了念完工科学位，在匈牙利多呆了一年。

乔治没有直接去英国，而是先到瑞士，因为他父亲要到瑞

士参加世界语大会。在伯尔尼短暂停留以后，索罗斯来到英国。

踏出国门的乔治·索罗斯从此不再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仍偶尔寄点钱来，但他在伦敦主要的资金来源却是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姑妈。1956年9月，索罗斯到纽约开创事业，同年他的父母也离开匈牙利来到美国，一家人在纽约团聚。

初到美国时，乔治生活很节俭，于是提瓦达开了一家蒸泡咖啡店，但经营不善，不久关门大吉，好在乔治在金融市场已崭露头角，能够照顾父母了。

60年代初，提瓦达身患癌症。1968年，这位伟大的求生专家去世，终年75岁。提瓦达过世后，伊丽莎白开始学着独立，60多岁时还上了大学，直到1989年，伊丽莎白以86岁高龄谢世，索罗斯称，在此之前，“她在一直不断成长。”

乔治的哥哥保罗长乔治四岁，乔治说他是“第一个让我了解什么是不公平的人”。因为小时候保罗常常打他、嘲笑他，尽管乔治一天到晚告状，可父母并不特别保护他，这让乔治感到愤愤不平。长大后，两兄弟在异国重逢，从此感情很好。

保罗是优秀的工程师，得到过很多工程创意奖，乔治说他是“家里真正有才华的人”。保罗在生意场上也很出色，他白手起家，只用了15年就建立起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公司。

索罗斯喜欢伦敦这座城市，喜欢它的繁华与自由，但遗憾的是他无法享受这一切，因为他太穷了。

这里是富人的世界，靠姑妈提供的那一点点钱单单生活已极度困难，同时他形单影只，没有钱，也没有朋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穷途末路”了。尽管如此，他相信自己能够在黑暗中找到光明，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求生之道发生了作用，他反而自嘲道“那不是很棒的感觉吗？”

索罗斯开始做事，当然这个 18 岁的青年只能做零工，他的工作一换再换，每次都做不长久。

有一段时间他在伦敦梅菲尔区一家叫做 Qualinos 的餐厅当侍者；这家餐厅是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在这里，索罗斯经常见到社会名流或电影名星之类的在这里用餐、跳舞，奢华的生活令人生羡；而他自己却经常囊空如洗，靠吃客人留下的残汤剩饭果腹。我们不知道这种强烈的反差在索罗斯的内心中激起怎样的涟漪，多年以后，索罗斯忆及往事，曾打趣地说：

“我嫉妒过一只猫，因为它有沙丁鱼吃，而我没有。”

很多风云人物早年都经历过苦难的磨砺，索罗斯在这一方面绝不逊于任何人：战时与纳粹“捉迷藏”的恐怖、伦敦街头的困顿饥饿、以及打工仔的寄人篱下……苦难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它教给人们生命的真谛，然而此时的索罗斯却没空儿想这些，他得忙着找工作，填饱自己的肚子，并且为自己挣得更多的利益。

1948 年夏天，索罗斯参加一项叫作：“徒手救土地”（Lend a hand on the Land）的计划，到农场做工。在这里，他领导了一场罢工，为农场工人争取按件计酬而不是按日计酬的待遇，这位未来的金融投机大师取得了胜利，他和工人们都赚到了更多的钱。

初到伦敦的日子是索罗斯一生最艰难的时期，对此索罗斯心有余悸：

“我心里对那些往事总怀有某种恐惧。——那可不好受。我担心再次穷途末路。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

1949 年，乔治·索罗斯如愿已偿地进入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在这里他结识了另一位对他影

响至深的人物——卡尔·波普尔。

伦敦经济学院是英国的著名学府，原因之一就是她拥有一批著名的教授。这所学校一般被认为倾向社会主义，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理论学家哈罗德·拉斯基在此任教。它是研究经济学与国际政治趋势的最佳场所。在这里，索罗斯如鱼得水。

索罗斯听过拉斯基的课，也上过约翰·米德的课，后者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索罗斯觉得收获不大。真正震撼索罗斯的是两位没落的政治保守思想家——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海耶克和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尤其是后者。

海耶克的代表作是1944年的《农奴制之路》(*The Road of Serfdom*)，他在书中抨击法西斯主义，同时也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把它们统称为“集体主义”，认为它“压抑了孕育自由精神的欣欣向荣的机制”。

卡尔·波普尔以他的科学方法理论而著称。1951年，他写成《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书。波普尔认为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可能的命运，其一是成为“封闭”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被迫相信同样的信念；其二是成为“开放”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尽管人们的信仰之间相互冲突，并且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但能够彼此加以容忍和接受。在“开放”的社会中，社会成员能够免于民族或种群间的战争，而战争则是令社会动荡不安的最重要的源泉因。虽说开放的社会也存在“不确定和不安定”，但却远远优于“封闭”社会。

波普尔的思想几乎立即引起了索罗斯的兴趣。索罗斯经历过纳粹的统治，也领教过苏联人的政权，他能够很快理解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的含义。大师们的理论启发了索罗斯知性认识的发展，奠定了索罗斯的思想基石。

索罗斯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念完了学士学位的全部课程，但为了拿到学位，他必须多呆一年，好在学校允许他选择导师，于是他选择了波普尔。他把《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看得烂熟于胸，并写了好几篇文章向波普尔请教，波普尔对自己的学生很欣赏，鼓励有加。

波普尔后来谈起索罗斯第一次出现在他门口时的情景：

“他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我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能否向您请教一些问题？’他是勤奋好学的学生。我曾以开放的社会为题写过书，显然那本书令他印象深刻。他常来找我，把他的想法告诉我。我不是他正式的指导老师。如果现在他称我为恩师，那是他人太好的缘故。”

事实上，波普尔只见到过索罗斯两次，而且并没有对这位上进的学生留下太多的印象，以至于当1962年索罗斯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已不记得他了。

“开放社会”不仅成了索罗斯日后哲学探索的核心观念，并且成为他终生追求的理想。为此，过了几十年，索罗斯在投资事业上取得骄人的业绩后，他开始在全球各地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创办慈善事业，以实现他心目中的“开放社会”理想。

索罗斯宁愿自己是哲学家，尤其是在商场失意的时候。1962年，索罗斯再次投入哲学探索，并且写成一篇名为《意识的负担》（*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的哲学论文，这导致了他与波普尔的再一次见面。当时，索罗斯从美国把论文寄给波普尔，引起了波普尔强烈的兴趣，于是索罗斯决定去拜访他，但结果却令索罗斯失望。

“他约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会面，”索罗斯回忆道“当时很多人在伦敦经济学院等着见他，他们知道我和波普尔有约都很不高兴，原因是这些等他的人都是他的学生，他们都希望得到波

普尔的接见。而我却好象是一个插队的人，于是我跑出房门到电梯口等他。他一踏出电梯我就上前自我介绍，他看了我一眼，接着说：‘原来你不是美国人！’我回答说：‘不是’。他说：‘那真叫人失望，让我告诉你原因。接到你的论文时，我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个明白我的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学说的美国人了，也就是说，我已经把我的信息广为传播。但你已经经历过那么多了，所以不能算数。我觉得失望。’”

尽管索罗斯引起了学生们的嫉妒，但失望的不只是波普尔，波普尔高兴知道的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能够了解他的理论，而索罗斯不是。但他仍鼓励索罗斯继续努力。

随着波普尔年纪的增加和索罗斯声名日盛，他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并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波普尔于1994年去世。

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期间，索罗斯的成绩并不理想。他曾热切地想走学术路线，梦想能成为弗洛伊德或爱因斯坦，或者象凯恩斯那样的经济学家，当然，波普尔也是一个好榜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幻想逐渐破灭，虽然说作个理论家是索罗斯一辈子的梦想，但终未如愿。即使有些人注意到他的哲学思想，恐怕也是受他在金融领域的非凡表现的影响。

索罗斯自称为“失败的哲学家”。

尽管如此，索罗斯仍然在其间思考了大量哲学问题，他对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尤其感兴趣，他后来提出的他自认为相当重要的发现就是源于此时的思考：

“我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都有若干瑕疵或遭到扭曲，接着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扭曲对事件形成的影响上。”

这一观念正是索罗斯后来创立的投资理论——荣枯相生理

论的基石，而此观念的形成则可追溯到战争期间的经历以及父亲提瓦达的教导。

哲学可以填充大量的时间，却不能填饱肚子。在伦敦读书期间，生计仍是摆在索罗斯面前的大问题，而且现在还要交学费。

忙于学业而又一文不名的索罗斯想到了犹太人监护会 (Jewish Board of Guardians)。希望能得到犹太同胞的帮助，但是他被拒绝了，理由是他是学生，而监护会只帮助收入少的受雇者。年轻的索罗斯很难理解这项规定有什么道理。

很快一件不幸的事故使问题出现转机。在接下来的圣诞节假期中，索罗斯在一列夜班火车上作兼职服务员，不慎摔断了腿，治疗需要一笔不小的数目。索罗斯认为这次他已在铁路公司做事，当然有资格得到帮助，“我下定决心，这次一定从那些坏蛋手中弄到钱。”

于是，他再次来到犹太人监护会，说明自己因为工作而摔折了腿，然而因为工作并未取得法律许可，所以无法取得政府的救助。索罗斯让他们相信，自己已陷入困境，急需同胞的帮助。当然，他隐瞒自己仍然是学生的事实。监护会的人相信了他的话，但为了拿到钱他必须每次拄着拐杖爬三段楼梯。

好景不长。不久，监护会发现了索罗斯的“谎言”，援助资金被中止。索罗斯可不是个容易认输的人，他马上给监护会写了一封“痛彻心扉”的信，表示监护会对待犹太同胞的态度和方式，实在令人心寒。

想不到这封信收到奇效，监护会被这个年轻人的话语所打动，不仅每星期的救助金恢复了，更棒的是现金是寄来的，不必他再每次千辛万苦地爬楼梯到监护会办公室去领。

尽管拿到钱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但索罗斯对早先受到监

护会的污辱却耿耿于怀，索罗斯报复的方式是，在他腿伤痊愈，已经在法国旅行时他才通知监护会可以停止寄钱了。

这段经历对索罗斯看待事物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影响。从此以后，他几乎讨厌一切慈善机构，以至后来自己兴办慈善机构的时候，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

虽然生活艰苦，学业也似乎不很顺利，但索罗斯总能保持情绪的开朗，他常常表现得“自得其乐”。

一年暑假，他在一家游泳馆里打工，但很少有人来游泳，所以作看护的索罗斯就有了很多剩余时间到隔壁一座很大的公共图书馆里看书，尽情地沉迷于观念的世界里。他把那段光阴叫做一生中“最棒的夏天”。

1953年，索罗斯取得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士学位。可以肯定，从事金融业不是索罗斯的最初选择，我们还记得索罗斯的哲学家梦想。但无论如何，经济学学位不能带来一切，甚至不能带来一份满意的工作，离开学校，索罗斯要做的第一件事仍是找一份工作，用以糊口。

索罗斯的第一件工作与金融完全无关。在一位同窗的推荐下，他来到一家精品生产公司作业务实习员。当时，英国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很难，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外国人，索罗斯运气还不算坏。这家公司生产新颖廉价的饰物、纪念品和定做珠宝等。名为实习员，实际上索罗斯并未在公司接受什么培训，因此他实际上始终是个推销员。

失望之余，索罗斯很快跳槽到一位客户所开的批发公司。在这里他的第一项差事是向伦敦的烟草零售商推销，但事实上那些零售商已自行组成了几个批发集团，“外来户”很难再打入市场。后来，索罗斯被派往威尔士，负责向威尔士海滨度假区的零售商推销，这回运气尚可，索罗斯做成几笔交易，而且

已经有了一辆当时英国生产的最便宜的小轿车代步。索罗斯的沮丧心情稍有缓和，但他仍觉得现实与理想太遥远，十年寒窗的目的难道就是这些吗？

“那是我事业的低谷。”索罗斯后来回忆说。

索罗斯开始对各种行业细加观察和研究，他发现投资是个赚钱的行当，因此决心到投资银行去发展。

他开始写信给伦敦各投资银行的总裁，这种做法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在此之前，恐怕还从来没有人写信向陌生人毛遂自荐。

这是一段有趣的经历。索罗斯收到一些回信，其中一家银行总裁约他见面，而这位总裁唯一的目的就是说明索罗斯把他的名字拼错了。

另一家名叫拉札德·佛雷斯的公司总裁的面试则颇具教育意义，索罗斯从他那里知道了伦敦金融业的奥秘。他告诉索罗斯，在伦敦金融界谋生就仿佛缘木求鱼，在这行里起核心作用的是一种叫“聪慧裙带关系”的东西。也就是说，每个银行总裁都有好些侄子外甥之类，而其中最聪明过人的，就是日后的下一任总裁。如果你和他念同一所中学或大学，还有点机会进入这家银行，但外国人却几乎没有这种机会。此人奉劝索罗斯不要妄想在这个行业发展。

那位总裁也许不无道理甚至很有道理，但是颇为讽刺的是这番话刚讲完就有一家叫辛格佛利兰德（Singer & Friedlander）的银行雇佣了索罗斯。当然，这家银行的总裁是一位匈牙利人，因此，前面那位总裁没有说错。

1953年，索罗斯至少换了三份工作。而这一次是决定性的一次，索罗斯从此踏入金融界。

此时，恐怕全世界没有几个人注意到索罗斯的存在，但从

此以后数十年间，一条“金融大鳄”不断成长，他的影响力将超过业内任何其他人，整个世界将为之震撼，赞叹、诧异、辱骂、诅咒将伴随其一生。

索罗斯注定是金融奇才，但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刚刚踏进金融界的门槛的索罗斯并没把“天才”两个字写在脸上，也未表现在他的工作中，甚至可以说他刚进金融界的时候倒象一只蹩脚的鸭子。

索罗斯的工作是为公司做复式记帐，但他几乎没有一天在结帐时能够做到借贷平衡，主管每天都要重新核对一番，自然对索罗斯心存反感。

接下来，索罗斯到了套利部，开始从事黄金、股票的买卖，设法从不同市场间的价格差中套取利润。在新部门中索罗斯表现仍不算出色，不久，他又回到总公司。

尽管索罗斯卖力工作，但仍不尽如人意，这种琐碎细致的工作不适合他，让他感到丧气。

索罗斯又有些坐不住了。

一个周末，索罗斯赴巴黎与哥哥见面，由于遇到大雾，直到星期二才回到办公室。很快，总裁通知索罗斯到他办公室去，向他表示不满，并且告诉索罗斯虽然公司不在乎他留下，反正他的薪水不高，但很难找到一个他适合的职位。此时索罗斯已心生去意。

说来凑巧，当天中午索罗斯和同事劳勃·梅尔一块吃饭时聊起和总裁谈话的情形，劳勃·梅尔马上表示，他父亲是纽约一家小型经纪行的老板，正需要人帮忙，并问索罗斯是否感兴趣。

考虑一段时间后，索罗斯终于做出又一个影响其整个命运的决定：到美国去。

总的看，在英国的八年时间对索罗斯的一生非常重要：他脱离了家庭的羁绊，开阔了眼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索罗斯就已具有了国际眼光，他一直是“世界公民”；他完成了学业，并奠定了哲学基础，成为一生事业和生活的动力源泉；他开始了事业的探索，尽管还远不算成功，但这段时间打下的基础将使其终身受益。

第三章 投资天才

“你的思想必须全球化，不能局限一隅。……你必须了解此地的一个事件会如何影响另一地的情形……”

1956 年，索罗斯来到美国。他身上带着 5000 美元，这是他到达美国时的几乎所有家当。

办理到美国的入境手续时也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小故事。索罗斯还只有 26 岁，美国人认为他太年轻了，除非他的专业国内急需而且无法替代时，才有可能让他入境，因此把索罗斯拒绝于门外。还是劳勃·梅尔帮了忙，他找到一位当作家的朋友，给索罗斯写了一份证明书，说明从事他的套利交易要求必须很年轻，因为他们都活不长。于是，签证终于拿到手了，而索罗斯则念念不忘证明书上的话，希望能早早脱离套利行业。

这一年晚些时候，索罗斯的父母也来到美国，全家在纽约团聚。

在劳勃·梅尔的推荐下，索罗斯进入梅尔公司（F·M·Mayes），当然是做套利交易员。

索罗斯从事的行业在美国是开路先锋，套利成为热门金融游戏是三十年以后的事情，在美国，几乎没有人比索罗斯更早

并且以如此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其中。尽管 50 年代的企业购并尚很罕见，因此套利行业很难有巨额利润，但从这么早的时候就开始密切注意世界各个角落的利率、汇率等等变化造就了索罗斯异常敏感的神经。

索罗斯要做的是从一个国家买进证券，然后在另一个国家出售。

当时做的主要是石油股票，原因是苏伊士运河危机使石油价格大涨。危机过后，索罗斯的生意变得难做，于是索罗斯发明了一种新的套利业务，他称之为“内部套利”。当时很多公司在发行证券时把普通股、认股权证和债券结合在一起，一开始时不能分开，而索罗斯则设法使投资者能够在正式的分割许可之前就可以买入单个种类的证券。他的创新手段很灵验，生意应接不暇，索罗斯第一次为公司赚了不小的一笔钱。

* * *

索罗斯从交易员做起，但凭着他的才华和对国际市场的了解，他很快成了一名金融分析师。

如他所料，华尔街上很少有人对欧洲的情况感兴趣。美国人根本瞧不起欧洲。二战结束没几年，欧洲靠美国“马歇尔计划”输入血液来维持，但经济繁荣却还要等上几年。

索罗斯可没那么狭隘，他从欧洲来，不仅对欧洲了解，而且善于在欧美两相比较中发现机会。在普通欧美人各顾各的时候，他判断机会已经来临了。

西欧经济开始缓慢地复苏，紧接着成立了“煤钢联盟”，它是欧共体的前身。欧洲股价也大幅上涨，开始有美国人注意到西欧有钱可赚，其中之一就是索罗斯。

这时（1959 年），索罗斯已跳到沃赛姆（Wertheim）公司，成为欧洲证券分析师兼交易员，后来又兼任机构投资推销

员。

初试牛刀的机会出现在 1960 年。

尽管当时能够得到的关于欧洲的信息非常有限，但索罗斯凭着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加上少量的信息为机构投资者们进行投资分析，他自己称那种作法为“闭门造车”。即使如此，索罗斯仍是这些投资者们倚赖的支柱，索罗斯描绘当时的情形说：“当时我成了欧洲投资热中的巨擘，情形有如一群瞎子找到了一个独眼人来做他们的国王一样。”很多大投资机构，诸如“德瑞富斯基金”（Dregrus Fund）以及 J·P·摩根都唯索罗斯“马首是瞻”。

索罗斯第一个开始研究德国的银行业，他发现很多银行的持股组合价值远远高于总资本额，原因是它们的股票和不动产价值已增值不少。

索罗斯对德国的联合保险公司（Allianz）尤其感兴趣，他的一篇文章，指出这家公司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于是，德瑞富斯和摩根开始大量买进。有趣的是，索罗斯的文章引起联合保险公司高级主管人员的不满，并给沃塞姆公司写了一封信，说它的伙计搞错了，联合保险公司没那么好，那么说会误导投资者。

但事实上索罗斯没有错，联合保险公司的股价涨了三倍，索罗斯开始名声大噪。

事业上初露锋芒的索罗斯此时也情场得意。

她也是欧洲人，来自德国，名字叫安娜丽丝（Aanalise）。初到美国，索罗斯对美国姑娘不感兴趣，然而在西安普敦（WestHampton）附近的长岛寇格（Quiogue），他与安娜丽丝邂逅，并双双坠入情网。他们的感情象索罗斯的事业一样发展迅速，1961 年，索罗斯 31 岁，第一次做了新郎。

1961年12月18日，索罗斯成为美国公民。

*

*

*

新婚燕尔的索罗斯士气高昂，希望能再接再厉。他发现“艾克纳——穆恩克纳保险集团”（Achacs Muenchnes Group）所属的各家保险公司互相持股，同样，其价值被严重低估，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分析图表去找摩根面谈，结果摩根反应非常热烈，他等不及索罗斯作更多的备忘录，要他立刻着手买入股票，他们尝过甜头，相信这一次索罗斯仍能慧眼识真珠。这一时期欧洲股市气势如虹，大家都期待着能赚上一笔。

索罗斯的分析没有错，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美国的海外投资业遭到新上任的肯尼迪政府的沉重打击，索罗斯也在阴沟里翻了船。

肯尼迪为了限制对外投资的增加，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推出所谓“利益平等税”（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向对外投资征收15%的附加税，它使索罗斯的业务毁于一旦。

生意上的打击是沉重的，然而更令索罗斯愤愤然的是同事的背信弃义。

在“利益平等税”推出之前，索罗斯还做了一笔关于东京海上保险株式会社股票的大生意。当时那家保险公司准备发行“美国存券收据”（American Depository Receipts, ADRs），索罗斯的设想是先购进该公司股票，然后以这些股票为后盾出售这种收据。这是一种获利颇丰的生意，但风险同样大，因为假如东京海上并不发行美国存券收据，那么所有利润都将成为泡影。公司所持普通股也只能在东京降价出售，势必损失惨重。利益平等税颁行后，风险骤然增加，这笔巨额投资生死未卜。事实上，这笔生意是得到公司一位合伙人的批准的，但当其他合伙人向他提出质疑时，他却矢口否认批准一事，于是索罗斯

只好一人独背黑锅。

事情的结果是日本人帮了索罗斯的忙，收据终于发行，公司赚了一笔钱。但索罗斯依旧情绪低落，最终决定离开公司，因为如果他说出真相，势必引发公司内部的彼此不信任，而再和那个撒谎的家伙呆在一起更令人感到别扭。与其左右为难，不如一走了之。离开之际，那位心怀鬼胎的合伙人对他说，只要他保持沉默，他自己也会从此缄口。

*

*

*

索罗斯的事业第一次遇到挫折，他闷闷不乐地离开沃赛姆公司。然而索罗斯天生具有自我调控的能力，除了金融投资事业，他的生命还有重要的另一半——哲学，索罗斯从没停止过他在知性领域的探索，事业上的不顺很自然地又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生命的另一半上来。

1963—1966年间，索罗斯用了大量时间埋头于哲学的思考和写作，并完成了他伦敦时期的手稿《意识的负担》。他非常希望得到波普尔的帮助，使他的著作能够出版，但是不幸的是，如前面所述，波普尔因为知道他并非美国人而对他的论文评价大打折扣，索罗斯受到冷落。尽管索罗斯坚称他的论文中有重要发现，但这副手稿一直未能付梓。这也意味着索罗斯的哲学理念不可能以专著的形式在世间传播，人们只能从他后来的作品中零散地捕捉他的哲学思想。

索罗斯自认是个“失败的哲学家”。

哲学上的冥思与现实中的赚钱二者对索罗斯来说相距只一步之遥，哲学上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生意场上也处处是“滑铁卢”，既然不能在思想领域树立丰碑，那么就换另一个战场好了。

索罗斯决心赚更多的钱，以此向世人证明他索罗斯并非等

闲之辈。

若干年后，索罗斯谈起自己的这种转变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称自己为“行动思想家。”

“基本上，思考是我生活的重心。我是一个相当喜欢思考的人。我喜欢去了解事物，年轻时就喜欢做些哲学推论。我浪费了许多年轻时光在某些观念上，后来我发现从行动中学习要比从思考中来得迅速。于是我变成行动思想家，我的思考在采取行动上扮演重要角色，而我的思考也因我的行动而有所进步。思考与行动双向作用，日后同时成为我哲学以及生活的印记。”

*

*

*

事实上，索罗斯从没停止过工作，他的后脚刚出沃赛姆，前脚已踏进另一个门槛——安侯公司（Arnhold & S·Bleichroeder）。开始一段时间，美国在欧洲的证券业务被“利益平等税”打垮，因此公司业务清淡，索罗斯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哲学上，但很快索罗斯又调转船头，他发现在金融战场上他更能得心应手。

安侯公司是美国从事外国证券交易的主要公司之一，创立于十九世纪初，有着浓厚的欧洲传统，公司中很多人，包括聘用索罗斯的史蒂芬·柯伦都带着欧洲口音。索罗斯喜欢它的欧洲味儿，在华尔街能找到这种“回家”的感觉可真难得。

索罗斯从分析师做起，很快便脱颖而出。柯伦为自己的用人之举感到满意：“我总希望我用的人会有不错的表现，但他显然十分突出。”

他来自欧洲，天生具有国际眼光。他了解国外尤其是欧洲的情形，在很多美国人还拼不出欧洲公司名字的时候，他对这些已深加研究，包括它们的老板。他会好几种欧洲语言。

44 金钱与梦想

他充满智慧和勇气。

金融业内充满风险、国际套利投机更是如此，谁能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发现机会、创造机会、把握它，发挥它，最后投入赌注，谁才有可能赢，索罗斯完全胜任这些要求。

1967年，索罗斯成为公司研究部门主管。

1994年在伦敦与索罗斯合作的阿斯泰尔（Edgar Astaire）早在60年代就已认识索罗斯，他对那时索罗斯的印象是：

“你可以看出他很聪明、能干、思路十分清晰——也很自信。你可以察觉他的身材似乎不是特别引人注目。你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他是很好的心理学家，很有见地。……他很内向、害羞，所以总是保持低姿态。他不想让人明了他的个性。他经常讲些相互矛盾的事，以求得好效果。他讲很多无意义的话，有时自言自语。他一点不讨人喜欢。”

从这段评价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副“天才”的形象，此时的索罗斯还不是什么大人物，显得个性突出，又让人捉摸不透，更何况他还远未成名，保持低姿态也是必然的。至于不讨人喜欢，这很正常，似乎没有人说过喜欢他。索罗斯从不以别人的好恶为行事标准、从不看别人的眼色，而更多的人对索罗斯则只是敬畏。

*

*

*

60年代末，索罗斯的事业进入又一个时期，此时索罗斯已身价倍增，在公司中举足轻重。安侯公司为索罗斯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事实上，索罗斯一直与安侯关系友好，即使是在他后来离开公司独自创业以后。

索罗斯在原有公司户头的基础上说服公司设了两个境外基金，由他全权负责管理。

第一个基金叫做第一老鹰基金（First Eagle Fund），它是

在原货车运输业股票户头的基础上成立的，创立于1967年。按照华尔街的语言，它是一种多头基金：即建立多头仓，期待市场上扬。

第二个基金叫做双老鹰基金（Double Eagle Fund），创立于1969年。它是个避险基金。

避险基金（Hedge Fund）的创立者是亚力山大·温斯洛·琼斯。琼斯曾作过新闻记者和学者，他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整个经济中某些部分表现很好时，其他部分表现却很差，于是他设立了一种投资比例，也就是避险基金。这种基金的一般作法是如果看好后市，那么投资者可以用80%的仓位做多，另外20%的仓位放空。反之，如果看坏后市，投资者可以做出相反的选择，即用80%的仓位放空，而用20%的仓位做多。这样做的最大目的是调整投资者的风险，靠投资整体获利。早期的避险基金只投资股票，后来的操作范围则大大扩大了。

1957年，沃伦·巴菲特，另一位伟大的投资专家建立了自己的避险基金，但到1969年索罗斯启航时，几乎还很少有人知道避险基金为何物。索罗斯是避险基金的元老之一，后来他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避险基金——量子基金的主持人。

避险基金从创立到60年代末，基本上不成气候，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它，除了少数几位高瞻远瞩的投资人，例如巴菲特和索罗斯。1971年，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机会来临，避险基金活跃起来，但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的到来，市场陷入低谷，许多避险基金倒闭。80年代末开始，又一批避险基金经理人迅速崛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索罗斯。

索罗斯用自己的钱创立了双老鹰基金，投入25万美元，但很快就有600万美元拥入，索罗斯在欧洲有很多朋友，声誉颇佳，因此他的第一批基金投资人多数是欧洲阔佬。

索罗斯这个基金的架构，可以让他拿股票和债券当担保品，买进任何数量的金融工具，包括股票、债券和货币。

索罗斯的基金不收美国客户，尽管很多美国人十分渴望加入他的基金。这是一家境外基金，设籍在荷属安第列斯群岛的库拉索岛（很多境外基金都是如此），这样有着明显的节税效果。索罗斯很相信基金对欧洲人的吸引力，但美国有“利益平等税”，索罗斯不愿有美国人加在里面，当然他自己是个例外。尽管他也是美国人，但他未受这项税收的影响。

两家基金在索罗斯的主持下欣欣向荣，索罗斯权力很大，这是他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事情，索罗斯有了大展才华的机会。

阿瑟·勒纳（Arthur Lerner）是纽约银行（Bank of New York）的分析师，1967年和1968年安侯公司本想挖角，但两次均遭婉拒。1969年初，他终于点头同意，到安侯的第一件工作是当索罗斯的助理，帮助他经营两个基金。接下来两年，两人并肩共事。

那两年内，市场波动很厉害，工作更为紧张和富于戏剧性。在索罗斯手下做事既忙且累，但很有趣。

“乔治是个严厉的主管，”勒纳回忆往事说，“他要你全神投入，他精通全球事务的能力，令我吃惊。A点一发生某个事件，他几乎能够马上理解个中涵义，并带你到B点的结果上。我没有这种推理能力，因为还不到他那个层次。他可能是我见过的最为宏观的投资人。至于微观的小事情，他就没有那么专注，或者没尽全力去表现得那么好。

“……乔治很早就看出，你的思想必须全球化，不能局限一隅。……你必须了解此地一个事件会如何影响另一地的情形。以前货币汇率的变动不重要，但他从各个消息来源取得基

本信息，并且放在心中呵护。接下来他会提出一个结论，而
些结论大部分时候都会变成现实。”

* * *

索罗斯与众不同。

他看起来和公司其他大部分人不一样，实际上，他和华尔
街其他大部分人都不同。而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心灵。他一直在
思考，想大的事情，随便讲一句话，办公室其他大部分同事都
要赶紧查字典才晓得什么意思。连勒纳都要稍微想一下才懂。

索罗斯被认为是办公室里的文人，但他的文风却没人能够
认同。“我不明白乔治写的东西为什么会那么难以理解。他的
风格和我的风格不一样。我已经习惯写报告给一般人看，乔治
的写作风格却很文诌诌。”

正这个时候，索罗斯开始撰写《金融炼金术》，阐述自
己的投资理论，他提出所谓“双向反射回馈机制”。1969年，
他曾请勒纳读了书内五章文字。“我连一个字都看不懂，”勒纳
回忆说，

“反射”（reflexivity）这个名词叫他想不透，只好翻字典
去查，25年后，也就是1994年春，勒纳承认：“到今天我还
是不了解那个词，根本搞不懂他到底想说些什么。”

问题不在于索罗斯的智商高于或低于其他人，勒纳认为问
题在于他无法表达内心想说的事。勒纳想从书内找到索罗斯理
论的精要之处，在那几章却看不到，于是打了退堂鼓。

勒纳觉得他和索罗斯很亲近，于是给了索罗斯一些善意的
忠告。“乔治，别想当老师，因为如果你想教底下的人——大
部分人都会……。”

他没有就此打住，进而坦率地说：“你很不会表达自己真
正的意思。”

象勒纳这样敢于直言相告的人很少，实际上，或许对索罗斯来说，听听类似勒纳那样的人对他说的话，应该有利而无弊。其他人不像他那么聪明，但这些人不可避免地，是他想引起注意的人。而想引起他们的注意，就必须把诉诸文字的想法讲得更清楚明白。“乔治，你最好找个编辑，也就是找人帮你把那些想法写成简单易懂的英语。”这就是勒纳想要告诉他的话。这话虽说得露骨，但确是一番好意。

索罗斯不理这一套，他习惯于我行我素。而更多的人则表现得很知趣，他们或许看不懂他的理论，但知道索罗斯的力量。由于这个原因，请人评论索罗斯的作品时，大部分人都不会试着说出那样的话。他们心知肚明：既然他不想听他们的话，何必自讨没趣？何必让那个人不高兴？

*

*

*

既然你们不明白，那就走着瞧吧！索罗斯决定到市场上测试他的反射理论。他深信反射理论能给他带来竞争优势。

“我把钱投到嘴里所讲的地方，而且本身不能与个人的投资决策脱离。我必须运用所有的智慧，我发觉我的抽象性观念呼之即来，令人十分讶异和愉快。说我的成功应归功于它们，是有点夸张；但毫无疑问，它们给了我优势。”

索罗斯经营双老鹰基金打的第一个漂亮仗是对抵押贷款保险公司（Mortgage Guaranty Insurance Company），即所谓魔术公司（MAGIC）的投资。当时加州的住宅市场崩盘，市场人士认为，该公司会破产，不料这家公司竟然熬了过去，使他们赚了不少钱。

索罗斯坚持这样的原则——假如股票可以安然度过困难时期，这些股票就应该持有，但千万不能在困难时期持有。这原则说起来容易，但往往别人都不容易做到。

接下来的一大宗生意是房地产投资信托（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REIT）。

1969年，索罗斯在一份流传甚广的备忘录中指出，投资一种叫做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新工具有好处。索罗斯预见到这方面的生意最初是“自我加强”，但到最后是“自败”的——他依然用自己的反射理论来解释。换言之，这种生意到最后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大部分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都会倒。但这种生意还有约三年时间才会崩盘，因此当时可以买进他们的股票。他拿REIT的景气循环周期和三幕剧相比拟，准确地预测到REIT会欣欣向荣，接着走得太过头，最后崩跌。

他展现了出色的先见之明，得出结论说：“由于第三幕至少三年后才会出现，现在我可以很安全地买进受益凭证。”他开始大量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

1974年，如他所料，REIT涨得太高，索罗斯开始放空，赚了100万美元。

早年测试自己的市场理论的这段经验，给了索罗斯很大的鼓舞。

这是他首次在购买空方面得到百分之百的利润。

他也把理论用到60年代末的企业集团的大繁荣上。

起初，他见到高科技公司大肆收购其他公司，使得盈余膨胀，让机构投资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索罗斯相信这些“高涨的基金经理人”的“偏见”，会把企业集团的股价喂养得更高，于是大量买进。稍后，他又趁机放空，并从随后的跌势中大获其利。

第四章 “量子” 出击

索罗斯承认，放空其它机构投资者喜欢的股票，
从中赚钱，使他得到“邪恶的乐趣。”

1970 年，索罗斯和吉米·罗杰斯 (Jimmy Rogers) 携手合作。

罗杰斯生于在阿拉巴拉马州的戴玛波利斯，196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罗杰斯在英国牛津大学念 PPE (政治学、哲学、经济学)，这引起想当哲学家的“亲英派”索罗斯的注意。罗杰斯在军队的两年内，以擅长发掘好股票著称，甚至替指挥官经管股票投资事务。

罗杰斯在华尔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贝奇公司 (Bache & Co.) 做事。1968 年，罗杰斯以区区 600 美元，开始在股市操作。并已显露出高超的理财天赋，两年后，他到安侯公司，在索罗斯的手下做事。

两人比肩和整个世界交手。

罗杰斯是一位很杰出的分析师，而且工作很勤奋。另一方面，他也理解并认同索罗斯的思想架构和投资哲学，所以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很好。但是那时候，新的经纪商管理法规正好

实施，不允许索罗斯或罗杰斯从公司的股票操作利润中分得一杯羹。虽然安侯不希望两人离职，并极力挽留。但是索罗斯和罗杰斯渴望当独立的基金经理人。他们终于递出辞呈，自创公司。

*

*

*

索罗斯和罗杰斯，华尔街上最好的团队之一。

1973年，他们创立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它的前身是双老鹰基金，而它又是后来的量子基金的前身。双老鹰基金1969年创立之初的资本额是600万美元，而四年以后他们的索罗斯基金的资本额为1200万美元。

在新公司中基金经理人可以得到全部利润的20%。索罗斯和罗杰斯把所得到的利润继续投资在基金之内，于是可以和其他股东一样按投资比例分红，再加上每年20%的利润，所以他们的持股比例日益增加。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办公条件相当困难，仅有的三个房间，俯视纽约的中央公园。离华尔街很远。

这在当时是很怪诞的做法，对投资有兴趣的人，怎么会把自己放在距权力中枢那么远的地方？

詹姆士·罗杰斯喜欢这样解释：“他、乔治·索罗斯和典型的华尔街思想不合，因此似乎找不到好理由置身于华尔街上。”对索罗斯来说，更重要的是，办公室离他中央公园西区的时髦公寓只有一街之隔。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工作风格和华尔街其他公司的紧张忙碌步调比起来，闲散轻松许多。有时，职员穿网球鞋上班，包括罗杰斯在内，有几个人是骑脚踏车上班。索罗斯和罗杰斯喜欢办公室这种非正式的气氛。他们期望继续保持下去，不管赚了多少钱。实际上索罗斯的穿着总是很整齐。

尽管环境似乎很宽松，但每人每周要投入 80 个小时在工作上。

刚开始的时候，公司只有两个人，索罗斯管操作，罗杰斯管研究。喔，还有第三个人，那是秘书。

办公室看起来很小，但是两人能做的事很多。此时他们都认为，规模小反有好处。他们可以专注于手头上的工作，不必担心撞到别人，做很多文书工作，也不必烦恼办公室变大时，必须处理无数杂事。直到后来基金规模扩大了很多后，情况才变得复杂起来，并且成为最后导致这对华尔街上的黄金拍档分手的原因之一。

索罗斯基金在各式各样的市场中都有操作，包括货币、商品、债券和股票，这在同行中是前所未见之举。如果要赌商品和货币，索罗斯和罗杰斯会利用期货或借来的钱。

从 1970 年创业，到 1980 年终于分道扬镳，索罗斯和罗杰斯从来没有一年赔钱。华尔街的人谈到他们，越来越肃然起敬。他们似乎比其他任何人，更懂得经济将往哪里走。

1971 年，索罗斯的基金的资产净值是 1,250 万美元，一年后，为 2,010 万美元。从 1969 年 12 月 31 日起到 1980 年 12 月 31 日止，索罗斯的基金赚了 3,365%。同期内，标准普尔综合股价指数只涨了 47%。

1980 年底，该基金值 3 亿 8100 万美元。

这个基金是私人持股的合伙组织，和较为传统的其他基金比起来，有着很多优势。最重要的是它敢于放空，而对某些投资人来说，这么做的风险太高。

同时，放空这种行为也有着道德上的压力，在某些人眼里，这种听起来像是没有什么害处的技巧，是不够爱国的行为。

他们振振有词地说：你怎能赌一家公司的表现会不好？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国人？你對自己国家的经济没信心吗？你是什么样的人，试图从别人的不幸中牟利？

索罗斯不管这些。他不愿把道德问题搅到生意上来，尽管他也不赞成米尔肯掀起的“垃圾债券”风波。

对他来说，放空的技巧有如魔咒，可以在美国和海外市场获得庞大的利益。

索罗斯基金的好处之一是：它的规模小；没有繁琐的官僚作业程序，建立和轧平股票仓位远比大公司容易。

索罗斯和罗杰斯配合得天衣无缝。

“如果我们的看法不同，”罗杰斯说，“通常我们什么事都不做。”

但是不见得永远如此。如果其中一人对某笔操作有强烈的信心，他会照自己的看法去做。

“等我们做完事情，”罗杰斯说，“那笔操作是对或错，就十分清楚。我们彻底思考过某件事情后，共识便会形成。我讨厌用这个字眼，因为取得共识的投资是个灾难，但是我们似乎只有相同的看法。”

*

*

*

他们以能各自独立思考为傲。

这也种下日后两人终于分手的原因。他们都能独立思考，结果发现两人之间有太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两人的暂时合作却有如加足油的机器。两人都认为，他们不可能从其它华尔街分析师身上学到太多东西。依罗杰斯之见，其它华尔街分析师只是随群众而舞。

因此他们只选择自己要的股票。

两人的分工情形是由罗杰斯做研究，而索罗斯做出决策。

罗杰斯的分析做得非常棒，但他从不做决定。

“他从不扣扳机，我不让他扣扳机，”索罗斯说。

索罗斯的原则是先投资后研究，如果投资出了问题，他自己也加入研究。有时两人会发现意见相左，“事实上，这是最理想情形，”索罗斯认为，“原因是我们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撒手。一旦掌握住状况，持有股票就很安心，但我仍不断注意是否出了毛病。有时我们也察觉到先前的想法竟然大错特错，那时我们就会尽快撒手。”

两人翻阅很多资料。他们订了三十种业界刊物，包括《肥料溶液》(Fertilized Solutions)和《纺织周刊》(Textile Week)。他们也研读一般性的杂志，到处寻找可能有价值的社会或文化趋势。数百家公司把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名字列在邮寄名单上。该基金的档案包括1,500多家美国和外国公司的纪录。每一天，罗杰斯都要深入阅读二十或三十份公司年报，希望找出若干有趣的企业发展形势或若隐若现的长期趋势——也就是别人看不太出来的某些东西。

他们孜孜不倦寻找的“某些东西”，是突然间的转变。

索罗斯时时提高警觉，注意某类股票突然间的转变，也就是别人还没看出来的转变，好用以测试他的理论。正如罗杰斯所说：“我们对一家公司下一季会赚多少钱，或者1975年铝的出货量会是多少，不如对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会如何影响一段时间内某一行业或某一类股的命运感兴趣。如果我们看到的和某支股票的市场价格间有很大的差距，那再好不过了，因为我们就有机会赚钱。”

*

*

*

机会出现在70年代初的美国银行业。

长期以来，银行业声名狼藉，在一般人眼里，银行业从业

人员脑满肠肥、笨拙迟钝，几乎没人相信银行业能从深睡中自己苏醒过来。投资人理所当然对银行类股不感兴趣。然而1972年，索罗斯察觉到这个行业即将有所转变。

索罗斯凭着敏锐的感觉发现一群新生代的银行从业人员刚从一流的商学院毕业，他们踌躇满志，充满活力。虽说表面上默默无闻，但很快便会接掌大权。这些新一代银行经理人念念不忘的是财务报表——而这将有助于银行类股的前景。而且他们利用了新形态的财务工具，因此银行业的盈余看涨。不过银行类股价格几乎仍然没有涨。许多银行业者运用财务杠杆已到极限，为了继续成长，必须增加股本。

1972年，第一国民城市银行（First National City Bank）请证券分析师吃晚饭，展现了前所未见的积极进取态度。乔治·索罗斯没有接到邀请，显然觉得很遗憾。但是这次晚宴促使他采取行动。他写了一份由经纪商发表的报告，题为《成长型银行真相探讨》，预示道：虽然银行类股价格目前表现平平，但很快就将起飞——这个看法和别人所想不同。这份报告发表的日期恰在第一国民银行的晚宴举行之日，索罗斯把他的立论依据放在这家银行股票背后。他推荐了一些经营管理比较好的银行。

银行类股价终于开始上涨，索罗斯赚得50%的利润。

有趣的是，随着银行业否极泰来，进而引发70年代的借款风潮，这股风潮又推动了80年代美国企业的扩张和合并热。索罗斯根据自己的反射理论，找到了一个荣枯周期中荣面的开端。

索罗斯是天生的国际投资者，他从没有忘记在国外市场投资。在国内业务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也在寻找即将大跃进的外国经济，好掌握外国股市的投资良机。哪个国家正要对外资开

放市场？哪个国家就要提出经济稳定的新政策？哪个国家致力于市场改革？

索罗斯希望从宏观的层次上取得致胜优势，他从前的一位助手说：“他就像其他任何优秀的人，总是设法拿 5 分钱赚 25 分。”

对于未臻成熟的市场，如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索罗斯会放长线钓大鱼。他希望能抢在其他投资人之前 6 到 18 个月，先进场投资。因此他在各国都握有股票。

1971 年某段时间，索罗斯的基金有四分之一的资产投资日本股票，结果大获全胜，赚得一倍。

索罗斯和罗杰斯选股很精明。他们见机行事，不放过任何能带来利润的机会。1972 年某日，索罗斯熟识的一位朋友告诉他，商务部一份不对外公开的报告说，美国对外国能源的依赖越来越强。于是，索罗斯基金买了大量的石油钻探、油田设备和煤矿公司股票。一年后，也就是 1973 年，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导致能源类股价格激涨。石油危机给索罗斯带来大把美元。

1972 年，索罗斯和罗杰斯也预见到粮食危机，买进了肥料、农业设备和壳物加工公司股票，赚得可观的利润。

*

*

*

他们再接再厉，同年索罗斯和罗杰斯欣喜地发现美国国防工业潜在着投资获利的良机。

1973 年 10 月，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事出突然，以色列措手不及。开战头几天，以色列处于挨打局面，死伤数千人，损失许多飞机和坦克。由此可见，以色列的军事科技已经落伍。阿拉伯人背后是苏联人，于是，索罗斯得到结论：美国的军事科技也过时了，这是美国政府绝对不

能容忍的情况，国防工业必然要加大投资。

大部分投资人听不进这种判断。因为越战结束后，国防公司赔了很多钱，人们心有余悸，金融分析师们对此也不感兴趣。

但是1974年初，罗杰斯开始特别注意这个行业。国防工业的潜力，激励罗杰斯启程上路，前往华盛顿，会晤国防部官员，并风尘仆仆造访美国各地的国防承包商。索罗斯和罗杰斯越来越相信他们是对的——而且别人将错失大好良机。

1974年年中，乔治·索罗斯开始大量购买国防类股。

他买了诺斯洛普（Northrop）、联合飞机（United Air - Craft）和格鲁曼（Gruman）等公司的股票，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当时经营惨淡，大有破产之虞，但索罗斯还是决定下赌在它身上，1974年底他投资了这家公司。

他和罗杰斯掌握关于这些公司的一项重要信息。它们全有重大的合约，如果续约，未来几年将有新的盈余流入。

他们从不打无把握之仗。

索罗斯和罗杰斯还注意到这样的事实。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以色列空军损失惨重，主要是欠缺精密的电子反控制能力，无法抵敌阿拉伯交战国拥有的苏联制武器。

他们认识到现代战场已从根本上起了转变。如今需要的是一套全新的现代装备武器：感测器、雷射导引的炮弹以及“智能型炸弹”。

所有这些东西，都要花很多钱。

1975年初，索罗斯基金开始投资电子战设备供应商的股票。索罗斯和罗杰斯所料不错，假想中的未来战争给他们带来滚滚财源。

大概在 1978 或 1979 年间，索罗斯摸对了科技股的行情，那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当时罗杰斯认为，全世界都在从模拟科技转到数码科技的过程中，因此他想抛空模拟科技公司的股票，但索罗斯却有意超买。当时科技公司的股票已失宠，虽然资料处理的代理业务“象野火般兴盛”，但这些公司的股票只能以很低的市盈率出售，原因是市场规模扩充得太快，供应商很难维持原有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投资者也很担心大公司中途杀入，把这些羽翼未丰的公司彻底打垮。因此，这些公司都很难向外筹措资金，而必须依靠本身的现金寻求成长。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公司应付不了市场需求，以致让电脑业的大型公司随时有机可乘，可以进入市场。这是最糟糕的一种自给自足的幻想，但索罗斯相信假如投资者的心理扭转了，能够向这些公司增加投资，那么赚大钱的机会就会出现。

他们俩跑去蒙特雷（Monterey）出席美国电子协会（American Electronics Association, AEA）的会议，花了一周时间和企业经理们会面，每天大概和八至十家公司的人会谈，结果他们掌握了这个难以掌握的行业。他们选择了五个最看好的领域，每个领域选择一种以上的股票。此后一两年，他们几乎坐享这番努力的成果。

*

*

*

1975 年，华尔街圈内人开始注意到乔治·索罗斯这个人。讲得准确些，他赚钱的才华吸引了注意的眼光。没人怀疑他注定名利双收。

人们开始关心他的一举一动。

1980 年代和索罗斯共事的艾伦·拉法叶（Allan Raphael）认为：“他工作得很卖劲，时时张大眼睛看事情，作风积极进取。在那一行，他真的十分拿手。这个行业不见得需要靠合乎

逻辑的理性思考，需要的是直觉本能。这个行业里，过去所有的经验汇集起来，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而我认为乔治拥有这些才能。”

虽然华尔街上的一些人开始认识他，但在华尔街以外的世界中，索罗斯几乎默默无闻。

那时候，投资高手很少被人注意，这和 80 年代、90 年代不一样。那时的新闻媒体不怎么喜欢报导华尔街上每件大小事情，因此对金融市场上的大人物，兴趣远不如今天——而今天，这些大人物，不管事业生涯，还是私人生活，都被媒体盯得紧紧的。

同时，华尔街上普遍认为，投资本来就是很机密的行为，因此吸引新闻媒体报导，徒然是惹祸上身，就像死神之吻，起初诱人，最后将跌入万丈深渊。一般人认为，华尔街投资人最糟的命运，是玉照上了发行量广大的杂志封面。一举成名天下知，不只要付出代价，还可能致命。

索罗斯和华尔街上大部分同行仍对新闻媒体有所顾忌，没人愿意给自己惹麻烦。

乔治·索罗斯躲在聚光灯圈之外。这样的姿态，他似乎非常放心。老友拜伦·韦恩（Byron Wien）说：“依我和他共事的经验，乔治从不自我吹嘘，即使出风头有好处也不干。”

但是 1975 年 5 月 28 日，华尔街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推崇有加的报导，强光照在乔治·索罗斯身上。文章的标题让索罗斯很早尝到新闻媒体宠誉的滋味：

“逆势表现：证券基金

回避流行作法

苦战华尔街，财源滚滚来

索罗斯基金发现各行各业的基本变迁”

这篇文章的要旨，在于夸赞索罗斯不人云亦云的投资理财思想，并且断言自有主见是索罗斯基金赚得庞大利润的主要原因。这似乎应使索罗斯高兴才对。

但刊出这样一篇文章的筹备过程中，索罗斯心情却很糟。当华尔街日报记者坐下来访问时，这位投资家抱怨背部长期疼痛，而且每当基金经营不力时，背痛得就更厉害。他像吐苦水般坚称：“基金管理是最残酷无情的一种行业。你不能自欺欺人，连喘口气也不行，因为你的分数每天都有纪录。”

接下来是一段有趣的说法，索罗斯的语气中，对未来相当悲观，这和他的基金后来令人难以置信的优异表现相距十万八千里。

“谁知道这个基金能在多长的时间内一直表现很好？历史告诉我们，基金经理人最后都会燃烧殆尽，我敢说，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如此，只希望不要今天下午就出现。”

这篇报导以索罗斯微笑面对股票报价机为引子。当时他正大量放空某知名建材公司的股票。他预期这支股票的价格会下跌。几家大型机构投资人试着把他卖出的股票全吃下来。

“你瞧，银行的信托部门急着买进，”索罗斯笑着说，“为什么？我刚卖出的一些股票，卖价比前一笔价格高一点儿，却有人抢着跳下去承接。”

接下来几个星期，这支股票的价格一路狂跌，索罗斯的帐面获利不少。那些多头投资者，则在这次交易上大蚀其本。

华尔街日报如此赞誉索罗斯和罗杰斯：

“这么多年来，两人的拿手好戏，是在某些股票未受青睐前就买进，等到如日中天之际再卖出。他们通常忽略大型共同基金、银行信托部门和其他机构投资人普遍持有的股票——除非有放空良机。”

索罗斯则这样总结：

“我们一开始便假设股票市场总是错的，因此如果你模仿华尔街上其他每个人的行为，注定会有很差的表现。华尔街上大部分证券分析师只是企业管理人员的传声筒，抄袭公司的年报，做成自己的投资报告，或者彼此抄袭，而且很少发掘出有价值的东西。”

*

*

*

乔治·索罗斯倜傥不群的行事风格，正是他标准的操作程序。

索罗斯基金的拿手好戏是放空。索罗斯承认，放空其他机构投资者喜欢的股票，从中赚钱，使他得到“邪恶的乐趣。”他的基金和几个大型机构对作，大量放空他们喜欢的股票。最后这些股票价格果真急转直下，索罗斯基金赚了大钱，而那些机构投资者则叫苦不迭。

索罗斯玩雅芳公司（Avon）股票，便是放空牟利的典型例子。为了放空股票，索罗斯基金以 120 美元的市价，借了一万股雅芳股票卖出。接下来这支股票价格大跌。两年后，索罗斯以每股 20 美元的价格……买回股票。就象用 5 分钱赚 25 分那句老话，结算下来，每股股票赚 100 美元，整个基金总共赚了 100 万美元。之所以有如此法力，是因为索罗斯从文化演变趋势看到获利良机；早在雅芳的盈余开始急降之前，他便洞悉人口逐渐老化，化妆品业的营业收入也将大不如前。

索罗斯玩味地说：“在雅芳的例子中，银行业没能了解二次世界大战后化妆品业的繁荣已经结束，因为市场已经饱和，而且小孩子不再用那种东西。这是他们失之交臂的另一个基本变迁。”

索罗斯能够准确地预见市场将发生的各种变化，当然也有

失误的时候，但赚的要比赔的多得多。

1970年代初，华尔街上人士很多惨遭浩劫，乔治·索罗斯却与众不同，惹人注目。1969年1月到1974年12月，索罗斯的基金的受益凭证价值约涨为三倍，从610万美元上升到1,800万美元。这段期间内每一年都有钱赚。

但同期内标准普尔500种股价指数下跌3.4%。

他们我行我素，独立思考，不受别人左右，而且做得十分成功！

1973年和1974年，许多大型机构投资者眼见自己的持股价值减半，个个心灰意冷。索罗斯却有辉煌的成绩，1973年赚了8.4%，1974年赚了17.5%。

那时和索罗斯共事甚密的罗伯特·米勒回忆说，索罗斯“有个本领，能在人尽皆知之前，便找到某些概念，而且能够拨开云层，看到灰云边缘闪耀的光芒。……他十分清楚为什么应该买进和为什么不应该买进。乔治另一个突出的能力，是发现自己身陷错误的处境时，会毅然决然脱身而出。”

1976年，索罗斯基金赚了67.9%。1977年，道琼30种工业股价指数下跌13%，索罗斯基金却赚31.2%。1976年底和1978年初，索罗斯和罗杰斯又决定建立科技和国防类股的仓位，看法和其他人南辕北辙，因为大多数华尔街交易人不碰这些股票。摩根史坦利公司的巴顿·毕格斯（Barton Biggs）说：“不要忘了，吉米·卡特当总统，谈的都是人权。乔治却早在华尔街人士之前18个月，大谈这些股票。”索罗斯怪自己太晚才注意到这些股票，可是仍领先几乎其他所有的人。

1978年，索罗斯基金的投资报酬率是55.1%，资产成长到1亿300万美元；接下来一年，也就是1979年，赚了59.1%，资产为1亿7800万美元。索罗斯的高科技股投资策略

略仍很赚钱——而且没有“燃烧殆尽”的迹象。

1979年，索罗斯把基金改名，叫做量子基金（Quantum Fund），以纪念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格（Heisenberg）所提出的量子力学的不确定原理。这个原理说，人不可能预测量子力学中次原子粒子的行为。这个观念恰和索罗斯的观念相吻合，因为他认为金融市场一直处于不确定和变动不已的状态，如果把显而易见的情形预先纳入考查，然后下赌注在出乎意料的事情上，便有可能赚钱。

量子基金的表现非常之好，它的受益凭证供不应求，价格暴涨。

*

*

*

乔治·索罗斯赚那么多钱，难免有人要质疑：他所有的金融运作都是光明正大的吗？

索罗斯几乎从不考虑投资中的道德问题，而且行事大胆，奇招迭出，每招似乎都擦边而过，不把华尔街上人人敬畏的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SEC）放在眼里。他遇到的为数不多的挫折中，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的诉讼案。

当时证管会向纽约的美国地方法院指控索罗斯，状告他炒作股票，罪名是民事诈欺和违反联邦证券法的炒作防制条款。

根据证管会的状词，1977年10月电脑科学公司（Computer Sciences）股票公开上市前一天，索罗斯把每股票价格压低50美分。证管会说，他涉嫌指使某位营业员积极卖出电脑科学公司的股票。状词声称，这位营业员卖出该基金所持4万100股中的2万2400股，占1977年10月11日电脑科学公司成交量的70%。

证管会宣称，由于“人为压低”价格，该公司股票上市价格只有每股8.375美元。据说最大的受害者是加州非营利公司

琼斯基金会 (Jones Foundation)，1977 年 6 月，它曾同意出售 150 万股股票给投资大众，并以公开上市相同的价格另卖 150 万股电脑科学公司股票。据称这次涉嫌炒作，可能使该基金会损失约 750 万美元。

证监会说，索罗斯基金向承办上市的管理人员买了 15 万 5000 股，并以较低的价格向其他营业员买得 1 万股。证监会指控，在上市当天以及那个月稍后，索罗斯下令再买 75,000 股电脑科学股票，以便把价格维持在每股 8.375 美元或更高的价位，同时劝诱“他人买进”这支股票。

面对证监会的指控，索罗斯的做法很简单，他签了一纸同意令，既不承认也不否认陈述的指控，就此结案。他辩称，和证管会对簿公堂，太浪费他的时间和金钱。1981 年一篇杂志的文章引用索罗斯的话说，“证管会不相信像我这样表现那么好的人能不做坏事，所以想探索些东西，好了解何以致此。”

对琼斯基金会的控诉，索罗斯以 100 万美元与之和解。

这件案子没有使索罗斯成为缩头乌龟，也看不出对他的收入有什么影响。

索罗斯在英国外汇市场的表现很好。1980 年，他在高点放空英镑。同时大举买进英国公债，他认为债券价格和价值有一大段差距。据说索罗斯买了 10 亿美元，最后赚进 1 亿。

索罗斯基金创立七年后的 1980 年，是个大丰收年，赚了 102.6%；这个时候，基金成长为 3 亿 8100 万美元。1980 年底，索罗斯的个人财富估计有 1 亿美元。

说来好笑，索罗斯杰出投资本领的主要受益者，不是索罗斯本人，而是欧洲的一些有钱人。这些人在索罗斯基金创立之初，便提供了资金。“这些人不需要靠我们变得有钱，”詹姆士·罗杰斯表示，“但我们把他们变得非常有钱。”

第五章 危机突现

“我得到的报酬是什么？更多钱、更多责任、更多工作、还是更多痛楚？”

接下来是 1981 年的危机。

1979 年，索罗斯才 49 岁，便拥有一生不愁吃穿的钱财，但第一次感受到因工作而起的紧张。他的基金成长得太大，需要更多的员工。原来只有三个，现在变成 12 个。他经营的不再是一家小店，只要和一两个人讲话就可以。现在他必须烦心一些新的事情：把责任下授给别人：一些助理说，他这方面的能力不强。

随着钱愈滚愈多，如何投资的决策也愈来愈多。要挑出前景看好的一堆股票，可没那么容易。然而，真正的困境在于基金规模扩大带来的压力，索罗斯在自己的成就面前一度茫然若失。

“大概在我提出我的三阶段策略（本章稍后将有介绍）时，危机就已蕴酿了，”他这样描述那段心路历程“当时我的事业很成功，我却坚决否认。我工作得很辛苦。我认为假如把我的不安全感抛诸脑后，我的成就就会出现危机。但我得到的报酬是什么？更多钱、更多责任、更多工作，还是更多痛楚？我说

痛楚，原因是痛楚是我的决策工具之一。基金规模已经达到一亿美元，我个人的财产大概也有二千五百万美元，但我已快要崩溃了，这种结果毫无意义，于是我决定面对我的成就，承认我的成功。即使为此不能持续成功也在所不惜。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的成功来自自我否认、自我批评和自虐。也许此举等于杀掉会下金蛋的鹅，但假如生活一天比一天难过，下这些金蛋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要开始享用成功的果实，否则我的辛苦又为何来呢？

“……我的成功定义与工作有关，但与我的生活方式沾不上边。一般而论，成功的好处之一是我可以买得起我希望得到的东西，但我这个人没什么奢侈的作风，我有那么多钱，但相对而言，我的生活是相当简朴的。但这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是我愿意接受多少痛苦、紧张和不安全感。”

“我改变了我的态度，接受我是一个成功者的事实，我抛开了我的不安全感，当然我也知道有多危险。之后我放纵了一段时期，不但和吉姆·罗杰斯散伙，也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分手。”

对索罗斯的婚姻及家庭，我们无从知道更多的内容，索罗斯的说法也充满矛盾。有时他埋怨工作的压力太大，“我和基金融为一体；它因我而生，我和它生活在一起，睡在一起……它是我的情妇。我怕赚钱，也烦恼着做错事，所以要极力避免。那样的方式很糟。”

有时，他又直接否认这与工作有关，而只是因为自己神经错乱。

“这其实是我当时精神错乱经历的一部分内容，但这和我的事业并无直接关系，原因是我太太非常支持我，也很能容忍我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生意。但我改变了我的态度，我们的关

系反而被打乱。于是我放纵了一段时期，又和我的合伙人散伙、和妻子分手……”

我们不知道索罗斯的所谓“放纵”指的是什么，但无论如何，现实是他很少给妻子和孩子带来关怀和爱护，他已经有三个孩子，但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冷淡。一些人认为索罗斯后来的慈善活动与此有关，他是想以此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疚感。

1978年，索罗斯与妻子分居，——就在分居的那一天，他巧遇22岁的苏珊·韦伯（Susan Weber）。他在以前一次晚宴上见过这位女士。她的父亲是一位纽约商人，经营生活日用品，家道殷实，苏珊小姐年青，高高的身体，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她在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ulege）念艺术史，后来协助整理二十世纪画家罗思科（Mark Rothko）和古宁（Willem de Koonning）的记录。“今天我刚和内人分居，”索罗斯说，“可以共进午餐吗？”这是他们的最早交往，5年以后，他们在长岛的南安普顿举行婚礼。

索罗斯的“神经错乱”，破坏了家庭也影响到他的事业。他变得神情恍惚，仓促出招，发现问题又忽然变卦，而有时又反应迟钝，坐失良机。长久以来，他和高层人士接触而受益无穷，但现在似乎找错了对象，至少批评他的人这么说。事实上他花了很多时间和政府官员在一起，特别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伏克尔（Paul Volcker）。基金经理人盖里·曼诺洛维奇（Gerry Manolovici）指出：“如果你的投资建议来自政府人士，只会让自己沦落到贫民救济院里。”曼诺洛维奇后来加入索罗斯基金。

1981年夏，没人认为索罗斯基金会会被送进贫民救济院。不过有些人真的很担心一切不会再那么美好。索罗斯的基金第一次成了“一列没有目的地的火车”。

不久，索罗斯投资美国债券市场搞得基金灰头土脸。

索罗斯投资美国债券市场出问题，始于 1979 年底，当时伏克尔决定抑制通货膨胀率。利率从 9% 上升到 21%，索罗斯肯定经济将因此受到伤害。这样的推断十分合理。那年夏初，债券价格激升，索罗斯开始买进。6 月间，2011 年到期的长期公债价格涨到 109。可惜夏季刚过，价格便跌为 93。

索罗斯本来以为短期利率会涨到长期利率之上；这会伤害到经济，迫使美联储降低利率，因此他的债券仓位会获利。但是经济维持强势的期间远比他预期的要长，结果利率不但没有降，反而涨得更高。

索罗斯以信用杠杆建立的债券仓位，如能维持“正殖利率差”（positive yield carry），一切就没问题。只要债券的殖利率高于向经纪商融资的成本，殖利率差就是正数，也就有利可图。索罗斯在利率为 12% 时建立仓位。但当他的债券殖利率为 14%，而且一度升抵 15% 时，融资利率（成本）则攀升到 20%，产生了“负殖利率差”，利润消失了，而且发生亏损。那一年，索罗斯持有的债券，损失三到五个百分点。据估计，他使客户亏损 8,000 万美元。

然而最糟糕的事情不是赔钱，而是客户的不忠诚。

索罗斯运用很高的信用杠杆，客户听了开始觉得两脚发冷；几位重要的欧洲客户决定退出基金。索罗斯的一位助理回忆说：“他有挫败感，觉得被迫在错误的时刻做出错误的决定。他老是说，除非你愿意忍受痛苦，否则不应待在市场里面。”他在感情上和心理上，都愿接受痛苦，但他的投资人不然。他发觉，致命处在于这群不稳定的投资人。某位大客户“叛逃”的危险，似乎与日俱增。虽然索罗斯到欧洲去了很多趟，企图说服这位重要的瑞士投资人不要退出，但他还是掉头而去，其

他人也跟着退出基金。那时候的一位助理说：“这是他第一次经验，碰到原本忠诚的客户、合伙人离他而去。”

那年夏天，对于以前 10 或 15 年内他曾为他们赚过很多钱的那些人，他十分气恼。赎回资金的过程，令他觉得十分脆弱，因此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他一直没积极揽取新资金加入。”遭受市场痛击，令他心烦意乱，赔钱总是叫人焦躁，但这种困扰比不上别人舍他而去带来的幻灭感。他举棋不定，不晓得该留在这一行，或者退出。”

说来好笑，索罗斯预测经济会转坏，后来证明是对的——但差上六到九个月。他预测高利率会导致经济衰退，后来果然成真，但经济衰退到 1982 年才出现，距他的债券仓位惨遭痛击已经很久。

1981 年的惊惧之夏，正当索罗斯为基金的失败而痛苦之际，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无疑是雪上加霜，那就是某大商业杂志以极尽颂扬之能事的文笔谈论他，发表了一篇恭维奉承有加的封面故事，而这篇文章正巧出现在夏季大挫败前夕，与后来的事实相对照，未免显得讽刺。

1981 年 6 月，索罗斯的照片出现在《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 杂志的封面，笑脸旁是一段文字：“全球最杰出的基金经理人。”

次标题是：“乔治·索罗斯从没赔过一年，赚钱的年头则赚得十分惊人。我们要探讨过去十年他如何与基金管理趋势背道而驰，并在这个过程中累积 1 亿美元的个人财富。”

在这篇文章的引言中，索罗斯被认为是颗商业超级巨星：“正如网球场上的柏格 (Borg)、高尔夫球场上的尼克拉斯 (Jack Nicklaus)、跳踢踏舞的阿斯泰尔 (Fred Astaire)，乔治·索罗斯是基金管理中一等一的高手。”

70 金钱与梦想

文章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索罗斯如何为自己赚到那么多钱，以及索罗斯基金奇迹般的成长：索罗斯基金从1974年区区1,500万美元的资产做起，1980年底已成长到3亿8,100万美元。“替阿姆斯特丹的赫尔津皮尔森（Heldring & Pierson）、巴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Banque Rothschild）等客户管理资金的12年里，索罗斯从没赔过一年；1980年，他的基金赚了102%，十分惊人。索罗斯靠代客操作的费用收入，建立起1亿美元的个人财富。”

索罗斯已经名利双收，他的基金迅速成长，个人财产越滚越大，但此时的索罗斯尚属年轻，随着事业的扩大，他身心承受的压力日重一日，危机已初露苗头，从基金到家庭，索罗斯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危机从索罗斯与罗杰斯的合伙关系处引发，导火索是两人对基金人手的增加怀有异议。

“我们的合伙关系很有收获，不断成长，”索罗斯回忆说，“但这却引起了一些问题。吉姆·罗杰斯不要增加人手，他很喜欢我们的伙伴关系，因此不要外人加入，但我们的业务规模一天比一天大，所以我必须要雇用新人，吉姆一直抗拒，但最后我们还是找了些新手来，由吉姆负责从头训练。这种做法完全背离华尔街传统，因为我们觉得任何人只要有点华尔街经纪商的背景，这个人就已经完全无可救药了。”

两人在对市场的看法很接近，对华尔街人士的看法也相似，差异在于程度不同，而致命的是，两人都坚持自己的论点。

“我们当时的立场是市场总是错的。事实上，吉姆·罗杰斯和我之间的最大分歧在于吉姆认为；流行的观点总是有错的，而我则认为：我们也可能有错。由于我们要和华尔街针锋相

对，事实上我们与华尔街传统之间也有的差异。所以怀着传统智慧到我们公司来的人根本无法适应我们的业务，所谓‘华尔街智慧’其实就是所谓传统智慧、常理。吉姆·罗杰斯对这一点非常坚持，我就比较不那么冥顽不化，我愿意接受从华尔街来的人，但碍于他的观点，而且业务由他一手包办，我只好听他的。”

他们从华尔街以外找来一些人，这些新人都很聪明好学，进步很快，“但是当他们开始受训，并陆续向吉姆提出反对意见时，吉姆却无法忍受，他受不了下属对他的批评。他一向都很能接受我的批评，我批评他，他从来不觉得不愉快，但他不能接受他的门生批评他或和他意见相左。所以只要这些人逐渐上路，并且越来越能干以后，他总千方百计对付他们，使公司的气氛变得不愉快。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总是留不住开始自立的人，于是公司出现了真空，我们生意越做越大，却还得事必躬亲。对我们来说，成功只给我们带来更多工作、更多责任，而这种情形发展下去，最后终于迫使我们散伙。”

实际上，索罗斯心中早有定见，他早就知道他罗杰斯无法再继续合作，因此从1978年就开始实行他的一套“三步走”的基金发展计划：第一步是由他和罗杰斯合力建立一支团队；如果这一点办不到，第二步就是排除吉姆，由他自己独立建立一支团队；假如这样也行不通，那就另请高明之士，由别人来建立团队，索罗斯自己不插手。事实上索罗斯把基金名字改为“量子基金”，目的之一也在于通过把自己的名字去掉来减少个人对基金的影响力，从而为基金队伍扩大创造条件。

1978年，索罗斯基金雇佣了一批新手，开始实施第一步骤，但正如前面所说，计划很不成功，并最终导致索罗斯与罗杰斯的分手；于是索罗斯开始独立经营，这就是所谓的“第二

步”。但是这段时间索罗斯日感辛劳疲惫，并触发了1981年的危机；计划进入第三步是1981年9月，索罗斯退下第一线，把量子基金交给其他人经营，力图从基金的日常事务中退出。

索罗斯与罗杰斯的失和很讽刺，因为1980年是他们合作最成功的一年。但是那一年5月，罗杰斯离开了公司，带走20%的股份，价值1,400万美元；索罗斯80%股份值5,600万美元。

根据纪录，罗杰斯解释他离职的理由，是基金成长得太大，员工太多，他必须花很多时间决定何时给他们休假和加薪。索罗斯和罗杰斯都没有公开详细谈论到底什么原因使两人分道扬镳。罗杰斯接受访问时，往往也无意再提往事。但从他的语气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此记忆犹新且深感难过。

看过《机构投资者》杂志中这篇文章的人，对索罗斯的印象是，他是个神秘的谜样人物，或者是从不透露秘密的魔术师，他常耍一些把戏，但没有不诚实的行为，他异常聪明，甚至才华洋溢。作者指出：“没人相当肯定索罗斯在哪个地方有所动作，或者投资仓位保持多长的时间，而使（索罗斯的）操作纪录周边的秘密色彩增浓一分。身为境外基金经理人，他不需要向证券管理委员会（SEC）登记。他避开华尔街的专业人士。而这一行中与他有个人接触的人，都说从来不觉得与他特别亲近。那么他是为名而奋斗？但这一行里的人普遍同意，没出名时，他一样做得很快活。”索罗斯在很长时间内拒绝接受《机构投资者》采访并做成封面的故事，虽然后来总算同意，但表示：“你面对的是市场，必须埋名隐姓才对。”

那一年夏天，索罗斯多希望他仍默默无闻。可是他已成为新的公众人物。“全球最杰出的基金经理人”此时身陷泥沼。

那年夏天的亏损对索罗斯伤害很深。1981年10月12日

的《福布斯》(Forbes)杂志说：“全世界如果不晓得他的胜利，对于他的挫败也不会在意。”由于《机构投资人》的那篇报导，全世界知晓了乔治·索罗斯所有胜利的往事。因此那年夏天，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注意他。

1981年是基金经营最糟的一年。量子基金的受益凭证价格跌了22.9%，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没有比前一年赚钱。某位人士说，索罗斯的投资人中，有许多是“心绪不定、唯绩效是问的欧洲人”。他们担心索罗斯失去了驾控能力，因此高达三分之一的投资人撤回资金。索罗斯后来坦承，不能怪他们。他们退出基金，使得基金的价值近乎减半——成为1亿9330万美元。

第六章 荣枯相生

他相信一场风暴即将危及全球，他没有办法解释它的性质以及它何时会开始，但希望它发生时，他就现场，度过那惊涛骇浪的时刻。如有可能，则趁机大显身手。

认为乔治·索罗斯会金盆洗手，似乎是很自然的想法。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苦思要怎么办。他有舍弃所有客户的冲动。这么做，至少以后不必面对有人叛离的窘境。

索罗斯之所以成为索罗斯不仅在于他的投资才能，更重要的是他的与生俱来的对这个世界的关注，如果投身政治，他也可能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实际上，有些人确实认为，与其说他后来涉入政治的一系列行为，诸如在东欧的慈善事业，以及在墨西哥和东南亚的兴风作浪是为了他的哲学理念或为了赚钱，勿宁说他自有一股成名立万，引起政坛注目的冲动。

面对困境的索罗斯此时自信心受到打击，但绝非致命，他内心仍在冲突，但已逐渐恢复。“我觉得基金是一个有机体、是寄生虫，正在吸我的血、在耗费我的精力。我扪心自问，自己重要还是基金重要？基金是我赖以成功的工具，还是我是基金的奴隶？这就是促使我实行第三步策略的主要成因。我要退

下火线。”

事态继续发展，危机已成为事实，然而索罗斯一旦找到症结所在，创伤就开始痊愈。

“基金输了，……而我却赢了，因为最后我终于克服了我的问题。”

“我不要成为事业的奴隶，我弄清楚我是主人，不是奴隶。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因为我已经开始接受我是一个成功的人的事实。我一向担心只要我承认成功，就会遭到不幸，但我竟然克服了这种恐惧的心理。”

索罗斯称这段经历使他的人格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甚至他的两任太太会对他“是个怎样的人有不同的认识。”

“但我想那时期我的人格起了很深刻的变化。自责和羞耻之心是我的情绪结构中很重要的内涵，但我克服了它们。我找过精神分析师帮忙，但并不深入。我没有躺在躺椅上，而且也只是一星期去一两次。不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原因是我把我的偏见摊开，而且还发现这些偏见并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我就放弃了这些偏见。”

不管怎样，索罗斯承认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并且以一个成功者的姿态重新面对现实，从遭遇失败到面对成功，这是一段离奇的思想发展历程，但无论如何，索罗斯渡过了危机，接下来的日子中仍有挫折，但索罗斯已如一只成熟的雄狮，充满警觉，却又能从容面对任何危险。

*

*

*

前面我们说过，索罗斯对这个世界有着与生俱来的关注，他不断地思量现实，发现冲突，验证自己的理论，他发现机会已经出现，那就是他所说的“里根大循环”。

1981年1月里根总统上任后，这位有保守倾向的新总统

着手整饬国防——但不提高税负——重新努力对苏联摆出强硬姿态，索罗斯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新的里根政策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不是荣枯相生走势的另一个起点？

是的，索罗斯相信，肯定会是如此。

电视评论员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请索罗斯解释，他在什么时候晓得某个荣枯相生走势就要开始。“在你看早报时，铃声是不是就响起？”史密斯问这位投资人，“那是怎么办的？”

索罗斯说，首先，这种走势不是每天都有。但是他把里根的新政策叫做“里根大循环”，渴望它能启动一个新的荣枯相生走势。他解释道，大循环是“中间一个善意的圆圈，全球体系的周边是一个邪恶的圆圈，基础在于强势美元、强大的美国经济、日渐增加的预算赤字、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以及居高不下的不动产利率”。索罗斯指出：“你有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但它不可能持久，最后必将反转。所以那是一个荣枯相生的走势。”

*

*

*

说来讽刺，虽然索罗斯面对那么多麻烦，他的基金在1982年却有非凡的表现。正如索罗斯的预测，里根的政策振兴了美国的经济，那年夏天利率下跌，股价上涨，金融市场后市转为看涨。荣枯相生走势中的上涨部分十分明显。那年年底，量子基金涨了56.9%，资产净值从1亿9,330万美元上升到3亿280万美元。索罗斯几乎回到1980年的水准（3亿8120万美元）。不过，他还是想退出——至少暂时休息一阵子。

1982年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寻找合适的人选。他终于

在遥远的明尼苏达州找到这样一个人。当时 33 岁的吉姆·马凯斯 (Jim Marquez) 是个少年得志的奇才，经营明尼亚波利斯一个叫做 IDS 进步基金 (IDS Progressive Fund) 的大型共同基金。马凯斯工作勤奋，经营有方，那一年，他的基金成长为 1 亿 5000 万美元，增加 69%，成了 1982 年首屈一指的共同基金。索罗斯和马凯斯那年年初第一次见面，1982 年整年断断续续又见了 15 次面。

每次见面，索罗斯都给这位年轻的基金经理人做“心理体操”，马凯斯发觉，他一次比一次快要听到索罗斯打算请他过去效力。但是马凯斯先坐下来参加了索罗斯一整套的研讨会，因为那位投资大师一直在观察探索，不断问自己，来自中西部的这位春风得意的少年郎是不是合适的人选。

1994 年春，马凯斯在曼哈顿公园大道的办公室，回忆说：“乔治是很会动脑筋思考的人。他常喜欢观察你能不能赶上他要去的地区和要做的事。接下来，有些时候，他会想看看你的思路，以及你跳出圈套的能力。他会找一个目前发生的经济情境，先描述一番，然后说：‘有了这些刺激和投入因素，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样的对应之道？你会怎么做？’”

索罗斯希望能找到一个经理人分担他的责任，使他能够从基金管理中抽出身来，有可能的话，他只想做个幕后人物。在马凯斯眼里，索罗斯似乎毫无疑问想要减轻个人的负担。索罗斯不只一次告诉他：“要玩这场游戏，你必须愿意忍受痛苦。”马凯斯发现索罗斯不想再玩这种游戏，而想找个代理人。马凯斯说：“因此我猜，我是第一位代理人。”

考察持续到 1982 年底，1983 年 1 月 1 日，马凯斯走马上任，全部基金组合中他负责一半，另一半则交给另外十位外部经理人。除了处理国内所有的交易，马凯斯也支援索罗斯的国

际投资行动。索罗斯退居幕后，负责掌舵，保持航船的方向，而马凯斯则开足马力全力冲刺。

虽然索罗斯不再管那么多事，还是经常到办公室。不过，他长期待在国外——春末六个星期在伦敦，秋天有一个月在远东或欧洲，夏天则留在长岛的南安普敦。

索罗斯和马凯斯合作两年，似乎搭配得很好。索罗斯做宏观分析，扫视大图像：国际政治、全球各地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利率和汇率的变化；马凯斯这边，则寻找能从这些预期的新变迁中获利最多的行业和企业。

比方说如，如果索罗斯预期利率上升，他会要马凯斯找出受到伤害的行业，好放空那个行业的股票。在选择买入的股票时索罗斯使用的技巧，是选择某一行业的两家公司去投资，但不是随便选两家。

其中一家必须是那个行业中最好的公司，由于是同行中的翘楚，这家公司的股票最常被人优先购买，价格因而扬升。另一家必须是业内最差的公司，也就是负债最高、资产负债表最糟的企业。投资这样一家公司，一旦其他投资人终于抢进，获取厚利的机会最佳。这是一种有趣而又有效的投资组合，但它依靠于准确的预见性。

索罗斯想在办公室以后台老板的身分出现，目的是按部就班地刺激马凯斯的神经，“因为你觉得好像不断被事后批评，必须不断面对知识上吹毛求疵的状况。我不应该说是吹毛求疵，只是抽丝剥茧、一直探索，而经过一段时间，便感到极其疲惫，非常地疲惫。”马凯斯后来回忆道。

“好多好多次，依你之见，认为他希望事情那样做而照做之后，他回来看你，然后像老师对学生那样讲话：‘你没搞懂，我的意思不是那样。’这一来，你会慌了手脚，因为你本来以

为自己十分清楚他的意思。

“他很容易发脾气。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看人就像要看透内心，感觉上有如面对镭射枪。他可以直接看穿你。他总觉得他需要你在身边，但从不认为你会做对事情，所以只好容忍你，就好像你是次等人类。

“他问你某些事情，你把自己检讨过和一再检讨过的告诉了他，但那不过是你自个儿的想法。他会试着直扑咽喉说：‘昨天你告诉我的事，你还相信那是对的吗？’”

*

*

*

1983年头四个月，是马凯斯了解和适应索罗斯的过程，他觉得那“有点像是文化震撼”。这位新人终于了解“那位尊贵的家伙真的让我完全独立自主和充分行使职权——包括金钱在内——还给了我一条上吊用的绳索。”

每天早上上班前，马凯斯总要举行某种仪式，有时在淋浴时做，有时搭车上班时做：思索当天金融市场可能发生的几种情境。他称此为“预期架构”，然后根据这个架构，做出应买进什么卖出什么的结论。

等到纽约一天的交易结束，索罗斯和马凯斯会积极检讨当天的所做所为，而且经常一谈就到晚上。“那事很快活，”马凯斯指出，“但十分紧张。乔治·索罗斯有件事做得很好，那就是当你解释某样东西时，他能够看着你，而且指出何时你强词夺理。”

索罗斯是个严格的上司，他迫使下属跟上他的步子，有时甚至很残酷。

索罗斯从未松懈下来，他常常盯着这位最得力助手，就像给博士班学生口试。“你现在是不是有和今天早上不一样的想法？”他经常如此开门见山地问，接着抛出似无穷尽的问题

——目的在探讨、寻找马凯斯可能猜错的地方。在马凯斯记忆中，那些检讨是很可怕的经验：“因为他一直在找你的要害，不断试着找出你的说词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乔治会试着寻找市场的走势是不是和你的预期不同。比方说，如果我预期银行类股价格上涨，但银行类股在某段时间内走平后下挫，他会说：‘暂且不要管我们的假设，也不要管你这么做的理由，（首先搞清楚）为什么这事会发生，然后试着（拿它）去与市场的表现相互协调。’”

*

*

*

很多人研究过索罗斯的投资技巧，包括他的理论，他们的发现很多，有一点是所有人都注意到的：“索罗斯的一个关键秘密，是他能接触全球领袖。”

从基金日常业务中抽身的索罗斯有了更多的时间关心基金以外的事情，这样说不准确。索罗斯走的“上层路线”对基金的好处简直难以估量。

索罗斯是打入权贵的俱乐部的少数政坛外人物之一，这种俱乐部无法通过申请获得会员资格，因为其中大部分参与者是富有的国家政治、经济领袖：总理、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会员总数不超过2,000人，而且散布全球各地。

索罗斯不是民选领袖，身分地位当然不能和其他会员相提并论。但是随着政治家的经济力量减弱，以及像索罗斯之流的投资人在金融市场取得愈来愈大的影响力，索罗斯在这些领袖心目中的份量愈来愈重。他们想要认识他，听他对全球经济有什么样的看法。最重要的，他们想了解他可能做些什么。当然了，他有同样的兴趣，了解各个国家的领袖将做出什么决定。

很少投资人能像索罗斯那样打进这个俱乐部。别人只能从新闻媒体上看到这些领袖讲什么话，索罗斯却能轻而易举接触

他们，从而享有优势； he 可以和某个财政部长共进早餐，和某位中央银行总裁吃午餐，或者礼貌性地拜会某位总理。

在轻松愉快的社交场合，索罗斯总能从权贵们口中获得有利的消息，或者发挥他个人的影响。

举例来说，80 年代初某一天，索罗斯受邀出现在英格兰银行，把他认为应如何透过货币抑制措施重振金融市场的看法和与会人士分享。后来他买了价值 10 亿美元的英国债券之后，银行家们的兴致被撩起，纷纷跟进，索罗斯结算时净赚 1 亿美元。

光靠投资才华，索罗斯还不能完全打进全球金融领袖网络，80 年代中期以及稍后，他开始积极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设立基金会，以促进这些地方的社会走向开放，此后便有更多的理由和政治、经济领袖们呼朋唤友，特别是在欧洲。

某位内阁部长出席他的基金会会议，或者他趁参加基金会董事会会议之便，顺道邀请某政治领袖，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尽管索罗斯竭力否认他的慈善活动与投资有关，但我们相信如果这些活动带来赚钱机会，他一定不会拒绝。

在普通人看来索罗斯的确手眼通天，1993 年的某一天，他早上见了摩尔达维亚总统，晚上又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之后，索罗斯夸耀地说：“你瞧，我和一位总统共进早餐，晚餐又和另一位总统在一起。”

这样的接触显然让索罗斯相对于其他投资人占有优势。当然，和政府官员吃早餐，不会让索罗斯知道某个国家贬值货币或者提高利率的正确事情，就算对方是乔治·索罗斯也是一样——讲得明白些，尤其不能向乔治·索罗斯说。

不过和这些领袖过从甚密，索罗斯能借以察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而别人无法获得这种能力。也许那是某位财政部长三

个月前吃午饭时不经意间讲的一句话。而三个月后，索罗斯忽然发现这句话的意义。其中的关键处，在于他已和那位财政部长见过，谈话内容印在脑子里，可以进一步利用，而别人只能从报纸上看到。

正如伦敦华宝证券公司（S. G. Warburg Securities）首席国际经济学家乔治·梅格纳斯（George Magnus）指出的：“索罗斯的确了解全球的事件及其运作程序。

他的欧洲背景，使他在同僚间鹤立鸡群。那样的背景给了他不一样的观点，去看这个世界如何拼凑在一起，特别是德国的统一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欧洲概念。……他有德国人所说的世界观，不受某一国家或另一国家国内问题错综复杂关系太大的污染。（他所做的事是）建构一幅大图象，并将之转化成机会。”

这样的世界观给了索罗斯很大的自信。

马凯斯对此感受颇深，“他不是满足于既有成就的人，但是会说：‘乖乖，这事应该照这种方式发生。’”

“你可以听到他用这样的词汇，如‘这很明显’，或者‘显然可以看出什么事将发生’，或者‘产生这件事的因素，非常简单、直接’。他很会观察整座森林；其他人只看到树木。”

其他投资人不只欠缺一张名片，好进入世界领袖专属的俱乐部。就算他们拥有一张，也很少有投资者像索罗斯那样，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和全球领袖接触，他们会觉得那不务正业。他们比较习惯待在步调紧凑的交易室里。大部分人觉得，周旋于上层人物之间，会让人分心，沾沾自喜，至少可以说是浪费时间。但索罗斯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他能够了解待在交易室的重要性，但也看出踏出办公室的价值；踏出办公室不只是为了见重要的决策人士，也为了有时间思考。正如索罗斯说过的：

“想成功，你需要休闲娱乐。你必须留很多时间给自己。”

*

*

*

索罗斯不善于立即褒奖别人，也不喜欢把功劳与别人分享，这与管理理念格格不入。

“与他分享（功劳），是场永不间断的争战，”马凯斯斩钉截铁地说，“他认为，你的成功是以美元和美分决定的，你拿了钱，就该去赢。”

和索罗斯共事，也有叫人欣喜之处，尤其是对象马凯斯这样的年轻人。他常兴致勃勃谈起有一次，索罗斯请他到爱尔兰参加索罗斯基金的董事会议。会议地点在一座城堡，也就是里根总统任内后来造访的那一座。“气氛十分难得一见。”和董事诸公共进晚餐时，马凯斯凝神倾听。索罗斯不费吹灰之力，视某位董事用的是哪种语言，便从一种语言转为另一种，英语、法语、德语，无所不能，看得马凯斯惊异不已。

当然和这样一位天才共事也有危险。索罗斯不喜欢庸庸碌碌的人，更讨厌有人溜须拍马，马凯斯说：“他有很高的智慧，如果你被他震慑住了，如果你变得曲意承欢，显然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也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如果你说，我想做小索罗斯，我想成为全球一流的思考家，想一些伟大的事情、做个伟大的投资组合经理人，而且我会像他的所做所为那样做事时，很明显的，在办公室里，他不需要那样的人。现在（1994年），他或许有需要，但那时候不需要。想要像这位家伙，就如海上女妖的呼唤，因为如果你真的认为他是这一行里的典范，你马上会发觉到，你根本没有那样的天赋，就是没那样的天赋。”

*

*

*

1983年，索罗斯和马凯斯合作愉快，他们的基金现在为

385,532,688 美元，净赚 75,410,714 美元，比 1982 年成长 24.9%。

1983 年是个好年，可 1984 年不是。这一年，索罗斯的基金增值，但只上升 9.4%，成为 448,998,187 美元。

利润减少，量子基金的董事认为索罗斯心有旁骛，向他施加压力，要他再全心全力放在投资上，他答应收回权力。1984 年夏末，索罗斯向马凯斯摊牌：

“不管喜不喜欢，我都是这艘船的船长，而我见到百年难得一见的风暴即将来袭。在百年难得一见的风暴中，你需要一双最能干、最好、最有经验的手去掌舵。我们必须面对它，在我们两人之中，那个人是我。”

索罗斯决心重掌大权，迎接大风暴的来临，“百年难得一见的风暴”，到底是什么？

基本上，那是指美国经济在里根 80 年代初高支出、不加税的政策后，终将崩垮。索罗斯相信，美国经济将走向萧条。

马凯斯回忆往事说：“那时候，所有的压力都在全球的体系中蓄积起来。美元愈来愈强。里根一直说：‘这很好，一国真正的力量，正好显示在它的货币上。’而乔治·索罗斯认为这只会在某个时点爆裂开来。”

索罗斯计划另雇两人，他认为理想的组织应有四、五个专家，才能提供一两人的小店所没有的深度和纪律。

马凯斯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待在较低层次的位置上，领导一个小组。马凯斯承认，“乔治真的没错，晚上有时候我想破了头，就是想不出该怎么做。有那么多的事情——以及压力——存在。”

但他不愿看到自己的权力旁落，只好决定离开。

*

*

*

在此同时，索罗斯为了寻找新鲜血液，征询十位外部基金经理人的意见。艾伦·拉法叶（Allan Raphael）的名字在这时候出现。

1980年到1984年，拉法叶是安侯公司（Arnhold & S. Bleichroeder）研究部门的两位主管之一。1960年代和1970年初，索罗斯也在安侯公司做事。1992年12月拉法叶又回到安侯当资深副总裁、全球策略部门主任、资深投资组合经理。

1984年8月初，索罗斯决定把拉法叶找来。两人不曾见过面，但拉法叶听过索罗斯的大名。索罗斯的几位外部经理打电话通知拉法叶，说他们已向索罗斯推荐他接手第二高位。拉法叶同样年轻，而且同索罗斯相似之处是：他同样是国际金融研究和投资的专家，并以在安侯公司的突出成就而成名。

索罗斯决定到老东主哪里挖角。

一位经理人对拉法叶说：“你有没有兴趣和乔治谈一谈？”

“当然乐于谈，”拉法叶几乎不加假思索地答道。索罗斯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华尔街的年青投资精英们哪一个不愿一睹其风采？

拉法叶相信索罗斯是华尔街上最优秀的投资人。“他的成功十分惊人。”有可能到索罗斯那里做事，对拉法叶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刚过一天，拉法叶桌上的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令拉法叶激动不已的是，对方是索罗斯本人，“我能荣幸地请您在下个星期四共进早餐吗？”索罗斯问道。

见面的地点就在中央公园索罗斯的公寓中，拉法叶礼貌而又谨慎地同索罗斯交谈，当他知道还有74位候选人等候见面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的机会只有百万分之一。

“选人的工作至少要花上一年时间，”拉法叶心想，“到那

时，眼前这位大亨恐怕早就忘了今天是和谁一道吃饭了。”90分钟过去了，拉法叶不晓得早餐吃这么久的意义何在。两人从餐桌上起身，拉法叶此时已相当平静，他觉得这是适当的时候，可以向索罗斯汇总报告一下自己的背景。

“对你来说，了解我正在做些什么，以及没做什么，是很重要的，”他说，希望讲得不会太激烈、太露骨。他不确定索罗斯是不是把话听进去了。

“太好了，”拉法叶得到这样的回应，“我们会成为很好的工作团队。”

这倒把拉法叶吓了一跳，这是真的吗？还是索罗斯在玩花样？他只能声若蚊蝇地说：“我想大概是吧。”

索罗斯绽开大大的笑容，像是作总结般地说：“这个周末你好好想一想。周一或周二我们见个面。打电话给我，我会请你再过来吃早餐。”

走出公寓大门，踏上街道挥手叫了辆计程车，坐进去，所有动作都在下意识中完成，拉法叶回忆起早餐最后几分钟的情形，忽然心花怒放。或许他是在做梦？趁计程车司机不注意，拉法叶悄悄捏了自己一把，确定不是在做梦。也就是说他可能到乔治·索罗斯那里，当第二号人物！

接下来那个星期二，拉法叶又和乔治·索罗斯共进早餐。索罗斯正式邀请拉法叶去工作。

拉法叶回忆说：“基本上，那就像我们先订婚再结婚：我会照顾你的下半辈子，但先看看怎么样再说。”

不知出于某种原因，拉法叶没有当场接受。几年后，他还是百思不解，何以如此？

“我再想想，”他答道，1994年春，回忆当时见面的情景，拉法叶只能说：“那似乎是合适的说法。”

拉法叶可能想起别人对他的警告（“那家伙很难缠。”“他会炒人鱿鱼。”），但他决定不予理会：“那有什么关系？这是我的机会。所以我愿意稍受虐待；那真的是大奸良机。”拉法叶走向电话，接受索罗斯给的工作。1984年9月初，拉法叶和索罗斯签了约。

*

*

*

1984年底，乔治·索罗斯又调整自己的队伍，但他决定加强在他的基金中扮演的角色。或许他可能很想把棒子交给量子基金的其他人，但还没准备完全下台，这不单是董事们的压力在起作用，问题的关键是索罗斯还没找到一个放心的人来接他的班。

他仍然相信一场风暴即将危及全球经济。他没办法猜测它的性质以及它何时会开始，但希望它发生时，他就现场，度过那惊涛骇浪的时刻。如有可能，则趁机大显身手。

与此同时，他非常仔细地注意基金的运作情形，待在办公室的时间增加，设法确保1984年和1985年都是丰收年。

第一个目标仍是英国。

说来有趣，英国似乎是索罗斯的福地。50年代索罗斯在此求学，度过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可以说英国给了他知识和视野；到了美国后，英国又成了他在金融领域大展身手，名利双收的地方。1980年，索罗斯买入英国公债，获利亿元；1985年，投资英国公司股票，收入颇丰；而令索罗斯一夜成名，成为国际理财大师的1992英镑之战，仍是发生在英国。

1984年12月，他的眼光移到英国。

那时英国刚推动大规模的民营化工作。准备民营化的公司中，引人注目的有英国电信、英国天然气、捷戈娃汽车三家公司。索罗斯清楚，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希望每位英国公民都拥

有这些英国公司的股票。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释出的官股价格必须很便宜。

索罗斯要艾伦·拉法叶注意捷戈娃和英国电信。

拉法叶研究了捷戈娃后，相信该公司董事长伊根（John Egan）爵士做得十分出色。捷戈娃当时的股价是 160 便士，它的汽车已成为美国的热门进口车。拉法叶拿基金的约 4 亿 4900 万美元资金中的 5%，也就是 2000 万美元左右，建立了仓位。在别人眼里，这可是个大仓位，索罗斯则不以为然。

一天，索罗斯忽然出现在拉法叶面前，问他“有什么结论？”

“我已研究捷戈娃。”

“你觉得如何？”

“我真的很喜欢这家公司的表现。我想，关于我们建立的仓位，我们会没问题。”

让拉法叶大吃一惊的是，索罗斯拿起电话，命令他的交易员：“再买 25 万股捷戈娃。”

拉法叶不想破坏索罗斯的好心情，但觉得有责任讲些有所保留的话。“对不起，或许我没把话讲清楚。刚才我是说：‘我们会没问题。’”

对拉法叶和索罗斯而言，“没问题”一词显然意义不同。

在艾伦·拉法叶心里，这句话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事没问题。但在看清前面的路之前，不要投入更多”。而对索罗斯来说，它的意思是“如果你喜欢目前的情况，为什么不带着已经得到的所有东西，跟着直觉本能走下去？”索罗斯对他的助手详细说明他的想法：

“那，艾伦，你告诉我，这家公司做得很好，所以才能否极泰来。这就是他们的现金流量和每股盈余会增加的理由。你

认为这支股票会受人重新评估，价格往上涨。国际投资人都会拥向它，美国投资人也将拥向它。而且，你说，这支股票的价格会涨。”

对索罗斯而言这是另一个难得一见的大好时机，能够测试他的反射理论。他察觉到这支股票的价格会上涨，投资人的狂热马上会生根茁壮，把股价推得更高。

索罗斯讲的话，拉法叶认为没有反驳的余地。

“是啊，”他表示同意，“这支股票的价格绝对会上涨。”

“那就多买些，”索罗斯语气坚定。

拉法叶说了声“是啊”但还是很好奇，不晓得索罗斯是不是真的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

“如果股价会上扬，”索罗斯继续说，“买更多就是，不必在意所建仓位占整个投资组合多大的比率。如果你是对的，去建仓就是。”

索罗斯有信心，捷戈娃和英国电信是必赢的赌注。因为他非常清楚那背后运作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两家公司的财务报表。真正重要的力量只有一个，而且是很重要的事实，也就是撒切尔夫人要使英国国营事业释出的官股十分便宜。

拉法叶还是有些担心，认为索罗斯是在拿全部家当当作赌注，“这不符合他的原则，”他对自己说。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量子基金投资捷戈娃得到的利润是2,500万美元。

*

*

*

常有人拿索罗斯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相提并论，两人是华尔街相比肩的两大超级投资巨星，而且巧的是两位大师级人物同龄。但比较之后，往往发现两人有很大的差异。

巴菲特喜欢专研一件事情，而且只钻研那件事——以低价买进股实的企业。他的投资策略有四大步骤：

- 一、不要理会股市每天的起伏；
- 二、不要过度担心经济形势的变化；
- 三、买下公司，而不是股票；
- 四、管理企业的投资组合。

巴菲特是位受人敬仰的大师，多数人，包括经济学家们都很欣赏他的策略，认为那是对社会有益的投资行为。

索罗斯同样受人敬畏，但那是出于对他的天才和财富权力，绝不是他的行为，更不是人品。他很早就被人称为华尔街上的“坏孩子”。尽管他后来在很多慈善活动中慷慨解囊，一掷千金，但更多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他四处出击，把世界金融市场搅得天翻地覆。即使还不能说索罗斯是声名狼藉的恶棍，但“金融大鳄”，“金融流氓”等恶名却始终伴随其身。97年索罗斯突袭东南亚，一时间东南亚经济草木皆兵，索罗斯的大名，终于在地球的另一端家喻户晓，甚而被视为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国家敌人。

相对巴菲特而言，索罗斯的投资策略比较富有弹性，他根据金融风向的变化而进出金融市场，设法在正确的时机抓住市场的波动。

索罗斯主张“混乱致胜”，即在混乱的市场中抓住矛盾，而他的目标则往往是市场中出现漏洞的位置，或者说是攻击弱者。所以更多的人，尤其是攻击的受害者，更愿意叫他“投机客”而不是“投资家”。

*

*

*

直觉本能——索罗斯的天才所在。

这是一种高深莫测的能力，可遇而不可求。

“有了它，才晓得何时应大手笔投机，何时应轧平某个投资仓位——也就是何时你已准备就绪，占好位置，何时不是。”有人这样评价这种异常的能力。

在索罗斯身上，这种能力表现得更富有神奇色彩。索罗斯能够察觉市场的走势，不管是涨是跌，而且一旦他的判断发生偏差，他会莫名地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应——背痛。

“基本上，我操作的方式，是先有命题，然后到市场中去测试，当我放空，而市场走不同的方向时，我便很紧张，于是我感到背痛，等到回补空头仓，背痛突然间消失不见。我觉得好多了，这时就是靠直觉本能的时候。”

摩根斯坦利公司的拜伦·伍恩（Byron Wien）总结乔治·索罗斯的投资技巧时表示：

“乔治的才华在于他有某种自制能力。他以非常务实的态度看市场，而且了解哪些力量影响股价。他了解市场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他晓得自己不是每次都对。对的时候，他愿意采取激烈的行动，善用大好机会，错的时候能够认赔出场。……肯定自己是对的之后，他便有很强的自信，一如1992年英镑危机期间他的所做所为。”

很少有人拥有索罗斯的这种能力，他在伦敦的合作伙伴埃加·阿斯泰尔（Edgar Astaire），认为他知道索罗斯成功的根源：

“他最大的成功关键，在于心理层面。他了解群众本能，晓得何时许多人会争着抢某样东西，就象一位优秀的行销人员。”

这就是直觉本能？

索罗斯的避险观念中，放空是后来为人乐道的一种。

80年代中期，索罗斯建立的最大空头仓，是针对西方联

盟公司（Western Union）的。

1985年，传真机在美国普及起来，而西方联盟公司的主营产品电传打字机已变得落后，而且公司尚没有发展出其他新产品的迹象，公司股票价格一降再降，已从早些年的高价跌为20美元上下。索罗斯和他的同事还特别注意到，它的资产负债表仍有大量提取折旧后的电传打字机，这些属于电子机械式设备的几乎已分文不值，同时公司已负债经营财务状况堪忧。索罗斯进一步断定这家公司已无力偿还债务或发行优先股。

艾伦·拉法叶回忆往事说：“我们想出了一句话：‘西方联盟对小马快递邮政所做的事，传真机也将施加在西方联盟身上。’”

而此时，却有许多知名机构的分析师建议买进西方联盟这支资产股，情形往往如此，索罗斯在华尔街上永远是特立独行的份子。

索罗斯建立了100万股的空头仓，华尔街再次败在他手下，艾伦·拉法叶说，他们的利润“以百万美元计”。

*

*

*

进入1985年下半年，索罗斯仍担心美国的经济将崩溃。8月间，他相信“大循环”为了刺激美国经济和支付军力扩增的费用，已进入最后一回合的信用扩张期。

“变局即将到来。”

之所以有这种判断是因为索罗斯发现，“美国和其他经济强国已经体会到外汇市场已成一只怪兽，与它们的利益为敌。”

安东尼·桑普森（Anthony Sampson）在《点石成金》（*The Midas Touch*）一书中，提到这点时指出：“回想60年代的情景，热切见到全球管制解除的人，总希望全球各国的货币缓和和理性地调整它们彼此之间的价值，出口和经济不振的国家将

货币贬值到自己变得有竞争力为止：美元、日元或英镑会准确地反映每个国家的工业效率。

“1971年，尼克松把美元和黄金的关系脱离，以及当各国货币开始独立浮动之后，没人预期到70和80年代汇率会激烈波动。”然而，事实是汇率随着每一个新谣言而波动。汇率似乎不再与出口有关。到了1980年代末，美元兑日元一天之内可以波动4%。

索罗斯刚开始操作货币时，运气不是很好。80年代初，他其实赔了钱。但是80年代中期，他研究市场状况之后，信心重燃。他预料到美元——以及其对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关系——会成为金融世界的主戏，而他正在注意这一点。

80年代初，美元经历各种浮沉变化，使得有赖于美元稳定的全世界厌烦和喘不过气来。

80年代的头几年，里根政府致力于维持美元强势，希望借此平抑通货膨胀，而且因为进口货会因此变得便宜，也会吸引外国投资人前来投资，弥补美国的贸易逆差。

最后，里根诉诸减税，加上国防扩张，触发了美元和股票市场欣欣向荣。外国资金被吸引到美国，自然能够提升美元和资本市场。经济日益扩张，吸引更多的资金，所有这些因素推高美元汇率——索罗斯同样称之为“里根大循环。”

但是索罗斯相信“大循环”本质上植有不稳定的因子，所以注定败亡，“因为美元强势和实质利率居高不下，势必会抵消预算赤字的刺激效果，并削弱美国的经济”。

正如索罗斯所料，到了1985年，由于美元汇率过高使出口进一步受到阻碍，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尽管贸易争端不断，但很多人都已看到，廉价的日本进口货已威胁到美国国内工业。一切都看在索罗斯眼里，他认为典型的荣枯相生循环已进

入下一阶段。

这个时候，其他分析师还在推荐景气循环类股票。索罗斯反其道而行之，他倾向于看好并购和金融服务类股——而且两者都飞涨。在都会城市（Capital Cities）收购 ABC 电视网时，量子基金买进了 60 万股 ABC 股票。那年 3 月一天下午，都会城市宣布每股出价 118 美元，购买 ABC 股票。量子基金这次行动，赚了 1800 万美元。

好消息传来，索罗斯打电话给负责操作的艾伦·拉法叶。“做得非常好，”索罗斯说，“但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

几年后拉叶谈起这段往事时，模仿索罗斯的匈牙利腔。拉法叶十分清楚，索罗斯根本不是在问他问题，而是在试探他。索罗斯要讲的其实是：“我很高兴，但别乐昏了头。”

索罗斯相信里根的美元政策，最后必然导致整个荣枯相生循环周期中的“枯面”出现。总统或许有很好的理由维持美元的强势，但有更好的理由去降低美元汇价。80 年代初，短期利率已涨到 19%，黄金价格涨到每盎司 900 美元，通货膨胀率窜升——高达 20%，美元汇价升抵 240 日元和 3.25 德国马克。

拉法叶说明索罗斯的策略：“很明显的，应该建立的仓位，是放空原油，做多美国短期债券，以及做多日本长期债券，因为日本倚赖进口石油。此外，应该放空美元，做多马克和日元。由于商品、固定收益债券和外汇市场的规模和数量高于股票市场，所以投资人或投机客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累积很大的仓位。而且由于这些证券的保证金要求相当低，因此能够运用很高的信用杠杆。所以，虽然当时我们的基金只有 4 亿美元，运用杠杆的能力却很大。

“乔治·索罗斯在所有这些东西上都有很大的仓位。一辈子

当中，你只能做那样的事一次。”

1985年8月，索罗斯开始写投资日记，纪录各个投资决策背后的思虑。他把这些投资决策称做“即时实验”（Real-time Experiment），因为他要找出“大循环”能够维系多久的答案。

他利用这本日记测试自己预测金融市场走向的能力——也当作一种机会，好将自己的理论付诸检测。由于有这本日记，1985年8月到1986年11月，索罗斯的看法和投资策略，才有详细的纪录可查。这本日记出现在索罗斯1987年的《金融炼金术》中。

索罗斯的第一个大考验在1985年9月。那年9月6日，索罗斯赌马克和日元会上涨，实际走势却往下。他开始怀疑“大循环”的想法是不是有错。两种货币的多头仓加起来有7亿美元——比量子基金的整个资产净值还高。虽然他已经赔了些钱，但通过更加专注地分析，他反而深信事件的发展，将证明他是对的，因此他又进一步提高两种货币的仓位到接近8亿美元——比基金的资产净值高2亿美元。

1985年9月22日，索罗斯预期中的情境开始实现。新上台的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决定美元汇价应该下跌，因为美国人开始要求保护自己的工业。贝克和法国、西德、日本、英国——所谓的五大工业国（Group of Five）——的财政部长齐聚纽约的广场饭店。索罗斯获悉有这样的会议召开，马上晓得这些财政部长要做什么事。他从早工作到晚，买进数百万万美元的日元。

这些部长确实决定设法把美元汇价拉低，因此提出所谓的“广场协定”，希望透过更密切地合作，使“非美元货币有秩序

地升值”。这表示各国中央银行现在觉得有义务把美元汇价贬低。

协定发表后次日，美元从 239 日元掉到 222.5 日元，跌幅高达 4.3%，是有史以来跌幅最大的一天。索罗斯大乐，一天之内赚了 4,000 万美元。那天早上，拉法叶见到他，说：“乔治，漂亮的一击，令我印象深刻。”

索罗斯继续买进日元。

1985 年 9 月 28 日的日记中，索罗斯称广场协定获得的利润为“一生难得一见的大满贯——上个星期的利润，比过去四年操作货币累积下来的亏损还多——”。

谈及那段经历索罗斯不禁神采奕奕。

“正如我在《金融炼金术》中说的，广场饭店协定显示，汇率自由浮动制度已经走到尽头，取而代之的是所谓“肮脏浮动”（编者按，即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原来的模式既然已经被打破，新游戏规则于是登场。我当时觉得，他们采取的是必要的步骤，也察觉到这件事的重要性。虽然当时我超买了日元和西德马克，但我继续跟进，更大规模地超买。我想不起来我是否马上采取行动。然后我停手，之后又再买进。这次行动我想是我打垮曲线（收益率曲线）的一回。我本来已经有投资部位，但还能够有本钱继续增加投资以便发出最致命的一击。结果我的部位变得非常大，但我得到的报酬也相当可观。”

和广场协定有关的投资，奠定了量子基金的传奇地位。

1988 年开始为索罗斯效力的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回忆 1985 年秋的往事时，说：“其他交易员也为索罗斯抬轿，在广场会议前不久做多日元。那个星期一上午日元开高 800 点，这些交易员开始赚钱，而且因为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赚那么多钱而震颤不已。但是索罗斯看的是一幅更

大的图像。可以想像得到，乔治走出门外，指引其他交易员停止抛售日元，告诉他们，他们不要的仓位，他将建立起来。政府刚告诉他，未来一年美元将下跌，因此为什么他不能做个应声虫，买进更多（日元）？”

接下来六个星期，各国中央银行一直压低美元。到了10月底，美元已经下跌13%，成为205日元。1986年9月，美元跌到153日元。外国货币对美元平均上升24%到28%。

整个加起来，索罗斯下了15亿美元的赌注。他利用信用交易，把大部分钱拿去买马克和日元。后来证明这是很聪明的做法。整段时间内，他赚的钱估计有1亿5000万美元。

11月第一个星期，他的基金成长到8亿5000万美元，而索罗斯持有15亿美元的日元和马克，几乎是整个基金资产净值的两倍。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还是愿意增加仓位的理由，是我相信反转的空间已经缩小。我对自由浮动汇率建立的一个一般性概念，是转折点处短期的波动最大，但随着趋势确立，波动会减小。”

他放空8700万英镑，以及2亿美元以上的石油，做多10亿美元的股票和期货，以及约15亿美元的债券。整个加起来，他在各个市场做多和放空约40亿美元。

*

*

*

索罗斯投资的又一秘诀是充满自信。

索罗斯一旦相信某样投资是对的，什么事情都阻止不了他。投资仓位绝不嫌大。畏缩不前，是懦夫的行为。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提出：最糟糕的错误，不是太过大胆，而是太过保守。

他喜欢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做那么小？”

他展现了无与伦比的信心，相信自己是对的。

1985年12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将来事情会怎么演变，我怀有前所未见的信心，这可以从我愿意建立的仓位规模看得出来。”

1985年是索罗斯表现非凡的一年。

和1984年相比，量子基金成长122.2%，高得惊人。它的资产从1984年底的4亿4890万美元，增为1985年底的10亿300万美元。这样的涨幅为道·琼斯30种工业股价指数（1985年约34%涨幅，包括股利）的四倍左右。

索罗斯的整体纪录十分杰出。

1969年他推出基金时，投资一美元在他那里，扣除所有的费用和支出后，1985年底的价值高达164美元。纽约时报记者戴姆·多夫曼（Dani Dorfman）这时对他进行跟踪采访，索罗斯很自豪地向他解释：同样的钱投资标准普尔500种股价指数的采样股票，同期内只增为4.57美元。

当多夫曼试图刺探他的个人财富时，索罗斯狡猾地避而不谈，只是透露他的大部分个人资产都在基金中。多夫曼猜测索罗斯持有股份占基金总额的15%—30%之间，《纽约杂志》据此计算他在1985年的个人收入在8300万美元到1亿6000万美元之间，但索罗斯付之一笑，说：“错了，差太多了。”

1985年是索罗斯如日中天的一年，在《金融世界》（Financial World）列举出的华尔街收入最高的100人中，索罗斯排名第二。该杂志指出，索罗斯从他在量子基金的个人持股中获利6600万美元，另有1750万美元的费用收入，以及客户给的1000万美元红利，总共赚到9350万美元。

*

*

*

1986年1月初，索罗斯大幅度调整他的投资组合。

下面是他日记中的一些记录：他对美国股市后市较感乐观，因此增加投资美国股票和股价指数期货，并且提高外国股票的仓位，结果美国和外国股票的价值总计高达 20 亿美元。放空美元的仓位 5 亿美元降为零。

2 月间，他把股票仓位减少到 12 亿美元。3 月 26 日，他觉得自己看涨后市的想法很好；油价下跌告诉他，他是对的。因此，他把美国和外国股票的投资金额重新提高到 18 亿美元。1 月初以后，基金的资产净值从 9 亿 4200 万美元增为 13 亿美元。

4 月 4 日，索罗斯把股票仓位减低至 8 亿 3100 万美元。十天后，他又买回 7 亿 900 万美元。5 月 20 日，他卖出 6 亿 8700 万美元，主要是卖掉指数期货。

他有 40% 的股票仓位和三分之二的外国股票仓位，和芬兰市场、日本铁路及不动产类股、香港不动产类股有关。

索罗斯的即时实验做得非常之好。他把量子基金从 4 亿 4900 万美元——1985 年初的价值——变为 1986 年底的 15 亿美元。

1986 年，量子基金成长 42.1% 成为 15 亿美元，他本人从这个基金得到的收入是 2 亿美元。

80 年代中期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道·琼斯 30 种工业股价指数节节上升，从 1982 年 8 月的 776.92，涨到 1987 年的 2772.42 点高位。根据索罗斯的反射理论，市场将涨得更高，投资人的狂热会使它更上一层楼。

80 年代中期，很多投资人大发其财，但最出色的仍是索罗斯。索罗斯认为如果能抓住大起大落的时机适时进退，那么就能“涨时赚钱，跌时也赚”。

*

*

*

索罗斯所言非错，可惜接下来他运气并不好。

索罗斯比其他大多数人更具有先见之明。

在内心深处，他很清楚如果他的反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荣枯相生循环的枯面迟早将来临，问题只是时间的早晚。但不见得马上发生。

1987年9月28日索罗斯上了《幸福》杂志的封面，他宣称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只有日本是例外。

索罗斯接受封面故事的访问时指出：“股价涨了又涨，偏离了基本的价值，但不表示一定会重跌。市场价值过高不表示无法维系长久。如果你想知道美国的股票价格高估多少，那不妨看看日本。”他在“华尔街周”电视节目中重申这个观点。

1987年10月日本股票市盈率是48.5倍，英国则是17.3倍，美国是19.7倍。尽管日本的会计处理有其独具的特色，索罗斯仍然认为，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东京呈现凶兆：东京地价飞涨，过多的资金追逐过少的资产。他相信高市盈率和低股利的状况必然难以持久。

日本的泡沫经济已经酝酿深刻的危机。

许多日本企业，特别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已大量投资其他日本公司的股票；其中一些公司甚至发行债券，以取得资金注入他们在股票市场的活动。随着东京股市激升，这些公司在股市的参与程度，使得他们的身价与日俱增——但一旦事有偏差而导致大崩盘的威胁，也一直若隐若现。

索罗斯凭借他的反射理论，判断出崩盘即在眼前，投资人的狂热如火如荼，必将涨破日本股票的价值。由于日本市场占全球所有股票价值的36%，其冲击将在每个地方都感受得到。索罗斯对日本股市的悲观情绪愈来愈浓。

“东京市场没有不归路。关于它的价值，投资人的看法已

延伸得过远，循序渐进地回档似乎不可能。崩盘可能迫在眉睫。”

经过对比分析，索罗斯认为，如果日本市场崩跌，美国市场不会受太大的影响。美国股票的价格距日本的荒谬水准还有一大段距离。虽然索罗斯见到华尔街也出现了一些与日本股价激涨相同的情形，但不是很担心美国市场。

因此，那年秋天，他把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从东京转到华尔街。他乐观地说：“市场只在最近才迷失了自我，还能以温和、有秩序的方式回档。”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的看法但索罗斯决心按自己的判断行事。

10月中旬，五年来一直看涨后市，讲话有很多投资人肯听的市场预测专家罗伯特·普瑞特（Robert·S·Predhter），此时已改变了看法，转而对美国股市看跌，他警告客户应该退出市场。

索罗斯和其他投资人一样，都对普瑞克特的说法大吃一惊。10月14日，索罗斯在伦敦的《金融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再次预测日本市场将崩盘。

接下来是从10月19日开始的戏剧性的一周。

大崩盘终于来临，但索罗斯犯了一个决定性的错误，崩盘不是始自日本，而是美国。

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股市暴跌508.32点，创历史最高纪录。华尔街股市崩盘，结束了长达五年的多头市场。索罗斯本来预期日本股市会跌得更惨。相反的，隔天，也就是星期二，东京股市呈现坚稳局面。

10月22日星期四，股市反弹300点，但接下来又转为下跌。许多人被迫追缴保证金。同时，在外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美国股票，跳低开盘后，仍旧一路狂泻，这宣告着美国经济繁荣已告一段落。

索罗斯决定立即大量卖出他的多头仓。

《巴隆》(Barron)的一篇文章说明了当时发生的事：“其他的交易场营业员听到海鲸受困的声音，都踌躇不前，但还是围着猎物不放。出价从 230 掉到 220、215、205、200。接下来，交易厅营业员发动攻击。索罗斯抛出的大量期货，价格从 195 涨回到 210。

忽上忽下的过程十分可怕。

期货价格比现货价格低约 50 点，或低于标准普尔 500 种股价指数合约现货价格 20% 的原因是索罗斯的大量抛售造成的，和电脑程序交易无关。5000 份合约低这么多，折合金额是 2.5 亿美元。期货基金经理人回补了这些，许多营业厅自营交易员也因为价格立即弹升而赚到数百万美元。”

索罗斯抛出的大量期货迅速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标准普尔股价指数期货价格马上回升，以 224.50 收盘。索罗斯一天之内赔了 2 亿美元。

后来才知道，索罗斯是华尔街崩盘最大的输家之一。老谋深算的索罗斯这次承认判断错误。“我本来预期重跌的会是股票，但事后回想，显然是从债券市场开始，特别是日本债券市场，那里的殖利率今年稍早几个星期内上升了二倍多。”因此，1987 年春美国债券市场急转直下。但索罗斯没有看出华尔街即将出现的跌势，仍预期美国股票市场会相当稳健。

电视台的经济事务评论员亚当·史密斯 (Adam Smith) 不解：何以索罗斯预见崩盘即将来临，却仍身陷其中。

索罗斯坦白答道：“我犯了很大的错误，因为我预期崩盘会出现在日本，也为了这事做好准备，同时相信这会给我机

会，好为我国的跌势做准备，却没想到实际上发生在华尔街，而非日本。所以说，我错了。”

索罗斯通常情况下都是金融市场的大赢家，而这次，人人知道他亏得很惨。许多人都想知道这位“常胜将军”到底赔掉多少。

1987年股市崩盘后没多久，报纸上的文章普遍猜测索罗斯赔掉6.5亿美元到8亿美元之间。

比方说，《纽约时报》1987年10月28日报导，“量子基金的每股资产净值从1969年的41.25美元上升到股市崩盘前一天的9793.36美元。这可能是量子基金第二次赔钱。……由于市场跌势从8月开始，量子基金的净值已下跌30%以上，从逾26亿美元减为不到18亿美元。单是上个星期，索罗斯就卖掉价值数亿美元的股票。”

佛洛伊德·诺里斯（Floyd Norris）在《巴隆》1987年11月2日的《交易》（The Trader）专栏撰文说，“由于股市崩盘，量子的资产净值下降32%，从第三季末（那一年到第三季止上升了60%）的26亿美元减为18亿美元。不到两个星期，索罗斯赔了约8.4亿美元。”后来，索罗斯接受《巴隆》简短的电话访问时承认，他有一些操作上的损失，但他的基金那一年仍上涨2.5%。

1987年的崩盘期间，索罗斯到底赔了多少，这个问题此后一直纠缠着他。根据艾伦·拉法叶的话，索罗斯试着说服新闻媒体相信，他所赔远低于外传的8亿美元。

“那是很不幸的事，”拉法叶指出，“别人总是喜欢从你的不幸中寻找乐趣。

……

“关于基金的价格，现在的信息远多于以往，但是1987年

时，外界能取得的基金价格资讯是……金融时报《其他海外投资信托》栏底下的……报价。”

“但那不是基金的资产净值。如果你想买基金，就必须依资产净值加溢价部分。……资产净值反映的是基金的资产价值而不是你在金融时报看到的价格，而人们不懂得这一点，这就是他们算出 8 亿美元的原因。”

“人们说，进入 10 月时，每股有 2 万美元，那个月结束时每股只有 1 万 6000 美元，那么每股一定赔掉 4000 美元。……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算法是把溢价的部分算在内。我们的亏损在 3.5 亿美元到 4 亿美元间。每个人都认为实际上应该在 6.5 亿美元到 8 亿美元间。那太离谱了。”

盖里·葛雷斯坦 (Gary Gladstein) 代替乔治发言，向《纽约时报》解释何谓溢价，但他们基本上早已有了定论。索罗斯因此感到很不快。”

“那不是真的，”他说“他们怎能这么刊登？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告诉他，‘乔治，不用去和那些一桶桶买油墨的人计较。算了吧。’”盖里后来回忆。

但他的心情真的很坏。在那之后，他开始觉得和新闻媒体讲话非常无聊。

事实上，股市崩盘使索罗斯 1987 年的整个利润化为乌有。崩盘后一个星期，量子的资产净值下跌 26.2%，成为每股 10,432.75 美元。这比美国股市 17% 的跌幅还大。也有报导说，10 月 8 日以后，量子的资产净值少了 31.9%，这表示索罗斯自己的钱赔掉 1 亿美元。

《时代》杂志的记者问到他在这次挫败的反应，他只能说：“我觉得有趣。”他显然清楚事情可能更糟，而且糟很多，但他

仍说：“我还在笑。”

1987年10月的崩盘是索罗斯最惨烈的挫败之一——1981年债券赔得一塌糊涂，但还没赔那么多——面对这样的打击，他仍泰然自若。

“他在崩盘期间十分镇定，”一位投资人朋友说。“他认赔了结的态度，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好。他可能认为市场没照它应有的方式演出，也就是照他的预测去走。但一犯下错误，他有所了解之后，便放开步子前行，不再留连。”

发现投资方向错误后及时认赔出场是索罗斯投资的又一大原则，艾伦·拉法叶对此印象深刻。

“乔治做错时，会脱身而出，他不会说，‘我是对的，错的是他们。’他很干脆地说‘我错了，’然后出场，因为留着坏仓位，它会吃掉你。你会时时刻刻惦记着它——晚上想，回到家里也想。它会消耗你的精力。你的双眼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这样的处境很糟。有人认为这事容易做，连停车场管理员也会做，可事实远非如此，那需要不同于常人的自制、自信，而且基本上必须不动感情。”

年终结算的结果令人难以相信，1987年底，量子基金仍涨了14.1%，成为18亿美元。

的确，这次崩盘，几乎没有动摇索罗斯在华尔街的地位。

《金融世界》(Financial World)发表华尔街最高收入人物年度调查报告时，索罗斯排名第二，仅次于第一的保罗·都德·钟斯二世(Paul Tudor Jones II)。都德·钟斯估计收入在8,000万到1亿美元间。索罗斯1987年的收入虽然碰上股市崩盘，仍有7500万美元。难怪他能坦然承受崩盘造成的损失！

第七章 索罗斯太太

索罗斯承认，他的第二任妻子对他有着重要的影响。

1983年，乔治·索罗斯再婚。新娘是28岁的苏珊·韦伯（Susan Weber），婚礼在他们相识5年后举行。据报纸报导，索罗斯因为打网球而迟到，没有准时抵达婚礼会场。

据说，婚礼上出现了一幅尴尬的场面。

这位53岁的新郎显然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当牧师问索罗斯，是否愿意把尘世的一切给他的新妻子时，索罗斯脸色变得苍白。索罗斯的儿子，也许出于半开玩笑，冲他做出割断喉咙的手势，似乎试着提醒父亲：“财富跟着飞了。”索罗斯马上转头回望私人律师威廉·杰波（William Zabel），好像要问：“如果我照传统的誓言‘不管好坏，尘世一切，我都给你’，那我是不是就得把每样东西都给苏珊？”杰波出面解围，向索罗斯示意；他的回答不会有害处。

为了保险起见，索罗斯用匈牙利语含糊其词地说：“那要看我和继承人以前有过的协议。”于是，婚礼继续进行。

不少人对他抛弃结发之妻而与比自己年轻25岁的苏珊结婚颇有微词。

关于索罗斯的两次婚姻，有很多议论，新闻界的一些好事者更是乐此不疲地跟踪，企图收集一些关于他私生活方面的花边新闻什么的。对这些我们不必太在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的第二任妻子苏珊对他有很重要的影响，这一点索罗斯自己也很认同。

多数时候，索罗斯和苏珊都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时而也会发生矛盾，主要是由于索罗斯太忙了。量子基金规模不断扩大，虽然索罗斯有意淡化自己对基金影响，但在接班人没有完全成长起来之前，他还不敢疏忽大意。加之此时，索罗斯正忙于在东欧的慈善事业，经常往返奔波于世界各地，留在妻子和孩子身边的时间少得可怜，苏珊为此胸中难免感到不平。

有一阵子，索罗斯希望全家住到伦敦去，因为比较接近东欧和前苏联地区，而这些地方是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他最感兴趣的。但苏珊为孩子着想，希望仍住在纽约。她的看法占了上风，索罗斯只好更频繁地飞跨大西洋。

1991 年发生一件极富争议性的事情。故事起源于苏珊不满索罗斯的英国仆役长和厨师。据一家报纸报导，这两个人是夫妻，为索罗斯服务多年，索罗斯给他们的薪水是每人每年七万英镑。

这家报纸报导说，有一段时间索罗斯不在，苏珊认为妮奇·戴维森（Nicki Davison）的英国式烹饪做得不够好。于是她用飞机接来美国主厨米瑞恩·桑切斯（Mirian Sanchez）。根据《纽约邮报》的报导，“受过高度训练的仆役长派崔克·戴维森（Patrick Davison）看到桑切斯把一瓶 840 美元的 Chateau Lafite 浇到她做的炖菜里，而他本来建议她用 Chardonnay 或‘较新’的 Beaujolais，于是脾气像火上加油一样烧了起来。”英国的《每日邮报》引述戴维森在法庭上的证词说：“我认为

那太荒谬了。”

《每日邮报》报导，一天，桑切斯和戴维森又为该用哪种汤匙吃蛋乳酥吵了起来。于是，苏珊开除了戴维森和他的厨师妻子。夫妇两人告到某英国法庭。苏珊出庭时说，她喜欢桑切斯的手艺，戴维森做的菜“烧煮得太过火”。戴维森辩称苏珊和他之间的争执，其实是苏珊耍的手法，目的是要乔治多花点时间在纽约，少在伦敦。

戴维森说：“索罗斯太太比索罗斯先生年轻 25 岁，我担心她要得太多。她趁他不在时开除我，在那之后，我试着打电话给索罗斯先生，但他根本不和我谈。”同样根据报纸报导，英国法庭 1991 年 5 月谕令索罗斯夫妇给付戴维森约 4 万美元；这是法律容许的赔偿上限。

索罗斯的一位亲近好友，也就是英国记者安纳托尔·卡雷茨基（Anstole Kaletsky）告诉我，他似乎很难相信竟有 Chateau Lafite 这样的风波，并为英国新闻媒体报导这件事而感到困窘。“事实真相根本不是那样子。……他们所称索罗斯住的那栋豪邸和有关它的描述，和他实际住的房子不一样。他妻子坚持使用 Chateau Lafiteae 做炖煮食物，根本不像真有其事。我曾多次在他们伦敦的房子里吃过晚饭。很难想像他们会派某个人去买最昂贵的酒，注入炖菜里。那不是他们的生活风格。……乔治和他妻子苏珊两人都告诉我，有关那次事情的大部分详情，报导得都不合事实。”

不管 Chateau Lafite 的风波是真是假，这件事一直困扰索罗斯夫妇以后的日子。有一阵子，凡是谈到他的文章，作者都会提起仆役长、酒和炖菜的故事，让读者了解乔治·索罗斯是怎样的人。

苏珊·韦迫毕业于艺术专业，终生热爱艺术，1993 年，苏

珊·索罗斯创立了自己的研究所，叫做巴德装璜艺术研究中心 (Bard Graduate Center For Studies in the Decorative Arts)。这个研究中心设在纽约的西 86 街，是巴德学院的一部分，推出两年的硕士课程，研究装璜物体家具和织物。丈夫资助她 660 万美元。

第八章 选定接班人

想办法保本，并出击全垒打。赚得不错的利润时，你可以比平时激进。

80年代开始，索罗斯走上慈善活动的舞台，他一直信仰“开放的社会”的理想，随着他在哲学创作上努力的失败，他表面上承认自己是个“失败的哲学家”，但内心中，他仍渴望通过某种途径实现自己“开放社会”的梦想。尽管索罗斯对慈善活动抱有成见，但在找不到更好的途径的情形下，他仍选择了这条路。

80年代中期以后索罗斯的全副心神都放在东欧和前苏联，愈来愈不想操心量子基金的日常作业。

1980年代中期起，基金的净值超过10亿美元。索罗斯走在成为美国巨富的路上。他希望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促进欧洲出现更多的“开放社会”上，尽量少想烦心赚钱的事。

然而，经过多年的培养和筛选，索罗斯仍然没有找到管理量子基金的合适的“接班人”，“接班人”问题此时已显得十分迫切。

1988年秋，索罗斯决定还是在基金外面找个人，这个人不要主持基金的日常经营，终有一天也接下整个业务，也就

是说，这个人能在广泛的投资选择中做出决策。

找出这样一个人，并把他放在掌舵的位置上，是乔治·索罗斯这辈子必须做的重大决定之一。

*

*

*

他选的这个人叫做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riller）。

老家在费城的德鲁肯米勒和索罗斯一样，事业生涯的早期几乎都默默无闻。他是个投资奇才，但很少人知道和他有关的事情。他在英国取得学士学位，在缅因州的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获得经济学的优异成绩。他继续到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所攻读经济学，但他发现课程太偏向计量和理论——无聊透顶。那里似乎太不重视实际的世界，这不合他的胃口。

德鲁肯米勒 1977 年开始到社会上做事，先在匹兹堡国民银行当股票分析师，年薪 1 万 800 美元。没多久，他升为股票研究部门主管，薪水增加到 2 万 3000 美元。此后不到一年，再升为事业部主管，年薪 4 万 8000 美元。两年后，也就是 1980 年，只有 28 岁的他离开那家银行，创立自己的基金管理公司。

自行创业的念头，起因于他接到一家证券高价主管的电话，答应每个月给他 1 万美元，所做的事很简单：只要和他谈谈有关投资的事就可以。德鲁肯米勒把他的基金叫做杜肯资本管理公司（Duquesne Capital Management）。

六年后，1986 年，德鲁肯米勒被德瑞富斯（Dreyfs）请去当基金经理，但可以继续管理他的杜肯基金。他在德瑞富斯管理股票、债券和货币的投资事务，进出市场，既做多也放空。德鲁肯米勒的才华得到很高的评价。德瑞富斯因此特地为他开发几种基金，由他负责。最受欢迎的一种成立于 1987 年 3 月，

叫作策略积极投资基金 (Strategic Aggressive Investing Fund)。接下来 17 个月，它成为金融界表现最好的基金。

索罗斯开始注意到这位才华横溢，成绩赫然的年青人。

据索罗斯回忆，德鲁肯米勒看了《金融炼金术》，觉得很有意思，于是来找他谈话，索罗斯刚好在找最优秀的人才，而德鲁肯米勒似乎是不二人选。虽然德鲁肯米勒一直想回去专职管理自己的基金，为此他感到为难。然而，索罗斯却是他的偶像：“就执行我所用的操作哲学来说，他似乎领先我约 20 年。”他所讲的哲学，是指做多一组精选的股票和放空一组精选的股票，然后运用信用杠杆操作标准普尔 500 种股价指数期货、债券和货币。

*

*

*

索罗斯请德鲁肯米勒见了几次面。

德鲁肯米勒内心挣扎不下，应该回到杜肯？或者抓住机会，替这位大师效力？

德鲁肯米勒听过有关索罗斯的所有故事，比方说，乔治常不分青红皂白便开除下属；量子基金的周转率很高。他和投资圈内的朋友提到，正考虑到量子基金去做事，几乎没有人赞成他去。

相关的传言没有对他造成太大的困扰。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他心中，最糟的状况是他做上一年，再被索罗斯开除。然而至少这一年内，他能得到宝贵的教育训练，如果真的不得已而回到杜肯，这一年对他来说有利无弊。

索罗斯决心找来德鲁肯米勒，采取了全场紧迫盯人的战术。早在正式请他上班之前，索罗斯便称他为“我的接班人”。而德鲁肯米勒心中却仍在打鼓，“我到索罗斯家中面谈时，他儿子告诉我，我是他第十个‘接班人’。其他人都没做太久。

……隔天我到索罗斯的办公室时，职员都称我为‘接班人’。他们也觉得这事很好玩。”

1988年9月，两人终于完成了相互间的选择。索罗斯的“接班人”已经找到。现在德鲁肯米勒的前六个月——如德鲁肯米勒所担心的——真的很苦。两人可能有类似的操作哲学，但是执行这些哲学的策略不同。德鲁肯米勒希望能够独立运作，不喜欢乔治站在上头盯着他瞧，或者放马后炮，事后批评他的每个行动。索罗斯这方面，则不想一开始就给德鲁肯米勒很多的自由。德鲁肯米勒必须自己想办法取得那样的自由，接着索罗斯才会视情况把掌控大权交给他。

这位新人不想和老板起冲突。因此当索罗斯建议做某件事时，德鲁肯米勒总是照做。毫无疑问的，德鲁肯米勒慑服于导师之下；他常称这个人是当代最伟大的投资家。

但是，委屈求全终于叫德鲁肯米勒受不了了。

任何事情只要从索罗斯嘴中讲出来，只有白痴才会和他硬碰硬，可是德鲁肯米勒又不希望只当个办事员。他终于告诉索罗斯：“厨房里不能有两位厨师；这样是行不通的。”索罗斯答应他情况将有所改变，但是变得不多。有一阵子，德鲁肯米勒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

1989年8月，到量子基金约一年，两人第一次公开吵了起来。德鲁肯米勒本来自行建立一个债券仓位，索罗斯没征询他的意见，就把那些债券卖掉。这是索罗斯第一次背着德鲁肯米勒做事。

德鲁肯米勒十分光火，两人都火了，相互对骂。最后，索罗斯冷静下来，保证他不再越俎代庖。

索罗斯承认，他和德鲁肯米勒刚开始时走过了一些不和的光阴。“起初他觉得和我做事很困难。虽然我给了他很大的权

限，却因我的存在而束手缚脚，而且觉得他不会做得像加入我的公司之前一样好。”

索罗斯会不会按新的约定行事？德鲁肯米勒很怀疑。

但是几个月后——1989年底——德鲁肯米勒松了一口气。

随着天鹅绒革命的展开，东欧形势起了戏剧性的变化。共产党政权开始颠覆。那一年11月，柏林围墙崩塌。索罗斯每天注意那里的发展。“乔治远在东欧，”德鲁肯米勒高兴地说“就算想插手，也做不到。”索罗斯是这么说的：“1989年夏，我告诉史坦利，他必须负起全责，经营基金。这之后，我们之间就没冲突。我成了教练，他则成了参加比赛的选手。我们的绩效有所改善。……”

新来的独立自主权，对德鲁肯米勒是一大福音。他为量子基金做了第一笔大买卖。他相信柏林围墙崩塌之后，德国马克会升值。虽然索罗斯不在视线之内，但他的影子还是存在德鲁肯米勒心中。这位年轻的基金经理回想起《金融炼金术》一书的内容，特别是索罗斯有关货币的理论。其中一部分理论认为，如果在财政政策扩张的同时，赤字大增，而货币政策则趋向紧缩，一国的货币会升值。这时下赌在德国马克上，似乎是好时机。

事实上，索罗斯的理论看起来似乎大胆违抗现实状况。柏林围墙崩塌后前两天，马克跟着倒下去。人们相信赤字会增加，进而伤害德国的货币。不过德鲁肯米勒遵照大师的教诲，接下来几天内建立了20亿美元的马克仓位，并获得丰厚的利润。

他也相信日经225种股价指数涨得太高；日本银行（中央银行）正在紧缩货币政策。德鲁肯米勒判断下跌在即，1989年底放空日本股票——他又一次为量子基金赚了大钱。

80年代末，美国的借贷环境帮了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等投资大户很大的忙。

1989年底起，短期利率低于长期利率而变得有利可图。纽约《格兰特利率观察家》（Grant's Interest Rate Observer）的主编詹姆士·格兰特（James Grant）解释道：“之所以有利可图，是因为比方说你能用3.5%的利率借到钱，拿去买殖利率高达5.5%的公债。两个百分点的差距看起来不起眼，但如你操作的整个期间内，一直存在这样的差距，则可赚得庞大的金额。”

理论上，“看起来不起眼的两个百分点”，任何人都能利用。不过避险基金有办法竭尽全力，善用这个机会。格兰特指出：“避险基金拿得出好看的资产负债表，能够要求银行给予信用额度。你我都没办法像这些家伙那样进去，借得10亿美元出来。……”

格兰特又说：“过去几年来，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个人合作事业组织能够而且一直在借钱。如果你一开始就有10亿美元的资本，就能借很多钱，并且留下很大的足印。……喔，如果你是用10亿美元或50亿美元做那样的事，你所要做的事，是马上现身就可以！……整个金融环境是为投机行为量身订做的，特别是为大手笔的投机行为。”

1991年初，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在美国和日本市场建立30亿美元的空头仓；他也在美国和全球债券市场建立很大的空头仓。那一年头两个星期，由于美国威胁对伊拉克动武，情况看来不妙：一旦战火爆发，市场便会重挫。

德鲁肯米勒不同意这种说法，量子基金的标准普尔500种股价指数期货仓位由空转多。他还保持很大的股票空头仓，特别是放空银行和不动产类股。战争真的爆发时，量子基金已经

全部做多。

结果证明德鲁肯米勒猜对了，尽管进入 1991 年 1 月时有那么多的错误仓位：全球各地 30 亿美元的股票空头仓，30 亿美元的放空美元做多马克的空头仓，以及很大的日本和美国债券空头仓，但由于及时转舵，到 1991 年 1 月底，量子基金赚了钱。

那一年量子基金赚了 53.4%，总资产达 31 亿 5725 万 9730 美元。基金发言人讲的话被人引述，“我们有很幸运的一年；从来没这么幸运。我们在股票、外汇和债券上，都赚了不少钱——像这样，在每个地方都大赚，并不常见。”

那一年早些时候，也就是波斯湾战后，他们一直看好后市。稍后，索罗斯旗下的基金经理人变得看坏后市，抛出数十亿美元的短中期公债。

1991 年德鲁肯米勒最大和最成功的操作，是下赌 120 亿美元在欧洲、日本和美国债券以及货币上。8 月和 9 月间，迹象显示经济转弱，债券价格因此上涨时，量子基金赚了数亿美元。

在生化科技类股上，量子也做得很好，并且在墨西哥电话和其他股票上赚了 2 亿美元。

德鲁肯米勒为老板干得非常之棒，使得索罗斯成为 1991 年收入最多的美国人，赚进 1 亿 1700 万美元。

索罗斯非常欣赏德鲁肯米勒，给他很高的评价，甚至称德鲁肯米勒为他的“第二自我”。

从技术上说，德鲁肯米勒是 12 位常务董事中的一个，但事实上，整个作业都由他主控。而德鲁肯米勒接掌量子基金后，基金战绩辉煌。资产净值平均每年成长 40%，比索罗斯 1969 年到 1988 年每年成长 30% 还高。1989 年，也就是德鲁

肯米勒领导下第一个完整的一年，量子基金成长了 31.6%，以后的情形是：1990 年 29.6%；1991 年 53.4%；1992 年 68.6%；1993 年 72%。

*

*

*

德鲁肯米勒指出，索罗斯曾说过，要取得长期的高投资报酬，必须“想办法保本，并击出全垒打。赚得不错的利润时，你可以远比平常激进。许多经理人一旦赚了 30% 到 40%，那一年就会缩手落袋为安（也就是在那一年剩余的日子里，操作得非常保守以免危及已经实现的厚利）。而要真正获得十分杰出的长期投资报酬，就得十分卖力地经营，直到赚得 30% 到 40%，接下来如果你有信心，就以当年获得 100% 的投资报酬率为目标。能有几年得到接近 100% 的投资报酬率，并且避免某些年头发生亏损，就能获得十分出色的长期投资报酬率”。

德鲁肯米勒指出，索罗斯教给他最重要的教训，是“做对或做错并不重要，对的时候赚多少，以及错的时候赔多少，才重要。索罗斯很少批评我，如有批评，是因为我对市场的看法真的很对，却没有充分掌握机会”。

他在量子基金开始做事没多久就学到一点经验。

他一直看淡美元后市，所以相对于德国马克建立了很大的空头仓。这个仓位开始赚钱，他对自己的作为相当得意。

一天，索罗斯闯进他的办公室，和他讨论这笔交易。

“你做了多大的仓位？”他问。

“10 亿美元，”德鲁肯米勒回答。

“你把它叫做仓位？”索罗斯说。这个问题成了华尔街的一句名言。

索罗斯建议德鲁肯米勒把仓位加倍。德鲁肯米勒照做了，而且，正如索罗斯所料，量子基金滚进的利润更多。

“索罗斯教我，”德鲁肯米勒指出，“如果你对某笔交易怀有很大的信心，就得直扑咽喉。当一只猪，得有勇气。以很高的信用杠杆抱着利润前行，也需要勇气。在索罗斯眼里，如果你对某件事情的看法正确，抱再多也不嫌多。”

量子基金成长得十分迅速，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终于觉得，有必要分出几个较小的基金。因此1991年和1992年，索罗斯的业务爆炸性成长。和量子基金一样，索罗斯1991年创立的准星基金（Quasar Fund）的投资对象，从货币到商品，无所不包。准星由15位外部经理人经营，但是索罗斯管理这个基金的货币操作部分。

1992年，量子新兴成长基金（Quantum Emerging Growth Fund）和配额基金（Quota Funds）创立。前者着重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股票市场；但它可以投资美国和欧洲，而且除了投资股票，也投资货币和债券。配额基金则以“基金中的基金”著称，由十位外部经理人处理投资事宜。

整个加起来，1993年初，他们的基金持有的投资组合超过500亿美元。德鲁肯米勒直接控制量子基金，并督导其他的基金。

第九章 国际慈善家

“我觉得我已拥有足够的金钱了，再三考虑之下，我得到的结论是，对我最重要的是‘开放社会’这个概念。”

在乔治·索罗斯事业生涯的早期，压根儿没想到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他很不喜欢公益慈善活动这个观念。

伦敦的犹太人监护会（Jewish Board of Guardians）对待他的方式，想起来就叫人心痛；这样的记忆也塑造了他对所有一般性捐助活动的态度。他觉得，“受到基金捐助者的影响，可能出现一些败德的行为。我认为，成立基金会唯一正当的理由，是我们想要达成某些东西，这种东西比基金会本身还重要。”他相信任何组织包括他的组织在内，都会因为处身其内的人追逐财富、权势和好逸恶劳而“腐蚀和败坏”。

他向一位记者表示，公益慈善活动“不合常理，因为我们的文明建筑在自利的追逐上，而非照顾别人的利益”。

然而，正如我们所说索罗斯不是一个简单的赚钱高手，他有自己的思想，除了赚钱外，他心中念念不忘自己的哲学理念：“开放社会”。早期哲学努力的失败也促使他把实现哲学理念的手段从著书立说成的传播转向实践活动。

80年代初，量子基金规模达到一亿美元，索罗斯的个人财富也有二千五百万美元，“我觉得我已拥有足够的金钱了，再三思考之下，我得到的结论是，对我最重要的是‘开放社会’这个概念。”

索罗斯认为，他这一生的分水岭，是逃离在祖国匈牙利生根壮大的“封闭社会”。离开匈牙利后，他尝到“自由”的滋味，首先是在英国，接着在美国。他决定运用他的力量，推广开放式的社会，在那里，“人们当家作主，可以把心里的话讲出来、追求自己的目标。”

索罗斯的哲学思想深受卡尔·波普尔的影响。在他几度修订但最终未能付梓的手稿《意识的负担》，以及在后来的一系列哲学著作和言论中，他提出他的哲学思想的首要基本前提是：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是不完整的，而开放社会的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一点的体认上。他进而认为西方的民主社会更符合他的开放社会的理想。

“任何人都无法掌握最终的真理，于是我们需要具备批判性思考。我们需要民主政治，以确保权力井然有序地移交；我们也需要缺席和利益，以便和平共存；我们需要可以提供回扣并允许失误得到纠正的市场经济；我们要保护少数族群并尊重少数族群的意见，最重要的还是我们需要法治。”索罗斯解释道，“开放社会是一个提供像我一样的个人可以生活和发展的空间的社会。我是犹太人，在匈牙利纳粹分子搜捕我时，我也尝过匈牙利共产主义的滋味，所以我绝对不是言之无物的。我十七岁就移民伦敦，我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时才开始了解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差别。”

索罗斯最后选择的实践方式仍然是设立基金会，尽管他对基金会有成见。而他设立基金会的宗旨，就在于打开封闭的社

会，使开放社会更稳定，以培养批判的思考方式。

谈到经营基金会，索罗斯滔滔不绝地回忆：

“我学习经营基金会学得很慢，我过去对基金会抱持怀疑态度，而且还有很深的偏见，到现在还有偏见。我认为，接受基金会捐赠只会使接受捐赠的人成为真正的慈善对象，而这却不是我成立基金会的用意所在，我把这种情形称为‘慈善的秘诡’。我认为，慈善事业基本上是一种腐蚀人心的行为，不但可以使接受捐赠的人腐化，也可以使捐赠的人腐化，原因是人们总是拍捐赠者的马屁、夸赞他，但从来不告诉他真相。向基金会提出申请的人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想办法向基金会要钱；而基金会扮演的角色就是避免遭人占便宜。基金会要自保，免为他人所乘，就要变得官僚或把规矩订得很严格，像福特基金会就如国家机器一样。但基金会也可以低姿态出现，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行事，我选择这种方式，我们的原则是：‘不要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打电话找你。’理论上，我打算用匿名的方式进行所有活动和捐款，我也刻意把我个人的自我排除在外，原因是我觉得基金会要存在，就必须有成就；假如基金会的目的只在满足自我，我的自我反而得不到满足。很讽刺的一点是，现在我主持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金会，而我个人牵涉在内的程度竟然那么深。”

索罗斯常常和人提起他设立的第一个基金会，那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基金会”，叫做中央公园社区基金（Central Park Community Fund），目标是整建纽约市的中央公园。不幸的是，这个基金会很快便夭折了，原因是，当时，另一个叫做中央公园维护组织（Central Park Conservancy）的团体，碰巧也有相同的目标，但做得远比其有声有色。两个基金会很快发生了令索罗斯感到不够体面的相互攻击，于是他“宰掉”了自己

的中央公园社区基金。他说，毁掉它比创立它，更令他感到骄傲。

他想做点善事。他必须创立一些基金会，但得确保它们的执行成果。

*

*

*

索罗斯真正的公益慈善活动始于 1979 年的南非。

这是他第一次实行大规模捐助活动的地方。南非社会是建立在种族隔离制度上的封闭社会。他觉得假如破坏种族隔离制度，最理想的办法是透过教育使南非黑人有能力 and 白人平起平坐。

索罗斯有一位祖鲁族朋友，此人是纽约一家大学的讲师，后来返回南非，1980 年，索罗斯到南非拜访他，并通过他认识了好几位南非黑人，和他们成为朋友。

他也跑到开普敦大学参观，开普敦大学校长史都瓦·桑德斯是一位投身黑人教育者，桑德斯的行为让索罗斯倍受感动。他觉得开普敦大学是一所建立在开放社会、以平等原则对待所有人的基础上的大学。这所学校学生的学费一概由国家支付。

索罗斯觉得，假如他帮助黑人学生进入开普敦大学读书，也就等于说他使南非当局花钱教育他们，也就是占了南非政府的便宜。

因此，他提供奖学金给黑人学生。这样的努力招致反效果：索罗斯后来发现他的钱主要被用于资助已入学的学生，只有一小部分提供给新学生。

他开始时捐赠 80 个黑人奖学金，但增加的黑人学生人数不足 80 人，索罗斯看出校方在他捐款之后把一些钱移作他用。第二年，他再到南非时和部分学生会面，他们竟很不高兴，充满敌意。于是他决定帮助第一批 80 名学生帮到底，但这项计

划就到此为止。

他不再支持那所学校。“南非叫人掉泪，”他后来解释说：“如果不在某种程度内成为整个制度中的一部分，做任何事情都很困难。”

计划的夭折令他感到非常可惜，他认为，假如计划继续进行，现在就有比较多合格的黑人领导者来开发南非。“我在南非也试办其它活动，但我的结论却是我占不了种族隔离政权的便宜，他们倒占了我的便宜。这个政权非常狡猾，总之无论我怎样做，都会沦为他们的同伙。于是我只让部分项目继续实行，包括训练南非新闻工作者和一些人权计划，但基本上我在南非做的不多，现在我觉得遗憾。”索罗斯后来表示。

*

*

*

索罗斯的主要的慈善活动在东欧和前苏联进行。

同一年，也就是1980年，他开始给东欧激进分子设立奖学金，并开始支持人权组织，包括波兰的团结工会和捷克的“宪章七七”（通过瑞典的一个基金会）及沙卡洛夫的运动。

索罗斯设立的基金会叫做“开放社会基金”。

他先和“人权观察”搭上线，当时这个组织叫做“赫尔辛基观察”，他参加他们的每周例会，把那段时期视为一个学习期。人权观察的会长阿尔耶尔·尼尔现在是基金会的会长，但在当时开放社会基金会规模很小，也只是实验性质的。

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是设法让东欧的异议知识分子有机会到美国，索罗斯通过这批人了解了东欧的很多情况。

从1980年开始，索罗斯通过瑞典基金会赞助宪章七七的激进份子，总共捐赠了三百万美元。到了捷克所谓的“天鹅绒革命”时，他向瑞典的基金会负责人简诺克及维也纳国际赫尔辛基人权联盟的舒瓦赞堡亲王建议，在捷克境内成立一个基金

会，一开始，很多人对外来的“好心人”很有疑心，即使是通过简诺克得到资金支持的人也发了不少怨言，得不到的人就抱怨得更厉害。

索罗斯回忆说：“他们并不知道我在革命之前已经长期资助宪章七七，也没有人知道我来自美国的陌生人希冀怎样的成就。问题的起因是我的资助是透过移民国外的人送达的，当时捷克人对这些人很不信任。积怨再次浮上台面，他们根本不想生活在现在，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算过去的旧帐。

“基金会和宪章七七之间也有磨擦，宪章七七老是认为基金会应该属于宪章七七，结果这些争端耗尽了基金会元气。我多次警告简诺克，要他忘却过去，回到现在，但这并没有效果，于是我就切断了对布拉格基金会的支持，这是我慈善事业中最让人失望的经验。”

布拉格的实验没有成功，但取得了教训。接下来，索罗斯把慈善活动的重点放在了匈牙利。

“我会说匈牙利语，而且我的根也在匈牙利，但我决定支持匈牙利异议人士，却并非因我是在匈牙利出生的关系，因为接受我基金会捐助的人当中，波兰人至少和匈牙利人一样多。而真正的原因是我在匈牙利学到的最多，而且我最好的个人关系也是在匈牙利建立的。”索罗斯这样解释其中原因。

索罗斯接触的最早的匈牙利政府官员是费伦茨·巴达（Ferenc Bartha），当时负责政府的经济关系事务。巴达和索罗斯1984年见面，索罗斯说明他有意成立一个公益慈善基金会。申请人以竞争方式得到捐助，基金会还将进行文化和教育活动。没想到他们的反应很积极，“让我有点意外，显然这些匈牙利官员把我视为一个美国生意人，可以在美国给他们一点方便，也会给他们钱，但要求不多。换言之，就是一个典型的美

国冤大头。”忆及当年，索罗斯面露得意。

双方于是展开磋商，匈牙利政府的代表叫乔治·艾克杰尔 (George Aczel)，是政治局中唯一一位犹太裔官员，也是匈牙利非正式的文化导师、总理卡达的亲信。

至于索罗斯在匈牙利的个人代表，则选了强硬的匈牙利激进分子米可洛斯·华萨赫尔利 (Miklos Vasarhelyi)。索罗斯和华萨赫尔利 1983 年首次见面，当时华萨赫尔利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交流研究所工作。华萨赫尔利是 1956 年叛变时匈牙利总理伊姆里·纳吉 (Imre Nagy) 的发言人和圈内人。苏联粉碎叛变行动后，诺奇被处死，华萨赫尔利被开除出党并判刑五年。

索罗斯对此人非常倚重，并且赞誉有加：“匈牙利的基金会之所以成功，要归功于他的政治智慧和技巧，以及匈牙利人普遍对他的尊敬。那时我每走一着棋都要和他商量，他对当时的局势比我了解，也许比匈牙利当局更了解。我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们倒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华萨赫尔利认为，成立那样的基金会，成功的机率不超过 50%。对索罗斯有利的一点，是匈牙利政府希望改善海外的形象，以取得西方国家的信用贷款和外汇。但是不利的一面，索罗斯面对的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没有和经营公益慈善基金会的外部人士打过交道，更不要说希望鼓励“开放社会”的外部人士。

华萨赫尔利所料不错，索罗斯基金会的成立几经磨难。

匈牙利政府同意索罗斯设立基金会的计划，但不准许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索罗斯坚持独立运作，不受外力影响。他桀骜不驯地说：“我想到匈牙利，把钱送给值得给的人。”而匈牙利政治家的反应是：“索罗斯先生，把你的钱带来，我们会帮

你分配。”

双方的谈判拖了一年。索罗斯只愿意拿出 200 万或 300 万美元，但是政治家嫌少；政府主张用于资助科学研究，索罗斯却希望基金会资助从事艺术旅行、写作或演出的个人。政府希望基金会提供资金协助购买设备，索罗斯却希望资助个人。

最后，双方的分歧似乎被克服了。匈牙利人签署相关文件后，其中一人说：“太好了！你的秘书处可以告诉我们的外国文化关系部门，它希望做点什么，我们就会去做。”

换句话说，匈牙利政府现在坚持新的索罗斯基金会受文化部管辖。叫匈牙利谈判代表大吃一惊的是，索罗斯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门口。他拒签文件。

一向是谈判高手的索罗斯说：“浪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却一事无成，多可惜。”索罗斯的手已经摸到门把，匈牙利官员的态度才软化下来，他们愿意给索罗斯基金会很大的独立运作权。

对方让步后，索罗斯签了文件，并保证在可预见的将来，每年提出 100 万美元经营基金会。

双方合作的方式是这样的：由匈牙利科学院和纽约的索罗斯基金会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当时匈牙利科学院还是受到匈牙利政府全面控制的，双方同意对方对支出都有否决权，花钱要事先获得两位主席同意。索罗斯是两名主席中的一人，另一人则是匈牙利科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到了 1993 年，索罗斯提供的金额增加到每年 900 万美元。

当时在美国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没有全职雇员，事实上这个基金会由索罗斯的太太苏珊在家里管理，“她做得很好，所以就没有管理开支的问题。你也可以说管理开支很大，这要看我如何评估我太太的工资而定。”索罗斯经常颇有自豪地如此称

赞他的妻子。

但1984年后，索罗斯在匈牙利成立索罗斯基金会后，就开始雇用全职人员，这个基金会和开放社会基金会是分开的，原因是匈牙利政府不接受“开放社会”这几个字。索罗斯基金会在纽约成立办事处，由一位全职雇员管理，但开放社会基金会却没有全职雇员，后来一直由苏珊撑了好几年。

*

*

*

和影印机有关的一件事情，成了匈牙利的索罗斯基金会一大突破的契机，并以此建立起积极改革的声誉。

在那之前，匈牙利主管当局担心地下新闻媒体兴起，一向严格管制可能用于颠覆活动的机器。索罗斯决定提供400台影印机给匈牙利各图书馆、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前提是政府同意不监视用来印什么，才能捐赠这批影印机。他总算获得政府批准。同意他的条件可能是因为政府急需外汇。

捐赠的数额为每年三百万美元，但头几年并没有把钱都花完。他们最初进行的一项计划是，向文化及科学机关提供影印机，以交换他们手中的匈牙利货币，以这些匈牙利货币作为在匈牙利提供奖金之用，但影印机也给匈牙利带来不少方便，所以同一笔钱竟然有两种好处。

“这项计划相当成功，原因是此举打破了匈牙利共产党对信息的控制，在此以前，一般人连看都看不到匈牙利仅有的几部影印机，而且这些影印机还是上了锁的，使用影印机前都要得到许可，到后来，影印机愈来愈多后，匈牙利的共产党政府控制不了这些机器，也控制不了信息的传播。”索罗斯回忆到。

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一直得不到政府的信任。基金会开始经营的前四年——1984年至1988年——执政党曾认真辩论“是否让索罗斯的基金会继续下去”，但在党内也有同情他们的人。

同情他们的主要是主管经济事务的人，而负责思想问题的人则很反对。当时在政府内支持索罗斯的人主要是伯达，他是主管对外经济关系的官员，匈牙利政府要他对基金会负责，他当然希望基金会成功，他希望暗中促成政府的改革而自己不必曝光。他是一位技术官僚，和塔托斯等好几位经济专家都主张改革。

索罗斯认为他在匈牙利的基金会很成功，他个人也参与了很多，他经常给人描述当时的情形：“基金会行事很审慎，均衡地进行各种计划，有时进行党内的思想官僚不乐见的计划，甚至他们不得不同意的计划，我们总是尽量使前者占上风；我们从事爱国文化计划，也进行使民众普遍受惠的社会慈善计划，使一般无法使用影印机的民众也得到好处。匈牙利对我们的奖助作家计划特别敏感，因为这可以使作家渐趋独立，有人还指称我们煽动作家联盟反抗匈牙利。”

“……那是我们最美好的日子。基金会的人即使不是异议人士，行事也犹如异议人士，教师、大学教授、研究人员都可以从事非政府活动，但又不至于打破饭碗。所以那是非常成功的行动，充满可贵的精神，此后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比不上它。该基金会清清白白，而且管理得很好。我经常回去看，并和基金会的人研究策略。而下一次再去时，所有策略都已一一实行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做到的，也许基金会是当时唯一的游戏，而公民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力量都在听候基金会的使唤。1990年解放以后，匈牙利人开始有别的机会了，但从1984至1989年，基金会的确是匈牙利知识界的生活核心。

“我想所有参与该事的人都会缅怀那段时期，我们花费很少，但成就却非常可观，我们觉得和恶势力角力很过瘾，此后再也找不到相同的境遇了。后来匈牙利改头换面后，基金会就

很难适应新的现实。”

据说基金会曾给一位年轻的新闻记者雷可齐奖金，资助他撰写 50 年代初匈牙利总理纳提亚斯·里克兹 (Natyas Racozi) 的传记。与即将出版的传记有关的一篇文章，出现在《世界经济》(World Economy) 杂志上。这是匈牙利境内可以刊登基金会广告的唯一一本期刊。当时的总理雅诺斯·卡达尔看了这篇文章，心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明天索罗斯会给某个人奖励金，写我的传记。”卡达尔把相关的新闻禁令延用到《世界经济》。

索罗斯对于自己和他的基金会受到的待遇大为冒火，似乎准备关闭索罗斯基金会。“接下来的两三个星期，双方剑拔弩张，”米可洛斯·华萨赫尔利指出，“最后事情冷却下来。”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又可以出现在《世界经济》杂志上。雷可齐的传记最后还是出版了，但出版时，风暴已经过去。

1988 年，卡达尔和几乎全部党领袖被扫地出门，失去权力。新的领导人上台后不久，索罗斯便受邀会见新任党总书记卡洛里·格罗斯 (Karoly Gros)，这表示政府再度肯定基金会的贡献，因为索罗斯从没被安排会晤以前的领导人。

关系改善为时短暂，只到 1989 年。这一年，政府的反犹太情绪高涨到肉眼可见的地步，基金会在匈牙利的地位变得较脆弱。“这是实话，”索罗斯回忆道，“政权易手后，我们不再是当地唯一的宠儿。在 1989 年之前，我们对当地的文化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1989 年以后，人们对文化活动的支持多了，我们也失去了有利的地位，而且我们的财政状况也开始恶化。文化机构手头已经没有那么多现金，‘文化美元’就不再值钱了，现在我们也无法再找志愿人士合作，而是要花钱请人工作，变成一个专业组织。

“匈牙利在 1990 年举行首次民主选举之前，我们还有段短暂时期享有点特权。我们捐赠多少款项，他们也提出相应的资金，那时就是这个基金会最风光的时刻，经过自由选举后，新政府有其合法性，我们遂失去原有的地位，之后，基金会之内开始有人活在过去，抗拒改变。”

“原因很简单：新政府不喜欢我们。虽然基金会小心翼翼不在政党政治中有所偏袒，也不自成派系，但基金会的人很多是支持自由民主党的，这个自由民主党在第一次自由选举后成为反对党。这并不令人意外，原因是自由民主党的政府最接近开放社会的构想。”

“更糟糕的是民主论坛之内有一个激进民族主义的反犹太派系，于是我和他们发生直接冲突，而这却对基金会起了积极作用，使它重拾原来的使命感。”

东欧各地，右翼人士对索罗斯的批评，以匈牙利最烈。1992 年 9 月 3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长达八页，标题是：“白蚁正吞食我国，关于索罗斯体制和索罗斯帝国的省思”。文内提到“共产党人和犹太人在匈牙利的权力斗争中扮演的共同角色……”。索罗斯明白地表示，他不受民族主义分子胁迫。“这些人其实想根据种族的认同，建立一个封闭社会。因此我十分反对他们，也乐于与他们为敌。”

*

*

*

索罗斯对他的匈牙利基金会很满意。

几年后，他说：“对基金会来说，情况是改善了。基金会过去无法和政府合作，现在已完全改观。在其它地方成功的计划现在也可以引进匈牙利，特别是教育和公共卫生方面的计划。当时匈牙利的基金会没有一般基金会的毛病，所有和慈善事业有关的秘诡都已化解，原因是这个基金会成了公民社会的

一项制度；这个基金会也不必自我保护，因为得到基金会支持的人都会保护它；基金会也不必官僚化，原因是它不必进行管制、报告和评估作业，而且受惠的人也不敢厚颜占基金会的便宜，假如有这种情形，也会有人告诉我们。”

1994年，布达佩斯的索罗斯基金会成立了十年，有40个奖助计划，资助不少图书馆和保健教育，并且提供奖学金。赴海外研习为优先，和年青人有关的计划也排在前头。索罗斯基金会甚至有个计划，赞助校园内的辩论比赛。“此地不熟悉辩论的观念，”基金会里留着一把黑胡子的主管拉斯齐洛·卡德斯(Laszlo Kados)说，“这里的风气是听命行事，不要与人争辩。”

虽然经营相当成功，基金会的主管还是觉得有很多事情尚待推进。“匈牙利还不是开放社会，”卡德斯说，“这里有很多结构、很多心态上的问题，等着我们去改变。你可以成立政党、进入议会参政、举办自由选举。这些事情已存在于匈牙利，但不代表已经是开放社会。现在只能说是起步。”

通过基金会的捐助，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索罗斯直言无隐地表达了他的希望：“我们不通过政治行动直接走向目标，反之，我们要间接损毁教条式的思想体系。不同理念间的竞争，正是民主的本质。”

索罗斯把匈牙利基金会的成功归功于以下几点：

其一，是当时匈牙利缺乏强势货币，那时美元的汇价比官定汇价高很多，这对匈牙利的文化机构也有利，因为他们手中持有不少当地货币，但总得不到强势货币，而索罗斯能带来大笔美元，满足了他们的外汇要求。他们把这种情形称为“文化货币汇率”。

其二，匈牙利人非常乐意为他们效力，以争取一点点奖

助，原因是基金会可以帮他们实现他们一向的心愿。

所有为他们工作的人几乎都不拿报酬，他们只要得到一点物质上的回馈，比如得到一台影印机，或者有机会出国做点研究等。“我们也使用匈牙利政府的设备进行与共产党无关的活动，原因是大部分人都是受雇于匈牙利政府的。训练课程、会议和表演可以随时举行而不必缴租金，这也是基金会发挥和扩大影响力的另一种方式”。

最后，他们选择了文化教育事业作为突破口。“有人指责我们另行建立文化部和教育部，我们却认为这是无上光荣，不要忘记，我们当时每年只有三百万美元的经费，但我们的工作不比匈牙利整个文化和教育建制差，而这个文化教育建制每年的预算比我们多上好几百倍。”索罗斯对此不无得意。

*

*

*

1984年在匈牙利创立基金会后，索罗斯决定扩大公益慈善活动的范围。1986年他进入中国大陆，因为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在这样的地方设立基金会的想法令他着迷。他的投资规模很小，只有几百万美元，而且前后三年的时间内，索罗斯试着打进这个“不可测度”的东方国家。他失败得很惨，理由不一而足。他一方面指责他的组织受到秘密警察挟持。另一方面他承认没办法适应中国文化。“这里奉行的是孔夫子的伦理，不是犹太——基督教的伦理。如果你给了某人某种资助，他会很感激你，指望你继续照顾他的余生，而且对你忠诚不渝。这和开放社会的观念完全背道而驰。”在中国大陆遭到挫败，索罗斯把精力转回东欧和前苏联。

*

*

*

1986年，索罗斯在波兰成立基金会。波兰的基金会是在波兰地下文化组织“窗”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个文化组织和团

结工会有关系。

索罗斯在波兰的经历很不顺利，原因是他以为只要把匈牙利的成功经验在波兰复制一下就行了。“初时，我也被波兰的基金会弄得很烦恼，……我觉得我在波兰的地位很稳，因为有波兰团结工会和团结一联的文化组织‘窗’两个非法组织支持我，我将匈牙利的模式带过去的时候，依仗的是‘窗’的人，并认为他们应该懂得怎样经营一个基金会。我以为只要和波兰达成协议，然后付钱，其余的他们就会自行发挥。但事情不如预期中顺利，‘窗’的人不知道从何入手，甚至连装设一条电话线也办不了。经过1989年的革命后，我把基金会交给团结工会的英雄巴雅克，但结果也不是很好，最后我们找到了执行董事的理想人选，但那时我已经和基金会发生严重矛盾，我还是希望波兰的基金会像匈牙利的基金会一样运作，是一个对所有人开放、提供财力使人们得以实现其目标的奖助组织，也是公民社会的支柱之一。但涉及基金会事务的人也有他们的憧憬，他们希望基金会有其缓急轻重的次序，也有自己的计划。”

索罗斯同意了他们的做法，情况有所好转。此后，波兰的基金会——只泰芬·巴托利——成了网络中的最佳基金会之一。

保加利亚的基金会情形和波兰的基金会很相似，但设立这个基金会时并未遭遇同样的困难。索罗斯回忆道：“这家基金会一开始就已经准备妥当、精神焕发，有如希腊女神雅典娜一样。当时我得到美国文化参赞约翰·曼兹斯的帮助，曼兹斯曾在匈牙利工作，也了解基金会的宗旨，他把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我的同意。但也不是说我们全无困难，例如一位人权组织首脑出身的董事原来竟是一位反土耳其、反吉普赛人的激烈民族主义分子。”

*

*

*

人权观察组织的活动。

即将启程离开美国的时候，她接到乔治·索罗斯打来的电话。索罗斯说，他将协助费城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组织（Bother's Brother），而这个组织正要送药品和其它用品到罗马尼亚。

“我乐意为他们支付运送药品的费用，但不希望送到不对的人手中。”索罗斯请她设法确保那些药品不经官方渠道，直接送到需要的人手里。布拉隆保证尽力而为。

索罗斯接着决定在1月间造访罗马尼亚，希望在那里设立基金会。至于主持基金会的人选，他想到罗马尼亚著名的激进分子，39岁的艾林·提欧德瑞斯库（Alin Teodoresco），此人是以异议分子组成的“社会对话团体”（Group for Social Dialogue）的领导人。

提欧德瑞斯库从没听过乔治·索罗斯的大名——也不知道基金会是什么东西或者想要做什么事。他们合作的开始并不愉快。1990年1月6日他和索罗斯首次见面，索罗斯没有先约好，就出现在提欧德瑞斯库的门前。随行的有他在匈牙利的索罗斯基金会的个人代表米可洛斯·华萨赫尔利。

当时提欧德瑞斯库忙着开一个又一个会议时，有位同僚说，“两个美国人在外面等你，其中一个说他是亿万富翁”，提欧德瑞斯库听了“不为所动”他不以为然地说道：“喔，少来这套，去他的。”

在此之前，革命刚过不久，就有美国人搭着一辆辆巴士前来，告诉提欧德瑞斯库和其他激进分子，说他们有钱，愿意伸出援手，这情形令提欧德瑞斯库很恼火，因此他让索罗斯等了两个小时。最后有位秘书闯进提欧德瑞斯库的办公室，告诉他那两人还在等候。

“请他们进来。”

走进来的正是那位亿万富翁以及他的助理。

“嗨，我是乔治·索罗斯。”

“嗯，”提欧德瑞斯库说，脸上毫无表情。

接着介绍到华萨赫尔利。

华萨赫尔利也是知名的激进分子，坐过监狱，许多东欧人视他为英雄，提欧德瑞斯库也听过他的名字。有华萨赫尔利在场，使得提欧德瑞斯库愿意给索罗斯一些时间。亿万富翁并没有使这位罗马尼亚激进分子肃然起敬。

三个人隔天在布加勒斯特的国际饭店共进早餐。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先闲聊了半个小时。

最后，乔治·索罗斯插进话局。

“我是亿万富翁，”他开门见山地说。

“嗯”是提欧德瑞斯库能想到的回答方式。

“我想在罗马尼亚这里成立一个基金会。”

“什么是基金会？”提欧德瑞斯库毫不掩饰地问。索罗斯很有耐性地解释：“你从我这里拿钱。你有个董事会。你要做广告，让别人晓得你有钱，他们就会来这里向你申请用钱，你再把钱给他们。”

索罗斯说，他希望提欧德瑞斯库领导这个基金会，并给他100万美元让他运用。提欧德瑞斯库发觉，把外部基金会的观念引进国内，是很奇怪也很困难的一件事。一个月后，索罗斯重回罗马尼亚，急着想知道为什么提欧德瑞斯库似乎犹疑不决，不肯接受他给的职位。索罗斯问：“你是不是需要有人帮忙，创立这个基金会？”

“是的，”那位前激进分子答道：“我需要帮忙，我不晓得怎么设立基金会。”

索罗斯说，很好。他心里正好有个人选，那就是珊卓·布拉隆。“你必须见见她。她是我见过的最富创意的人，但带点神经质。”

回到纽约后，索罗斯打电话给珊卓·布拉隆。

“你对我的基金会，有什么看法？”

“什么基金会？”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根本不晓得他在说些什么。

“还没开始运作。你想不想回罗马尼亚，把它弄好？”

索罗斯似乎正在提供给她一个工作机会，珊卓·布拉隆很兴奋。最后，他正式请她当基金会的第一位执行主任，她同意了。1990年4月，索罗斯与提欧德瑞斯库再度碰面，两人同意由他出任基金会的第一任总裁。

现在最高两个职位都找到了人，成立基金会的工作可以开始推动。

1990年6月，基金会开始运作，名称是“开放社会基金会。”珊卓·布拉隆9月间抵达罗马尼亚，就任新职。

对提欧德瑞斯库来说，与索罗斯相处并不容易，因为索罗斯很没耐性。他希望把钱花掉，然后再到别的国家，做别的事情。“第一次见他时，他就像个老板，”提欧德瑞斯库回忆往事说。他用轻蔑的语气提“老板”这个字眼，用以表示某个人期望他的员工不用给太多指示，也没机会问老板问题，就能自行运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提欧德瑞斯库完全慑服在那位投资家底下。他提出一个关于乔治·索罗斯的理论：他比其他大多数人坐在更高层次的心灵飞机上。他认为，了解索罗斯的秘诀，在于把他想成是在与他自己竞争，而不是和别人竞争。这个观念，提欧德瑞斯库是从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那里得

到的。

从无到有创立基金会很不容易，光是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为基金会找人，已是史无前例之事，登广告送出第一笔奖学金也是一样。

罗马尼亚虽已脱离共产主义，但仍显得神秘而多疑。据报导，1991年1月3日，第一批60位领到索罗斯基金会奖学金的学生抵达布加勒斯特火车站，启程前往爱丁堡大学时，其中一个女孩子竟然哭了起来。她表示，看到报纸广告时，她本来以为那是骗人的。在那之前，只有位高权重的罗马尼亚人才到过海外，她绝不可能有这种机会。如今事实摆在面前，她实在太激动了。

连基金会的雇员，也发现在基金会“开放”的气氛中工作很不习惯。高个子，相貌迷人，现年30岁的安卡·哈拉辛(Anca Haracin)，1990年10月开始到基金会工作，当计划协调员，但1993年就接任珊卓·布拉隆的位置，当上执行主任。那一年，她可以动用的预算高达600万美元。

哈拉辛从小接受的教育，使她相信每个活动都需要一个集权机构做决定。在基金会工作，动摇了那种信仰。她脸上经常挂着微笑，目的是掩饰她刚开始时感受到的恐惧。不过到了1994年，她已经能说：“基金会的意识形态已完全灌输到我脑子里。我甚至能把所学应用到私人生活上。我负起了更大的责任。现在我进到第二阶段。我必须授权。这比负起责任还难。”

索罗斯的匈牙利血统给他在罗马尼亚的活动带来一点麻烦，罗马尼亚有2310万人口，其中240万是匈牙利人。在某些罗马尼亚人眼里，匈牙利出生的亿万富豪，到罗马尼亚来提倡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和开放社会，似乎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其实是煽动罗马尼亚境内的匈牙利人与政府对抗。

基金会成立后不久，对索罗斯的攻击便纷至沓来。有些报纸指责索罗斯想要把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卖”给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有 180 万匈牙利人。基金会设法公正行事，不偏袒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居民——或故意歧视他们。这事做起来并不容易。在克鲁日市（Cluge），匈牙利居民大量申请补助，基金会别无选择，只好给他们看起来似乎不成比例的资助。

索罗斯对付攻击的办法是不加理会。他没给基金会任何指示，职员只好尽可能坦诚面对大众，作为反击。在别人发动攻击之前，基金会从未发表奖助学金得主的名单。攻击展开之后，就这么做了。安卡·哈拉辛说：“这是种方法，可以让别人晓得，我们不只把特兰西瓦尼亚卖给匈牙利人，也做了很多好事。”

连基金会的名称——开放社会基金会——也引起外界的疑虑，他们相信基金会的职员必然有所隐瞒。毕竟，这个基金会没有挂索罗斯的名字，因此布拉隆要求提欧德瑞斯库把它改名为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 for an Open Society），把索罗斯的名字挂在基金会上面。以此使人相信该基金会不是秘密工具，运用匈牙利的资金以支持罗马尼亚境内的匈牙利人。

同样令人疑惑的是他们仍没有显眼的办公建筑。站在布加勒斯特的维多利亚大广场前索罗斯基金会所在的建筑物的外面，你会发觉，这里没有标志指出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就在里面。三楼基金会办公室外的走廊上，也没有标志。这绝不是无心的疏忽。

同样的，办公室墙上找不到乔治·索罗斯的照片。虽然所有的帐单由他支付，而且这个地方挂着他的名字，却明显地欠

缺意在歌功颂德的标示。没人私底下谈论他，或者开他的玩笑。但是乔治·索罗斯一直都在那儿。他无所不在，职员每四五句话，就有一句提到他的名字。开放社会基金会具体而微地展现了索罗斯包罗广泛的策略和使命。职员晓得，如果他们想
出一种对那个使命有所帮助的计划，索罗斯必将全力为之。

*

*

*

1987年，索罗斯决定在苏联开展新的公益慈善活动。他称苏联为“一等一的封闭社会”。那一年3月，也就是苏联官员释放俄罗斯著名激进分子安德烈·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后三个月，索罗斯开始和苏联官员磋商，允许他在苏联有个落脚点。他最大的希望是促进经济改革。

那一年，他征询美国的苏联移民的意见。出生于莫斯科的科学家艾雷克斯·格法伯（Alex Goldfarb）长久以来就是异议人士。格法伯首先在索罗斯的纽约市寓所和他见面。格法伯和他的朋友有所怀疑。“我们真的抱持负面的看法。我们说，这样努力马上会被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行动给耗蚀掉，而且不管你多聪明，他们总会比你更聪明。”索罗斯不理睬他们的悲观论调。

事实上，他进行得很顺利。1990年，他创立了爱沙尼亚开放社会基金会，也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设立类似的基金会，提供商业和管理训练、给予学者留学补助、提供奖学金和英语训练。其中一项是由他的老友赫塔·赛德曼（Herta and Paul Amirian Foundation）主持的“管理训练计划”。她的计划针对成年工作者——从阿尔巴尼亚到前苏联都有——训练他们学习企业管理技巧。1994年4月，管理训练计划刚为35位俄罗斯人上完会计课程。赛德曼说：“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们会需要当地的专业人士提供相关服务，而这就是我们想做的。”

1992年12月，索罗斯宣布其规模最大的援助计划，拿出1亿美元资助前苏联的科学家和科学研究。1992年9月放空英镑，刚赚了大钱，索罗斯说：“我一直在找一个宏伟的计划，希望能产生更大的冲击。”这笔捐助款的目的在于减缓人才外流的速度：在那之前，已有五万科学家离开前苏联各共和国，放弃他们的研究，到利比亚或伊拉克等地找待遇更好的工作。从这事可以看出索罗斯剑及履及的作风。美国和欧洲共同体还在为如何帮助俄罗斯分崩离析的科学界而不知所措之际，索罗斯已经放手做了起来。

“我在1987年着手筹备俄罗斯基金会，或者说是苏联基金会。开始时我以观光客的身分前往莫斯科，企图说服沙卡洛夫领导计划中的基金会，他强烈建议我不要按计划进行，原因是他深信我的钱最后会落入国家安全委员会（KGB）手中。我不为所动，勉强组成了一个理事会，这个理事会的组合颇为奇特，其中有些人平常根本互不理睬，包括历史学家艾凡纳塞耶夫、社会学家札斯拉芙斯卡雅和后来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作家拉斯普汀，这样的组合今天根本不可能出现。”

“这个所谓文化倡导基金会——也就是该基金会的名称——结果交由苏联共青团的一群改革派官员管理，他们接手后就马上着手组成一个封闭的群体，希望由此促进开放的社会力量，但他们毕竟无法摆脱原有的苏联心态。我察觉到这种情形时，就发动一次政变把这些人赶走，这次政变发生的时间刚好在苏联的1991年8月政变之前。策划这次基金会政变的人是我在莫斯科的代表律师，但此人马上把基金会变成个人的采邑，于是我又发动另一次政变除去他。此后基金会可说花果凋零，直至我们着手进行所谓‘变换工程’为止。”

索罗斯的所谓“变换工程”是一项“教学改革”计划，目

的在取消一般学校和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课程。为此索罗斯打算投入巨额捐款，但这却成了另一个危机发生的主因。

当时是 1994 年上半年所谓“强盗资本家”事件的高潮，俄罗斯正进行大规模的企业私有化计划，公开让国民持有企业股票，而这些股票的交换凭单几乎一文不值。

在银行方面，由于货币供应短缺，名声比较差的银行以月息十厘的利率吸引美元存款，手头有点钱的人都赚了大钱，这种诱惑对基金会的负责人影响相当大，索罗斯发现一笔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巨款存在一家不知第几流的银行里。

“虽然我们把钱提了出来，而且也没有什么损失，我们还是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核查，最后把主要的工作人员辞退，基金会元气大伤。”

索罗斯不无遗憾地说。

于是，索罗斯逐步撤销设在莫斯科的文化倡导基金会，用别的组织取代。他是国际科学基金会的负责人，这个基金会的宗旨则是保存苏联最先进的科学，和该基金会并行的国际科学教育计划也由他负责。

这都是规模很大的计划，比他们平常进行的计划规模大得多，索罗斯捐了一亿美元给国际科学基金会，但不到两年钱就用光了，基金会提供三万多名科学家每人五百美元的紧急奖助金，这五百美元足够他们使用一年。

基金会按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模式创立了一项奖助计划，并透过这项计划发放大部分的钱，同时，基金会也提供旅费补贴、供应期刊，现在除了俄罗斯的科学界外，还帮助学校、大学、图书馆、医院、传播媒体和一般使用者使用国际网络。

国际科学教育计划每年的预算为两千万美元，但“受惠”的人更多，而且所有的工作都要按“明确的规定”进行。

“我要证明西方的援助也可以是有有效的，而自然科学就是证明这一点的最佳园地。俄罗斯科学代表了人类智慧的杰出成就，俄罗斯科学和西方科学有所不同，但它是值得保存的。科学可以站在争取建立开放社会的第一线，而且过去的确也是如此，我在这方面努力成功的机会也很不错，原因是我们在这方面有评估得失的可靠标准，我们也可以动员国际科学界在选择保存对象方面助我们一臂之力。”

“事实证明我们的想法是对的，我们推行的各项计划都很成功。最近俄罗斯反情报机构攻击我们，俄罗斯国会众议院也下令调查，结果整个科学界挺身而出为我们辩护，反情报机构的攻击反而给我们带来胜利。”

索罗斯在前苏联的慈善活动规模是最大的，除了俄罗斯，对其它前苏联各共和国基金会的进展，索罗斯也表示满意。

*

*

*

“其他在前苏联各共和国设立的基金会也都很成功，乌克兰的基金会表现尤其好，我希望俄罗斯基金会扮演的角色，它办不到，乌克兰的基金会却办到了。乌克兰基金会周边有一大群其它机构随着成长，各有各的目标，现在他们已经成了一个网络。这些机构或多或少都和基金会有关，但他们本身却是独立的。这些机构包括一所公务人员训练学院、一所私立大学、一个促进法治文化的基金会、一个传媒中心、一个现代艺术中心、一个经济研究所和一所私立学院。乌克兰基金会正在帮助乌克兰建立现代国家和开放社会必须的基本设施，假如乌克兰能够继续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存在，基金会对乌克兰的成就是功不可没的。”

“原因有好几点，一个民主独立的乌克兰，其重要性我过去已经察觉到，只要乌克兰国运昌隆，帝国主义的俄罗斯就不会成为事实。我有一些很可靠的合作伙伴，所以我才有办法帮助乌克兰，这些人包括日内瓦一家商学院的退休院长郝维利辛，他退休的目的就是要在凯尔夫设立一所商学院；另一个则是从加拿大跑到乌克兰做研究的克拉成柯教授。我让他们全权负责，他们果然把基金会创办起来，我们早在1989年就成立了乌克兰文化复兴基金会，甚至比乌克兰在1991年的独立还早了两年，最后乌克兰独立时，我们决定全速推行，订立明确的目标，就是为日后的西方援助作开路先锋；结果我们的目标达到了。

“坦白说，当初我对乌克兰的感觉有点矛盾。二次大战时被遣送到乌克兰的犹太人命运如何我很清楚，原因是其中一人逃回来了，他在我十三岁左右时教我拳击，他告诉我的一切让我毕生难忘。后来作家出身的乌克兰文化部长德祖伯要求我在乌克兰成立开放社会基金会，我就把听来的故事拿来质问他。他说，基金会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乌克兰，使这些暴行不再发生，我接受这一点。觉得这个目标意义甚大。”

*

*

*

1987年以后，索罗斯在东欧各地设立了许多索罗斯基金会办公室。每一年，他的支出都在激增。1990年，他在东欧更加努力，创立了中欧大学，布拉格和布达佩斯都有校园。400位学生来自全世界22个国家。中欧大学是索罗斯的梦想，他认为它最富有意义。

“起先我答应每年给500万美元，前后五年，总共2500万美元给这所大学。我们目前的支出水准早已超过这个数字。”

索罗斯做得很好，试着避免自己因为援助计划而成为崇拜

的偶像。没错，他希望被人赞美和尊敬，但不坚持名字和照片必须摆在他出资的每个组织中的显眼位置。利用各个基金会传播他的理念，他也似乎没有特别感兴趣。有一次他说：“我不想死后名字还为人悼念。我想做的是影响正在发生的事。”

设立大学，并非索罗斯的初衷，但后来他的想法转变了，并且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其中。

“我一向反对成立常设机构，也从不愿意将钱投资在一砖一瓦上。但经过 1989 年的革命后，我觉得有必要透过一种制度，维持和发扬这场革命的精神。‘天鹅绒革命’是在开放社会的精神下进行的，只是他们的开放社会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过于简陋。当时知识界在这方面需求迫切，我为满足这种需求，遂建立了中欧大学，中欧大学的宗旨不在弘扬开放社会的概念，而在实现此一概念，我们不但要造就一批精英分子，也要成就一种新的理解、新的境界。

中欧大学的成立也以革命方式为之——既无预先计划，也没有适当的法律结构。决定之后几个月内，中欧大学马上于 1991 年 9 月开学，秩序也在混乱中建立起来，现在中欧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很象样的学府了。我们的教授阵容很强，包括知名的学者和成名在即的学者，校长是第一流的人选，校董事会也是第一流的。

“大学草创初期，我非常活跃，亲自制订决策，后来才逐渐把权力移交给校董事会。纽约州立大学承认我们颁授的学位，教学品质也很高，所以我们决定第一届毕业生都授予硕士学位。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是教育史上一项独特的成就：我们只花了六个月时间就把得到认可的硕士课程办起来。中欧大学在二十年内每年至少可以得到我捐献的二千万美元作为经费。1995 年秋天，中欧大学在布达佩斯一幢我们兴建的宏伟

建筑物里开课。

“中欧大学中有世界各地的研究生，但主要还是东欧学生，东欧学生可以享有全额奖学金，大学里开设各种人文科学课程，皆采用英语教学。目前许多教授都来自西方大学，他们的课程和传统大学有些分别，有比较多从事创新研究的空间，教学、研究和对实际计划的参与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

*

*

索罗斯的基金会活动很讲策略，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他们的做法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完成自己的目标。比如说，索罗斯的基金会从不支持政党，因为它违反美国的基金会法律。

“我主张开放社会这个概念，但我绝对反对支持政党。假如一个民主运动正在抵抗一个不民主的政权，我会去支持它，但我的基金会绝不支持政党，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这是违反关于美国基金会的法律的。”

“说得精确一点，我只能说不论在任何处境中，民主运动和政党之间的分界可能都很难界定，像罗马尼亚这个国家就是。我在罗马尼亚支持所有立场超然的报纸，以低价向他们供应新闻纸，于是伊列斯库总统就说我支持反对党。我回答说，我支持的是多元自由的报界，我们不能互相容忍彼此的歧见。我引用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要说明决定做到什么程度是很困难的。

“很多人不希望在中欧或东欧出现开放社会。他们要的是封闭的社会。当有人希望封闭社会出现，他们自然就想把我们从他们的国家赶跑。”

*

*

*

索罗斯在全世界 25 个国家都设有基金会，其目标是实现

他的“开放社会”的理想，对他的基金会的活动，他总括道：

“封闭社会转变成开放社会是一个有系统、有步骤的转变过程，几乎是每一样事物都要改变，但我们完全没有任何蓝图作为依据。基金会实现的是改变带来转变的方式，基金会动员了相关国家人民的精力。”

“在每一个国家，我都会找出一群人，有的是比较知名的社会贤达，有的没那么有名，但他们对开放社会怀着同样的信念，所以我把决定首要任务的责任付托给他们。我有的是总体的远景，而且经过一段时间，我也从个别的基金会身上学到不少事情，我花力气进一步推动比较成功的计划，其余的就放弃。我也设法把成功的计划从一个国家移到另一个国家，也提出区域性计划，但我绝对不从外面带东西来强加在这些人身上。我让基金会自主，我只通过增加捐赠的方式控制。”

“开放社会是一个自发组织的制度，我希望基金会帮忙建立开放社会。而在这一过程中它也成为开放社会的‘原型’，我们从混乱开始逐渐建立秩序。基金会的规模几乎是无限的，我们选择真正重要的计划，计划的内容则视我们察觉到的需要而定，也视我们能够拿出来能力而定。所谓首要任务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举例言之，旅费奖助在初时是很重要的，但到现在成效就不会很大。我们最重视的主要是教育、公民社会、法律、传播媒体、图书馆及国际网络，但这些并不足以涵盖我们活动的范围，我们往往是先进行活动，范畴则是后来才建立的。事实上谁都不知道我们全部活动包括哪些内容，这样反而较合我意，最让我觉得过瘾的是那些我一无所知以及我偶然发现的活动，为此我必须动员其他人的精力，原因是有些我从未想过、甚至不可能想到的事情不断发生，而且这些事情往往是我不能理解的，所以我很需要别人帮忙，这让我有一种解脱的

感觉，我终于可以突破孤立，和世界连成一气。事实上，我知道并不是每一个活动我都喜欢，但那些活动虽然我事前不知情却仍能顺利进行，倒也教我宽心不少。”

索罗斯的慈善活动，尤其是在东欧和前苏联设立各种基金会，目的非常明显。他的反共立场也很鲜明，他本人对此也毫不掩饰。他自诩为促进东欧和前苏联发生巨变的斗士之一，认为他的事业很雄壮、带激情、有报偿——而且乐趣无穷。

“我们做的是破坏制度的工作。我们支持任何事情，捐助很多小钱，因为任何独立自主的行为，都会破坏极权主义的教条。”

在西方国家，他也不是没遭批评。有些西方人指责他为现代的罗宾汉，也就是“夺取”富裕西方国家的钱，赠予贫穷的东方国家。这一点，他必须淡然处之。1992年9月，他孤注一掷赌英镑会贬值——而且赢了——有人不屑地说，索罗斯等于从每位英国国民身上“偷窃”了12.5英镑。索罗斯以幽默的口气应付这种抨击：“我真的认为西方应该已经而且必须为东方做更多事，所以我很高兴自己替他们做了。”

第十章 英格兰，别为我哭泣

“一个国际金融界的专家，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从英镑危机里赚了将近 10 亿英镑。”

索罗斯一举成名，是在 1992 年的 10 月 24 日。这一天，伦敦的《每日邮报》刊出了美国《福布斯》杂志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用粗黑的大标题向世人宣告了索罗斯的一场豪赌：

“在英镑暴跌时，我赚了 10 亿”。

《每日邮报》的文章里，附有一张索罗斯的照片，照片上索罗斯手中端着饮料，脸上充溢着一种成功者的微笑。文章引言中说：“一个国际金融界的专家，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从英镑危机里赚了将近 10 亿英镑。”

*

*

*

《每日邮报》中报导的索罗斯的成名一击发生在 1992 年 9 月。

当时他投入巨资，赌英镑会下跌。这场世纪之赌，索罗斯的对手是英镑和强大的英格兰银行。几百年以来，英镑是全世界最坚挺的货币之一，英镑直接和黄金挂钩，曾经是流通领域的“世界货币”。然而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创伤和 1929 年股市的灾难，严重损伤了英镑在国际上的威信。英国

不再采取金本位制，也就是不再以黄金作为发行钞票的后盾了，英镑也采取浮动汇率制，对其它国家货币的汇价每日波动。自此以后，英镑再也不是国际支付中的霸主，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多的货币向英镑发起了挑战。

英格兰银行是世界上最早全面发挥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私人股份银行，成立之初，它就有和其它银行不同的特权，比如接受政府存款并向政府提供贷款，在发行银行券上有优势等。1844年通过的银行法，结束了英国279家银行都发行银行券的局面，同时，因为其它商业银行需要证券时只能从英格兰银行提取，所以必须在英格兰银行存款，从而使得英格兰银行成了集中其它商业银行一部分存款准备金的银行。于是奠定了英格兰银行成为中央银行的基础。1854年，英格兰银行成为全国银行业票据交换中心；1872年它开始在其它银行困难时提供资金支持。至此，它已成了全国金融的管理机构。多年以来，它代表的是繁荣和力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摇其坚实的地位，就如同中流砥柱一样，在一次次危机中岿然不动。

索罗斯将向他的对手发起攻击，这样强大的对手，别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索罗斯却决意做了，他要摧垮英镑的不可一世，摧垮英格兰银行的“央行神话”。

欧洲货币体系于1979年3月13日正式实施，目的是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崩溃之后，在欧洲加强货币合作，以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区域，当时规定的对中心汇率 $\pm 2.25\%$ 的波动幅度（相互之间则为 $\pm 1.125\%$ ）使成员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接近于稳定的固定汇率，从而避免各国之间汇率波动过大，有利于开展经济工作。按照规定，如果市场上冲击力大，使得某一对成员国之间的汇率接近上下限时，中央银行必

须干预，以稳定相互之间的汇率。这种欧洲汇率稳定机制可以稳定欧洲的企业，削弱交易员和国际投机家们的势力。

1992年2月7日，各国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加强紧密合作的期望更浓，欧洲共同体12国签署的这个条约，目的是为区域性的货币和经济体系做准备，逐步走向全面的统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欧洲货币联盟设定了一个日程表：整个工作分作三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中，欧共体的成员国要尽力使本国的有关指标达到规定的标准，这些标准主要有成员国之间的通货膨胀差异、利率差异、汇率变动和财政赤字以及公共债务水平。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各成员国自身的努力。第二阶段的重点是加强欧共体的监督，成员国实施多年度的方案，以保障经济的趋同。第三阶段的目标是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发行单一货币。如果多数成员国能于1996年达到规定的标准，第三阶段就可以从1997年开始，否则开始日期将推迟到1999年1月1日。

多么伟大的目标，多么美好的构想。

然而要实现他们的希望，必须要各国齐心合力，一致行动，不惜节制自己的利益来维护欧共体这个大家庭的利益。如果真正在一个家庭中，为了大家而损失自己一点利益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国家呢？就算政府有点国际主义…慈善，当它为了别国而触怒自己的人民，它还有什么退路吗？

早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之前，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经济顾问玛丽·布朗就曾认为，欧共体成员国的经济差异很大，如德国的人均收入为9400英镑，而希腊只有4500英镑；卢森堡的失业率仅为1%，西班牙却高达16%；成员国之间通货膨胀率的最大差异达到18个百分点；短期利率的最大差异为10个百分点。这种经济差异使共同体无法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

欧洲人的努力要取得成功，太需要彼此的协调和互相帮助了，但是不管他们签了多少文件，发表了多少崇高的演说，有一件事，西欧的政治家们始终做不到，那就是统一的西欧所要求他们去做的事。

这时，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管制的解除，外汇市场上每天的交易达到1兆美元，是1986年的三倍多。美国劳工的退休基金就有1500亿美元投在海外，各式各样的机构，从日本的保险公司到美国的共同基金，都在全球各地寻找着机会。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成长得十分迅速。越来越多的钱需要越来越大的机会。索罗斯虎视眈眈地盯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寻找着自己的猎物。1992年秋，索罗斯终于拿出几十亿美元来赌英镑下跌，即便如此，索罗斯的钱也只是冲刷全球金融市场海岸的汹涌钱海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 * *

1992年，欧洲货币市场的微妙关系终于显现出来了。从1987年以来，欧洲的货币都盯住德国马克。但是由于英国经济的持续衰退，以及没有理由相信英国有能力让英镑钉在那么高的马克价位上，投机家们开始嗅着猎物的气味，他们感觉到英国迟早会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

索罗斯心中十分明白，欧洲国家击退投机家的唯一方法，是所有国家的利率维持在同一水平上。要是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率有差异，投机家们就跃跃欲试地要打垮弱势货币。乔治·索罗斯打赌参加欧洲汇率体系的国家无法采取一致的立场和行动。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行政长官加里·葛雷斯坦指出：“乔治的才华，是早在其他任何人之前便看出了整个趋势。”

索罗斯的等待，已经很长了。从柏林墙崩塌的那一刻起，

他就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了。他看出德国统一所花的钱将远远高于科尔（德国总理）和其他任何人的预测，宏观经济的图谱根植于他的脑中。

索罗斯同样清楚，一场风暴即将到来。他不需要去看华尔街电子显示屏中变幻莫测的曲线和花花绿绿的、令人眼晕目眩的数字。在他的脑中，有一幅图象像，一幅非常简单的图像，一幅足以使其举世瞩目的图像。

1972年初，欧共体部长理事会着手推行货币联盟措施，在欧共体内部实行可调整的中心汇率制。1971年底“十国集团”达成的“史密森协定”，规定各国货币汇率的允许波动幅度为规定值的 $\pm 2.25\%$ ，欧共体的目标更高，在1972年4月决定各成员国波动幅度为 $\pm 1.125\%$ ，是“史密森协定”的一半。于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4.5%幅度内，又形成一个小的2.25%的波动幅度。一般人称这为“隧道中的蛇”，因为在汇率变动图上，它就象弯弯曲曲的隧道中藏着一条蛇，洞是“史密森协定”规定的大幅度，“蛇”是欧共体内部规定的小幅度。1973年3月，“史密森协定”终因维持不住而宣告瓦解，洞不复存在，但蛇还在离洞自由浮动。

然而现在，“蛇”仿佛已经到了生命的边缘，索罗斯已经看到“蛇”已将死，这是他的机会，他要抓住这一机会，而欧洲的政治家们却还要苦苦支撑。

欧洲的麻烦已经越来越大，英国的政治家们也在苦苦思索，怎样才能重振经济，索罗斯和其他投机家们越来越坚信英国没法保持那么高的利率，经济那么困难，利率再高无疑是雪上加霜。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降低利息，然而如果这样，英镑的汇价势必走软。英国将不得不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而英国一直坚持着：“决不”！索罗斯为首的投机商们早在几个月前便建

立了可观的仓位，赌英镑会下跌。

英国政府决心已定，投机家们蓄势待发。

梅杰和索罗斯，谁将是胜利者？谁是最后的赢家？

*

*

*

进入 1992 年的盛夏，英国政府的境地越来越糟糕，他们希望德国能降低利率。

然而德国呢？

德国统一之后，西德向东德大规模注入资金，在德国经济内造成了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西德的宪法规定中央银行要提高利率，以抵消通货膨胀压力，中央银行尽力地去做。然而欧洲（尤其是英国）却还在经济衰退的深渊中，德国的高利率对当时的英国经济状况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在欧洲货币体系中，要维持汇率波动幅度，各国的利率水平必须相近。德国的中央银行将在这一制度下，扮演双重角色，第一是作为德国马克的守护神，维持本国币值稳定，抑制通货膨胀，第二是作为欧洲汇率制度的中流砥柱。两种角色发生了冲突，何者应该优先呢？这个问题其实是不需要回答的。

于是，德国在整个欧洲进入经济衰退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失去了成为欧洲汇率体系的中流砥柱的资格。于是一直在近平衡中运作的欧洲汇率机制，顿时陷入了一种矛盾。

梅杰要促进经济，政策必须改变，而这样一来，政府会动摇，甚至倒台。梅杰决定咬紧牙关以渡过难关，英国将坚守其政策，维持英镑的汇价。然而首相的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护英镑汇价的政策，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1992 年 7 月初，六位知名的金融专家联名写信给伦敦的《泰晤士报》，呼吁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政府才可以降低利率，来刺激萎靡不振的国内经济。但是

政府犹豫不决，因为利率一降下来，英镑就会成为弱势货币，禁不起投机家和货币避险操作者的群起而攻。

如果德国降低利率，英国也许会跟着降，但是德国联邦银行拒绝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利率。

*

*

*

整个7月里，愈来愈多的伦敦金融专家对政府的汇率政策提出质疑，梅杰和财政大臣拉蒙特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显得束手无策。英国的企业界要求调整欧洲货币体系中英镑的中心汇率为2.60马克左右，他们还要求降低利率至少三个百分点，然而政府对于经济学家和企业领导们的呼求置若罔闻。整个夏天，财政大臣拉蒙特都在一遍又一遍地声明英镑决不贬值。

为了防止还有人没听清，拉蒙特在8月中旬又一次出现在媒体上，郑重宣称：“我们不想使英镑贬值。”他在某报撰文道：“我决心不毁坏已经取得的进展。”对外界的批评，拉蒙特针锋相对：“如果象某些人建议的那样，我们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并且降低利率，事情会变得更糟。英镑会重挫，通货膨胀率会急剧上升。”

1992年8月26日上午八时许，拉蒙特出现在财政部外面，身着深色西装，站在电视摄影机前，面带笑容斩钉截铁地说：“英国不会离开欧洲货币体系。”这位财政大臣非常坚定地表示，他“希望明白地传达政府的立场。我们不会使英镑贬值，我们不会离开欧洲货币体系。我们绝对地支持欧洲货币体系，那是我们的政策。”紧接着又强调了一句：“我们政策的核心，是我们会做任何必要的事。”话音甫落，记者高举话筒，蜂拥而上，一时间，现场乱成一片，对于记者所问的问题，拉蒙特置之不理。只在离开时补充了一句：“我们正在采取行

动。”

在场的记者们除了听着他讲的话，还细心地捕捉着每一个细节，研究他的身体语言，藉以查出实情，记者们以职业的敏感认定拉蒙特的身体语言泄露了内心的不安。拉蒙特不断地眨眼，而且常在提到一个特别敏感的字眼时眨眼。他呼吸急促，胸口起伏十分明显。他讲话讲得很快，表示他急着尽快结束这次露面。替《每日邮报》分析拉蒙特谈话录像带的专家之一凯瑟琳·查尔顿说：“这个人的心里十分不安，大部分人一分钟眨眼六到八次，但拉蒙特在 45 秒里眨了 64 次，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说的是实话，或者讲得十分真诚，眼睛会保持静止和平静。拉蒙特的眼睛泄露了他的秘密。”记者们和专家们所发觉的东西，投机家们当然也察觉了，他们感觉到英国政府的立场正在一点点地变软。

就在拉蒙特发表公开声明时，英格兰银行也开始动作了，它积极地进场买进金额约为 3 亿的英镑，同时抛出马克。中央银行试图说服人们去相信拉蒙特的话，并吓退那些投机家，不要把英镑压到 2.7780 德国马克的浮动下限之下。那一天收盘时，汇率是英镑兑换 2.7946 德国马克。

隔了一天，在欧洲共同体财政部长会议之后，拉蒙特又发表了另一份声明，他宣布欧洲汇率体系中汇率不会重新调整。

*

*

*

这时，乔治·索罗斯已经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为了尽可能弄清形势，他找了德国联邦银行总裁史勒辛格，史勒辛格告诉索罗斯，德国不会做有损本国经济的任何事情。史勒辛格不愿意对英国和其它国家伸出援助之手，梅杰和拉蒙特想让英国留在欧洲汇率体制内的愿望实现的机会更低了。

索罗斯看到一笔大买卖就在眼前。他手下的一位发言人兴

奋地说：“我们就象为一场考试准备了半年，而现在终于要上考场了。”

乔治·索罗斯并不孤单，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战争并不需要揭竿而起，和欧洲汇率体制以及各国中央银行作对的人很多。共同基金和跨国公司一向是很活跃的货币避险操作者，他们和索罗斯一样，都嗅到了市场上的血腥气，察觉到了市场上的刀光剑影。他们不断地卖出弱势货币，不仅仅是英镑，还有意大利的里拉。

外汇交易市场里的交易员们感觉到他们的工作量一天比一天重了，在投机家们纷纷抛出弱势货币时，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花费很大的资金去支撑本国的货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压力越来越大。

*

*

*

9月3日，拉蒙特对外宣布政府已拟定计划向一些国际银行借款75亿英镑的外币来保卫英镑，这项行动在英国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伦敦金融界缓了一口气，又洋溢出乐观的气氛，大家觉得：也许拉蒙特能避免英镑的贬值，保持英镑的强势并继续留在欧洲汇率体系里。

一周之后，梅杰在格拉斯哥对苏格兰英国工业总会演讲，语气十分强硬。他指出“软弱的选择，贬值论者的选择，助长通货膨胀的选择都是背叛我们的未来的选择，那决不是政府的政策。政府将一如既往，保持英镑的汇价，并留在欧洲货币体系之中。”梅杰的讲话赢得听众雷鸣般的掌声。这一天，拉蒙特也再度排除英镑贬值的可能性。

索罗斯当然也关注着梅杰和拉蒙特的讲话，但是他说：“那不能给人多少信心，因为现实已经十分紧迫。”

“我个人不认为欧洲汇率体制将会崩溃，只是看到各主管

当局之间的紧张关系。紧接下来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十分严重。”

德国联邦银行总裁史勒辛格接受过一次特别访问，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很清楚地告诉世人，“远离英镑为妙。”

索罗斯看得很清楚，在英国经济迟滞不前之际，硬是被逼得维持货币汇价居高不下。他一直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他在等待正确的时机。他知道定时炸弹最终会爆炸，他所不知的是，炸弹会在什么时候爆炸，但他已经感觉出，这一天越来越近。每到新的一天，他都兴奋不已，因为他知道，即使不在今天爆炸，至少也距离爆炸的那一天近了许多。

在《华尔街日报》报导的那篇专访上，史勒辛格还表示，用意大利贬值里拉来交换德国降低利率的协定，远不足以化解欧洲外汇市场上的危机。他还暗示出：外汇市场的骚乱可以由货币贬值来避免。事实上，他是等于说外汇市场的骚乱可以由英镑贬值来避免。

*

*

*

对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来说，遵循史勒辛格的暗示，赌英镑会跌绝对没有错。“我们必须要做个决定，不是要不要建立仓位，而是要建多大的仓位。最初，我想做 30 亿或 40 亿美元。但是乔治的直觉、本能、第六感觉或者其它什么东西，也就是使他成为伟大投资家的东西，开始起作用了。”

乔治·索罗斯告诉斯坦利说：“问题不在于你是正确还是错误，而是在你明确自己是正确的时，务必尽全力投入。”

德鲁肯米勒建立了放空英镑的仓位，索罗斯一如既往，提供了十分有把握的信心，鼓励德鲁肯米勒下更大的赌注。

索罗斯的游戏很复杂。之所以加入这么复杂的游戏，是因为他相信欧洲汇率体制分崩离析已是迫在眉睫，而当欧洲汇率

体制崩溃之后，会有一些链式反应出现。第一，欧洲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将大幅度调整；第二，欧洲利率会大幅下调；第三，欧洲股市会下跌。

因此他决定卖空弱势欧洲货币，同时也下赌注在利率和证券市场。在这一次行动中，索罗斯和他的同事卖空英镑的金额高达 70 亿美元，并且买了价值达 60 亿美元的德国马克。与此同时他们也买了一些法国法郎，只是金额少了一些。

索罗斯买了 5 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原因是一个国家股票的价格会在货币贬值之后上升。索罗斯还买进了德国和法国的债券，并放空德国和法国的股票，因为德国马克汇价上升会损害股票的表现，但由于利率下跌，对债券很有好处。索罗斯的信用不错，能够仅拿出 10 亿美元作为抵押，建成所有的仓位。他借了 30 亿美元，维持了 100 亿美元的仓位。

一套组合拳已然拟定，只待出击。

这场豪赌不只索罗斯一人，全球各地的外汇交易员都赌英镑汇价难保。但索罗斯的赌注最大，他们有 70 亿美元的股票而整个仓位达 100 亿美元之巨，是其全部资本的一倍半。他利用量子基金的资产，借了 50 亿英镑，然后按 1 英镑兑换 2.79 马克的比率，把英镑换成马克。现在他握有了很多的德国马克。

剩下来的事情不多了，只需要静静地等待形势发展了。索罗斯仿佛走进了一家剧院，找到自己的座位，静静地等待帷幕拉开，戏剧上演。

※

※

※

危机，迫在眉睫。

1992 年 9 月 15 日，这天是星期二，梅杰首相原计划访问西班牙，但为了专心处理欧洲汇率体制的危机，只好取消了。

英格兰银行也很有信心，相信它能够击退乔治·索罗斯等投机家。然而它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早先时期，强大的中央银行只需要大量买进弱势货币，抛出强势货币便足以扭转汇率，击退投机家；而如今，情况不同了，当中央银行可以动用数以百亿计美元的资金时，每天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已高达万亿之计。中央银行已成沧海一粟，在庞大的市场面前它再也不是帝王了。

投机家在中午前不久注意到里拉已经开始下跌，于是他们开始抛售更多的英镑，并买进德国马克。下午，英镑重跌达到了2.80 马克，据说英格兰银行已经买进约30 亿英镑，但无济于事，英镑汇价丝毫不见反弹。

当天晚上，伦敦外汇市场上的收盘价是1 英镑兑2.7782 德国马克，仅比2.7780 的底限高出0.002 马克。英国政府越来越忧心忡忡，除非采取一些激烈的行动，否则英镑必须贬值，而这种情形将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

当国家的货币受到攻击时，财政官员可以有几个选择。其一是在外汇市场大量干预，买进本国货币。如果此举不能奏效，下一个手段是提高利率，因为高利率可以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促进资金回流，从而使汇价稳定下来。

但是英国不愿意提高利率，提高利率无异于在疲软的经济这一伤口上撒上一把盐。

投机家越涌越多，财政大臣拉蒙特心烦意乱，束手无策。他正和美国大使共进晚餐，尽管频繁离席是不礼貌的，但他不得不每隔几分钟便停下来，设法和德国联邦银行的官员通上话。

电话接通了，拉蒙特向对方恳求道：“求求你们降低利率。”

要是德国联邦银行的官员答应了，就能化解若干危机，而且在未来的几天里，英国会度过难关，金融体系不致大乱。然而德国联邦银行委婉地拒绝了，拉蒙特感到无比的失望，一阵凉意，也许还有几分恐惧，袭上心头。

面对佳肴，拉蒙特怎么能提起胃口呢？拉蒙特强作笑颜，陪美国大使用餐完毕。英格兰银行的高级官员匆忙赶到财政部，会见拉蒙特，危机已是迫在眉睫了。大家围绕在一张大橡木桌旁，桌子上方两盏灯照得透亮，他们部署着第二天的策略。他们计划第二天一开始英格兰银行就大举干预市场，如果还不奏效则只能提高利率了。

以索罗斯为首的投机家们已经察觉，英国财政部正和德国中央银行吵得不可开交，而英国的政府会不可避免地象他们的货币一样，最终屈服，不管会对长远的经济发展造成多大的伤害，政府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都是提高利率。大家的赌注都在这个方向上。

拉蒙特的会议结束了。官员们离开了沉闷的会场，心中依然牵挂着他们所将要面对的形势。但是事件的发展十分迅速，快到他们的计划来不及反应。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德国联邦银行的总裁史勒辛格已经接受了访问，发表了颇有争议性的讲话。史勒辛格的话中之意是希望里拉和英镑贬值，但准备保卫法国法郎。这话无疑是火上浇油。总裁后来指出，他也没有答应发表他的讲话，然而生米已然做成了熟饭。拉蒙特听到史勒辛格的谈话，十分震惊，他想淡化这件事的冲击，但为时已晚。

*

*

*

这天下午的五点半左右，乔治·索罗斯坐在纽约曼哈顿中区的一栋摩天大楼 33 层的办公室内，回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

他的信心愈来愈强，“这是再明显不过的赌注了”，他说，“就算碰上了最糟的情况，我必须用借钱时的汇率来偿还借来的钱，顶多会损失4%，而赚的机会却多得多。所以这里的风险确实很小。”

晚上，索罗斯回到了位于第五街的寓所里，享受完了厨师奉上的晚餐，回到卧室，他想休息一下，这几天想的很多，100亿美元的赌注已经掷出，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赌注了，虽然这笔赌注足以让任何人心惊肉跳，但他还是要去睡个好觉。

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他也相信自己的决定。

*

*

*

第二天的清晨，英格兰银行负责中央银行的市场操作业务的副总裁埃迪·乔治的办公室里，聚集着八位外汇交易员，他们紧盯屏幕，开始买进英镑，他们接受的指示是花费20亿美元分三次干预市场。

成百上千的在英国有工厂或办公室的公司，以及成千上万的持有英镑计值股票和债券的退休基金、保险公司和其他投资人，都急于抛出手中的英镑。交易员们抛出的美元一眨眼在滚滚钱潮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他们的操作失败了。

伦敦金融圈的上空弥漫着一层浓厚的乌云，积云越聚越厚，是不是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

拉蒙特又和伊恩·布连德累斯及首相通了话，布连德雷斯是英格兰银行负责市场操作的助理主管。简单磋商之后，拉蒙特下令动用央行的外汇储备，在市场做更多的干预。

首相梅杰乘着他那辆防弹捷戈娃轿车，从办公室开到了海军总部的旧大楼，在这里，他预定要和政府官员开会，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会议主题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拉蒙特的电话打到了会议室，梅杰欠身离开了会场，抛开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去听拉蒙特的秘密电话。拉蒙特告诉首相英镑怎样继续重跌，德国人根本不想帮忙，其利率稳如泰山。“必须不计任何代价避免英镑贬值，因为那会损害英国政府的威望。”拉蒙特请求首相批准将利率由现在的10%提高到12%。梅杰应允了。

摄影记者们开始聚集在财政部的大门口，关注着出入的每一个人，捕捉着他们的目标。上午十一点钟，拉蒙特表示“目前承受异常的压力，情况十分不明确”，正式宣布提高利率，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把利率再降下来。然而谁会相信呢？

就在这时，梅杰改变原先的计划，请休会中的国会复会，他希望议员回来讨论欧洲汇率体制的危机和英国经济，而国会本来是预定在9月24日复会的。二次大战以来的四十多年中，国会休会中被临时要求复会的情况只出现过十次，这一行动很不寻常。

虽然拉蒙特宣布了提高利率，英镑还是没有呈现出丝毫涨势，外汇市场认为拉蒙特之举是恐慌下的产物。伦敦的金融官员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们觉得，游戏就要结束了。

英格兰银行从440亿英镑（788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抽出相当于150亿英镑（269亿美元）的金额买进英镑，结果徒劳无功，汇价依然没有得到支持。

*

*

*

纽约的时间是上午七时，斯坦利·德鲁肯米勒的电许打到了乔治·索罗斯的府上，他从自己的消息渠道得知，英国就将认输了。

“乔治，你刚赚了九亿五千八百万美元。”

德鲁肯米勒的话早了一些，但已无关紧要，他知道英国已毫无还手之力，他和索罗斯都是最后的胜利者。

*

*

*

拉蒙特身边的人已经开始进行可怕的想象了。一位交易员说：“英镑被抛售的情形就象水龙头流出来的水。”

英格兰银行决心再试一番，再作最后的拼搏以力挽狂澜。下午，它再次提高利率，现在利率达到了 15%。在英国的历史上，谁也没有见过在一天之内，利率提高两次。这个利率已经和两年前的梅杰当财政大臣时，带领英国加入欧洲汇率体制时一样了。

投机家们看到英镑还是比欧洲汇率体制规定的下限 2.7780 德国马克低，情况变得十分明显，政府的政策难认为继。金融市场看到英国的利率在一天里从 10% 升高到 15%，晓得这个国家绝对没有办法长期忍受这么高的利率。

越来越多的英镑涌到了英格兰银行的门口。

所有行动都无力回天，英国必须脱离欧洲汇率体制，英镑必须贬值。

不久之后，法国总理皮埃尔·贝利哥温和德国总理科尔接到了梅杰打过来的电话。梅杰告诉他们：我别无选择，我只能把英国带离欧洲汇率体制。

*

*

*

乔治·索罗斯这个胜利者终于笑了，梅杰和拉蒙特则黯然神伤。

英格兰银行随即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通话，传达了英镑退出欧洲汇率体制的消息。

纽约外汇市场收盘时，英镑价格是 2.703 德国马克，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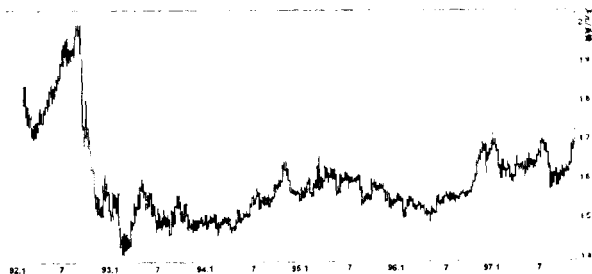
了2.7%之多，远远低于以前在欧洲汇率体制中的下限。

梅杰召集内阁成员，大家一致同意英国退出欧洲汇率体制，意大利也传来消息，表示将跟随英国一起退出，这些天来，意大利同样为了捍卫汇率而弄得焦头烂额。现在英国和意大利的货币将自由交易，两国的中央银行再也不用为了保卫汇价而在公开市场上费劲地买进自己的货币了。

电视台和各大报纸的摄影记者们拥在财政部门外，等待政府公开宣布这一消息。

拉蒙特出现在摄影机镜头前，他的脸看起来更消瘦了，神情疲惫不堪，他将双手放在背后，挤出一丝笑容，随即用右手撩开覆在前额上，略显零乱的头发。

“今天，极其艰难和骚动的一天，”拉蒙特黯然神伤，“大量的金融波动扰乱了欧洲汇率体制的运作。……值此之际，政府决定暂停在欧洲汇率体制中的会员资格，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英国的利益。”



美元对英镑汇率走势图

次日，英国的利率降回10%。

意大利紧随英国，退出欧洲汇率体制。英镑立刻下挫到2.70 马克，然后稳定在2.65 马克，但后来英镑继续下跌，比

上一天的收盘价低了 16%。

货币贬值的国家不只是英国。西班牙货币贬值 20%，意大利里拉贬值 22%。英国退出欧洲汇率体制的消息传出，纽约外汇市场的报价不到 2.70 马克，比它在欧洲汇率体制中的下限 2.7780 马克低了 0.07 马克以上。

*

*

*

索罗斯看起来是个天才，也象一个魔鬼。

索罗斯从黑色的星期三开始，赚了接近 20 亿美元，其中 10 亿美元来自英镑，另外 10 亿美元来自意大利和瑞典的货币以及东京股票市场。

此时，即使一些小赢家，也要打开一瓶香槟酒来庆祝胜利。

而索罗斯显得很坦然。“我玩这种游戏玩得比别人好，筹码也比别人的大，当然会有这样的成绩。”

然而可怜的英格兰银行，在这一场和全球投机家的赌博中输了。这场赌博，英格兰银行动用资金 100 亿美元，不仅毫无效果，而且损失惨重。

英镑危机的赢家不只索罗斯一人，但那些利润都没有大肆报导。凯斯顿公司的布鲁斯·柯凡纳和琼斯投资公司的保罗·都德·琼斯都是市场上的胜者，柯凡纳的基金估计挣了 3 亿美元，资产增至 16 亿美元；琼斯的基金赚了 2.5 亿美元，总资产达到 14 亿美元。

这个月也是美国知名大银行的黄金时期，这些大量经营外汇买卖的大银行，象花旗银行、摩根银行、化学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第一芝加哥银行和美洲银行等，在这场英国灾难身上也大发横财。整个加起来，在 1992 年的第三季度，这些银行赚的钱比正常情况下操作货币所挣得要多 8 亿美元。但是这

些银行的收入不会在这个季度的财务报表上反映出来，因为当交易利润太大时，他们就把收益滚动地计入下一季度的收入，以减少交税。

首相梅杰和财政大臣的心里充满了屈辱。拉蒙特试图解释一下，他说“英镑浮动不等于贬值。”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因为在外汇市场上，英镑浮动就是英镑贬值，两者被事实划上了等号。保守党十分同情他们的首相的遭遇，愤然指责德国联邦银行对英镑的贬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乔治·索罗斯说：“净效果是瓦解了那个制度，造成了不安，并给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至于影响有多大，我们不清楚，但也许非常地坏。我的意思是，欧洲会陷入深重的衰退中去，德国的企业几乎要崩溃，法国也很糟糕。

不平衡总是坏事，对于我这种不稳定的分析师可能是好事，但对经济确实很不利。”

事实上，9月的黑色星期三，对英国或是意大利那样长期被欧洲汇率体制压得抬不起头的国家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它们不仅表现出了新的竞争力，利率也大幅下降了。几年后，它们的出口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

*

*

索罗斯身在伦敦。《每日邮报》的那篇报导刊出之后，他的家立刻被许多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包围了。索罗斯感到很是不安，一个电话打到他的老朋友安纳托尔·卡雷斯基的家中，卡雷斯基是伦敦《泰晤士报》的经济新闻主编。

“发生了什么事？乔治。”

“我现在在伦敦，不晓得你看了今天的《每日邮报》没有？”索罗斯话中透露着不安。

“看过了。”

“我想出去打网球，但我家被记者包围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参考一下？”

卡雷斯基问索罗斯，“《每日邮报》的报导是不是真的？”

索罗斯很快回应：“没错，大致上是那样。”

卡雷斯基立刻建议，让他不要和记者谈话，告诉他如果想让自己做过的事和没做过的事公诸于众，不妨自己写篇文章，或者“等我过去，可以和你谈谈。”

半个小时之后，索罗斯又一次拨通了卡雷斯基的电话，邀请卡雷斯基过去。索罗斯接受了卡雷斯基的访问，告诉了他包括怎么策划这次对英镑进攻在内的完整故事。

10月26日，卡雷斯基的文章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自此以后，索罗斯成为公众人物，名闻英伦三岛乃至全球，而在那之前，虽也成就不凡，但没有多少人听说过索罗斯的大名。

卡雷斯基的文章告诉人们：“乔治·索罗斯是个极其理性的人，很多时间和金钱花在东欧，是一个慈善家。他也是世界上操作规模最大的投机家。黑色星期三是他和英国政府之间的扑克牌游戏的最后一张，这场游戏的赌注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索罗斯从英镑崩溃中赚了10亿美元，对此他感到有一丝困窘和畏缩，但这无法掩饰其损人利己的成就感。”

索罗斯坦然承认在欧洲汇率体制解体的前几天，他们可能是市场中最大的投机人，到9月16日星期三为止，总仓位价值应该高达100亿美元。原计划索罗斯要卖出更多，但事情的发展比他预想的还要快，他来不及把整个仓位建立起来。因此估计他们的利润是10亿美元。

索罗斯通过他的办公室查出，仅英镑操作就赚了9.5亿美元，但除了放空英镑，还有其它许多东西，他玩的是一套组合

拳，这里面有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利率期货多头和卖空意大利里拉，全部加起来，他的利润约为 20 亿美元。

在访问中有一段时间，索罗斯开始分析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行为，他说：“投机行为可能有害，特别是在外汇市场，但是扼阻投机的措施，如外汇管制，危害往往更大，固定汇率体制有很大缺点，它迟早会瓦解的。其实，任何汇率制度都有缺点，时间越长问题越多。”

索罗斯认为解决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办法是完全不要有汇率制度，在欧洲采取单一货币，就象在美国一样。那会使他这样的投机家失业，但他愿意做出自我牺牲。

卡雷斯基对那天下午的访问记忆十分深刻，数年之后仍能回忆出当时情形，“索罗斯对赚钱所持的态度，看起来总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只是挂在嘴上谈谈而已。当时我没有从他的表情中发现钱对他具有任何情感上的意义。在他的生活中，钱似乎真的只是取胜得分的手段。……他显然对那次成功一击感到十分自豪。我想这也是他为什么愿意接受我的访问，谈谈那件事的原因吧。”“他对自己有那样敏锐的才能，能够弄清楚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和英格兰银行对抗并取得胜利而自豪。”

有一点更让索罗斯乐不可支，他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的许多理论，在他这一次操作上得到实践。这本书自出版之后一直无人问津，而自从黑色星期三之后，它很快便脱销了。

索罗斯的理论认为，认识过程在每一件事情中都占有很大分量，而且错误的认识可以在市场中引发反射行为，因此能在欧洲汇率体制危机的前夕有一个致命的误解，误以为德国联邦银行会在任何情况下出面支持英镑兑马克的汇率。在德国联邦银行充分表示，它不愿意降低利率以满足英格兰银行的欲望，甚至是希望里拉和英镑贬值，但准备保卫法郎之后，索罗斯的

赌注推上了前台。

根据索罗斯的理论，其他投机家会去追逐趋势，在市场中创造反射行为的条件。就象他分析那样：“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中，投机性交易会占有越来越大的分量，而在这一过程中，投机从本质上变得更加追逐趋势，使得汇率的波动慢慢变大，直到整个制度彻底崩溃。”

*

*

*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对英镑策动了重击的人是谁了。在媒体中，索罗斯被称作“击垮英格兰银行的人。”英格兰银行没有被击垮，它依然屹立在伦敦城内，然而它已经元气大伤，它感到十分的屈辱，再也无法恢复大英帝国的中央银行气概了。

在大多数英国平民的心中，索罗斯并没有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棍，相反地，英国民众认为他一定是个十分聪明的人，英国的错误在于他愚蠢的政府，他们觉得，不能因为政府的无能而指责对手太狡猾。

有些英国人对他们所受的损失十分痛心，自然而然地迁怒于乔治·索罗斯。

英国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宣称：“中央银行为了保卫英镑而动用外汇储备，以至于损失巨大。政府没有透露我们到底损失了多少，但可能高达数十亿英镑。这个秋天，我们为了保卫英镑付出的代价，比到波斯湾打仗还高。”

法国前外交部长杜马愤然指出：“索罗斯之流的各国投机客破坏了欧洲的抱负。谁在这次罪行中获利谁就应当为这次罪行负责。”

英国的新闻媒体对索罗斯指摘有加，而索罗斯却怡然自得，虽然各界都称9月16日为“黑色星期三”，他却偏称之为“白色星期三”。他断然驳回别人对他的批评。“我肯定那些批

评会带来一些负面效果……但那压根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我因为一些道德上的顾忌，而放弃某些行动，那就不够资格做一个优秀的投机家。”

“从英镑贬值中赚取利润，我没有一丝良心上的不安，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贬值可能反而有好处。我并非为了帮助英国而对英镑做出投机性的行为，我也不是为伤害英国而做那样的事。我做那件事只是为了赚钱。”

法国一家银行的货币基金管理部负责人安德鲁·魏茨曼也对这种投机行为给予了辩护：“是中央银行自己造就了9月的危机，因为他们之所以要死死地捍卫汇率，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从经济角度来做的。”

索罗斯这样说道：“任何交易中，总有某些人会赢，某些人会输。”“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绝没有一丝罪恶感，因为即使我没有建立仓位，也有别人会去建立仓位。”

他也提醒大家，他也有赔钱的可能性，但他赔的不会有赚得那么多，这是一场赌博，却是一场“单向的赌注”，因为损失会很少，而利润则十分丰厚。

乔治·索罗斯不是单独下赌卖空英镑，他的钱是很多，但是从整个环境来看，外汇市场每天的交易额可达一万亿美元，索罗斯的仓位也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如果大家方向一样，一齐抛售，其效果十分骇人。击垮英格兰银行的，不只是乔治·索罗斯，只有整个市场才有办法做到，乔治·索罗斯只不过是其中最强大的一股力量而已。

除了9月份他从欧洲汇率体制危机中所赚到钱之外，他在国际股票市场上也赚了不少，特别是那年年初在日本股市上，此外美国的股价指数期货也使他获益颇丰。

索罗斯在量子基金1992年的第20次年报中写道：“今年

的突出表现，主要原因在于和欧洲汇率体制解体有关的一系列事件，但这种事件不会一再出现。我们因建立的英镑空头仓位而为人瞩目，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英镑仓位所获取的利润，仅占本年度总利润的 40%，而且即使不存在这一利润，这一年的经营业绩仍然高于我们以前年度的平均报酬率。”

“有一点应当提醒量子基金的受益凭证持有人加以注意。近来，我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知名度太高，几乎每一天都有传言说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进场操作，而且市场因此而波动。这些谣言是没有根据的，所有受益凭证持有人对此应当持谨慎态度。我们所建立的仓位如需揭露则会按规定申报，并正式予以公布。”

这一年的年底，量子基金是首屈一指的境外基金，总资产高达 37 亿美元，成长 68.6%。如果有人在量子基金 1969 年创立时，投入 1 万美元，并且把所有的股利再投资进去，那么他在 1992 年底时便拥有将近一千三百万美元之巨的财富了。

全美六种表现最好的基金中，有四种是索罗斯的基金，量子新兴成长基金排名第三，上涨 57%；准星国际基金第四，上涨 56%；配额基金排名第六，上升 37%，包括这四种境外基金，索罗斯管理的资金超过 60 亿美元。

同年，索罗斯当选华尔街上收入最高的人。1992 年他个人赚了 6.5 亿美元，是 1991 年的五倍有余。迈克尔·米尔肯被比了下去，迈克尔·米尔肯是德雷克塞尔公司的交易员，著名的垃圾债券大亨，他在 1987 年曾赚得 5.5 亿美元，但他在 1990 年 4 月被判六项重罪，并罚款 6 亿美元，入狱十年，不久，德雷克塞尔公司破产。（米尔肯于 1993 年假释出狱，仍拥有 5 亿多美元的个人财富，但从此远离金融圈。）

刊登了这份华尔街高收入排名榜的《金融世界》杂志详细

刊出了，索罗斯从基金的已实现利润中得到约 4 亿美元的收入，管理费用收入为 2.5 亿美元。39 岁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首席交易员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在 1992 年赚得 1.1 亿美元，名列第五。

*

*

*

索罗斯不仅获得了令人目眩神迷的巨额财富，也被视为奇迹的创造者，他走到哪里，就成为那里的中心，他突然之间成了公众人物，人们想要他的签名，记者们需要他的事业生涯和日常生活。

接近年底时，在布拉格的一场知识分子云集的晚宴上，大家的话题没有别的什么，只是围绕着索罗斯和他赚的钱。索罗斯和他最喜欢的人坐在一起，说：“如果名气上升之后有助于我在东欧的努力，就算受到西方国家的抛弃，我也很高兴。”

他现在已经拥有了很多东西，金钱和名望，他都有了，而且不计其数。然而在他的心中，总觉得缺少些什么，即使大把大把的金钱送出去之后，他好象还是没有得到。

索罗斯所追寻的仍是难以捉摸的东西：尊敬。他一直希望人们尊重他的心灵，而且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因为他的心里明白，围在他身边等候签名的人和等候提问的记者们，所需要的不是索罗斯的存在，而是索罗斯所拥有的东西。他希望自己在人们的心目中，不是过眼云烟，而是永恒。

索罗斯需要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来自于民选官职或阁员位置，而是来自于受到尊敬。他希望总统和华盛顿的显赫官员对他的想法能洗耳恭听。“我必须改变别人看我的方式。因为我不想只当一个富翁，我有一些事情要讲出来，我希望自己的声音被人听到。”

第十一章 呼风唤雨走天下

“人们……不愿意相信市场能够自行把未来的事件预先反映出来。他们宁愿相信索罗斯的存在，相信索罗斯的力量。”

因为乔治·索罗斯 1992 年 9 月对英镑的一击，人们在他的身上罩上了一层光环。

他看起来总是领先别人许多，他仿佛是个天才的投资家，他仿佛巫师般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

他的身上有个神话：只要他选好建立什么仓位，就能让市场上涨或下跌。当他公开谈论某种货币、股票或公司，和它有关的市场就会起浪。

乔治·索罗斯被市场看成了大师，他开始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决定向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进军，第一个选中的是房地产。

1993 年以前，索罗斯从来没有碰过不动产，一段时间以来，这个领域一直受到很大的压力，索罗斯却突然对它产生了好感，他觉得这是一个买进良机。

尽管他对这一领域雄心勃勃，自己终究是个外行，所以挑选保罗·莱切曼当合伙人。这一年的 2 月 8 日，索罗斯宣布设立 2 亿 2500 万美元的房地产基金，由莱切曼负责管理，新的

基金叫量子房地产基金。

莱切曼三兄弟：保罗，阿尔伯特，拉尔夫在房地产市场崩溃时损失惨重。此前，莱切曼家族在加拿大、纽约和伦敦持有价值约数十亿美元的房地产。但是他们的奥林匹亚约克公司由于开发伦敦的加纳利码头金融中心，发生巨大亏损，他们的绝大部分房地产都已进入了破产清算过程。乔治·索罗斯对莱切曼兄弟的失败毫不介意，他向《纽约时报》是这样介绍的：莱切曼家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房地产开发商，为我的钱寻找投资机会，当然要找最好的人来管理。”量子房地产基金的投入总额在 7500 万到 1 亿美元之间，大部分来自量子基金的受益凭证持有人。

9 月，索罗斯和莱切曼的基金第一次交易，他们花 6 亿 3400 万美元从大型保险业主旅行者公司的手中买下已丧失抵押赎回权的房地产和未履行债务的抵押贷款。11 月间，索罗斯和莱切曼宣布，他们的基金计划在墨西哥推出三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总支出可能高达 15 亿美元。

量子房地产基金成立后的四个月，索罗斯来到了英国，量子基金和伦敦一家叫作英国土地公司的房地产开发商合作，他打算投资 7 亿 7500 万美元到房地产上，与此同时，他也购进英国土地公司 4.8% 的股份。英国的投资人见到索罗斯投向自己的房地产，蜂拥而上，股票市场上的房地产股价格猛涨：总市值增加了 6 亿 6700 万英镑，英国土地公司的股价从每股 298 便士涨到 434 便士，索罗斯靠着他的 4.8% 的股份一举赚取了 520 万英镑。市场一旦察觉索罗斯在操作某种股票、货币或商品，众多的投资人就会闻风而动。事实上，在市场这块广袤无边的大草原上，乔治·索罗斯无疑是一把火。

*

*

*

1993年4月，乔治·索罗斯的目光似乎投到了黄金身上。前几个月通货膨胀一直处于低位，但索罗斯认为，通货膨胀率再度上扬已成必然之势。黄金是不能带来利息或是股利的，但和票据、不动产以及债券相比，在高通货膨胀时，却是最优秀的保值工具。

量子基金因此以每英两345美元的价格，买进了200万到300万两。索罗斯也投资4亿美元到纽蒙特矿业公司，从杰可比·罗斯切尔德和市场收购好手詹姆斯·高史密斯手中以每股39.50美元的价格买了一千万股，股份占13%，一举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高史密斯占30%，是最大的股东，而罗斯切尔德连5%都不到。

他们三人关系不错。索罗斯和罗斯切尔德之间有位重要关系人，尼尔兹·托伯，是索罗斯多年的得力助手，也是量子基金的董事之一，但却没有在量子基金里面担任职务，而是在罗斯切尔德的公司里当首席投资员。

市场上开始有人看到乔治·索罗斯的身影，一些交易员循着索罗斯的足迹走下去，也开始买进黄金，黄金价格涨起来了。等到传言越散越广，投机商越聚越众，黄金的买盘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潮。伦敦市场上黄金价格每英两突破了350美元，上涨了5美元之多，这是自1992年10月以来第一次突破这一价位。

这个夏天即将结束，索罗斯渐渐感觉，夏日的狂热即将过去，应当在秋天到来之前就收获所有的果实，于是他在385到395美元之间，逐渐卖出手上持有的全部黄金。其实，早在索罗斯抛掉手中黄金之前，伦敦市场的黄金价格已经涨到过每英两400美元了。

*

*

*

索罗斯开始对自己的呼风唤雨能力很有信心了，但在市场上总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1993年4月26日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商业日”栏目主持人戴勃拉·马奇尼访问了索罗斯。他尝试着把自己的操作公布开来。

马奇尼说最近金价的上涨，是因为俄罗斯方面有利多传闻，叶利钦和他的经济改革措施在全国公民投票中，取得信任。

索罗斯不以为然，他指出俄罗斯的消息和黄金价格上涨没有多大关系。金价上扬是因为他买进了纽蒙特矿业公司的股票。

除了在有线电视新闻网上大发宏论，他还对《商业周刊》说：“我对自己的大师地位很满足，我承认这一点。我怎么会否认呢？但那是一瞬间的事。我更希望：既然我对别人思想有影响力，我想让他们知道，寻找事物的缺陷和带着批判性眼光去思考很重要。”

尽管如此，市场还是十分狂热，索罗斯在市场上一有举动，传到其他交易员的耳中，便会触动市场的神经，带来市场进一步的活动。新的市场行为就是不计其数的索罗斯行为的叠加，市场总是和索罗斯所想的、所做的一样。

索罗斯太有影响力了。1993年4月30日《每日邮报》在它的标题中问到：“为什么这个现代麦德斯让我们这么着迷？”

事实上，乔治·索罗斯确实象麦德斯那样能够点石成金，迷倒了千千万万的人。在别人的眼里，索罗斯无疑是个大师，是个神秘人物，而他自己怎么看的呢？“我的工作操作，那是我的角色或专业。如果不建立某种股票债券或货币的仓位，我就不能继续管理量子基金。所以我买进了一些纽蒙特矿业公司的股票，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和索罗斯一样同为匈牙利移民的波得·罗拉这样分析索罗斯：“有些机构投资的资金远远比索罗斯要多，但却很相信他的判断。这就是索罗斯呼风唤雨本领的源泉吧。”

在这么多人称道索罗斯的市场力量的同时，也有人不喜欢索罗斯，说他根本没有动摇市场。一家报纸的新闻副主编阿西亚·诺兰宣称：“经手大量资金的经理人，可能在短期内动摇市场，却不能撼动市场的根本，因为供给和需求因素决定了长期的价格。”

诺兰的话没有错，但是索罗斯这样的投机家，恰恰是在一个个短期的撼动中获得了滚滚财源。在索罗斯的眼中，能够被他撼动的市场是个错误的市场，索罗斯不是天上的神灵，他不能动摇市场的根本，他的神奇只在于他能够察觉市场的错误。

有一点索罗斯坚定不移地相信着，那就是市场也会犯错误。

1992年英国危机使这并不很出名的量子基金总裁走上了前台，索罗斯的讲话、生活乃至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有褒赞的，也有诋毁的。《观察家》对索罗斯同高史密斯和托伯的交往甚密颇有微词：“这种关系，给人以拉党结派的印象，照正规行事的投资人，听到索罗斯的名字时，难免会皱起眉头。他的同事可能说索罗斯的操作凭借的是第六感觉，可是连他们所说的话，都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就是之所以他要建立广泛的人缘，就是为了收集情报。”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企业经理人加里·格雷斯坦对索罗斯交友广泛却大加赞赏。“乔治有很多头脑很精明的朋友，在全球各地有很广的人缘。……在他的整个事业生涯中，一直依靠着各地的独立顾问师。”

1993年5月20日，索罗斯的老朋友，伦敦《泰晤士报》

的经济新闻主编安纳托尔·卡雷斯基写了一篇文章，敦促索罗斯对法国法郎发动攻击。6月9日，索罗斯致函该报，算是对卡雷斯基的文章的回复。索罗斯答道，他不同意卡雷斯基的看法，也就是该卖出的不是法国货币和债券，而是德国的资产。他说，不管德国联邦银行心里怎么想，德国的短期利率势在必降。“我预期马克对所有主要货币下跌，甚至包括英镑在内。我也预期未来几个月德国债券相对法国会下跌，但当德国联邦银行的准备率停止下降，开始上升，并大幅度降低短期利率后，德国债券价格会上涨。”

“德国银行把利率订得太高，而且这么高的利率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它本来大可逐步降低短期利率，而不危及其威望，但它却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德国的经济衰退情况比法国还严重。”

索罗斯大张旗鼓地公开表示，德国马克将要下跌，这事并不令人意外。一个人如果已经作了结论，相信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不同于普通人的力量，最后一定会有这样的行为，达成他所需要的结果。

在索罗斯看来，德国迟早会屈服，因为经济衰退越加重了。不管德国人是否喜欢，短期利率势在必降。到时候，德国债券价格会因为马克上扬而跟着上涨，但一旦汇率因素吸收消化完毕，价格会回跌。

公布了自己的交易，索罗斯感觉很有成就感。索罗斯这位优秀的理财专家，依据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向大众提供了忠告，索罗斯更公开宣称，假使大家追随他的号召，他个人的仓位会直接受益。

这也是索罗斯这几个月来第三次透露自己做了什么投资，他已经发现了市场会跟着他走，告诉别人自己的决策有助于自

己的仓位增值。摩根·斯坦利公司驻伦敦的分析师大卫·罗奇表示：“这是一种赚钱的新方法，综合了在市场底部适时投资和公开宣传之效。”

索罗斯在自己的信的末尾处这样说：他的两种事业是分开的，作为投资人和作为公益慈善家是截然不同的。他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目的不是为投资获取收益。索罗斯希望公众能区分自己的两重角色。

索罗斯对卡雷斯基在信中同时提到他在外汇市场和东欧的活动很是不满。索罗斯这样说道：“这两者中间有很大的差别。在东欧，我追求的是促进开放式的社会；在金融市场上，我是为受益凭证持有人和我自己追逐利润。在金融市场上活动，使我有足够的资本来赞助东欧的基金会。在这个市场上，我不会当慈善家，在东欧，我不会去追求利润。我总是设法避免那种单纯因为我的活动而给别人带来灾难的投机行为。我所做的，是那些没有我参加也会发生的事，这种事，没有任何理由让我对它敬而远之。当然了，做这种判断时，我可能会比那些中央银行更容易犯错误。”

市场听到了索罗斯关于马克的谈话，做出了正面的反应，他的大师地位也更加巩固了。6月11日，马克的汇率是61美分，6月23日索罗斯发表了他的信，说马克汇价肯定会下跌，美元立刻以1.70马克涨了上去。这封信发表两天后，6月25日，马克跌到了59美分。量子基金因此增值10%，约合4亿美元。

*

*

*

90年代初，华尔街最大的“赌场”是避险基金的操作，由于它规模庞大又不受节制，便主宰了复杂的金融世界。它们成了投资人的新宠，主要因为一些极其有名的基金经理人赚得

了天文数字的收入，这也引得场外游荡的人格外眼红。

市场上千余个避险基金的年投资总金额高达 5000 亿美元，这其中有索罗斯的 120 亿美元。这些基金每天的交易额估计有 750 亿美元，而纽约证券交易所每天的交易额连它的八分之一都不到。

1987 年到 1990 年之间，避险基金平均每年成长 75.1%。而同期共同基金仅年增 35.1%，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价格指数为年增 56.2%。1992 年，一般避险基金的投资报酬率是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价格指数涨幅的三倍。最有名的避险基金的投资报酬率在 25% 到 68% 之间，而投资于美国股价指数基金仅可获得可怜的 7% 到 8% 的投资收益率。

这些业绩优秀的基金当中，除了乔治·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外，还有迈克·斯坦哈特和他的斯坦哈特合伙人公司、朱利安·罗伯特森和他的老虎基金以及列昂·考伯曼和他的欧米茄顾问公司。1992 年索罗斯的基金上涨 67.5%，斯坦哈特的基金上涨约 50%，罗伯特森的基金上涨 27.7%。经营这些基金的人，成了美国最有影响力，待遇最优越的企业人，往往使得华尔街一些重要公司的操作力量望尘莫及。用《商业周刊》上的一句话来讲，这些人是“投资王国里的枪手”，他们不受约束，不顾一切，而且作为投资人，所赚的远比传统的同业者要高。

《金融世界》1993 年编纂了一份赚钱好手的名单，其中有近半数人自营避险基金或在避险基金里工作。这些人占据了排行榜的前五名。名列榜首的是乔治·索罗斯，收入是 11 亿美元，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在短短一年之中挣到 10 亿美元以上的美国人。而且是排名第二的朱利安·罗伯特森（Julian Robertson）的二倍。索罗斯再次上了这本杂志的封面。这次

他坐在棋盘旁，看起来就像正在苦思下一步怎么走。内文有他各种姿势的照片——正在打电话、穿着舒适的皮鞋，上身是红色运动衫，坐在长椅上，悠闲地阅读艺术书籍。

《金融世界》为了制造一点气氛，这样描述索罗斯 1993 年 11 亿美元的薪水：“如果索罗斯是家公司，那么他的获利力排第 37 位，他的薪酬超过至少 42 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与乍得（非洲）、哥德洛普（Guadeloupe，位于法属西印度群岛）、布隆迪（非洲中东部）的 GDP 大致相当。用另一种方式来说，他可以买 5790 辆 19 万美元的劳斯莱斯轿车，或者支付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大学加起来所有学生三年的学费。一些父母亲可能会说，要是他肯，那可太棒了。”

《金融世界》也告诉读者，1993 年索罗斯自己一个人赚到的钱，和麦当劳雇用的 169600 名员工赚到的钱一样多。索罗斯的每个基金都有丰收的一年：扣除费用前，量子新兴成长基金上涨 109%；量子配额基金也上涨 72% 以上。

《卫报》（The Guardian）谈到索罗斯 11 亿美元的收入时指出：“我们常见到亿万富翁，但他们总是拥有，而且可能早已建立起或继承到创造财富的资产、油井、油轮等东西，持有我们一般人终其一生不能得到的东西。那可能是幸运之神眷顾他们，也可能是我们自己找来的借口。这里却有个人的薪水高达此数。因此现在我们全都可以想像能于今后和索罗斯一样富有。……”

量子基金的的经理人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名利第四，他的收入是 2 亿 1000 万美元。排行榜的前十名中，有八位是避险基金的经理人，而在前一百名中，则占了四十六人之多。在索罗斯的基金里工作的，有九个人位列排行榜百名之内。

要想获取这些令人咋舌的利润，这些避险基金经理人或总裁要掌握全世界的利率，赌某些货币会对利率的变动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也常买进外国债券，特别是欧洲和日本的债券，买进的地点通常是在期货市场。许多人也投资于欣欣向荣的第三世界市场。

按纽约《葛朗特利率观察家》主编葛朗特的看法，这些华尔街巨子所拥有的金融力量，往往比外人所想象的少得多，但是华尔街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某个人或某个机构能够控制事情的发展，从而“无中生有”。

“我认为现在索罗斯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既充满神秘色彩又是实实在在的人。人们总是希望某个人能使市场发生某种变化，他们不愿意相信供给和需求的力量，不愿意相信市场能够自行把未来的事件预先反映出来。他们宁愿相信索罗斯的存在，相信索罗斯的力量。”

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SEC）考虑到只有富人才有能力和愿意承担风险，强制规定美国避险基金的投资人必须有 100 万美元的净资产，或者连续两年每年的所得至少达到 20 万美元，夫妇则必须有 30 万美元。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没有设定加入的底限，但是买主必须付很高的溢价才能加入到其中去。

一般人可能会以为避险基金完全不受管理和约束。事实上，美国 1934 年的证券管理委员会法规规定了，对于 1 亿美元以上的基金，投资经理人必须向证券管理委员会申报信息，而且所有经理人必须接受反欺诈法规范。但也有特例：避险基金如果限制投资人在 100 个以下，而且以直接销售的方式出售商品，则不必以投资公司的形式登记。

只要基金的绝大多数受益凭证持有人不是美国人，基金的受益凭证持有人就可以不缴资本利得税。有时美国人可以投资

境外基金，但不得享受税收优惠。不过由于避险基金的风险极高，大部分的境外基金都不赞成让美国投资人加入。乔治·索罗斯虽然在1961年之后拥有美国国籍，成为了美国公民，却有资格加入自己的境外基金。索罗斯基金的大部分投资人来自欧洲。

长久以来，乔治·索罗斯一直希望政治家们能注意到他，听进他说的话。自从1992年对英格兰一役之后，政治家开始注意他了。索罗斯期望能得到政治家们的尊重，而不是怀着犹疑之心来关注他。但是，索罗斯最终得到的是后者。

*

*

*

1993年夏，在金融圈里，索罗斯仍是个充满谜团的人物。这时，距1992年9月抛空英镑大赚一笔已有九个月，索罗斯被视为几近神话中人，每开金口，市场总要随之起舞。

但索罗斯却是这样看自己的：“在英镑危机过程中，我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员而已，也许我比别人更有分量或更成功，但我也只是许多人中的一人而已。即使到现在，认为我有影响力也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也许某一市场动向会和我的名字挂上钩，就好像以前货币和黄金挂钩一样，但假如我们企图违背市场规律行事，我们就会被打倒。”

事实上，市场确实对他的一言一行都很注意，但他们的真正行动却往往被谣言埋没了。由于他的言论有可能影响市场，他的处境就颇为独特，讲话必须很小心。

这年夏天，欧洲共同体出了麻烦，法国法郎受到压力愈来愈大。德国利率居高不下，吸引大量资金从法郎流向德国马克，迫使法郎汇价跌到欧洲汇率体制允许的下限。投机客大抛法郎，但是法国无意贬值法郎。在欧洲汇率体制行将解体之际，索罗斯会有什么样的举措？索罗斯曾趁欧洲汇率体制有问

题时兴风作浪并且获胜，现在人们的忧虑之情复起，担心他再来一次。

7月26日星期一，索罗斯告诉法国《费加罗报》，他不会
对法郎有任何投机性动作，理由是：不希望任何人指责他摧毁
欧洲汇率体制。事实上，索罗斯等于给法郎投下了信任票，意
思是法郎可以渡过目前的动荡，法国不用脱离欧洲汇率体制。

索罗斯似乎打算远离那场骚乱。可是德国联邦银行开会并
表示不调整重要的再贴现率之后，索罗斯大怒，讲出他似觉遭
人背叛的话。他预测：“我想这个体系最终将会瓦解。”

7月30日星期五，他传真一份新闻稿给伦敦的路透社，
宣布：“德国联邦银行决定不降低再贴现率之后，我觉得身为
欧洲货币体系支柱的德国联邦银行，毫不顾及其他会员国的利
益，放弃操作货币，它保护欧洲汇率体制的作用一点也没有发
挥出来”。“我不认为目前这种体制安排，到星期一上午还能运
作。”他宣布，现在他觉得可以无拘无束地恢复操作法国法郎。

那些关注着索罗斯一举一动的人，发觉愈来愈难以猜透这
位大师心里在想些什么，揣测他喜欢当前金融市场的哪个侧
面。他好像坐在跷跷板上，忽上忽下。想跟随他脚步的人，往
往被弄得昏头转向。索罗斯在《费加罗报》上的文章和后来的
新闻稿使得金融圈感觉十分迷惑，不晓得乔治·索罗斯要做什
么——以及他想传递什么样的讯息。

一天，他躺在南安普顿家中游泳池畔小憩，《纽约时报》
的记者碰巧打电话来，逮个正着。《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
的话听起来更像是年老的政治家，而不太像货币交易者说的。
他告诉这位记者：“恰恰是由于我不想把市场逼疯，所以不想
说出自己要做什么事”。索罗斯不愿把秘密泄露出去，只说星
期五中午以前他没有投机操作欧洲货币。

欧洲各国部长群聚布鲁塞尔，手忙脚乱地试图挽救欧洲汇率体制之际，索罗斯仍好整以暇，设法给人一种清楚的印象，认为他远离纷扰，对欧洲汇率体制的另一次危机无动于衷。

真是这样吗？

索罗斯不说。他急于消除别人心目中他只是投机客的印象，因此举手投足依旧像是年老的政治家。“我对欧洲和它的体系有很强的信心，参与者应该关心那个体系如何保存，不要只为自己牟取利润。”

8月4日，他对马克公开发表谈话。他认为德国联邦银行的政策正驱使德国的经济衰退陷得更深，所以应当卖出马克。索罗斯在德国电视台上说，“我自己是投机操作马克，卖出马克买进美元和日元，”长期而言，这是针对马克应建立的仓位。德国央行的高利率政策将自取其败；德国应降低利率，协助振兴欧洲经济。

在这之前，很少人质疑索罗斯有权公开自己的操作内情。因为几乎所有大师都会这样做。但是人们愈来愈觉得，索罗斯给全球政治家进言的做法，可能做得太过火了。

《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 1993年8月5日的社论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自从他下注100亿美元，赌英镑会脱离欧洲汇率体制之后，每讲一句话，都被奉为神谕，他的信和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则被视为圣经。……

“没人期望索罗斯先生病倒。最近几天，欧洲大陆的政治家和中央银行官员，责怪象他这样的投机客造成欧洲汇率体制崩解，但他们应该抑制自己的怒气：错全在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试图维系无法长久维持的汇率和利率……”

“但也有应审慎提防之处。索罗斯先生对新闻媒体传达的讯息日益嚣张，让人感到他非常狂妄自大。……”

“这个星期，索罗斯先生主张从空中攻击，以解萨拉热窝之围，我们开始觉得他应该少发一些宏论。他可能已经相信，点个头或眨个眼，不只可以决定汇率，还能决定外交政策。……不错，这个世界愿意倾听索罗斯先生讲的每一句话，但不能让他误以为什么话都可以说。”

两天之后，8月7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乔治·索罗斯老糊涂了吗？报纸和广播中，这位住在纽约的匈牙利裔投资人讲的话愈来愈多，话题从银行到波斯尼亚，无所不包。最近几天，正值欧洲的欧洲汇率体制岌岌可危之际，索罗斯先生的看法所吸引到的关注，至少和德国联邦银行主管能吸引到的一样多。新闻媒体当然对索罗斯先生有兴趣：毕竟他是‘击垮英格兰银行的人’。……可是拥有像他那种力量的投资人，通常惜言如金，为什么他不是这样呢？”

对这个问题，文章提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索罗斯先生一定不反对被视为当代杰出的投资大师。他确实当之无愧。”

“另一个动机可能是，索罗斯不再自满于抱着财富呆在暗处，他更希望影响有关当代重大议题的公共政策。这种野心值得赞许，但是从公益慈善活动中或许更容易得到满足，正如他目前在东欧的所做所为。”

“索罗斯先生显然渴望新闻媒体有所报导的最后一个理由，可能是和以往每天必须管理量子基金比起来，现在没有多少值得牵挂之事。”

新闻媒体继续抨击他，《巴隆》金融周刊8月16日讲话了。

“早些年，乔治沉默寡言。许多年以来，他是我们的‘圆

桌论坛’中机智诙谐、很有价值的成员，但除此之外，他宁可由自己的经营业绩替他讲话。”

“不过最近乔治已经彻底打破沉默的习性。在伦敦，打开电视机，要想连续几天在荧屏上看不到他，可以说十分困难，他写给报馆的信满天飞，在特别报导解说版撰写文章、接见记者、公开叱责德国联邦银行。总而言之，他除了是传奇性的投资大师，还成了公众人物，政治评论家。”

“……索罗斯觉得总有股动力，让大家知道他在做公益慈善活动，或者像有钱人，钱赚得有点累了，想做个好发议论的哲学家。这样的事，我们不觉得意外。要是我们没有那么了解他的话，便会怀疑他是不是染上一种叫做狂妄的常见病毒。”

那年夏天，《商业周刊》一位记者抓住机会，便问索罗斯，为什么他变得那么“好发议论”。

索罗斯这么说：“除非我有某些事情想说，否则通常不愿在大众面前露脸。……只要有可能，我宁可用自己的话来说。因为这是我的明确政策，我发现接受访问，所讲的话会被断章取义。即使那是我自己讲的话，经过处理，却和本意大相径庭。”

“我（和新闻媒体）没有爱恨关系。如果可以，我会保持相当远的距离。如果你现在大肆批评，发现我有某些缺点或者其它东西，那不会伤害我。所以你可尽情去做。”

索罗斯似乎是说，他并不在意新闻媒体，其实显然并非如此。索罗斯没有庞大和复杂的公共关系机器帮助他，却相当熟练灵巧地成了本身最好的发言人，他其实是离不开这些新闻媒体的。

他十分聪明，知道发送传真和写信给主编，和接受报纸访问比起来，更能使自己的所有观点完整地呈现出来。这样的手

段一次又一次奏效。报纸接到索罗斯的传真或信函之后，总是全文照登。他也知道，有些时候最好向新闻媒体发表评论，有时则应当守口如瓶。那年他大胆聘用外部的公共关系公司——纽约声名卓著的凯斯特公司（Kekst & Co.）时，看上的是凯斯特的公共宣传机器会尽可能少谈他。

索罗斯本身的助理，包括斯坦利·德鲁肯米勒，给他愈来愈大的压力，要他控制自己的嘴巴。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内部的看法，认为索罗斯经常公开谈话，使得该基金少了运作的灵活和弹性。正如以前的一位同事所说的：“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上帝送给一般投资人的礼物，但有种现象值得注意，也就是他的仓位变得那么大，需要很多人追随买进，才会造成既成事实。就某种意义来说，他本身可以说是个市场。他的货币仓位那么大，固定收益投资工具的仓位那么大，以致于他的基金在市场中失去了弹性。”

*

*

*

1993年9月29日，索罗斯应柏林亚斯潘学会的邀请，在德国作了一场演说。总结了历经英镑危机和法郎危机的欧洲汇率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欧洲共同市场是一种很理想的组织形式，甚至可以说是体现了开放社会的理想。”在索罗斯的眼中，自以1989年共产主义体制崩溃和德国统一以来，欧洲一直都在一个动态不平衡的状态之中。对于自己在1992年9月中的表现，索罗斯这样认为：“我希望看到欧洲统一、繁荣和开放的立场并不影响我参与市场的活动。只要我是一个不知名的参与者，我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论我是否曾拿英镑投机，英镑其实早晚都免不了退出汇率机制。”

索罗斯自己也认识到在英镑退出汇率机制后，由于知名度

大增，他再也不是一个不知名的市场参与者了，他成了一位大师式的人物。93年的夏天，索罗斯一改常态，被称作“好发议论的人”。这场演说中，索罗斯对此作了反思：“当法国法郎遭到压力时，我的确相信我也可以把它打垮，假如我加入战局的话。但这种想法却使我做了一件蠢事：我决定不针对法郎进行投机，但却得罪了法国当局。假如我投机，他们还不至于比听到我的建议更感不快。于是我得到了这样的教训：**投机者不要多话，一心投机就好了。**”

索罗斯的这篇演讲可以说是关于法国法郎8月危机的金融分析报告。他给这场危机总结出六点因素，最后他断然指出：“法国当局制定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外汇储备，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办法是使法郎成为强势。然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索罗斯认为法国的当务之急是刺激国内经济，并延长向德国联邦银行偿还贷款的期限，以利于法国降低利率。”

“总而言之，欧洲的货币政策错了，但这是可以纠正的。”

索罗斯很想在欧洲政治家那儿赢得人缘，却事得其反。索罗斯不断对欧洲的货币事务“插手管闲事”，令他们非常生气。

1993年9月底，比利时外交部长卡雷斯，当时的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主席，指责索罗斯拐弯抹角地推翻欧洲的统一大业。卡雷斯接受法国《问题周刊》（Le Point）访问时说：“那里面有某种阴谋存在。在盎格鲁·萨克逊的世界里，有些组织和个人宁可见到分裂的欧洲，和只能扮演次要的经济角色，而不想见到强大的欧洲，拥有自己的货币和外交政策。”

索罗斯的发言人大卫·柯隆费尔德（David·Kronfeld）轻描淡写地应付卡雷斯的话，指出：有关这种盎格鲁·萨克逊阴谋论的无聊谈话，我们打算有所回应。”他再次强调，索罗斯赞成一个有效的欧洲货币体系，但深信这个体系最近崩溃之

前，已经不再对欧洲国家有任何好处。”

不管索罗斯的言行引起了多少非议，然而整体而言，1993年是量子基金十分丰收的一个年头，资产净值涨了61.5%。1969年只要投资1万美元在量子基金，现在便已有2100万美元的身价。拿同样的1万美元的投资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的选样股，同期内只能变成12万2000美元，少得可怜。

索罗斯的每个基金，表现都好得叫人啧啧称奇。最好的量子新兴成长基金，扣除费用之前，涨了109%，其次是量子配额基金，都涨了72%以上。1969年以来，索罗斯的基金年成长率约是35%。而标准普尔股价指数每年只上涨10.5%。

附：欧洲解体的前景

本文是索罗斯在 1993 年 9 月 29 日应邀向柏林亚
斯潘学会演说的纪录

欧洲共同市场是一种很理想的组织形式，甚至可说是体现了开放社会的理想，原因是欧洲共同市场有一点很有趣的特色：就是各会员国都属于少数民族。对少数的尊重是欧洲共同市场建构的基础，也是开放社会的基础，但目前仍待解决的问题是：要授予多数多少权力，统合到什么程度？

欧洲演进的过程对于欧洲以东地区的局势有很深远的影响。这些社会需要欧洲的开放、欧洲的接受和欧洲的支持。东德得到的帮助太多了，其余的东欧国家得到的又太少。我是深切地致力于帮助其余东欧国家的人。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建立了一个基金会网络进行这番事业，这就是我看欧洲问题的立场。

我曾针对所谓“大起大落过程”进行研究，这过程往往都可以在金融市场看到。我认为，这种观点也可以应用在欧洲统合和解体的问题上。自从 1989 年革命和德国统一以来，欧洲一直都在一个动态不平衡的状态中。所以对于我的历史理论来说，欧洲成了一项很有趣的个案研究对象。

我是一个国际投资者，因此我是参与这种动态不平衡的人之一。我以前自称是投机者，也开玩笑说投机出了问题才成为

第十一章 呼风唤雨走天下 193

投资。但鉴于有人要发起运动对付投机者的这个事实，我现在觉得这笑话不好笑了。国际投资者在汇率机制的瓦解中扮演重要角色，要有一个没有资金流动的共同市场是不可能的事。责怪投机者就好像射杀带口信的人一样。

在讨论欧洲的不平衡时，我将以我的历史理论为依据。我是一个参与其间的人，但这并不影响我应用这个理论的能力。相反地，这一点还容许我在实践中验证我的理论。我有了预设立场后才来谈这个问题，也是不妨碍的，原因是我的理论认为参与历史过程的人往往是按照预设的立场行事的，倡导理论的人也往往如此。

但我必须承认，我希望看到欧洲统一、繁荣和开放的预设立场并不影响我参与市场的活动。只要我是一个不知名的参与者，我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论我是否曾拿英镑投机，英镑其实早晚都免不了要退出汇率机制。在英镑退出了汇率机制后，我的知名度大增，我再也不是一个不知名的市场参与者了，我成了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事实上我当时是可以影响市场趋向的，假如我假装没有这种能耐，那才是自欺欺人。这种情形为我提供了好些机会，但也带给我责任。基于我的立场，我不想要为法国法郎脱离汇率机制负责。于是我决定不拿法国法郎投机，以便提出一个建议性的解决方法，但并没有人因此感谢我。事实上，我的公共言论似乎比我的金融市场的活动更能惹恼金融事务主管当局，所以我不能说我把大师的角色发挥得很好。根据我的立场，下面有些话说了虽会对我的市场参与者身份有些不方便，但还是不能不说。谈到欧洲统合的大起大落问题，我将特别谈到对整体过程发挥很大作用的汇率机制问题。在德国统一之前，汇率机制在近乎平衡状态中运作得很好。到了德国统一之后，动态不平衡的情形出现了，此后错误和误解

影响了事态的发展。最具体的结果就是汇率机制的瓦解，假如日后欧洲联盟解体，汇率机制的瓦解将是重要因素之一。

我首先要提一提近乎平衡状态由动态不平衡取代的时间，事实上这时间可以很精确地指出，就是柏林围墙倒下来的时候。柏林围墙倒了，德国随之统一。德国总理科尔担任起德国统一的大任。他认为，德国的统一必须是完整、立即生效的，同时也是在欧洲的范围内完成的。事实上他当时也别无选择，原因是德国宪法授予东德人公民身份，而德国本身也是欧洲联盟会员国之一。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德国主导整件事，却还只是被动地反应。科尔总理发挥了他的领导能力，马上和法国总统密特朗商量，争取法国和欧洲的支持，使德国得以马上完完全全地统一。法国的反应是可以趁此机会使欧洲在两德统一的情形下壮大起来。于是德国统一得到了强大的动力，大起大落过程中的大起也随之开始。英国反对强大的中央集权。相信大家还记得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布鲁雪（译者按：比利时城市）发表的演说。接着，艰难的谈判展开了，但那时大家也有一点迫切感，好像大家都设定了最后期限似的。于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应运而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两大目标是制订共同外交政策和行使单一的共同货币。条约还有一些比较不重要的规定。英国针对这些不重要的规定提出反对，结果得到允许可以自由遵行这些规定。但总括来说，这条约代表了欧洲跨向统合的一大步，也是一种宏远的理想，旨在应付因为苏联解体而出现的革命性转变。但这一步走得太快，也跨得太远了，比舆论的预期还要快、还要远，但那是各国领袖要应付当时革命局势不得不冒的风险。我觉得这一点是对的，这就是领袖应有的表现。

但问题出在别的地方。我在这里就不多谈德国和欧洲共同

市场谈妥的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独立的附带问题。这个问题当时注意的人不多，讨论的人也很少，但后果却是非常严重的。我现在集中谈的是德国统一在国内引起的内部不平衡，原因是大起变成大落，原因就是在这个内部不平衡状态。

德国政府严重低估了统一的代价，而且也不愿意通过加税和削减政府开支来支付统一的代价，于是在两个层面上引起了德国中央银行和德国政府之间的紧张。首先，中央银行明确表达的建议，德国政府却背其道而行。其次，德国政府为此而采取的宽松财政政策——换言之，容许巨额的预算赤字。但在这种情形下，德国必须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以维持货币平衡。德国政府透过西德马克和东德马克的等价兑换，使德国东部的德国人享有较大的购买力，结果引起了通货膨胀，而财政赤字更使问题加剧。根据德国宪法，德国中央银行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维持德国马克的价值。于是中央银行迅速采取行动，把回购协议利率提高到百分之九点七，但这种措施对欧洲货币体系之外的其他会员国不利。换言之，德国在国内重建平衡状态的政策却引起了欧洲货币体系之内的不平衡。这不平衡状态要花一些时间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中央银行的货币紧缩政策把欧洲各国推向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事实上，德国中央银行兼具两种角色，不但要维持德国马克的强大，也要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支柱。在整体过程中，德国中央银行把德国内部的不平衡状态转化为一股促成欧洲货币体系解体的力量。

德国中央银行和德国政府之间还有层面更深的冲突。德国总理科尔为了争取法国的支持，因而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于是，德国中央银行在体制内对欧洲货币的主导地位以及该银行的欧洲货币政策裁决人的地位，都受到严重威胁。在欧洲货

币体系中，德国马克是稳住整个体系的重心。但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德国中央银行的地位将由欧洲中央银行取代。在欧洲中央银行的表决中，德国中央银行只占十二票中的一票。当然，欧洲中央银行是按照德中央银行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但作为一个模式和实际亲自掌控大局有很大的分别。德国中央银行从未公开表示反对这种体制上的转变，所以我们不清楚德国中央银行的行动背后有多少阻止这种转变的发生用意。我只能告诉大家，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我只能根据我的推论行事，我的推论就是阻止这种转变发生的正是德国中央银行的深谋远虑。我不能证明这推论是对的，我只能够告诉大家，这推论是行之有效的。

举例言之，我听到德国中央银行总裁史莱辛格警告说，假如市场认定欧元是一篮子固定的货币，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后我问他喜不喜欢使用欧元作为一种货币。他说，他喜欢欧元的构想，但他不喜欢欧元这名称，假如欧元称为马克，他会比较喜欢。我从他的话中得到启示。过了不久，意大利的里拉就被迫退出了汇率机制。

我不想逐一细谈事情发生的经过，因为我要建立的是一个广泛的历史观点。从这个历史观点看来，重要的事件包括丹麦公民投票否决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法国仅以些微票数之差通过了，在英国国会也只能勉强通过。于是，欧洲汇率机制实际上已经解体了。但实际解体过程还要拖上好几个月，经过好几项事件，其中最后一项就是当年八月各国货币汇率波动的上下限扩大了，但此一事件却是影响最深远的，原因是此举把欧洲共同市场之内最强固的一重关系——即德国和法国的关系削弱了。当然，还有更长远的后果，就是现在欧洲置身严重的经济衰退中，而且短期之内无法快速复苏。现在欧洲失业问题严

重，而且不断恶化，恶化的原因之一是各国的货币政策是不合适的。我从这些观察得到的结论是欧洲统合的颠峰时期已经成为昨日黄花，而且趋势已经逆转了。

丹麦公民投票否决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是逆转的起点，但事实上，这次公民投票也未尝不可以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带来强劲的支持，假如情形确乎如此的话，逆转也未尝不可以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带来强劲的支持，假如情形确乎如此的话，逆转也不会出现。但结果是这次公民投票导致了汇率机制的瓦解，欧洲现在也在解体的过程中。由于现在我们谈的是在大起大落过程，我们也不知道滑坡会滑到哪里为止，但很可能比人们愿意或可以预见的还要远，原因是朝向大起大落过程的两个方向都是可以自我加强的。

我的看法是，至少有五项因素是互相加强的。最重要的就是经济衰退。法国百分之十一点七的失业率，比利时百分之十四点一，和西班牙的百分之廿二点五都太高了。高失业率引起社会和政治不安，这些不安是很容易走向一个反欧洲方向的。其次就是欧洲汇率机制的逐渐瓦解。这一点是很危险的，原因是从中长期而言，假如汇率不稳定，共同市场就无法继续存在。

汇率机制在近乎平衡状况中妥善运作了十余年，但德国统一却暴露了此一机制的弱点，就是德国中央银行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是马克稳定的守护神，但同时也是欧洲货币体系的中流砥柱。只要这两种角色维持和谐，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但两种角色现在发生冲突，德国中央银行自然优先考虑到本国的国情，德国的国际义务因而受到影响。这一点在7月29日星期四就看得很清楚。当时德国中央银行拒绝调低贴现率以舒缓法国法郎受到的压力。事实上也可以说德国中央银行别无选

198 金钱与梦想

择，因为德国宪法规定，维持马克的币值是优先的要务。于是，在汇率机制和德国宪法之间出现了无可弥补的冲突。

这件事也暴露了汇率机制的其它弱点，就是扮演中流砥柱角色的货币和受到压力的货币，彼此的义务竟是不对称的，几乎所有义务都要由弱势货币来承担。我们还记得，在布雷敦森林协定签署时，凯恩斯强调，强势货币和弱势货币的义务一定要均等。他立论的依据就是两次大战之间的一段时期的经验。目前的形势愈来愈像那段时期，但有时不禁觉得好像世上根本未曾出现过凯恩斯这一号人物一样。

这一点把我们带到第三点因素，就是错误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必太责怪德国中央银行，要怪的反而是曾经反对德中央银行的人，如德国政府，以及曾受到德国政策拖累的政府，如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制造内部不平衡当然由德国政府首当其冲为此负责。但英国在德国统一后于1990年10月8日加入汇率机制，实在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英国加入，所持的理由竟然是在1990年提出来的，结果遭到撒切尔夫人强烈反对的一套根据。最后她的势力日趋势微，只好不再坚持，但即使可以在1985年成立的论据，到了1990年，就未必有效了。所以英国其实犯了两次大错，一次在1985年，另一次在1990年。

英国受到德国中央银行高利率政策的打击特别严重，原因是英国加入汇率机制时经济已经在衰退。被迫脱离汇率机制也让英国松了一口气。他们本来应该深表欢迎的，但当时他们六神无主，不知如何反应。最后他们走对了，把利率调低了，但还是未能把握机会采取进一步行动。于是英国政府更难以恢复国人的信心，到了经济有点起色时，也已难控制工资的成长。

我们也许会以为法国会把英国的经验作为后事之师，但结

果法国比英国更缺乏弹性。法国努力守住所谓法郎堡垒，这一点也许会引起别人同情，原因是这所谓法郎堡垒是几经艰辛才建立起来的，而且法国当时也快要可以享受到成果，在竞争力方面赶上德国，但最后这些成果却在法郎轮番遭到攻击下被硬生生地抢走。但在法郎堡垒显然已经守不住时，法国政府就要评估时势，调整策略作为因应。但法国并没有这样做，反而自愿死守汇率机制加诸他们身上的制度，结果是要承担极严重的后果。我想我能够理解法国的动机：他们的目的是要重建外汇存底，以偿还法国中央银行为维持法德两国货币平衡而向德国中央银行借下的债务。但法国却把事情的优先顺序搞错了。这就是8月危机的起因。用高利率政策使法郎紧贴着德国马克是自败的一着，要使法郎强大，唯一的方法就是使法国经济强起来。

德国中央银行在遂行自己目标的做法相当一贯，也非常地成功，特别是假如我们也把在体制内自保算作目标之一的話。德国统一后，德中央银行发现身陷非常困难的处境：货币量大增，国家出现巨额财政赤字，以及自身在体制内的存亡受到威胁。但结果德中央银行胜利了，代价——包括整个欧洲，经济衰退以及汇率机制的崩溃是否值得，则另当别论。几个月前，我还以为德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错误的，原因是即使只以国内形势而论，德国也在经济衰退中，而货币政策是应该反循环的。但德国中央银行反而固守中期货币政策目标，我觉得M₃货币供给在近乎平衡状态中是相当理想的目标之一，但在当前的极不平衡状态中是不适用的。我也觉得德国中央银行奉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过了头。

不过那是各国货币汇率波动的上下限扩宽以前的事，此后德国马克汇价上扬，德国长期债券回落趋稳，而且，最重要的

200 金钱与梦想

还是德国经济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我现在必须承认我可能错了，德中央银行在遂行国内目标方面是很成功的。但这一点更加强了我的看法，认为德国中央银行的国内责任及在欧洲货币体系之中的中流砥柱角色之间的确是有利益冲突的。过去两个月来发生的一切也足以证明德国的需要和欧洲的需要很不一致。德国要的是较低的长期债券利率，原因是德国举债是以长期为主的，但其余的欧洲国家就需要较低的短期利率，原因是银行体系流动资金必须重新建立，而且短期利率低，也可以刺激经济活动。德国的需要得到满足了。但其余的欧洲国家并没有。

我对德国马克的看法可能错了，这一点却引出第四项因素，那就是不但政府当局犯错，市场参考者也会犯错。市场是经常出错的。具体而言，他们出错的地方就是假设通往单一共同货币的路是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国际投资者，特别是国际债券基金的经理人，跟着最高收益的尾巴走，根本就忽视了汇率方面的风险。德国中央银行总裁史莱辛格警告说，假如市场认为欧元是一篮子固定的货币，那就错了，他的警告是对的。在他提出警告以前，大批资金涌进货币居弱势的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这种资金流动最初是自我加强的，但到最后却沦于自败。原因是，这种情形使汇率变得过分欠缺弹性，也引起地区的不稳定。在引起动态不平衡的过程中，政府当局犯错，但市场犯下的错误使情形更趋恶劣。

最后，我们要谈第五个因素，这个因素和态度有关去年发生的一些事情，使不少国家受到震撼，于是造成了一种带有敌意的气氛。本来法国很有理由向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靠扰的，但结果经过去年的情形竟使他愈走愈远。对法德联盟的投入仍是法国政策的基石，这一点在法国是很容易感受到的，不

过目前这种关系绷得有些紧，而且，假如经济情况持续恶化的话，这种关系可能还会绷得更紧一些。

我对德国的情形比较陌生，但我可以预见会出现一种两代交替时出现的转变。这一代的德国人仍然不免对上代的罪行耿耿于怀，于是他们立志要做一群模范欧洲人。巴尔（译者按：德国新闻官员）1990年在柏林的一项会议上很认真地宣称德国的外交政策就是欧洲的外交政策时，当时我真的很感动。现在情况改变得太多了。假如新一代排拒上一代的罪恶感，而且毫无愧色地寻求国家利益，那是很自然的事。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注意到德国马克已经成为德国国家认同的一种重要象征。

英国一向对德国有些疑心。我老是跟他们说，德国人是比英国人更好的欧洲人，但现在英国人可以拿德国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以及德国中央银行的做法，来证明他们本来的怀疑是正确的。

事实上，我们还应该考虑第六点因素，就是东欧的不稳定，特别是前南斯拉夫的不稳定。但我认为，这一因素是朝相反方向起作用的。不稳定的风险，以及难民流入的可能性，本来应该促使他们团结建立一个“欧洲堡垒”。反过来说，欧洲共同市场的缺乏团结也将加强东区的政治不稳定和经济衰退。将来出现的，可能是一个和我本人及我在东欧支持者的理想相距甚远的欧洲共同市场。

这是很令人失望和难过的。听来我比较像一个预言祸之将至的人而不像一个大师。但我可以提醒大家，大起大落过程不是注定的。整个过程几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扭转。事实上，大起大落过程的重要特色之一是整个过程是可以逆转的。我现在要说明的是现在很多事情的方向错了，而且还会一直错下去，

202 金钱与梦想

直至我们看到那里出了根本性的错误并采取果断行动纠正为止。

以欧洲货币体制目前的结构而言，我们可以说的确出了根本性的大错。首先，德国中央银行对德国的责任和在欧洲货币体系的中流砥柱角色是冲突的，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德国中央银行利用了大欧洲货币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以解决德国的国内问题。其次，强弱势货币之间的责任不均等，而更重要的是国际投资者——即投机者的风险和报酬也是不对称的。这些结构性的缺乏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但到了去年才变得明显。这些缺陷暴露出来以后，要回到过去的局面已经是不可能的事。要除去这些缺陷，就是完全不设汇率机制。但自由浮动的汇率会毁掉共同市场，于是就有必要行使单一共同货币，换言之，就是要实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有关各方谈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期间引向单一共同货币的过程看来，是一个渐进而近乎平衡的过程，但这渐进过程遭遇到障碍，假如继续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只会走到相反方向，原因是出现了逆转，欧洲本身已经在瓦解状态中。于是我们必须另辟途径。假如我们不能以渐进方式达到目标，我们就全体飞快到达目标所在，到了目的地总比完全没有到好。

在8月1日的会议上，一位葡萄牙代表建议加快实现使用单一共同货币的过程。据说一位与会的德国代表闻言后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假如我的论点是正确的话，我们就要重视葡萄牙代表的建议了。有人也许会觉得这说来容易，但事实上也是如此。假如我不能提出通往单一共同货币的途径，根本没有人会理会我的论断。由于我们处在动态不平衡的状态中，所以我们的途径也要是不平衡的。目前，法国当局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存底。他们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就是使法郎变为强势。

这种做法是错的。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刺激法国经济，并延长向德国中央银行贷款的期限，也许延长两年，以利于法国降低利率。但我说降低利率，要降低百分之三。法国降低利率，应该要和其他欧洲货币体系的会员国——包括德国和荷兰配合。德国马克不会因此升值。德国马克币值过高，对德国经济自然会有消极影响，从而促使德国利率下降。到了德国经济下滑，欧洲各国经济开始转好时，汇率的强势不仅可以扭转过来，还可能回到和扩宽汇率波动幅度上下限前的原点距离不远的地方。有分歧的地方就有经济活动。起初，欧洲经济复苏会让德国吃亏，但德国也会逐渐加入复苏的行列。到时候动态不平衡的现象就会得到纠正，各国也将在近乎平衡的状态中继续朝单一共同货币发展，而毋须重新建立较紧的汇率波动幅度上下限。但我们走的不是一条直路。目前我们身陷恶性循环当中，所以我们有必要扭转形势进入良性循环。这种情形已经在意大利出现了，当然也可能在其余的欧洲国家出现。

在这里，我还未谈到外交政策问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前途问题，以及东欧前途问题，但我说的已经很多了。这些课题都和货币政策有密切关系。总而言之，欧洲的货币政策错了，但这是可以纠正的。

第十二章 东京滑铁卢

“满目疮痍的索罗斯：炼金师失去准头”

“我想我这一辈子都可能摸不清日本金融机构的
真正想法。”

索罗斯在日本市场上，当了几回失败者。

回忆起来，索罗斯说这是一个很沉痛的问题。在 80 年代中期他就看到日本的金融泡沫发展起来，当时他预测这个泡沫会破灭。于是他在股市卖空，原因是他认为 1987 年的崩盘会从日本开始。但结果崩盘从美国开始，他在日本卖空了，在美国却超买，当时可谓受挫不轻。

日本的储蓄率很高，日元也很强势，通货膨胀率和利率都很低，股票票面价格却很高，于是日本企业就可以以很低的成本筹措资金，这成为他们的竞争优势之一。当时日本土地供应有限，而且严格的法规——例如限制兴建高层建筑物的阳光法案——使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日趋严重，于是房屋价格上升的速度比薪水调高的速度快，人们为了买房子，只好把更大一部分的收入，储蓄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加强的过程，这个过程把储蓄率提高到极点，又把生活水平压到最低。这是一部机器，其作用在于使日本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龙头老大，但同

时使日本人不断努力工作，几乎不问生活的报酬。

事实上，这是很有效的一部机器，使日本在每一方面都有竞争优势；但一如其它自我加强的过程一样，这部机器也有缺陷，就是拉大了有房子的人和没有房子的人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成为一股分化社会的力量。对现行制度的不满不断累积，终于引起政治动荡，自民党的主导地位不保，改朝换代的过程也启动起来。在这种情形出现前，房地产暴涨情况比股票上涨情况还要惊人。结果这个泡沫被戳破了，房地产市场崩溃，崩盘的严重程度也比股市的下挫厉害。

索罗斯猜错的是崩盘的时间，导致他在 1987 年受创非轻。1987 年之后，日本出现了人为的房地产景气。当时日本大藏省（相当于财政部）为了避免景气大跌，因此尽力支撑市场，当时，索罗斯和一位日本官员碰面。这位官员说，1987 年的崩盘后果和 1929 年的情况不同，因为日本准备挺身而出，向世界各国提供流动资金。换言之，日本人希望金融实力赶上他们的工业实力。1987 年之后，日本各银行成了世界主要的货币机构，三菱地产还买进了洛克菲勒中心。

但这次日本中央银行把金融泡沫缩小时，日本各银行背了巨额坏帐，日本大部分的海外投资成绩都不好，导致日本资金大规模回流。最后股市下挫时，他们还可以得到一点好处。股市在 1990 年开始下挫，但让索罗斯称道不已的是他们可以慢慢把泡沫井然有序地缩小，而不致一下子就破灭，这个泡沫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泡沫，但日本人竟然可以井然有序地将它缩小，而不至于酿成大祸。

1994 年 2 月乔治·索罗斯再受重创，赔掉的金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这次是 6 亿美元。

索罗斯一直赌日元会对美元继续下跌。那时美国政府主张

日元应呈强势。这是在贸易谈判期间，对日施压的一种手段；如果日元上涨，日本的出口货物会变得较贵，从而很难在世界各地销售。索罗斯相信克林顿总统和日本首相细川护熙会化解他们的贸易争议；一旦化解，美国政府就会让日元下滑。

他们当时的想法是日元已经经过大幅调整，何况日本经济衰退也有三年的时间了，土地价格已经下挫，银行也熬过了一段艰难时期，同时股市也下挫了过半。日本为了适应环境的改变，已经把一部分需要廉价劳动力的产业外移，特别是外移到廉价劳动力充足的东亚国家。

在1994年初，索罗斯推测日本股市将止跌回升，原因是日本经济马上就要开始复苏了。当时流动资金充斥，他们觉得有一部分流动资金即将注入股市，事实上他们在日本股市超买也赚了钱。

然而，索罗斯赌错了。克林顿和细川护熙间的谈判在2月11日星期五破裂。三天后，市场恢复交易时，本来跌个不停日元，突然间激涨。交易员作出的结论是：美国会试着推高日元，希望借此缩减对日贸易逆差。强势日元会使美国的日本进口货更为昂贵。

那个星期一，纽约汇市的日元收盘价是102.20日元兑1美元，比上个星期五的107.18日元涨了5%。叫索罗斯悔恨不及的是，他没想到贸易谈判破裂之后，日元会涨得既快又猛。

索罗斯很少谈到2月14日的亏损，但有一次说：“日元一天之内涨了5%，同一天之内我们也亏损了5%，其中大约有半数的人来自日元仓位。我不晓得哪一样比较差劲——是我们建立的仓位，还是两个政府的立场，彼此相斗而制造了那种波动。”

真正叫人注目之处，是索罗斯对这次挫败的泰然处之，似乎有意掩饰灾难的规模。这次挫败发生在1994年2月14日。量子基金的员工称之为“情人节惨遭屠戮”。

索罗斯赔掉6亿美元，令人诧异的是，这事对他的声誉影响相当小。几乎没人落井下石，也几乎没人发表评论，说索罗斯的赚钱机器一夜之间自取其败。没人表示，这位世界一流的投资者自掘坟墓，或者从此将默默无闻。

索罗斯不只活了过来，还活得很好。他利用十分聪明的才华，粉碎流言于无形之中。

1987年10月股市崩盘时，索罗斯试着说服新闻媒体相信他的损失金额只有3亿美元，而不是别人传说的8亿5000万美元。他没有成功。

现在，1994年2月，传言再度纷飞，说索罗斯的损失金额远高于6亿美元。这一次，索罗斯晓得，必须赶快行动，粉碎这些谣言。

他找来左右手斯坦利·德鲁肯米勒要他站到新闻媒体前面。因为必须先有地震，德鲁肯米勒才会和新闻媒体讲话。1994年2月14日，地震已经发生，索罗斯需要找个人从瓦砾堆中把钱挖出来。

德鲁肯米勒面对新闻媒体时，一开始便很聪明地指出赔了多少钱：6亿美元，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

德鲁肯米勒证实，索罗斯基金的主要亏损，来自误判日元会对美元下跌；他们建立的日元空头仓远比谣传要小，只有约80亿美元，而不是某些市场报导所说的250亿美元。

德鲁肯米勒接着指出，有一阵子他们的基金的确有较大的日元仓位（他没有说明到底有多大）但2月14日之前已经缩小。

为免他人误以为“索罗斯的投资已经误入歧途”，德鲁肯米勒解释说，前一阵子，他认为1994年日本经济成长会转强，产值提高后，日本的贸易顺差将缩小。所有这些事情会压低日元。因此，索罗斯基金建立了很大的日元空头仓，并且买进很多日本股票，卖出日本债券。1993年夏到那年下半年，索罗斯的日元兑美元游戏，操作得相当好。

一整年内，索罗斯对美元的信心十分坚强。虽然那年稍早，这样的信心使他损失不少，他还是相信美国的经济愈来愈强，而且政府会继续采取措施，维持美元于不坠。他也深信美国和日本迟早会解决贸易争执，而这有助于美元对日元攀高。可是美元似乎是扶不起的阿斗，连美国联邦储备委员数次进场干预和全球各地的中央银行相互配合，也无济于事。

索罗斯本身的公共关系努力也告失败。8月2日接受WNET的查理·罗斯访问时，索罗斯为美元辩护，一日咬定，不应让美元贬值太多，因为那会种下美国经济不稳的种籽，他告诉罗斯：“如果让美元贬值太多，会制造很大的不安定，因为通货膨胀压力将因之而生，债券市场也会有不良的反应。”罗斯问他是不是正买进美元，索罗斯闪烁其词。“我不想告诉你，就在我们谈话的这个时刻，我们可能买进，也可能卖出，而我并不清楚。”

索罗斯1994年的挫败，并没有使交易员却步，不再跟随他的每一个脚步，不再仔细聆听他讲的每一句话。10月4日索罗斯接受路透社访问，交易人全竖起耳朵。索罗斯说，他见到日元有可能对美元大幅贬值。索罗斯斩钉截铁的说：“我认为有回档15%到20%的潜力。”他预测日元将从99.55日元兑1美元跌到115日元至120日元兑1美元。

两天后的一个晚宴上，大型机构的基金经理人群聚纽约一

位客户家里，谈话的主题是索罗斯对美元所下的大赌注。那个晚上宾客很泄气。他们想相信索罗斯知道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他做对的次数十分频繁；在他表现大师风范并且发表公开谈话时，他的观点似乎总能自我实现。可是以前索罗斯对美元的看法都错了。

他会不会再次犯错？

索罗斯那时的公开评论，泄漏了他 1994 年投机性货币操作感到的挫折。《商业周刊》10 月 3 日那一期，有一篇访问他的文章。问及他从日本的亏损得到什么外汇的教训时，索罗斯说：“这个时刻，在外汇市场投机，赚头不是特别好。过去两三年的紧张关系，大幅失衡导致货币大幅波动的情形，目前并不存在。尚未解决的最大问题在日本——在经常性顺差方面与美国的言词之争。我们认为这事会解决，因为很有必要去解决。这是年初以来，我们犯错的地方。我们认为会提早解决，而不是拖得很晚才解决。说来有趣，我们目前所想的还是同样的事。”

但是坚信美元将升值，愈看愈不像对的策略。1994 年 11 月初，美元跌到战后新低点。

年终，德鲁肯米勒报告，量子基金已经赚回 2 月 14 日大赔中的若干。以 2 月 23 日的资产净值计算，索罗斯基金只跌了 2.7%。

他们还有足够多的钱。俯瞰中央公园的摩天大楼中，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员工还领得到钱，还有很多钱能够送往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所有基金会。

各基金会的工作仍全力推展。索罗斯可以一夜之间赔掉 6 亿美元，而不引起一丝疑虑，没人怀疑他有能力维持赚钱机器继续运转。1994 年头几个月，人们对他的信心，由此展露

无遗。

没错，6 亿美元的亏损，对索罗斯的资金管理公司有严重的影响。但重要的是，在大众心目中，索罗斯是理财魔术师的形象没有改变，一点都没变。

不管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试着把 1994 年说得多好，财金专业新闻媒体——《金融世界》、《华尔街日报》等等——唱的调子都有所不同。

《华尔街日报》11 月 10 日的标题这么写道：“交易员说，索罗斯再次看贬日元”。这份报纸指出，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因为赌美元会对日元上涨，已经损失掉 4 亿到 6 亿美元；2 月间它赌同样的事——也赔了。

要是索罗斯的赚钱机器对 2 月间的亏损，抱着某种厌烦的态度，这一次——1994 年 11 月——则采取比较愤怒和模糊的语调。同样的，德鲁肯米勒被推到新闻媒体面前，但现在他不再把事情讲得那么明白。他告诉《华尔街日报》：“正常情况下，我们不发表评论。但这些谣言绝对荒谬无稽。”他指的是外界传称量子基金的资产净值“那一年疲软”。他补充说：“我们乐于揭露今年稍早的亏损，但外汇操作又有损失一事，绝对荒诞无稽、毫无根据。”德鲁肯米勒指出，基金的外汇仓位“略有利润”，但不多谈基金的美元对日元仓位细节。

对外界来说，索罗斯的表现远优于其他避险基金经理人。1994 年，量子基金的表现是历年来第二糟，只比前一年上涨 2.9%，别人则下跌 20% 到 30% 不等——它们的客户也不断流失；其他的避险基金必须整个退出这一行。不过这些似乎无关紧要，因为财金新闻媒体的注意焦点放在索罗斯身上。新闻媒体仍认为他十分神秘、令人目眩神迷，继续试着打进他的投资王国的密室。

1994年7月的《金融世界》把索罗斯列为1993年美国首屈一指的赚钱高手，11月8日的封面故事标题却为“满目疮痍的索罗斯：炼金师失去准头”，对索罗斯1994年的表现不予好评。封面上的索罗斯看起来疲态毕露，右手撑着前额。他似乎在说：“我怎会搞得一团糟？”

索罗斯宣称，1993年投资于量子基金（那时持有50亿美元资产）的人，已赚到63%的利润，《金融世界》杂志不以为然，认为只有50%。索罗斯说，1994年头六个月，量子基金涨了1.6%，《金融世界》同样不以为然，坚称实际上发生9%的亏损。

《金融世界》也指出索罗斯陷自己于困境的另一种可能原因：依《金融世界》的数字，1993年底，量子基金欠索罗斯的顾问和绩效费用累计达1,549,570,239美元，占基金净资产的25%，只要基金的表现不错，而且索罗斯也不会为了弥补自己的亏损而追讨，这个“债务”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新闻媒体对索罗斯的攻击持续不断。11月底，报纸报导，虽然量子基金1994年的资产净值只涨1%多一点，交易价格却远低于以往。受益凭证的资产净值从1993年12月31日的22,107.66美元，降为1994年11月初的17,178.83美元；减少之数几乎等于1994年4月每股派发4,900美元。但是受益凭证市值的最重要指标，是高于资产价值的溢价。1994年初溢价是36%，但11月初已重跌为只有16%。个中涵义十分清楚：投资人不再愿意多花钱，好成为索罗斯赚钱机器的一员。

替索罗斯讲话的人，则试着解释溢价下跌的原因：1994年避险基金普遍承受很大的压力；索罗斯虽然处于种种不利的境地，做得还是比其他避险基金经理人好；以前量子基金的溢价被人为抬高，是新闻媒体炒热乔治·索罗斯的结果。

索罗斯对自己在日本所受的重创，归咎于日本的现行金融制度和他们的货币——日元。

日本的金融制度是一种由大藏省主导，很多机构——包括银行、经纪商、信托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参与的制度，而这些机构都是唯大藏省马首是瞻的，市场信号反而要退居其次。但这个制度也只是整体制度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缺席的基础则是所谓主导权，而前者已经开始在整体制度之内酿成气候了。作为工业奇迹的龙头老大，其大藏省却表现奇差。工业部门的巨额盈余，到了金融部门手中全都被浪费掉。

日本本来的宏谋伟略是要继十九世纪的英国以后成为世界各国的资本家，但却画虎不成，无功而退，其国内的资产泡沫反而被迫缩小。该国金融部门本来有大量所谓的隐藏资产，这都是日本工业奇迹的成果，但这些隐藏资产现在都烟消云散了。这些资产的数量非常可观，也因此拖这么久的时间才能完全烟消云散。

“我想大藏省和这些机构根本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情况，他们感到不安，但他们还没完全察觉到他们的困境。不过，金融部门的表现这么差，倒不是一件教人很意外的事。引导他们的是帐面价值，而非市场价值，他们追随的是错误的信号，他们习惯按规定办事，而大藏省在颁布规定方面，可是驾轻就熟的。大藏省的官员都是官僚，官僚却不适合在市场之内动作，这一点倒和法国很类似，看看法国里昂信贷银行的情形就知道了。

索罗斯说：“我想我这一辈子都可能摸不清日本金融机构的真正想法。他们很能花时间应付规章条文，而不花时间应付这个真实世界。这方面的例子太少，但太技术性了，我也并不完全了解日本的规章条文。举例言之，大藏省有一条规定，允

许金融机构按成本持有政府债券，但外国债券则要按行情标价，假如外汇损失超过15%，就必须具结。这就是促成海外投资回流日本及日元强势的重要因素之一，显然私人募集和柜台买卖是不必按行情标价的，于是就可以溢价出售，这正好和一般人的预期相反。

“要在市场成功，就不能率性行事。除了这一点，还有衍生性工具出现的问题。衍生性商品的作用之一，就是规避规章条文。最初外国经纪商向日本金融机构介绍衍生性商品时，就有点像白人最初教印第安人喝酒的情形一样，我不知道日本金融机构的帐册里有多少衍生性商品，但衍生性商品却把本来已经够复杂的隐瞒帐项问题变得更复杂。”

然而在大藏省的维持下，日本的金融制度是不会崩溃的，索罗斯却将大藏省的功劳一笔划去了。他说：

“他们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日元。日本当局一直想办法把日元压下去，但他们办不到。日元强势对营业性经济活动都是不利的，这种情况的正式名称是“通货收缩”。日元强势的效果和金融泡沫的效果恰好相反。其国内物价和利润率相继下降，货物销售也缩减，工人奖金减少，消费者则省吃俭用。实际利率很高，但当局却束手无策，虽然不乐意，却要开始考虑降低贴现率，不过降低贴现率也会引起别的问题。在日本有不少人靠储蓄过日子，但假如邮储的利率降低，他们的收入就会受到影响。此外，日本的保险公司大量出售年金，而且还保证4.75%的利率，于是都要亏本，都要筹措现金。在盈利不足百分之二分之一的情形下，股票还是能以盈利五十倍的价钱出售。有谁能够吸纳出售的股票呢？很奇怪，最近都是外国人在买。日元汇价升高后，总算抵销了他们在股市损失的一部分。现在日元的汇率如此，他们还会再买吗？”

1994年初的金融市场上，赌日元会跌不是只有索罗斯一人。其他避险基金也参与其中，同样亏了很多钱。使问题更复杂的是，一些避险基金为了筹措现金，不得不卖掉持有的部分资产，如日本证券和一些欧洲的仓位。持有很多日元的自营商被迫卖出之后，在全球各地产生连锁反应。

连没有赌日元会下跌的避险基金自营商，也受波及。这些基金的经理人相信，高失业率会迫使欧洲各国政府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因此他们建立了很大的欧洲债券仓位。他们的看法是：如果欧洲利率下降，手头上的债券价值会增加。

接下来一些避险基金因为日元赔了不少钱而必须卖出其它的资产以弥补，其它避险基金因此开始卖出手上持有的一些欧洲债券。这样一来，债券价格下跌，迫使欧洲的债券发行机构提高利率以吸引买主。欧洲债券市场陷入动荡不安，一些避险基金因此赔了很多钱。

第十三章 市场卫道士

“作为参与者，你要按规矩行事，作为公民，如果这个系统是错误的，你有责任去改变它，纠正它的错误。”

避险基金风险非常高，但也吸引了众多的人，有一部分人之所以加入是因为愿意属于某个团体，以加入俱乐部为荣，但绝大多数还是冲着令人眼晕目眩的利润而来的，毕竟高风险意味着潜在的高收益。这些投资人的钱通常要留在基金中很长时间，赚到钱之后会再投进去，从而利上滚利，越积越多。

一般的基金管理人，比如共同基金和退休基金的经营者，总是比较保守，通常通过分散化投资来降低风险，他们只用少数投资技巧来维持既令人比较满意又不受巨大风险的收益。而避险基金则不然，他们的心态极为积极，毫不保守，常常是选准极少几个目标进行集中操作。

令人心惊肉跳的一种手段是使用杠杆，也就是借钱来投资，靠从别处筹来的钱来生产钱。举一个例子：假如一段时间里，行情很好，靠自己的资本能获得 28% 的收益率，但对避险基金经理人来说，利润不只会停留在 28%，投机家们通常会按某个比率要求，假设为 5%，来借钱，这是一个 20 比 1

的杠杆，意味着只要付出 5000 万美元的现金，就可以借到 10 亿美元来从事投机。而结果是，投资人的钱的收益率会达到 560%，也就是，如果自己有 5000 万美元，就可以赚到 2 亿 8000 万美元。

多么令人眼红的利润！

那是勇气的考验，非常残酷，投资人必须拥有某种智慧、某种信心，才能投入这种战场，因为对投资人有任何一点不利的波动，也会通过这一杠杆，给投机者以重创。

索罗斯是个大师，是个杠杆操作的大师。他有那样的胆识，对于所下的赌注，有着极大的信心，也有一套财务控制手段以确保自己的钱多于所用的信用杠杆。

然而索罗斯毕竟不是神，信用杠杆给他带来财源滚滚，同样也让他为之吐血。1994 年 2 月美元兑日元汇价在一天里变动了 4% 到 5%，便让索罗斯损失 6 亿美元之巨。在我们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4% 到 5% 的波动并不罕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提高利率四分之一个百分点，道琼斯 30 种工业股票价格指数便会一举跌下近 100 点。

信用杠杆要求投资人对风险有一种偏好，而且还要十分明智地使用。它可以一夜之间让人暴富，也可能使这些财富在第二天消失得无影无踪。

避险基金操作还有一招，就是卖空，也就是卖出自己并没有的商品、股票、外汇或债券等。期望价格跌下去，以便以后用较低价格买进，交付给买方。索罗斯能在 92 年 9 月创造英镑危机，也靠他卖出了不计其数的英镑，其实，他的手中根本就没有英镑，当危机爆发后，英镑汇率下跌，他再重新买进来以支付那些卖空的条约。

一位华尔街知名的避险基金经理人这样说道：“证券分析

之父葛拉汗认为股票有内在价值，内在价值是指某种特定环境下的价值，这些环境包括利率、经济状况和公司的获利能力等。那些分析师或基金经理人的工作，是找出价位高于内在价值的证券。普通投资人会卖出这一证券，而避险基金则会卖空。反过来，当价位低于内在价值时，也即价格偏低，普通人会用自己的钱买进，而避险基金经理人则会借助信用杠杆，借钱来买进更多的数量。”

避险基金不只会用信用杠杆或卖空，市场上还有许多东西供他们挑选，比如期货、期权和其它衍生金融产品。这些工具还可以细分下去，象期货就有许多品种：商品期货、外币期货、利率期货和股票指数期货等等。即使专家看了也会眼花缭乱，所以他们的仓位更集中在某些投资工具中，无论是操作的频度或是数量都非传统的基金经理人所触及。

避险基金之所以这么积极地去赚取利润，是因为经理人通常会获得基金利润的 20%，而对传统的共同基金或退休基金经理人来说，不论资产的表现怎么样，只能拿总资产的 1% 左右作为管理费收入，所以他们没有很急切的个人欲望，去积极地奋斗。

避险基金的成长速度十分惊人，避险基金的操作者们投入庞大的资金到金融体系，有能力对金融市场造成不利的影响。政治家们认为金融体系的骚乱的幕后罪魁祸首是避险基金，他们开始谈论需要新的法规来管理。

但是对乔治·索罗斯来说，立场应当怎样呢？他自己是在没有管理的情况下，获取了巨大的财富，这使他有能力和在东欧进行他的慈善事业。索罗斯喜欢自称为不稳定状态专家，靠着金融市场中的不稳定谋生。但是他又赞成成立一个集中管理的银行体系，这不是一种矛盾吗？

“在外汇市场投机，我一点也不犹豫，虽然我认为外汇市场需要稳定。我们应当区分参与者与一般公民的不同。作为参与者，你要按规矩行事，作为公民，如果这个系统是错误的，你有责任去改变它，纠正它的错误。”

*

*

*

早在1993年初，索罗斯一些引人注目的举动便越发引起政治家侧目。这些政治家的记忆里，无法忘却并购年代如火如荼的情形，迈克尔、米尔肯、伊万、波斯基和一些其他巨星，赚进了成百上千万美元，一开始时，每个人都惊异于这些金融界巨子的聪明才智，后来大家终于发现了，这些金融大腕并不象他们外表看起来那么聪明，而只是利用内部消息大赚其钱。

政治家们想要好好观察乔治·索罗斯和整个避险基金的运作。他们没理由相信他的行为和米尔肯等人相同。依他们之见，索罗斯之所以值得怀疑在于他的钱来得那么快，那么多。华盛顿总是对此惴惴不安。1992年，证监会曾针对境外基金，提出了厚达500页的报告。提出这份报告时，正值人们怀疑三大避险基金在美国财政部出售公债时，大量买进。那时的公债标售过程中，纽约的所罗门兄弟公司被指责为企图围标。政府的调查人员发现这三个基金，包括索罗斯的量子基金，都没有问题，他们作出结论说：避险基金不需要更严格的管理。

在政治家们的眼里，一些金融高手赚得了巨额财富，然而糟糕的是，他们对这些高手的所作所为以及赚得巨富的方法一无所知，华尔街里面的人都有可能不清楚，更何况置身华尔街以外的人呢。华盛顿不安地觉得，为了维持一种正义，他们有必要找索罗斯和其他一些避险基金的经理人来谈一谈，了解一下情况。然后让他们来向公众说清楚。

1993年6月，众议院的银行委员会主席亨利·刚萨雷斯公

开宣布，计划请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证券管理委员会来跟踪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的外汇交易情况。他在众议院的全体会议上说，他非常好奇，很想知道索罗斯怎么能赚到那么多利润，索罗斯的资金有多少来自银行贷款，以及美国银行家因为借钱给索罗斯的基金需要承受多大的风险。这位国会议员这样向外界宣布：

“近期内，我将请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证券管理委员会调查索罗斯先生在外汇市场的行为，以弄清楚索罗斯先生有没有可能操纵外汇市场。”

“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最好能够充分了解索罗斯先生操纵外汇市场的方法。因为在操纵各种货币的价值时，他们和他进行的是正面的斗争。”

欧洲各国中央银行于3月间在巴塞尔集会，美国国会的听证会预定4月间举行。索罗斯和各避险基金承受的压力愈来愈大，因为两个机构威胁说要采取行动对付他们。

于是那年春天索罗斯成了避险基金的代言人，以为因应。他决定尽可能博取好感。3月2日在波恩，他宣称中央银行当然有权规范庞大的避险基金。“我察觉到，未受规范的市场先天上就不稳定，”他告诉记者，“我想，主管当局理该有所规范。”

“我真的相信，不受规范的市场，终有崩溃之虞，因此（中央银行）进行调查是很合情合理的事。我们准备就这事和他们合作。我只能希望，不管他们采用什么样的规范，产生的弊都不要多于利。”

有人指责避险基金使得市场的波动和不稳定性增加，询及对这一点有何看法时，索罗斯说：“我会说，市场本来就有过度反应的倾向，因此我一点不相信有所谓的完美市场存在。我

也不认为避险基金很完美；否则它们不会一天之内赔掉 5%。”

巴塞尔的会议结束后，十大工业国的中央银行总裁找不到好理由订立新法规，以规范避险基金或者使用自有资金在国际市场交易的银行业者。市场已从那一年稍早的骚动不安中启航矫正，没有理由预期会有进一步的麻烦。不过还是有些观察家有种独特的感觉，认为避险基金使出各式各样的骗术巧妙地逃脱，因此需要更多的管制。

丁威特雷诺兹公司股票研究部门资深副总裁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威廉·道奇这么说：“要是你说，今天给我 50 美元，你就可以拥有 100 英两的黄金，而且任何时候只要你想要它，就能来拿，但要付我当时的市价和 50 美元之间的差额，那我就卖你一个可以拥有 100 英两的选择权。现在，当我进入这一行时，如果我和很多人达成那样的协议，就会被归类为交易未登记的证券。”

“我搞不懂何以今天衍生性金融商品在没登记的情况下滋长茁壮。由于这些东西没有登记，所以不需在某个定点交易。如果它们没在定点交易，有关的纪录和交易情况就没有；市场的构成、交易条件、个别交易的内容就无从得知或了解。……”

“避险基金投资的构成变得如此庞大……如果它们失败，（它们）会对银行体系制造系统性风险，从而危害到整个社会的金融结构。”

“市场本来就有过度反应的倾向。”

听证会举行前一天，刚萨雷斯发表的立法声明，威胁要让这个领域（不当的管理），成为“直接违反法律”的行为，并指出希望“国会加强监视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活动”。

立意很不错，但在众议院银行委员会提出新的法律规定之

前，必须先解决更为基本的问题。虽然这个委员会主管的范围是金融，但委员会的成员几乎无人知道避险基金是何以运作的。很少人了解他们使用的深奥难解的金融工具。

为了取得若干答案——实际上是上一堂避险基金的入门课程——他们请索罗斯 1994 年 4 月 13 日出席听证会。听证室内座位开始坐满后，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乔治·索罗斯的表演是那一天华盛顿最棒的一幕。

听证室挤满了人，最后只能站着听。避险基金入门课程即将开始。“老师”宣读一份声明，“研讨会”终于开始，桌上放着他的部分金融理论，用以解释为什么国会议员找错路狂吠不已。他利用自己的理论说明何以如此。

*

*

*

索罗斯首先指出：“委员会对金融市场的稳定问题感到关注是正确的，原因是金融市场的确有可能变得不稳定，因此需要经常严密的督导，以防止严重的混乱。”

刚萨雷斯和另一个委员相视一笑，对索罗斯的这句话他还是比较满意的。

索罗斯认为一般人接受的理论是认为金融市场是倾向稳定的，而且也往往能正确地预测未来的情况。而他的理论与此截然不同，他斩钉截铁地说，金融市场没有办法正确地预见未来，却可以影响经济的基本面。一旦出现这样的事，市场行为便与有效率市场理论所认为的正常状况相去甚远。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但在各个领域是存在着的，反射作用有时具有破坏作用，原因正在于它们影响经济的基本面。

索罗斯再一次引用了他 1987 年的著作《金融炼金术》，他为许多人不理解这本书里的观点很是悲哀。事实上，后来一些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回忆时，也说《金融炼金术》过于高

深，看不懂。

索罗斯向国会议员们详细地解释了他的“一窝蜂行为”理论。他这样说道：“所谓一窝蜂行为，是反映投资人在价格攀升时就不断买进，价格下挫时就不断卖出，从而形成一种潮流。假如市场全由一窝蜂行为支配时，大起大落的过程就会出现，这种行为是市场崩溃的必要条件，却非充分条件。”

议员们在索罗斯的金融理论中迷失了方向，如云山雾罩一般，他们开始有点失去耐心了，他们把索罗斯弄到这个讲台上，是想让他辩白一些什么，而不是要让索罗斯来给他们上一节非主流金融理论课。

索罗斯继续分析他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东西引起了一窝蜂行为？避险基金可能是因素之一。……但我认为，至少有两种因素更重要，更值得大家好好地端详一下。其一是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共同基金扮演的角色，其二是衍生性金融工具的作用。”索罗斯毫不容情地指出机构投资者在本质上就是一窝蜂。因为他们往往追随趋势而行。“为什么资金会一直拥入？他们经常维持低于正常的现金余额。因为他们预期资金会再流入。资金流入时，他们必须增加现金，以防投资人赎回。”结果，“他们创造了部分的金融泡沫。”

索罗斯试着尽可能和衍生性金融商品保持距离。所谓衍生性金融商品，是从股票、债券或商品衍生出来的金融合约。银行委员会对这些金融工具十分好奇。索罗斯说的话，听起来就好像连他这位终极投资高手，也很难讲清楚它到底包括什么。它和金融中介机构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操作台上积极活跃的避险操作和避险基金混为一谈。除了‘避险’一词，它们之间没有相同的地方。”

为什么大家会对衍生性金融商品感到迷惑？

索罗斯表示：“它们有许多种，其中一些深奥难解，涉及的风险，连最精明的投资人也不是很清楚，而我想我是其中一位。这些工具中，有些似乎专为机构投资人设计，让他们去赌本来不被允许的东西。”

“我们很保守地使用选择权和比较奇特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我们的活动是逆势而为，不是随势而作。我们试着尽早抓住新趋势，而在稍后的阶段，则试着抓住反转中的趋势。”

索罗斯留下清楚的印象：就算国会决定要规范管理衍生性金融商品，他也并不在意。“看看最近狂热冒出的工具，或者将本息分离的工具……我不很确定它们真的有必要。”

对索罗斯的这番话，蒂姆·福格森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责，索罗斯有点不厚道：不能因为其他某些人最近赔了钱，“这位投资泰斗就在国会批评自己没有用到的技巧。”

索罗斯接下来很简短地谈到当前的市场状况：“我愿意强调，我没看到市场有崩跌或一蹶不振的立即危险。我们刚戳破了资产价格上涨产生的一些泡沫。因此，目前的市场状况远比去年年底健全，我不认为投资人在这个时候应该十分忧虑。”换言之：大可放心买进美国证券或标准普尔 500 种股价指数期货。

索罗斯抨击克林顿政府在贸易上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以及试图唱低美元。“这对美元的稳定和市场的稳定有相当大的伤害。拿压低美元当作对日本的贸易政策，是种危险的工具，我们不应该这么使用。”许多人从大师口中听出了相当明显的市场信息：做多日元和放空美元，直到贸易谈判稳定下来。

索罗斯开始为自己的量子基金作出辩护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经营了二十五年，从未出现过不能应付增加保证金的情

形。索罗斯告诉议员们他很少使用期权或其它比较复杂的衍生性金融工具。索罗斯对议员们说：“我们的活动往往和流行趋势背道而驰。我们往往设法在趋势刚一出现时把握先机，然后在趋势到了强弩之末时把握趋势的逆转。因此，我们的活动是使市场趋于稳定，而不是使市场趋于不稳定。”

议员们被索罗斯搞迷糊了，一场质询索罗斯是否操纵市场的听证会，仿佛可以结束了，索罗斯用自己的话告诉了大家，他不仅不是市场上的操纵者，而是一个混乱市场上的“卫道士”。

索罗斯继续试着避免避险基金成为听证会的焦点，他指出在投资世界里，避险基金所占比重没有那么大。索罗斯告诉银行委员会，虽然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平均每天的货币交易额为5亿美元，这种交易水准不会影响市场，因为避险基金顶多占有外汇市场每天成交量的0.005%。

索罗斯认为，解决货币危机和骚乱的方法，是不要固定汇率。他说：“那太僵化了。”但他也反对汇率浮动。“自由浮动汇率制有缺陷，因为市场总会反应过度，走上极端。”他的解决方法是：“七大工业国主管货币政策的官员，应该相互协调货币和财政政策，不要让彼此之间出现很大的差距，而从根本上埋下市场不稳定的种籽。”

对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索罗斯看得很清楚，他们还是不明白避险基金到底在做些什么。

“避险基金到底是什么？”他们一问再问。

索罗斯试着向他们说明，但不得不承认这个概念包藏着许多原本不是它要的东西。“这个名词不分青红皂白地应用之后，涵盖十分广泛的活动。它们唯一共同的地方，在于经理人是依绩效而给酬，而不是从所管理的资产中抽取固定的百分比。”

用这种方式描述避险基金似乎很奇怪——特别是出自避险基金大王之口。但是索罗斯没有兴趣开个研讨会去定义避险基金是什么。他想传达的讯息是：避险基金，不是罪魁祸首，而是在金融市场中做一些好事。

索罗斯向听众讲了一句最坦率的话，为避险基金辩护：“老实说，我不认为避险基金值得你们或主管当局伤脑筋。”他说，那年稍早股票和债券价格急挫，不应怪罪到避险基金头上。“我不接受任何人的盖棺定论，或暗示我们的行动有害或造成不稳定。”

索罗斯被问到，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状况，也就是像他那样一位民间投资人，累积起足够的资金，能够操纵意大利里拉或英镑等货币。

“不会，”他答道，“……我不相信任何市场参与者有能力，背逆市场基本面，成功地影响主要货币的外汇市场，但是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有可能。……和全球外汇市场的规模比起来，避险基金小巫见大巫。较次要的货币，也因为市场欠缺流动性，能防止任何投资人成功地影响它们的汇价。如有任何投资人建立了那种货币的大仓位，企图影响汇价，将因欠缺流动性，在卖出仓位时面对灾难性的后果。”

索罗斯因为支持立法规范而感内疚，他也承认公司里的其他人试着说服他，应该高声疾呼反对立法管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布鲁斯·文托询问索罗斯关于最近金融市场波动的事情，索罗斯答道：“不瞒你说，我们为我在此出席之事做准备时，稍许谈及了这件事。我说，坦白讲，衍生性金融商品工具的发行或许应受管制。接着我的合伙人……指出，不合时宜的法令规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主管当局只对负面的事情有兴趣；对正面的事不感兴趣。换句话说，他们希望避免大

灾难发生。”

“因此……如果你们规定义务（象股票那样，向某个管理委员会登记）……那真的会产生一股对繁文缛节的抗力，因为主管单位的兴趣和市场的兴趣不相称。因此他要我不要做那样的建议。”

听证会上，发言认为不需要进一步管理的人，不是索罗斯一个。主管官员也认为，应该淡化避险基金和衍生性金融商品对银行体系及对投资人可能产生的风险。金融检查署长尤金·鲁威格指出，八家国内银行拥有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平均不超过资产的 0.2%。证券管理委员会主席亚瑟·李维特在听证会上表示，依目前的银行和证券法，几乎所有的避险基金活动都受到高度严格的管理，因此不需新另订新法。出席作证的三位主管官员，都认为需要更多的信息。“我们不赞成管制，”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约翰·雷威尔指出，“但我们强烈倾向于披露更多的信息。”

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对索罗斯的说词，反应如何？

托马斯·弗雷德曼隔天在《纽约时报》撰文总结道：“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成员，受教于那位能够点石成金的人，既敬且畏，但同时对避险基金的神秘世界十分好奇，两种感情交互激荡。避险基金是富有投资人的合伙事业，在全球各地搜寻通常是十分奇特的货币、债券和股票投资标的。避险基金大起大落的故事，包括索罗斯先生最近一次货币交易赔掉 6 亿美元，使得这些基金的神秘色彩似乎更浓，而不是更淡。……”

索罗斯那一天在华盛顿作证，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仅仅说服国会还不够，他还想转变新闻媒体的看法。罗伯·约翰逊奉命接下这个任务。约翰逊是索罗斯基金公司的常务理事，老板这次前往华盛顿，由他陪同。

听证会结束后，约翰逊向新闻媒体说，乔治·索罗斯这位投资人到底在做些什么，还需要做更多的沟通，好让国会和大众明了。“最大的问题在于有关避险基金的神话。我们还需要和新闻媒体多聊聊。”

约翰逊显然为了更坦白些，透露了索罗斯怎么配置资产，以及如何运用信用杠杆：

- 索罗斯的资金中，通常有 60% 投资于个股：在这方面，索罗斯很少利用信用交易。

- 20% 投入总体交易中——下注在货币和全球性的指数：这一方面，运用的信用杠杆，有时高达资金的 12 倍。

- 另外 20% 用在约翰逊所说的“预防性准备”上，例如国库券和银行存款。他说，这 20% 有吸震缓冲作用，目的是“在险恶的环境中争取时间，做为投资组合的减震器”。换句话说，万一需要补缴保证金，马上有钱可用。

乔治·索罗斯作证完毕，从种种迹象来看，他表现得很好。

两个月后，拜尔伦·伍恩（Byron Wien）和证监会一位官员吃晚饭。他们谈到听证会和索罗斯出席的事情。伍恩后来说，那位证监会官员“认为乔治做得很棒，因此证监会也不再烦恼什么事情——而且国会也不再烦恼避险基金的事了。”

附：避险基金与动态避险

本文是索罗斯在 1994 年 4 月 13 日向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金融及市政事务委员会作证的纪录。

我很高兴有机会向贵委员会作证词。我认为，委员会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感到关注是很对的，原因是金融市场的确有可能变得不稳定，因此需要经常严密督导，以防止严重的脱序。最近价格剧烈变动，特别是在利率工具市场的价格波动，使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市场的运作方式。

另一种市场观

我一开始就必须申明，我彻底不同意流行的看法。一般人接受的理论是金融市场是倾向稳定的，而且也往往能“正确地”预测未来的情况。我运作时的理论根据与此不同。根据我的理论，金融市场不可能正确地把未来排除在考虑之外。原因是虽然金融市场现在的确有此情形，但事实上，它也是塑造未来情况的因素之一。在某种情形下，金融市场可以影响一些他们本来要反映的“基本因素”。这种情形出现时，市场就进入所谓动态不平衡状态，而且那时市场的情况，就会和所谓有效市场理论描述的正常市况不一样。大起大落的过程不常出现，但一旦出现时，则可以引起极度混乱，原因是他们是可以影响经济本身的基本因素。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细谈我的理论，但在我的《金融炼金术》书中，我有详细说明，我在这里谈一个理论观点，就是假如市场全由一窝蜂行为支配时，大起大落的过程就会出现。所谓一窝蜂行为，是反映投资人在价格攀升时就不断买进，价格下挫时就不断卖出，蔚成一种风气。一面倒的一窝蜂行为是市场崩盘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到底什么东西引起一窝蜂的行为？避险基金可能是因素之一，因此各位要看看避险基金是怎么一回事，是很合理的。不过，各位却看错了地方。我认为，至少有两种因素是更重要，更值得大家好好端详一下的。其一就是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共同基金扮演的角色。其二是衍生性工具的作用。

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问题是，他们的表现是相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的，而不是根据绝对标准衡量的。于是他们本质上就是一窝蜂。在共同基金方面，由于他们是开放型的，所以助长这种趋势。当钱涌进来时，他们往往只维持比较不正常的现金余额，原因是他们预期继续会有现钱跟进。钱流出时，他们又要筹措现金准备应付投资人退股。这本来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但共同基金成长速度惊人，比避险基金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现在共同基金还有不少以前完全未曾投资股市而且完全缺乏经验的股东。

衍生性工具

衍生性工具的问题在于发行这些工具的人往往从事所谓三角避险或动态避险自保，以防止亏损。动态避险的意思是假如

230 金钱与梦想

市场趋向对发行衍生性工具的人不利时，这些人往往被迫跟着市场走，于是市场的初步价格波动随之扩大，但只要价格不断变动，也不会出现什么严重情况，只是价格变动趋剧，对衍生性工具的需求因而有增无减。但假如朝同一方向进行的动态避险过多，价格变动可能会停止，金融脱序的阴魂就会挥之不去。对于必须进行动态避险的人来说，假如他们只能下单，不能执行交易，损失可能非常惨重。

这就是 1987 年股市崩盘时的情形，当时的罪魁祸首就是投资组合保险的过度使用。投资组合保险是一种动态避险的方式。此后，金融当局制订了条例，俗称“断路装置”，使投资组合保险变得不切实际，但其它动态避险工具马上就应运而生。这些工具和利率在市场扮演的角色远比在股市哲学的角色重要，而最近数周内，最充满惊涛骇浪的也就是利率市场。

动态避险把风险从顾客转嫁到市场主导者身上，但假如所有的市场主导者都同时朝同一方向进行动态避险而又没有人承受风险的话，市场就垮了。

衍生性工具的爆炸性成长也引起别的危险。其一是衍生性工具种类非常多，其中有些还是很难懂的，即使最高明的投资人也未必能够正确掌握风险所在。部分工具是经过特殊设计的，使投资人可以透过这些工具进行赌博。举例言之，部分债券基金投资所谓合成债券，风险比在固定范围内的风险大一、二十倍。另有部分工具的报酬率高得不得了，原因是投资这些工具是可以把全部投资统统亏掉的。1994 年 4 月 4 日美国债券市场出现所谓“房地产抵押债务余款”（俗称有毒废物）的强劲卖压，结果导致一项六亿美元，专门投资这一类工具的基金清盘。

这些工具的发行人多是商业或投资银行。一旦市场崩盘，

调节机构就要插手，以维持市场完整。从这方面来说，政府当局有权也有义务监控和调节衍生性工具。

一般而言，避险基金不发行衍生性工具，他们反而比较会是这种工具的客户。因此避险基金对体制构成的危险远不如金融中介业者的衍生性工具部门，大家千万不要把动态避险和避险基金混为一谈，他们除了“避险”两字是一样的外，并无其他共同点。

避险基金是怎样的一回事？

我来这里不是要笼统地为避险基金辩护。现在避险基金这四个字已经被滥用了。因此包含了很多种金融活动。避险基金共同的地方是基金经理人的报酬是要看看基金的表现而分红的，而不是根据他所管理的资产总值的一个固定百分比来计算的。

我们用避险基金投资，并藉由避险作用、杠杆作用，同时在多个市场运作来分散风险。我们比较像一个内行的私人投资者，而不太像一般为别人管钱的机构。由于我们的报酬是看绝对表现而定的，所以是可以对机构投资者的一窝蜂行为起一点化解作用的。

但避险基金的报酬结构也不尽理想，原因是赚钱和亏钱时大有分别。赚钱了，基金经理人分红，但亏钱时，他却不分担亏损，亏损往往是累积的。基金经理人表现进入负数领域时，就很有动机增加投资风险，以便转亏为盈。他本来应该是要审慎的，但他往往不这样做。这就是避险基金业在 60 年代末期趋于式微的原因，那时正是我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量子基金群

我可以很自豪的说，我的量子基金群没有这种弱点，原因

是由我们的经理所经营的基金，他们自己也占了相当大的股权。我们的股权是我们妥为管理金钱的一种很大的直接诱因。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经营了二十五年，从未出现过不能应付增加保证金的情形。我们很少使用选择权或其它比较冷僻的衍生性工具。我们的活动往往和流行趋势背道而驰。我们往往设法在趋势初起时把握先机，然后在趋势到了强弩之末时把握趋势的逆转。因此，我们的活动是使市场趋于稳定，而不是使市场趋于不稳定。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公益，这只是我们赚钱的方式。

所以不论有人明言或暗示我们的活动是有害或助长不稳定的，我一概不承认。因此，也许只有一个地方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我们的确利用贷款投资，而且假如我们不能应付追加保证金通知时，的确会出问题。但事实上，这种危险是很小的，不过我也不能保证所有避险基金都是这样。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经验是，银行和券商很小心地查证和注意我们的活动。我们每天都按照市价计算投资组合，而且也定期和银行沟通，因此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信贷状况。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稳健而且有利可图的，我们的活动甚至比他们其它的活动更容易掌握。

监管与调节

不过，这是金融调节当局必须监管，甚至必要时需加以调节的领域。假如要订立法规，应该平等适用于所有市场参与者。假如只针对避险基金，那是不对的。

提到规章问题，我们得要小心防止出现与我们初衷不符合的后果。例如，在货币买卖和债券买卖的保证金制度方向，也许订立规章是一件好事，但这却可能促使市场参与者使用选择

第十三章 市场卫道士 233

权等衍生性工具，结果使局面变得不稳定。人们要规避规章制度就是促使衍生性工具发展的动力之一。

我希望把监管和调节分开。我个人主张，可以尽量多监管，但调节就要尽量少。我也要把资讯的收集和公开分开。我觉得政府当局比社会大众要掌握更多资讯。但事实上，有时法律规定我们公开的资讯会引起不必要的价格波动。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现在是评估新工具和新现象引起新的风险的适当时候了。不过金融市场最近经过一次很严重的修正，假如进行正式调查，却会引起我们要防止的那种脱序现象。

我也希望强调，目前市场没有崩盘之虞。我们只是把资产价格的泡泡戳了一个洞。市场状况现在比去年年底时健康多了。我认为投资者不必过于担心。

我的一般性意见到此为止。各位提出的问题，我已经书面作答，假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会设法回答。谢谢你，也谢谢各位委员使我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

第十四章 犹太情无结

“我的犹太血统没有产生族群的忠诚，引导我支持以色列。相反的，我以身为少数族群自豪，像个局外人，能用不同的观点看事情。只有批判性思考和提出独特观点的能力，才能弥补身为匈牙利犹太人而一直困扰我的危险和侮辱。”

索罗斯的父母和他本身的经历，都没吸引他更接近犹太信仰。即使纳粹大屠杀强烈地激发他想起自己的宗教背景，但对他的宗教信仰没有产生持续的影响。1944 年躲避纳粹追捕的经历，使他学到冒险和求生图存的技巧，但他并没因此更像犹太人。

如果他从纳粹大屠杀吸取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应该说他相信少数民族——如欧洲的犹太人——将来应该受到保护，而最好的保护方式，莫过于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给予少数民族应有的权力。

1992 年 10 月初，索罗斯邀请以色列企业家班尼·蓝达（Benny Landa）到纽约的寓所吃晚饭。蓝达是一家叫做英迪格的高科技公司的主人，英迪格是全球高品质数位彩色印刷产品的翘楚。这个晚上后来被证明是非常美妙的。

6月间，蓝达请美国投资银行第一波士顿公司替英迪哥做些策略性的规划工作。第一波士顿公司建议先从直接发行证券做起，几年后再公开发行。就在第一波士顿的直接销售备忘录即将完稿、继而寄发给可能的投资人之际，索罗斯得悉该公司的意图，进一步探询之后，他请英迪哥暂缓寄发直接销售的备忘录，并表示他有兴趣吃下全部作为投资，共5000万美元。

这个消息对蓝达来说，无疑是个天大喜讯，因为他本来预期至少要有六位投资人才能卖完。双方谈好条件，索罗斯又告诉蓝达，他个人对这件交易很有兴趣，但希望在最后敲定之前，见见这位企业家。索罗斯请他到纽约来，共进晚餐。

索罗斯和蓝达见了面。在场作陪的还有两个人，一位是索罗斯的同事查特吉，另一位是第一波士顿公司的总经理罗伯·孔瑞茨。

他们在晚上7时30分开始吃饭，前后四个小时。大家坐下来享受丰盛的晚餐后，索罗斯请蓝达谈谈自己和他的公司。这事大概花了20到30分钟。接着蓝达问索罗斯，是不是该轮到 he 请这位投资人谈谈自己了。

“没问题，”索罗斯答道，他以为蓝达要问他有关投资上的问题。

“喔”，蓝达打断他的话，“我看过你的经济和政治哲学，对那不是很有兴趣。”索罗斯听了这话，皱了皱眉头，蓝达却没有注意到。“我感兴趣的是，”蓝达提醒自己，要讲得含蓄些，“身为犹太人，你的感觉如何？和以色列的公司做生意，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意义。”

蓝达听人说过，索罗斯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却对犹太信念无动于衷，蓝达有点难以理解，所以有此一问。

对于这个问题，索罗斯看起来似乎很惊讶，但没有不快。

“不论是哪里的公司，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并不是因为你是以色列公司，我才感兴趣，只是因为这事看起来似乎是个很好的机会。”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索罗斯侃侃而谈他的犹太血统、他的意外经历，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躲避纳粹的追捕。“那是我这一生中最刺激的经历之一，”他告诉蓝达，“那种躲藏就像玩警察抓小偷，刺激极了。”他们也谈到犹太的民族性和犹太人的自我憎恨。那个晚上，有些时候，两人辩了起来——不是争得面红耳赤，而是相当心平气和地辩论，但话题都是蓝达后来所说的“那些切身而痛苦的问题”。

查特吉和孔瑞茨整个晚上几乎没开口。后来蓝达解释说，这两人一定是听了索罗斯和他整晚聊的竟然都是和生意无关的话题，吃惊之余，不知如何开口。

蓝达和索罗斯聊天的时候，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令这位投资人否定自己的犹太根源。他注意到索罗斯描述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时，总是把它看成很刺激的游戏。可是现实中，他一定经历了难以想像的恐怖。于是他作出结论：身为犹太人，对索罗斯来说是个负担而从来不是有趣的事。

那个晚上的某个时候，索罗斯透露，直到 80 年代初，公开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他才不觉得浑身不自在。在这之前，他总是避而不谈这个问题。索罗斯说：“或许是因为在商场中的成功，终于给了我足够的信心，承认自己的犹太血统。”

他们又扯到民族情感的话题。蓝达认为：“民族主义含有某些建设性、正面的内涵，犹太人复国运动是一股十分积极向上的力量，值得为之奋斗。”他告诉索罗斯：“我希望能够吸引你更接近它。”

索罗斯深受纳粹的残酷折磨，对民族主义没有好感。“那只会带来邪恶和破坏的行为，引发盲目的爱国心和战争，”索

罗斯回应道，“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如果民族主义有可能只出现建设性的一面，没有负面的特质，以及因之而来的政治和社会伤害，那你说的的是对的。但那不可能。”

时间接近 11 时 30 分，索罗斯和蓝达神色间都露出疲态。

蓝达转向索罗斯，说：“我觉得那是我的使命，就像你对其它政治信念的认同，终要把你拉回来认识以色列。把你拉回到犹太人的世界里。”

“那会很有趣，”索罗斯含糊其词，并不十分热心。

在电梯中，查特吉对蓝达说：“我很吃惊。这一辈子，从没看过这样的事，关于乔治的那些事，我从来不晓得。”蓝达自己也很惊讶。

*

*

*

几个月后，1993 年 1 月，蓝达在索罗斯的纽约办公室和这位投资人见面，握手、签约。

索罗斯一定还记得 10 月间他们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可能觉得他让人留下印象，以为他不肯和以色列公司有所往来，害怕如此将使自己的犹太血统过分曝光。他设法消除蓝达可能持有的这种想法。

索罗斯说：“你该知道，我很高兴这家公司在以色列。”蓝达认为，索罗斯的意思是说这件生意对他的确具有个人的意义。蓝达趁机邀请索罗斯到以色列，索罗斯答应了。

“1947 年我到英国，1956 年到美国，”他这样说，“但从来没变得很像美国人。我的犹太血统没有产生族群的忠诚，引导我支持以色列。相反的，我以身为少数族群自豪，像个局外人，能用不同的观点看事情。只有批判性思考和提出独特观点的能力，才能弥补身为匈牙利犹太人而一直困扰我的危险和侮辱。”

犹太教信仰对他是个负担。这事没有特别的好处，只会带来“危险和侮辱”。因此，战后他尽量避谈自己的宗教。他的哲学观念无一来自犹太教。

他的老友和事业上的伙伴拜尔伦·伍恩指出，“乔治从没否认自己是犹太人。他从没背离自己的根，但我想，他不希望那是自己血统的核心。”

“他是犹太人的这个事实，标志着他必须有所逃避。他必须奔逃，躲起来。到了美国之后，身为犹太人，便被划为一个特别的类属，而索罗斯希望摆脱所有类属。他希望因自己所做的事、自己的智慧和成就而为人接纳。他不认同犹太教义，但另一方面，也不背离。他假定每个人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但不会刻意告诉别人说自己是犹太人。”

与班尼·蓝达见面后，乔治·索罗斯出现了更深沉的变化。90年代初，朋友和同事开始注意到他对宗教的态度改变了，开始对自己的过去重新感到兴趣。他开始请一些熟识的朋友，如丹尼尔·杜隆，介绍他看一些书，包括犹太法典。其它方面，他也有所觉醒。在布加勒斯特的索罗斯基金会正式揭幕式上，索罗斯站在人群前面，大声地说：“我是乔治·索罗斯，我是匈牙利犹太人。”珊卓·布拉隆也在场，还记得人群惊愕的样子。罗马尼亚人不习惯听到某个人在公开场合以身为犹太人为荣。

是谁唤起乔治·索罗斯的犹太人自觉？尽管东欧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对他和他的犹太血统展开攻击，但他对自己的犹太血统愈来愈能够安然处之。他已在商业世界得到巨大的成功，因此觉得可以不怕遭人攻击。他不再担心犹太血统会带来惩罚。

他在东欧亲眼目睹的苦难，特别是90年代初波斯尼亚的战争，使他想起犹太同胞在本世纪稍早承受的痛楚。在他资助萨拉热窝重建供水和天然气管线后，有位记者问，为什么像他

这样一样犹太人，会同情伊斯兰教国家。索罗斯表示：如果你经历过纳粹大屠杀，再见到另一次类似的情形，便有特别的感触。我尤其关注前南斯拉夫的大屠杀。”

多年来，他的犹太同事一直设法吸引他更注意这个犹太国家，但徒劳无功。索罗斯对犹太信仰的冷漠，令他们相当气恼，但是他们十分清楚，不管费多少唇舌，索罗斯本人还是必须经历某种转变，才会去拜访以色列。

他以前老是说，远离以色列的原因，是不满以色列对待阿拉伯人的态度。另一个理由是，他觉得社会主义式的以色列经济过于僵化，对投资人太不友善。由于他提供援助的目的，在于打开东欧的封闭社会，稍后更扩及前苏联地区，所以没有理由在已经走向民主的以色列取得一席之地。他不认为以色列需要“开放”。

但是别人并没有因此放弃努力，极力说服他到以色列看一看。

*

*

*

1993年秋，以色列宣布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秘密谈判，希望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以色列经济学教授古尔·欧佛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于是写了封信，请索罗斯重新考虑到以色列一游之事。

“阁下应该还记得，我们谈过，但你拒绝到以色列一事。”欧佛写道，“过去几年中以色列已经历非常重大的经济改革，而且我们将要拥有和平。此时应当重新思考您和以色列的关系。”欧佛写的信便如石沉大海一般。但索罗斯宣布1994年1月将访问以色列，等于间接给他答复。

索罗斯决定造访以色列，或许不是因为对这个犹太国家有了新的兴趣，而是想向整个世界宣示：他不屈服于东欧右翼民

族主义分子的攻击。虽然被指责为替以色列的知识分子效力，索罗斯却想表示这样的抨击不会使他却步。

尽管以色列很希望有像索罗斯那种身分地位的人造访，一些以色列人对这则消息还是相当审慎。这样的审慎态度和索罗斯本人没太多关系，而是和一位叫做罗伯特·麦克斯韦尔的国际金融家有很大关系。几年前，以色列人铺上红地毯欢迎麦克斯韦尔，这个和索罗斯一样，直到年近暮年才发现自己的犹太根源。麦克斯韦尔来访之后，以色列人大感遗憾，原来麦克斯韦尔不是什么好人，甚至可以说是骗子。因此一些以色列人担心索罗斯是另一个麦克斯韦尔，带着他的数十亿美元财富和神秘的金融理财活动，到以色列招摇撞骗。

虽然大部分以色列人没听过索罗斯这号人物，以色列政府重要的官员却听过，而且决定让这位投资家受到最好的待遇。索罗斯离去时对以色列留下正面的印象，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因为只要他在国际金融圈讲一两句话好话，以色列对外国投资人的吸引力便会上升。的确，单是他因商务目的造访以色列这样的事实，以色列的宣传机器便能拿来大作文章，说它的经济正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索罗斯在以色列已有两项小投资，他也到现场巡视。其中之一是吉欧电信公司，经营特别行动广播和无线通讯事业，另一家公司就是英迪格。索罗斯在英迪格拥有 17% 的股份，1993 年价值 7000 万美元，1994 年增值一倍。

索罗斯获准会见大部分以色列重要政治和经济官员，从总理拉宾到以色列银行总裁法兰克尔：索罗斯以前曾和法兰克尔一起共事。拉宾告诉索罗斯，以色列正试着加速推展一些公营企业的民营化工作，很欢迎这位投资家参与。

一天晚上，在地中海岸，特拉维夫北方的赫齐里亚艾凯迪

亚饭店里，他们为索罗斯安排了一场晚宴，全国金融圈约 250 位知名人物到场。索罗斯将对这些人发表演说。黄昏时分，索罗斯问班尼·蓝达，他该讲些什么。蓝达说，听众除了想听他的商业生活，还想听身为犹太人的他，谈谈在今天的以色列感受如何。“把那天我们一起吃晚饭，你告诉我的事，讲给他们听。”索罗斯同意照办。

索罗斯讲了 20 分钟。以往索罗斯大庭广众面前都能侃侃而谈，但这一次，却显得结结巴巴。蓝达说，索罗斯“变得很别扭，含糊其词，口齿不清，且颠三倒四”。这可能是索罗斯第一次站在人群前面，试着以亲身感受的方式，谈自己的犹太血统。要是他始终以身为犹太人为荣，可能就会很顺利地把话讲出来。但是在他长久以来一直掩饰自己的犹太血统之际，一定察觉每一位听众都以身为犹太人为荣，而且其中不少人也可能曾在纳粹大屠杀期间失去亲友。他一定了解，在他怀着犹太人的自我憎恨和否定心情时，他讲的话很难叫人信服或产生吸引力。

在那 20 分钟里，索罗斯把他约一年半前向班尼·蓝达讲过的大部分话，重新讲了一次。他谈到，小时候被朋友叫做异教徒有多么愤怒，一直无法接受身为犹太人的事实，以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对以色列保持缄默，因为他对这个犹太国家没有好感，所以最好什么话都不说。也提到，以色列现在似乎放弃了大民族主义，而且正采取行动和阿拉伯邻国媾和，所以他才能很自在地来访。

他谈到自己的公益慈善哲学，说明以色列一直是向外伸手的国家，但以他的观点，不认为该这么做，相反地以色列是适合投资的地方，不是做公益慈善事业的地方。他无意把公益慈善事业延伸到以色列，但他目前在以色列有两项投资，而且还

在考虑做更多的投资。

对索罗斯的来访，不是每一位以色列人都持乐观的态度。许多以色列人根本不晓得该怎么看待他，听了他那个晚上在艾凯迪亚饭店的演说，他们大为失望。“对那些听众来说，那是个叫人惊愕的晚上，”班尼·蓝达回忆道，“由于他不肯为这个国家贡献一些东西，他们大为失望。”

“很多以色列人对他的演说感到生气，而且是很生气。虽然每个人都了解他很坦白直率，视听众有如自己人，而且说出的都是肺腑之言，但有些人还是不解，何必弄得大家不愉快。他们说：‘我们有过集中营的经历，失去了家庭，并没有变成反犹太主义者。而他却背弃以色列？背弃犹太信念？他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我们得听他要和以色列保持距离的话？’”

索罗斯必须克服很高的期望。有些以色列人期待，或至少抱着一丝希望，想听到索罗斯一掷千金，宣布他计划在这个犹太国家投资多少多少。但至少他提醒以色列人相信，他是精打细算、很认真的金融家。以色列人虽然发现他欠缺支持以色列犹太化的热情，但不得不承认，索罗斯谦逊有礼，不摆架子，不像麦克斯韦尔光讲大话、投机取巧。他们不再拿他和麦克斯韦尔相提并论。

索罗斯现在认为他是研究这个犹太国家的某种专家。访问以色列后没多久，1994年1月11日他来到有线电视新闻网上的“拉利金现场”节目，前联合国大使珍·柯克帕垂克作为来宾之一和他合作节目，柯克帕垂克表示她怀疑以色列和叙利亚可以马上讲和，索罗斯则非常肯定地说：“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他们从内心的深处有了真正的变化。我想，双方会有和平的，因为他们真的想那么做。”

第十五章 九七年重拳出击

1997年7月2日，泰国央行宣布放弃了实行14年之久的固定汇率制，当天泰铢贬值20%。乔治·索罗斯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人物，一只全世界最大的金融游鳄又在四处出击。

1997年7月到10月，东南亚金融市场风起云涌，动荡不安，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的货币先后贬值，股市大幅下挫。进而危及巴西、墨西哥、纽约、伦敦、香港等金融市场。顿时全球金融界一片混乱。

乔治·索罗斯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人物，一只全世界最大的金融游鳄又在四处出击。

自从1992年英镑事件一举扬名之后，索罗斯着实过了几年休闲日子，除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他和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有几次面对面的讨论外，他一直在忙着自己的哲学。

1995年索罗斯在个人名誉上获利颇丰。先是索罗斯的又一新著《超越索罗斯：走在曲线之前》获得出版。此书的出版当时轰动出版界和金融界，随之而来的是，世界上两所最著名的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 and 美国的耶鲁大学先后在95年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一转眼到了1997年，索罗斯——这只金融界的大游鳄在几年的休养生息后又发觉自己需要活动活动筋骨了。

突破口在哪里呢？

索罗斯站在世界地图前沉思，他知道自己“大起大落”理论在此时已选择地落在了这几年创造出世界经济奇迹的东南亚。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索罗斯翻出了几盒录相带，轻轻地打开了录相机，电视上出现了李光耀、马哈蒂尔等人，对于他们，索罗斯一直很留心，因为在他心中这两位强人无疑是东南亚经济奇迹的核心缔造者。他们都在英国最好的大学获得过博士学位，在国际上颇受尊敬。索罗斯也曾在几次国际会议上和他们握过手。

面对东南亚，此时的索罗斯现出了为难，可是目标已经选准，索罗斯是很难说服自己退却的。他拿起了专线电话，想和德鲁肯米勒聊一聊。

“铃…铃”深夜时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被吵醒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只有索罗斯才会这时候给他来电话，这种事从1992年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这次又是什么重大的事情呢？

德鲁肯米勒轻轻地举起电话，索罗斯只说了一句话：“斯坦利，明天我们一块研究一下东南亚吧。”

然而就是这句话却让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当晚难以入眠。说实在的，有时斯坦利不能不佩服索罗斯对市场超乎寻常的直觉。尽管从他接手量子基金几年来看，每年的增长率已经超过索罗斯自己掌管基金时的增长率。然而斯坦利常常在内心深处追寻索罗斯的投资哲学和投机哲学。

东南亚的事，量子基金也不是没有参与过，然而斯坦利·

德鲁肯米勒也有他的担忧。因为在那里，他曾经有过败运。

说起来，那是在 1995 年末，当时泰国的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呆账、坏账大量增加，而其出口增长率却大幅下降，国家收支失衡。斯坦利悄悄地购入了相当于几亿美元的泰铢，而后在市场上大量地抛售泰铢。

然而德鲁肯米勒在 95 年末却没有得手，由于 94 年末到 95 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余波未平，泰国也加强了警惕，因而泰国央行早做好了准备，在斯坦利刚刚出手之时就骤然提高利息，并取得了东盟其它几国的支持，在 95 年 11 月的 8 天时间里，终于让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无功而返，统计下来，在那次对泰铢的袭击中量子基金损失了近 7000 万美元。

这件事情德鲁肯米勒一直耿耿于怀。这次老板准备“关注”东南亚，也是正中下怀。并且德鲁肯米勒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次他和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又将扬名全球。

干！

这就是第二天索罗斯和自己的爱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会后最后得出的结论。

为这个问题，索罗斯近一个月已经考虑了许多种方案，现在他拟出一个行动方案，基本上和上次英镑事件一样，那就是利用政治因素出击！

和斯坦利·德鲁肯米勒研究过之后，索罗斯沉沉地坐在沙发椅中，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冲着德鲁肯米勒高声说：“让全世界人都把目光转向东南亚吧！”

一场无声的战斗已经开始，那在世界漫游的幽灵笼罩在东南亚各国的上空。这次索罗斯准备先从泰国开始。

*

*

*

对于这次出击，索罗斯十分谨慎，他准备分两步走，一是

准备阶段，包括屯积泰铢等东南亚货币以及利用政治上的因素搅乱东南亚各国政府的注意力；第二阶段将是突击获利阶段。

在第一阶段时，索罗斯让斯坦利·德鲁肯米勒着手屯积货币，而他则关注政治上的事态演变。

正巧此时美国和东南亚过不去，双方在缅甸加入东盟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

事情还得从缅甸说起。当缅甸政府接受了大毒枭坤沙的投诚后，1996年美国要求缅甸将坤沙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缅甸政府从维护本国尊严出发，拒绝了美国的要求。此后，美国就以“人权”为借口，对缅甸实行“经济制裁”，强行命令在缅甸的美国公司撤走。

索罗斯从中嗅到了搅乱东南亚的好味道。因为索罗斯在东南亚的情报网在96年中及以后一直给他提供东盟国家将接受缅甸成为新成员的报告，并且从各方面验证这件事情将在97年东盟外长会议上予以解决。

这真是一个难觅的切入点啊！

索罗斯是太了解美国政府了，他心里明白，只要东盟接受缅甸，那么美国一定会暴跳如雷，到时候东南亚各国又不会让步，好戏就有得看了，那时他的量子基金再乘虚而入，东南亚政府就没有太多精力和他对抗了。

分析形势之后，索罗斯断然和美国政府站在一边。1997年1月，索罗斯在欧洲布达佩斯发表演讲，随美国政府的调子，猛烈抨击缅甸，甚至呼吁西方各国停止对缅甸的支持，不要到缅甸投资，就连旅游也不要选择缅甸。

在东盟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同时，索罗斯开始利用他的宣传机器在市场上造势，谣传泰铢将被强制贬值，一时东南亚市场上十分紧张。

2月,索罗斯指示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出击,于是量子基金做空泰铢,大量抛售手中压积的泰铢。几天之内抛出相当于1亿美元的泰铢。国际上有几万个避险基金敏锐地从市场感受到了风吹草动背后的电闪雷鸣。一时泰铢抛售成为热潮,连泰国国内人员也担心泰铢将被强制贬值的谣传成为现实。

泰国中央银行为了捍卫泰铢地位,只好动用外汇储备,用美元大量地买进被抛售的泰铢,折腾了两个星期,耗费了20亿美元,才算把这次风暴平息下来。

一切都正如索罗斯预料的发展着,尽管2月份量子基金在抛售中损失了近500万美元,但索罗斯却又一次露出了笑容,他把这次抛售称为“演习”。从中他清楚地知道这次只要不出意外,他赢定了。因为他明白泰国包括东南亚其它各国的货币体制在这次风暴中已表现出弱不禁风的“体质”。

*

*

*

索罗斯基金负责东南亚事务的科恩早在1996年就给索罗斯和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提供了一份详细报告,科恩指出东南亚的可乘之机首先在于东南亚各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过快,在快速引进外资的时候,未能配合以行之有效的调控措施。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指出,如果能有效地动员国内的储蓄以满足国内的经济建设,或者说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对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形势来说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可以减轻这些国家对外资的过分依赖。

90年代以来,泰国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1990年4月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的义务,取消了对经常项目国际支付的限制。1991年,还减少了对资本项目交易的外汇限制,1992年对外资开放,允许国内投资者直接通过银行获得低息的外国资金。1994年进一步放松了

这方面的限制，放宽出入境时可携带的外币限额；允许持有泰国离岸银行执照的外国银行在曼谷以外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将被允许拆借规定限额的泰铢，等等。但是随着经济不稳定因素的增强，泰铢贬值增大压力，较为自由化的资本项目管理措施使外汇投机渠道更多，从而加剧了投机者对泰铢稳定性的冲击。

几年来，泰国外资的流入无论在量上和质上都已经严重失控。1992年泰国的外债为200亿美元，但到1995年底已增加到了750亿美元，1997年2月份更高达90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它国家，菲律宾为54%，印尼为47%，马来西亚为39%。尤其严重的是，流入东南亚各国的外资有将近四分之一属于短期贷款。

过分依赖外资，虽然使泰国经济“繁荣”一时，但同时也使国内资金膨胀，导致经济过热。过多的资金盲目流向房地产业，刺激房地产投资，造成严重的供求失调，增加了银行的坏帐风险。1996年，房地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泰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到1997年1月份，泰国900亿美元外债中有700亿美元为私营部门所欠，其中大部分又投向房地产项目。泰铢的稳定刺激了地产类投资，地产供应严重过剩。其时，全国积压的房屋已达85万套之多，再加上高利率影响，泰国出现了连续四年多的地产低潮，银行系统承担的房地产公司的坏帐日益增加，到1997年1月时已达155亿美元之巨。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印尼雅加达的商业建筑的空房率已达13.7%，而且还在攀升，银行贷款总额的20%是直接投入地产业的。在菲律宾，地产业的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11%。马来西亚吉隆坡商业建筑的年增长率大约为9%。

建立在投机泡沫和大规模举债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最终会走入死胡同。当宏观经济的变化影响到收益时，外国资本尤其是投机性质的短期外资会像它们当初进入该国时那样，迅速而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个国家和它的货币。出于逐利的本性，他们始终是“始乱终弃”的过客。

科恩在给索罗斯的报告还指出东南亚各国汇率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当年击垮英镑汇率制度的环境。

第一，由于美元是世界性储备货币，许多国际贸易都是用美元结算的，而东南亚国家的货币政策是使本国货币同美元联系在一起，这是货币管理体系中的一个结构性缺陷。

1995年4月以来国际上美元汇率持续走强，由于日本是东南亚的主要竞争者，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被迫追随美元对日元比价的升降趋势。亚洲各国的外汇同日元的比价实际上已过高了，这就使与美元挂钩的各国出口出现滑坡，加剧了经常项目逆差。科恩收集的统计数字表明，从1995年至1996年，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的总体出口增长率从22.8%下降至5.6%，下滑近70%，受出口大滑坡的影响，东亚及东南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了将近一个百分点，导致经济严重的不稳定。

第二，东南亚各国汇率的确定主要是以美元为主导货币，而且汇率的波动幅度较小，导致汇率制度缺乏弹性。这种情况尤以泰国为甚。从1993、1994年泰铢汇率的实际波动情况来看，其月变动率仅为0.15%至0.16%，这种缺乏弹性的盯住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直接投资，但严重限制了中央银行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操作空间。1988年以来，资本开始大量流入泰国，使泰铢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由于泰国央行限制泰铢升值幅度并在1993年年终前实行中和干预，导致了国内

利率与国际利率差异不断扩大，进一步吸引资本流入。在泰国央行放弃中和干预后，资本的大量流入促进国内货币供应扩大，这又进一步刺激国内需求及对非重要部门投资的增加，使央行难以实行有效的货币政策，损伤了国内经济。

其它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虽然允许大幅度的浮动，但由于政府都对汇市和汇率进行强烈的干预，企图长期维护一定水平的心理价位，因而其汇率政策也是缺乏弹性的。

第三，东南亚各国在放松资本项目管制的同时没有对汇率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一般认为，自由的资本交易不能与人为固定的汇率长期并存。因为实行汇兑管制是为了维护在市场上看来已高估的汇率，东南亚各国在没有强健的国际收支状况和灵活有效的汇率体系的条件下实行资本自由化，使汇率不能自动调节。在这种允许资本自由进出的情况下，科恩认为投机商只要冒较小的风险就可以在市场上进行投机。

科恩的情报系统还发现东南亚各国尤其是泰国，缺乏对金融部门的有效监管。泰国过早地开放了资本账户，中央银行却对外国银行的离岸业务和金融交易监管不力。由于泰国资本帐户开放度较高，非居民可以较自由地参加本地市场的交易活动，而中央银行的监管工作却不及时。索罗斯在2月份的“小试牛刀”中证明了这一点，当时量子基金发动部分国际新闻力量先广造舆论，谣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明确要求泰铢贬值，并有大量外国资金介入，通过离岸业务找泰国本地银行借入泰铢，利用外汇远期和利率互换交易，进行了周全、隐蔽的准备，并有预谋地组织了在外汇市场沽泰铢买美元的突然袭击。而泰国央行处于信息不对称和资金杠杆能力不对称的地位上，事先没有及时觉察，随后索罗斯及跟风的几百个避险基金突然发难，泰国央行措手不及，同时由于市场上泰铢流动性严重不

足，央行调控货币市场能力不足，最终草草收场。

另外美国研究东南亚的经济学家杰夫·福斯特曼还发表文章指出，东南亚各国经济结构调整存在严重的滞后，“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曾一度使东南亚新兴国家以惊人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但是，由于东南亚国家在维持经济高增长率的同时并未重视经济结构的调整，未能及时完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以及将工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劳动力素质及技术水准并未随着工资转移而提高，东南亚的出口优势受到了挑战。

出口停滞及滑坡，使东南亚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1991—1995年泰国出口增长率为18.7%，而1996年为零，经济增长率也从以前的年平均9%减缓到6.47%。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的出口增长都变缓，出口增长放慢使东南亚各国的经常帐户赤字剧增。国际上认为经常帐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安全下限为5%，而泰国1996年这个比例达到8%，马来西亚为6%，印尼为4%，菲律宾为2%（需要指明的是，菲律宾削减赤字依靠的是海外劳工汇款这种不稳定的收入）。

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开放，全球经济渐趋一体化的今天，某种经济模式的有效周期将越来越短，如果一国不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使其市场与产品结构更接近动态相较优势，就会坐失良机，使经济持续发展成为空话。

*

*

*

一晃两个月又过去了。这两个月中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已经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东南亚。而索罗斯则一直静静地等待着，终于机会出现了。

4月27日马来西亚外长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发表讲话，不管美国采取什么政策，缅甸的东南亚邻国将根据它们

自己的利益决定是否允许缅甸加入它们的地区组织。巴达维认为美国一直避免同缅甸军政府接触，美国甚至禁止美国公司在那儿进行新的投资。巴达维强烈地指出，缅甸是东盟的邻国，东盟比美国更了解缅甸的情况。

当晚泰国总理差瓦立和财长庵雷·威拉旺讨论货币政策问题时，仍然做出了比较乐观的估计。于是他马上接通了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热线电话……

随后，马哈蒂尔在5月4日发表强硬讲话，敦促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反对由富国统治而“穷国仍然没有发言权”的世界秩序。他说：“我很感激许多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穷国的真正关注和合作，但我必须警告它们，它们总要做一些对我们没有好处的事情。”

索罗斯的嗅觉发现了异常气味，他从各方面印证泰国已经从2月份的泰铢事件中“解脱”出来了，现在差瓦立的注意力又分散了。

索罗斯又一次深夜打电话，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平静地说：“这一次准备出几乎重拳！”

马哈蒂尔5月4日讲话的话音刚落。世界各地金融界人士又在悄声谈论泰铢贬值的传言，可是这个传言从哪出来却没人能捉摸得到，只有索罗斯悠闲地坐在沙发椅上，品着咖啡，心满意足地回味着1992年的英镑事件，——制造传言并把它最终变成事实早已是他的拿手好戏了！

5月12日，索罗斯对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下达了最后指令。于是随后的几天内，量子基金大量抛售泰铢，市场上泰铢对美元汇率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并一度下探到1美元兑26.6泰铢的低点。

这回泰国总理差瓦立坐不住了。5月15日他和财长庵雷·

威拉旺紧急讨论泰铢危机，最后决定借助新加坡和香港的力量。

从5月16日起泰国央行联合新加坡和香港金融当局同时干预亚洲地区市场，支持泰铢汇率，并大幅度调高利率，曾一度将隔夜拆借利息由10厘左右调升至1000—1500厘，又严禁泰国国内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临时分割离岸与在岸市场，三管齐下，终于使随后几个交易日中泰铢兑美元走势逐渐走稳。

这回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感到遇上了强劲的对手。新加坡和香港金融管局的“职业选手”，他在过去有所接触，并曾有过“挖”几个到量子基金的想法，只是后来业务发展占用了不少时间，所以一直没有联系此事，这次他们借用泰国的外汇储备，并利用拆借市场禁入，着实是从容不迫，防守严密。使得斯坦利十分发愁。

索罗斯也同样地发愁，这次本想重拳出手一举击垮泰铢，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量子基金又损失了1000万美元，如果下面新加坡和香港仍然这样卖力的话，自己的计划就要大打折扣。

索罗斯出现了几年来少有的沉闷。

这边，泰国内阁也在发愁，特别是总理差瓦立，本来多党联盟成立的政府内阁就十分脆弱，现在泰铢出现几年来少有的动荡，国内舆论哗然。前总理川·立派领导的民主党更是尽情嘲笑刚刚上台六个月的新内阁。

5月25日，差瓦立又一次神情严峻地和财政部长庵雷·威拉旺讨论货币问题。庵雷·威拉旺此时更是压力重重，他有预感这次他可能成为泰铢危机的牺牲品，但是这位年轻时曾留学美国的中年人是不会轻易屈服的，早些时候他已经从过去的朋

友处了解到这次麻烦的制造者是量子基金的索罗斯，他准备和这位金融界的“坏孩子”来一次较量。

6月2日，庵雷·威拉旺指示泰国中央银行发布通告，要求泰国的金融机构必须停止货币互换信贷和利率互换、远期汇率协议或者货币与利率选择权协议，其目的在于防止投机者囤积泰铢，因为经过前几天的“保卫战”，索罗斯等人手中的泰铢已有很大消耗，另外庵雷·威拉旺还通过中央银行要求金融机构必须每天详细报告外汇交易情况和保留有关票据，包括合法出售泰铢的票据。

6月2日晚，庵雷·威拉旺在公布这些通告之后，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轻松地休息一晚上了。

然而，他只对了一半！

索罗斯在泰国时间6月2日了解到这些通告时的确是吓了一跳。虽然这些措施也在意料之中，然而却来得太早，而且他想像得更彻底，通告等于使泰国又回到了以前金融市场不开放的状态。不过此时量子基金的帐上仍然有近50亿的泰铢货币协议，而在其他一些跟风的基金人手中有多少泰铢则谁也不清楚。索罗斯微微一笑，放下手中的咖啡轻轻地说：“我是上帝，只要我出动，谁还能不跟着我，区区泰国……。”

6月2日的通告也在泰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企业财务经理们感到很委屈，因为他们同非投机性代理商的交易也将因此受到伤害，而外国人则感到很难在泰国股票市场上为他们的投资保值。然而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在泰国国内开始传播的令人担心的消息，许多人都十分确信地说这回泰国可能担不住了，否则中央银行也不会采取这样“彻底”的措施，大家都尽快把手中的钱换成美元吧！当差瓦立的幕僚了解到这些情况，并要求各地方官员维持民众情绪时，老百姓反而被激怒了，几天

后，曼谷街头出现了“庵雷·威拉旺是个蠢蛋”“差瓦立下台”的小标语，一时人心惶惶。

这回可轮到索罗斯暗暗高兴了，本来他唯一担心的就是差瓦立和庵雷·威拉旺仍然那样坚定地和他对抗，联合新加坡和香港，那样的话，索罗斯就准备举手投降了，因为现在市场上的跟风者还不是很多，而观望的人却很多。

索罗斯仍在等着事态的发展。

当曼谷街头出现“庵雷·威拉旺是个蠢蛋”的标语时，索罗斯又故伎重演，在市场上散布庵雷·威拉旺将下台的传言。量子基金情报处的人员还鼓动一些人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言论认为泰国中央银行的通告是一种无知和危险的政策，一时泰国国内外舆论哗然，反对党民主党更是变本加厉地嘲笑现内阁的金融政策。

索罗斯开始动用相当于 50 亿美元的泰铢存量中的 20 亿，配合着市场传言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轰炸。泰铢汇率随之又出现动荡。

6 月 18 日，差瓦立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会上一片沉默，庵雷·威拉旺的确很委屈，但他明白此时差瓦立和他都无能为力，而且他自己这几天头痛得厉害，如果只考虑财政金融问题他是不能出现头痛的，现在差瓦立这位多年的老友自身难保，他觉得今天开紧急会议的目的并非讨论如何对付索罗斯，而是如何对付国内压力，特别是来自反对党民主党制造的压力。

会议开了半小时，一点进展都没有，差瓦立无奈地看看大家，又转头瞧了瞧庵雷·威拉旺，轻轻叹了口气又转回头去。

庵雷·威拉旺内心翻山倒海。又过了十分钟，他终于拿定主意，首先打破沉默，因为他明白今天他是这儿的主角，大家

都在等他，庵雷·威拉旺清了清嗓子说：“这次泰铢出现问题，跟我有关系，目前国内压力很大，我仍坚持目前我宣布的一些政策，但我已决定辞去财政部长的职位。”

差瓦立十分地难过，这位多年的战友终于因为自己的内因而做出如此大的牺牲。然而……当晚庵雷·威拉旺推荐自己的副手他农担任财政部长。

第二天泰国新闻报道了庵雷·威拉旺辞职的消息。索罗斯大喜，市场上对泰铢贬值的预期得到了近几个月来最确凿的印证，大家纷纷大规模抛售泰铢，泰铢汇率猛跌到1美元兑28泰铢左右，泰国股市急挫4.48%，跌到了461.32点，创下了8年来的最低点。对于索罗斯来说，胜利在望。

6月23日，泰国新任财政部长他农宣誓就职。

6月25日，差瓦立公布了到1998年9月的新财政年度预算。这份376亿美元的预算将大幅度削减开支和增加收入，以便在经济衰退之时使预算达到平衡。

然而议员们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个目标是根本不可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为此议会在随后的3天中对差瓦立提交的这份预算报告进行了辩论，同时反对党对政府的所谓缺乏财政纪律发起了猛攻。

他农和差瓦立这几天面对强弩之末的泰铢走势实感无奈。他农在当日宣誓就职时就已经认识到这次他出山只是收拾残局，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在私下打电话时，他农和差瓦立已经在考虑放弃现行的固定汇率制。

索罗斯的神经这几天也紧绷着。泰国国内已经乱成一团，现在他最担心的就是东南亚其它区域的干预，尤其是新加坡和香港那帮职业选手和强大的外汇储备，6月27日晚，索罗斯有点坐不住了，他紧急给德鲁肯米勒打电话说，现在是最后关

头，成败只在这几天，一定要果断。挂断电话之后，索罗斯自己也倒吸冷气。这次如果失败，他的基金将损失 20 亿美元。而这几天如果泰国跌跌撞撞地挺过去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一定会反应过来并及时帮上一把，到时候，他就可能毫无挽回的余地。

对于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又一次不得不佩服索罗斯的“豪赌”，凭着多年的经验以及对于 1995 年末一箭之仇的铭记，斯坦利·德鲁肯米勒这次是干定了。

28、29 日是休息日，索罗斯和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在静静地等待；在地球的另一边，差瓦立、他农则陷于政治攻击的重重包围之中，其它东盟各国想给予支持但因涉及到内政这一敏感问题，只好袖手旁观。

30 日一开市，泰铢当即受到重创，无力支持 1 美元兑 27 泰铢的支撑位，市场抛售之风猛涨。泰国中央银行苦苦支撑。

第二天也就是 7 月 1 日，泰铢又一次跌破 1 美元兑 28 泰铢的价格，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这十多天来泰国中央银行已经付出了 50 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沉重代价。

他农只好通知差瓦立，再这样下去几天，泰国将损失惨重。差瓦立早有所料，当晚又一次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外人至今不知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但开完会后，所有内阁成员无不面色严峻。

7 月 2 日，泰国央行宣告泰国将实行管理式自由浮动汇率制，放弃实行 14 年之久的泰铢对一揽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

当天泰铢贬值 20%。

索罗斯和斯坦利·德鲁肯米勒高呼“我们又赢了！”

至此，一场持续半年的战役宣告结束。

然而等待东南亚人民的决不仅仅是这些，这只是个序曲。

第十六章 泰 虎 落 难

泰铢的贬值使东南亚各国都慌了手脚，多米诺骨牌纷纷倒下。香港特区、中国政府各给予 10 亿美元的贷款，然而泰国国内却政局动荡，总理差瓦立无法支撑局面，只好辞职。

泰国央行改变泰铢为浮动汇率制，泰铢应声大跌，泰国人眼看着手中的存款急速变薄，为了对抗突然来临的通货膨胀，泰国人疯狂抢购黄金，曼谷金条零售价由周初的每条（15.2 克）4150 泰铢，在短短数日内狂飙至 4450 泰铢，涨幅高达 7.2%。分析家指出，曼谷金价大涨不是单纯的供求关系，而是不受欢迎的汇率制度下的产物。

7 月 3 日澳大利亚央行突然宣布大量抛售黄金储备，国际金价大跌至近 12 年来的最低价，且一时之间恐难止跌，泰国人闻讯实在搞不清楚自己买黄金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就如同分析家所说，自从泰国央行宣布泰铢为浮动汇率制后，泰国人大为恐慌，不是身在其中的人是无法体会当时情况的混乱的。传统上当泰铢暴跌时，泰国人都购买黄金寻求避险，例如 1973 年国际石油危机和 1979 年泰铢重贬，而事后都证实泰国人的选择是对的。这一次，事实证明他们也是做出了正确的选

择，而那些对政府抱有信心的人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财富的自动流失。

而同时，外国的银行则纷纷削减对泰国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额度。他们宣布不再向当地银行和金融公司提供新的信贷，而且只有泰国地位最高的 5 家银行的现有贷款可以“以很高代价”延期偿还。

泰国一位银行业分析家说，外国银行作出上述反应的部分原因是，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关闭 16 家金融公司，并限制泰国对债权国的债务。他说：“人们对（泰国）铢的信心仍旧十分动摇。”一些研究机构预言，铢对美元的汇率明年将跌至 32:1，甚至 35:1。

7 月 3 日，泰国中央银行行长猜亚瓦表示，泰国将谋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帮助，学习如何控制货币的浮动。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斯坦默说，选择澳大利亚在这方面当顾问是最好的，他说：“澳大利亚的经济是中等规模的，在许多方面比美国、德国和日本更贴近于泰国的经济状况，因为美德日的经济规模都比较大。”在这之前，泰国货币一直是一种管理货币。

尽管如此，泰国国内仍然一片悲观气氛，而国际游资仍然在抛售手中的泰铢，尽管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从做空中获得了近 3 亿美元的利润，他却准备从泰国撤出，进一步在东南亚其它国家扩大战果。他知道这时候已经没有谁有能力挡住这已倒下第一张的多米诺骨牌。

而在泰国国内，货币危机和经济混乱却并没能平息政治上的风暴，执政的多党联盟仍然无法获取反对党民主党的谅解和支持，双方的矛盾在愈演愈烈的泰铢贬值中也变得越来越激

化。

7月底到来的时候，泰国总理差瓦立和财政部长他农·比达亚终于感到国际援助已不能仅限于技术上的支持，他们现在最急需的是金钱，以稳定国内民心的波动，同时只有大量注入金钱才能使已陷入绝境的大量金融公司和银行起死回生。

7月2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派出了一个5人代表团抵达曼谷。这个代表团成员在华盛顿临行前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铢稳定在30铢兑换一美元的水平，即不使铢的贬值超过它在7月2日浮动以前价值的15%。为此他们提出一揽子援助计划。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

- 泰国货币自由兑换，取消泰中央银行在5月建立的泰国铢境内和境外市场之间的壁垒。

- 尽管预料进口税和公司税收入可能降低以及举债筹资的费用可能提高，但仍需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从而把预算赤字保持在最低限度。

- 限制工资增长，包括冻结最低工资的增长，以防止货币贬值的成本效益受到通货膨胀影响。

- 改革破产法和银行规章以增加透明度并使资本分派更有效。

- 对金融制度给予一次性紧急救济。

尽管泰国政府对是否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迟迟不明确表态，但是财政部长他农·比达亚已不再坚持说，泰国铢在7月2日实行贬值后并不谋求国际援助。他承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五位官员已从华盛顿抵达曼谷商谈一套经济措施，包括数额不定的信贷。他说，内阁将在8月5日批准经济方面

的一揽子方案，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贷额。

他农对记者说：“我们需要专门知识，我们需要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也需要在国内外恢复信心。在这之后，清偿手段问题将得到改善。”他说，信贷额将用于支撑泰国货币、保持清偿能力和增加泰国的外汇储备。

他农说，信贷额度和哪些国家或机构提供信贷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政府的一位高级顾问说，政府需要 200 亿美元的信贷额。分析家估计这笔信贷只有较少一部分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其余部分的可能有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政府或私人机构。

另外，泰国总理顾问素拉沙对《曼谷邮报》记者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泰国的通货膨胀率应在 7% 以下，而且经常项目赤字总额应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7%。《曼谷邮报》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的其它主要内容包括，加速实行泰国的私有化计划和允许外国在泰国商业银行持有的股本高于目前 25% 的限额。素拉沙当时透露，泰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最大矛盾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认为，不应再帮助陷入困境的泰国金融公司摆脱困境。而泰国政府从本国民众利益出发却认为，向这些公司提供帮助是必要的。

尽管在 8 月 5 日内阁会议之前泰国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5 人小组却是有备而来，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8 月 5 日，内阁会议上，泰国政府无奈地同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自向墨西哥提供紧急救援资金后最大的一项救助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提供 120 亿至 150 亿美元的信贷限额，以防止泰国的金融业全面崩溃。

这项一揽子计划包括为泰国混乱的金融业采取切割手术，

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关闭因房地产贷款出现坏帐而失去资金的 42 家金融公司。政府还将把增值税率从 7% 提高到 10%，这将提高平民购买商品的价格，有可能加重通货膨胀。

在传出关闭金融公司的消息后，泰国证券交易所的指数猛跌了 22.51 点 (3.4%)，降至 641.31 点。所有银行业和金融业的交易立即中止。到收盘时，指数有所恢复，达到 648.47 点，全天下跌了 15.35 点 (2.3%)。

这项交易中最苛刻的部分是关闭 42 家处境困难的金融公司，致使自 6 月开始倒闭的金融公司的总数达到 58 家。这样的公司以前曾有 91 家。

泰国中央银行行长猜亚瓦说，为了让金融公司维持下去，中央银行已经借出 5000 亿铢 (156 亿美元)。

宣布的其它措施包括，政府保证不让外汇储备低于 250 亿美元。最后一次从中央银行得到的数字是，6 月份的外汇储备为 324 亿美元，比 5 月份的 333 亿美元下降了。

财政部长他农·比达亚在内阁会议后说，救助计划将使生活在短期内变得比较艰难，但是政府认识到需要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来恢复对泰国金融业的信任。泰国金融业现在正因国内外债务过多而面临垮台的威胁。

他说：“对泰国来说，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要能恢复经济局面，恢复国际社会的信任。”

对于这一番明显是安慰国人的讲话，泰国国人只能是无奈，而民主党人在议会上则更加有力地指责差瓦立政府无能。

*

*

*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七一”回归后的香港特区和中国政府随后也参与了援助泰国的一揽子计划。

8 月 5 日，在泰国内阁同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援

助计划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即牵头，召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亚太地区多家中央银行参与讨论，决定向泰国提供 160 亿美元的贷款，以协助泰国稳定泰铢汇率，进行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

刚刚回归祖国的香港特区在 8 月 11 日决定首次动用外汇基金，向泰国提供 10 亿美元贷款，参与援助泰国的贷款计划。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认为，香港是亚洲主要的金融中心，面对邻国受到货币不稳的压力，香港不能袖手旁观，而且，这样做有利于稳定货币的环境，对香港贸易和金融都有裨益，因此香港决定动用外汇基金援助泰国。他表示，向泰国借贷 10 亿美元，风险不大。

曾荫权指出，任何炒卖活动的蔓延，都会波及其它国家和地区，不排除严重外汇炒卖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能会影响到香港。但香港有超过 800 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加上没有对外借贷，因而，他对捍卫港元很有信心。他认为，参加这种联合借贷计划，对于根治将来的炒卖是值得的。

8 月 14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通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将参加由该组织牵头，旨在帮助泰国摆脱目前经济危机的 160 亿美元贷款的一揽子计划。戴相龙说，中国将保证注入 10 亿美元。他在发表讲话时说，中国人民银行此举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国际上的货币稳定。但他也明确表示，外交也是作出这一贷款保证的一个因素。

对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一举措，一时外电反应强烈。

分析家们都认为，中国参加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助的营救泰国的一揽子计划，标志着该国已成为亚太经济中一个成熟的金融大国。

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一项多边的金融营救工作。一个国际

金融组织驻北京的代表说：“中国当然没有仓促作这一决定。因为它深知，要想成为不可忽略的地区金融大国，就必须参加工作。”

他说：“这并不等于中国宣称自己成为经济上的超级大国。但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北京想要占据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所应得的一席之地。”

他还说，北京的这一决策还可能使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更为顺利。

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的增长，但是，其邻国出现的货币贬值和混乱将削弱中国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分析家们说，拥有 1200 亿美元外汇储备、且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完全有能力提供 10 亿美元紧急援助。

香港一家公司的分析家西尔说：“我认为他们与地区中央银行合作将对他们十分有利。”

分析家们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并没有受到地区货币不稳的影响，它总的经济状况比大多数国家都好。

一位驻北京的外交官说，中国通过帮助泰国，可以指望泰国支持它采取逐步和谨慎地开放经济的政策。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中，有的国家指责中国，只想加入后得到好处，而不愿意承担义务。中国这次破例与其它国家一起参加对泰国的紧急援助计划是想消除人们的这种印象。

*

*

*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十分高效，泰国铢的疲软走势似乎还足已成定局，而同时其国内的政局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8月16日，总理差瓦立公布了改组后新内阁的名单，新内阁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由差瓦立提名增加了几位负责经

济的副总理。

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负责监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执行的新任副总理威拉蓬·拉曼古拉指出：“今后三个月将是非常关键的。”他是 80 年代炳·廷素拉暖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时的财政部长，也是 1984 年货币贬值的发起者。他是泰国最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想法接近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想法。几个月来，他一直对泰国的银行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批评，但是在庵雷·威拉旺辞去财政部长一职后，他却拒绝接任此职。据当地报界说，是一些军人（人们一直担心他们可能搞政变）说服威拉蓬·拉曼古拉进入内阁的。

这次内阁改组的另一个角色是他信·西那瓦，他被选中是由于他在商界的影响。这位 48 岁的商界巨头是西那瓦电信帝国的老板，他也被任命为副总理，专门负责商业和基础设施计划。他主要是同商业部长纳龙猜·阿加萨尼合作，共同对付通货膨胀（今年可能达到 7—8%）。同威拉蓬·拉曼古拉的任命相反，他的任命主要是联合政府政治协调的结果。某些职位的变动也同样如此，这些变动影响到一些在位的部长，但是对那些被指控为贪污和无能的显贵们的势力却没有真正的触动。

16 日晚，很少干预政事的国王要求新内阁要诚信。这一点很关键。如在海关和金融机构的监督部门这样一些容易受影响的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政治领导人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能力。

新内阁刚刚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送来一份礼物：20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为处于困境的泰国提供一笔 39 亿美元的贷款，并预测泰国的经济增长将是稳定的，但比较慢。它警告说，前面还有危险。

这笔贷款将为国际社会提供给曼谷的 160 亿美元紧急援助

提供方便。泰国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老虎其声望在经过历时很长的金融危机之后开始下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笔贷款的同时发表一项声明说：“泰国政府 1997 年至 2000 年的政策框架……旨在初期恢复信任和稳定经济，并为在中期健康增长奠定基础。”

声明说：“但是，要实现这个计划的目标，还有一些风险……在经济增长放慢的情况下，需要坚强的决心，持续进行财政调整和实施金融部门所必需的改组。”

同时，泰国中央银行 22 日公布了对金融机构及其资金的一揽子管理方案，以保护债权人和储户的利益，恢复公众对银行系统的信任。

这一方案将包括短期和中期措施。短期措施有：一、商业银行、信贷和金融公司立即改善管理和增加资金。允许外国公司在资金周转有困难的金融公司中持有 25% 以上的股份。

二、泰国金融机构发展基金继续对 58 家因资金周转不畅被迫中止营业的金融机构提供援助，以使它们摆脱困境。

三、金融公司必须从今年 12 月底起，增加给泰国金融机构发展基金的资金，金额总数从占其储蓄总额的 1% 增加到 1.5%。以后增加到 2%。

四、泰国中央银行还将密切监视金融公司资产的增加情况，任何新的对外借贷都必须得到中央银行的批准。

五、泰国政府将为 81 家金融公司的债权人和储户提供担保，一旦情况恢复正常，债权人和储户将在提出申请和债务到期之日起的 30 天内取回存款、欠款和不超过最高利率的利息。如果金融公司不能做到，泰国金融发展基金将介入，并代为偿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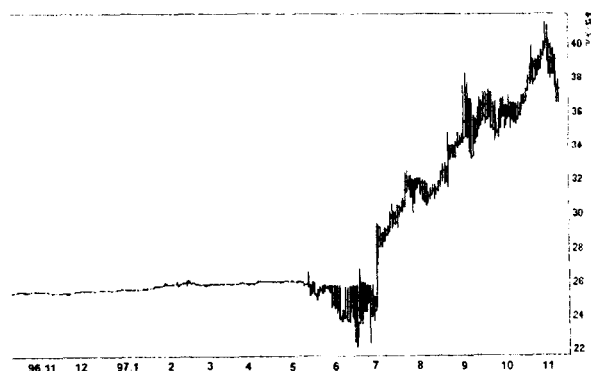
中期措施则包括修改金融机构的税收、财产和债务转移、

合并、接管规章等。

然而，在议会中却有不同的声音。许多来自民主党的议员公开要求差瓦立下台，他们宣称政府现行的政策是向国际强权机构妥协，是在出卖泰国的利益。

当市场的注意力集中在议会关于经济政策的辩论上时，8月28日，泰铢与美元的比价再次下跌，降到了34.40 铢比1美元的新低点。

差瓦立内阁在这样的压力中苦苦支持，时间一晃又过了两个月。



泰铢兑美元汇率变动

10月14日，泰国政府通过了一项进行全面金融改革的一揽子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大量紧急财政援助后，恢复金融稳定，使经济进入长期的恢复阶段。

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威拉蓬·拉曼古拉说，内阁已原则上同意成立负责对境况不佳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金融改革署和接管坏帐的资产管理公司。

据认为,对隐藏着 1.36 万亿铢(370 亿美元)坏帐的金融部门进行改革对泰国货币的稳定至关重要。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紧急财政援助计划提供了 172 亿美元,但是泰国铢还是贬值了 29%。

泰国中央银行行长猜亚瓦·威汶斯瓦迪建议修改法律,这样当局就能在出现危机之前干预金融机构的管理,而不是在情况变得不可收拾时让它们暂停营业。

中央银行已经勒令 58 家金融公司暂停营业,并让它们提交重新振兴公司的计划。根据新规定,金融机构可以被受命划销现有股东的注册资本中的呆滞资产,然后再通过发行新股来增加资本。当局还可以勒令金融公司撤换其主管人员,强迫现有股东接受新的合作伙伴。

财政部长他农·比达亚说,对达到新规定的违反贷款标准的金融公司,政府将根据一揽子计划的规定减少它们的税务负担。

政府还将鼓励没有被停业的金融机构筹集资本,并且禁止它们分红一年。

猜亚瓦说,外国投资者将被允许在被监管的金融公司中持有多数股权(可能最多达到 100%),但是,其股权,通过出售,在 10 年以后必须降至 49% 以下。

威汶斯瓦迪说,泰国经济的基本要素情况依然很好。据政府预测,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2.5%,明年为 3.5%,1999 年为 6%。

他说,经常项目赤字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限额之内,今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明年为 3%。

他说,政府打算将今年的外汇储备保持在 230 亿美元,明年则增加为 240 亿美元,1999 年达到 300 亿美元。

然而，10月31日，市场对不稳的政局再次作出强烈反应，泰铢兑美元汇率跌至41.20铢兑1美元，突破40铢兑1美元的大关，创历史最低水平。反对党和部分工商界人士要求差瓦立总理辞职的呼声渐高，国家发展党内也出现要求退出联合政府的呼声。一场政局变更在紧锣密鼓地开场了，让我们追溯一下差瓦立政府的组成。

差瓦立1996年11月底出任总理，组成6党联合政府，任命国家发展党主席、前总理差猜为总理经济和外交顾问团主席。这样，政府实际上存在两个经济班子，一个是以新希望党支持的副部长兼财政部部长庵雷为首的班子，一个是以国家发展党主席差猜为首的班子。两个经济班子在如何解决当前面临的经济问题上发生分歧，进而演变为争夺经济主导权，使矛盾加深。

今年6月19日，庵雷宣布辞职，军人银行原董事总经理他农被任命为财政部长。4个月后的10月19日他农宣布辞去财政部长职务。10月下旬，政府宣布国家发展党副主席、副总理兼工业部长功·塔帕兰西主持经济内阁会议。国家发展党逐步掌握了部分经济主导权。

面对严重的经济压力和舆论压力，差瓦立于10月24日改组内阁，由于差瓦立打算起用一批经济专家来解决国家的经济困难，故而这次改组幅度比较大，削减了国家发展党两个部长名额，引起该党的不满。

11月3日上午，国家发展党的议员举行会议，决定退出联合政府。3日下午，该党主席差猜宣布辞去总理经济和外交顾问团主席的职务，形势表明，国家发展党将要退出联合政府。

差瓦立总理的联合政府由新希望党、国家发展党、社会行

动党、民众党、自由正义党、群众党等6党组成，在国会下议院393席中占221席，如果拥有52席的国家发展党退出联合政府，5个执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不足半数，联合政府就要倒台。在这种形势下，差瓦立总理于11月3日傍晚在新希望党总部对记者宣布，他将在国会讨论通过6项金融法律和3部与新宪法相关的法律后，晋见国王，然后宣布辞职。差瓦立说，为解决国家经济问题，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辞职是为了政治稳定，国家安定，使经济问题得到解决。

舆论认为，差瓦立力图解决国家经济问题，但力不从心，回天乏术，只好辞职让贤。

差瓦立总理宣布即将辞职后，泰国各政党为组阁展开了紧张的活动。11月3日晚，6个执政党举行会议，表示保持6党联盟，并一致推举枢密院大臣、政坛元老炳·廷素拉暖为新政府总理。77岁的炳曾于1980年至1988年任总理，但炳表示自己年老体衰，婉拒了请他出任总理的要求。接着，执政党联盟派要员联络国会第二大反对党、拥有39席的泰国党。泰国党主席班汉明确表示不参加执政联盟，而和民主党站在一起。

在这期间，国家发展党也暗中与民主党联络企图组成以民主党、国家发展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由于国家发展党坚持要由该党主席差猜出任总理，民主党坚持要由民主党主席川·立派出任总理，两党没有达成协议。

也有消息说，新希望党也曾派人联络民主党，草拟组成以新希望党、民主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是新希望党的一些派系不愿同民主党合作，民主党的一些要员也嫌新希望党内派系多，因此双方也没谈成。

6日，形势发生变化。当晚8时30分，差瓦立发表辞职声明，正式宣布辞去总理职务，辞职自7日零时起生效。执政党

联盟发生分裂，自由正义党主席披匿和社会行动党主席蒙蒂先后宣布脱离 6 党联盟，投向民主党阵营。于是泰国 11 个政党形成以民主党和新希望党为核心的两个政党联盟。6 日深夜，两个政党联盟分别在国会大厦二楼和三楼举行新闻发布会，都宣布已获得足够多数的议席组织内阁。由于双方势均力敌，由哪一个政党联盟组阁还没有定论。

7 日，形势又发生突变，民众党执委越他那、副主席颂汶、秘书长仁攀等 14 名议员，不顾党主席沙马的劝阻，投入民主党阵营。7 日下午，民主党主席川·立派在国会大厦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已有 210 名议员支持民主党为新内阁核心，在国会下议院 393 席中占大多数，因此民主党已取得新内阁组阁权。

8 日，川·立派向国会主席递交了支持民主党组阁的政党 and 议员名单。

以民主党为核心的政党联盟中的各党派一致推选川·立派为新内阁总理。9 日傍晚，泰国国王普密蓬发布命令，任命 59 岁的民主党主席川·立派为新总理。从此，泰国政局又进入了新的阶段。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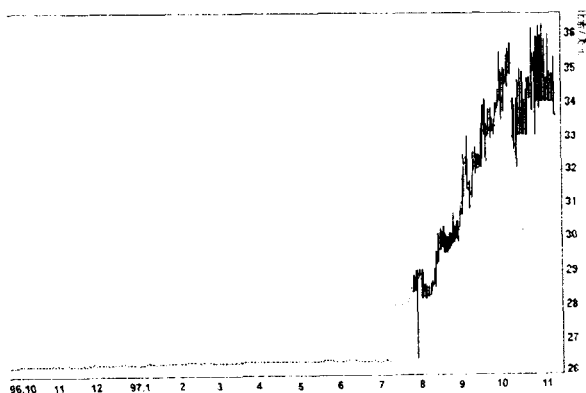
*

由泰铢贬值而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波及到东南亚其它各国货币市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的货币受其冲击，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贬值。

7 月 11 日，菲律宾央行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当日菲律宾比索对美元下跌 11.6%，创八年来的最高跌幅，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等货币 7 月以来也大幅下挫。缅甸元对美元则由 160 比 1 跌至 240 比 1。尤为引人关注的是，连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五的香港，其外汇市场也出现了活跃的投机势力，一些

大投机商开始大笔买进港币期货，以期出现抛空港币的机会。一向币值坚挺，外汇储备强大的新加坡也深受其害。

7月17日，菲律宾政府宣布，它将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7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作出回应：宣称它将向菲律宾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减轻比索所承受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行动，是自从它1995年建立“紧急筹资机制”以来的首次应用。



菲律宾比索兑美元汇率变动

除了东南亚各国，一些中欧国家和拉美国家也受到冲击。马其顿代纳尔7月10至14日下跌16.2%；波兰兹罗提跌6.8%，捷克鲁纳跌6.6%。捷克共和国随即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取而代之以浮动汇率。

同时，在遥远的太平洋的彼岸——西半球也立即产生了反响：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感到了地震，它们的股市普遍出现了下跌，并且风传巴西货币雷亚尔将会贬值。

7月15日圣保罗股市下跌了8.51%，这是因为有传闻说巴西政府将被迫使雷亚尔贬值。

投资者在圣保罗证券交易所抛出他们的股票所引起的恐慌，影响到了拉美地区其它的证券交易所，利马的股市也没能幸免。

7月15日这一天，利马股市的主要指数——总指数和选择指数都下降了5.64%。这是今年以来利马股市下跌幅度最大的一个交易日。

拉美地区其它国家的股市也有所下跌，只是下跌的幅度较小。然而，分析家们说，其它这些股市迅速感到了“桑巴效应”的影响，当天布宜诺斯艾利斯股市下跌了3.38%，墨西哥城股市下跌了1.73%，圣地亚哥股市下跌了1.42%。截止到7月18日，拉美5个主要股市累计下跌的情况如下：圣保罗14.99%；利马6.47%；布宜诺斯艾利斯5.70%；圣地亚哥2.50%；墨西哥城2.10%。

为了对付蔓延整个东南亚的货币危机，7月25日，亚太央行行长汇聚上海召开东亚和太平洋行政会议，共同磋商如何行动。

尽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五国一致同意延长现有的货币互惠信贷协议，东亚和太平洋行政会议还是没有使交易商们感到放心。

会议结束后，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在上海发表一项声明，对基本经济情况作了评述。

其中告诫说：“货币市场的极度动荡可能影响到东亚和太平洋行政会议成员的货币和金融稳定。”这表明他们都意识到保持外汇市场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与会诸国除了再次建议成员执行调整计划和成立一个秘书处以便交流情报和互相讨论外，没有采取任何更强有力

的措施。

与东南亚及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相反，整个7月份，全球发达国家却出现股市普涨的现象。美国纽约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突破8000点大关；从多伦多到米兰的13家证券交易所在7月中旬都同华尔街一起暴涨，以10年来的最高纪录收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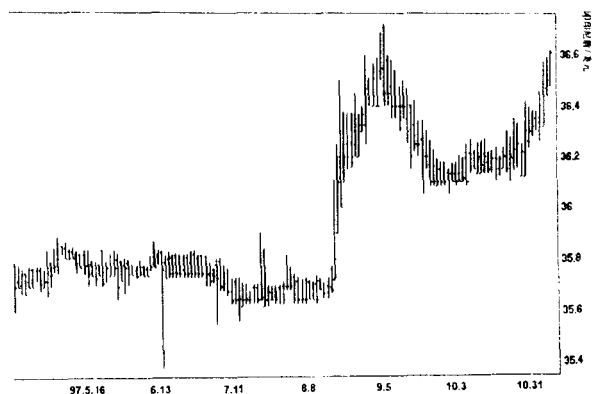
而此时，及随后的8月份，东南亚各国却陷于金融危机的呻吟之中。

索罗斯此时已赚进10亿美元，然而他却还在市场上放出“新鲜空气”用以干扰。8月26日（周日），索罗斯在新加坡发表言论认为，东南亚货币风波预计将在近日结束。索罗斯表示相信，东南亚外汇市场很快便可恢复平静。他还特别透露说，作为“抄底”之举，他已购进了一些印尼盾。当被问及东南亚货币目前的价位是否还存在“高估”的成份时，索罗斯回答说，他认为东南亚货币的动荡程度可以形容为“矫枉过正”。

此言一出，东南亚外汇市场闻“风”起舞。8月25日（周一）普遍反弹。市场上买进美元的意愿立即受到抑制，新加坡汇市25日收市，印尼盾汇价为2695盾/美元，前收市价为2700盾/美元；马来西亚元为2.7710林吉特/美元，前收市价为2.7720林吉特/美元；新加坡元为1.4918新元/美元，前收市价为1.5020新元/美元。

然而，这只是索罗斯放出的缓兵之计，国际上的避险基金经理们早已按耐不住了。

8月28日，避险基金首先打压马币林吉特，马币兑美元汇率跌幅达2.01%，下降到了2.8920林吉特比1美元，是马币自1973年自由浮动以来兑美元的最低点。29日，马币再次贬值，创26年来的新低，从7月2日到8月底，马币兑美元



印尼盾兑美元汇率变动

的汇价已下跌了 14%。在吉隆坡股票市场，综合指数连续一周大幅滑落。28 日，综指曾一度跌破 800 点的心理防线，闭市时以 812.18 点报收，与前一天闭市时比较，大跌 35.74 点相当于 4.22%。当天，虽然马哈蒂尔总理宣布数项措施，包括指示本地资金公司进场吸购、停止借票卖空以遏止卖空活动等，但仍无法挽救股市颓势。29 日，股市综指继续下滑，以 804.40 点收市，在 28 日的基础上再跌 7.78 点。

在短短 4 个月内（5～8 月），吉隆坡股市综指下跌了近 33%，倒退到 1993 年 8 月份的水平。

受马来西亚的拖累，东南亚各国货币 28 日、29 日均出现普遍下跌。泰铢兑美元的比价降到了 34.25 比 1 美元；新加坡元汇率降到 1.5185 新加坡元比 1 美元；印尼盾汇率降到了 3000 盾比 1 美元。

多米诺骨牌效应越来越大，直到 11 月份这场货币贬值危机才有所收敛，但泰铢又跌破了 40 泰铢兑 1 美元的心理价位。

第十七章 马哈蒂尔和索罗斯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名道姓地指责乔治·索罗斯暗中操纵了货币投机活动，从而使当地的货币贬值，其目的是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惩罚。

1997年7月24日东南亚国家联盟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一年一度的外长会议。这次会议引人注目的议题是源于柬埔寨政治危机的安全问题 和有关缅甸加入东盟的争议。

东南亚国家联盟本想在它成立30周年时实现缔造者们的梦想：将该组织成员国数目增加到10个。但是，柬埔寨第二首相洪森和第一首相拉那烈的军事冲突妨碍了这一计划。23日，只有缅甸和老挝被正式接纳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新成员国。

东盟代表着一个巨大的市场：5亿人口（欧盟为3.65亿人口），经济实力相当于日本经济实力的三分之二，产值（按购买力计算）相当于1.6万亿美元，特别是经济增长率引人注目。

然而一个多月来，泰国的外汇市场已经被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折腾得近乎人仰马翻。因此会议一直开得十分沉闷。

东盟现在有9个成员国。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主持这次东盟会议的开幕式时，警告外国不要干预这个地区的事务，

并要求该地区国家对自由市场的改革和信息流动作出响应。

现年 71 岁的马哈蒂尔说：“只要把坚决放弃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就能够以东盟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而确保我们的安全。”

马来西亚是东盟今年的主席国。在谈到亚洲货币急剧贬值时，马哈蒂尔呼吁采取“一致立场”，以便为东南亚国家的货币提供支持。他说，该地区各国家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不够充分。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东盟和美国就该地区安全问题的矛盾公开爆发了。

7 月 25 日，美国政府代表团的一位高级负责人要求东南亚各国使它们的正在贬值的货币“恢复秩序”，并要求这些国家的经济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去做。这位负责人是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率领的、参加这次区域性讨论会的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在这位美国官员看来，亚洲发生的这次货币危机证明，这些国家应该开放它们的金融市场，而这是列在美国和东盟讨论日程中的一个问题。

而随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名道姓地指责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暗中操纵了这次货币投机活动，从而使当地的货币贬值，其目的是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惩罚，因为这些国家已将由军政府领导的缅甸接纳为东盟国家。

两周来，马来西亚林吉特与美元的比价已经下跌 5%，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不得不多次进行干预以支持自己的货币。而泰国铢与美元的比价则下跌了 20% 以上。

乔治·索罗斯在 25 日也承认，他曾试图说服马来西亚和泰国不要让缅甸加入东盟。但这位金融家否认通过操纵货币投机

对这些国家施压，并说，“我们不可能把缅甸的自由事业作为货币投机的借口。”

8月30日，在庆祝马来西亚独立40周年之际，马哈蒂尔总理敦促国人捍卫国家自由，否则马来西亚将重遭外国的经济主宰。

他说：“如果我们不愿以热忱的爱国态度和更加艰苦的工作来应付这一挑战，我们肯定会被重新殖民化。”

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七周前贬到2.52兑换1美元，8月29日为2.79兑换1美元。股票价格也在暴跌，原因是外国资金在该国货币贬值后被抽走了。

马哈蒂尔在当天的一次政党会议上说，马来西亚的外债增加了10%，资本市场被蚕食了1613亿美元，企业资产减少了10%，人均收入从4600美元下跌到4200美元。

马哈蒂尔点名批评了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说是他带头操纵东南亚各国货币和市场。索罗斯否认了这一指责。

马哈蒂尔说，不幸的是，一些外国投资者从未在该国建立什么产业，而是一味沉迷于在市场上搞投机活动，实在是忘恩负义。

他说：“在长期从我国的进步中渔利之后，他们现在却打击我们的货币和股市，企图毁掉我国经济。”

他说，该国的遭遇表明，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可能变成弱肉强食的场所，而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小国，又无法关闭其边界。

为了反击外资的抽走，马哈蒂尔8月29日批准动用政府控制的养老基金等力量来收购股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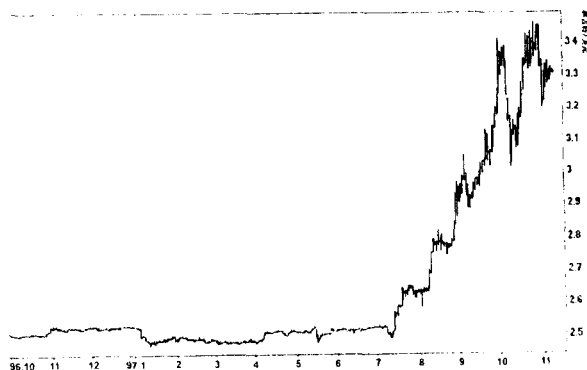
马哈蒂尔在讲话中继续抨击“不负责任的”外国投机者，并把他们为“野兽”。

马哈蒂尔在宣告马来西亚将会克服当前经济动荡时，促请国民面对这场“将会加强本国实力的挑战”。

他说，尽管“对我们来说，要建立一堵可保护我们免遭发达国家猛烈攻击的墙，40年是太短了”，可是，政治稳定将有助于国家克服所有困难。

马哈蒂尔猛烈抨击外国基金，指责是“不负责任的投机”造成了本地区的经济举步维艰，而且从马来西亚的股市侵蚀了逾4亿林吉特（1.39亿美元），从而使外债价值增加10%。

他发誓要同这些投机家作斗争，并且说，这场危机证明：“一个没有疆界的世界可能是一个野兽充斥的丛林。”



马来西亚林吉特兑美元汇率变动

他在向马华公会致辞时说：“我们不可能关闭边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无足轻重的；然而，即使我们不能把野兽的角拽脱，我们也要把它的耳朵扭断。我们要学会在这个丛林中生活，并且要培养那些对付丛林野兽的本事。”马华公会是由14个成员组成的国民阵线执行联盟政府的一个重要组织。

马来西亚林吉特兑美元跌至新低，股市的价值自 1997 年初以来已下挫 1/3。而由于新的监控措施，外国资金的抽走业已押后。

*

*

*

马来西亚经济在此之前已连续九年取得了 8% 以上的增长，通货膨胀率控制在 4% 以下，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在“马来西亚能够”的口号下，马来西亚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1997 年初马币林吉特被伦敦和新加坡选为“区域最佳货币”，其汇率扶摇直上，兑美元曾达 2.46:1 的高水平。

但马来西亚经济也存在几个弱点。首先，马来西亚经济过于依赖外资和外国市场来取得经济增长。据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最近的统计，过去 10 年，外资占马来西亚总投资额的 50% 到 60%。另外，马来西亚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其中又主要依靠电器产品和电子产品的出口，而这两个领域的大企业大部分是美国和日本等国的跨国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子公司。随着其它生产成本更低廉的地区的崛起，有些跨国公司已决定从马来西亚迁走工厂，这对马来西亚经济将产生一定程度的打击。

其次，长期以来，马来西亚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1995 年经常项目赤字高达 198 亿马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9%；1996 年政府的经济降温措施使赤字减到 130 亿马元。1997 年该项预测为 150 亿马元。

第三，近几年马来西亚推行各种庞大的基建发展计划，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国内储蓄不能满足融资投资活动。马来西亚的储蓄目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8%，而投资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5%，这意味着马来西亚部分投资是依赖举债进行的。1997 年 8 月份，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了 97 年 6 月份马来西亚

贸易赤字已高达 28 亿马元，严重打击了外资的信心。

针对 7 月以来量子基金在外汇市场上的狂轰乱炸。马哈蒂尔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7 月份，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先是进场干预，利用提高利率和动用外汇储备来捍卫马币，但未能收到预期效果，反而损失了近 100 亿马元的外汇储备。面对这种状况，8 月 4 日，马央行开始实施限制外国客户掉汇安排的措施，规定外国客户通过掉汇安排最多只能借贷 200 万美元用于非商业性活动。然而上述措施并未能遏制马来西亚林吉特的跌势。

*

*

*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眼见市场人气性几近散去，就把资金从外汇市场转移到吉隆坡股市，这一举动又导致许多市场跟风者的进入。8 月 28 日，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为打击卖空活动，把 100 只综指成份股列为“指定股票”。同时禁止投资机构和银行借出股票。这一措施令外资信心大失，投资者惊慌抛售，吉隆坡股市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综指跌幅达 8%。

9 月 3 日，马哈蒂尔宣布设立一项 600 亿马元的救市基金，其中 300 亿马元由马来西亚国库控股发行债券筹集，其余则由政府和私人机构合力筹措。

而从 8 月 28 日后的几天内起，索罗斯就在市场上大放谣言，认为马来西亚干预市场的措施是违反国际惯例的，将极大地影响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信心，

在此压力下，9 月 4 日，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撤销对卖空 100 只指数股的限制，并宣布将推迟实施多项大型建设工程直至马来西亚经济恢复正常，这几项措施使市场投资者信心有所回升。而这正中索罗斯下怀，因为，量子基金可以利用这一小段时间歇口气。

随着9月底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香港年会的到来，马哈蒂尔也在努力地采取措施以稳定经济。

9月7日，马哈蒂尔敦促国际社会将货币操纵，而不是货币投机宣布为非法行为。

他在主要执政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对记者说：“世界是不会从货币操纵中得到好处的。”

他说：“现在是国际社会制止它、使它成为非法行为的时候了。这样，像马来西亚和其它的新兴国家才会安全。”

马哈蒂尔说：“当我们谈论全球经济时，理应考虑到像我们这些穷国的问题。因此，如果一种体制公然受到伤害时，就应该用法律制止这种行为。”

他说：“马来西亚认为，国际市场只应向投机活动，而不是操纵活动开放。”他还说操纵活动“不能创造就业机会或商品。”

他说：“很显然，有些人没有做任何事，却捞到了一大笔钱。他们将大量的资金在世界范围内调动，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操纵者和投机商以外，没有任何人从中得到好处。”

9月18日，马哈蒂尔又发表讲话说，马来西亚金融市场最近的混乱使他在2020年把马来西亚变成发达国家的计划延缓了10年。

外国投资者因为担心马来西亚经济可能遇到同泰国一样的麻烦而纷纷逃离，使得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降到24年前浮动以来的最低点，并使股市降到四年以来的最低点。

马哈蒂尔在17日接受美联社与道·琼斯新闻社记者独家采访时说：“他们使我们倒退了10年。”

他说：“10年前，我们的人均收入是4000美元，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是5000美元。他们使我们倒退了20%。我们又

回到了 4000 美元。现在我们就算是为了恢复原来的样子也必须努力工作。”

马哈蒂尔说，马来西亚在 2020 年前每年的增长率至少要达到 7% 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过去九年中，马来西亚经济每年都增长 8% 以上。分析家认为，增长率今年可能降到 6% 至 7% 之间，明年将进一步下降，这是由于林吉特疲软和投资者撤走造成的股票价格下跌。

马哈蒂尔坚持认为，投资者已抛弃了马来西亚金融市场，没有他们的帮助他的国家仍能继续前进。

他说：“我们可能耽误几年，但是我们不会依靠他们。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他们能在我国赚钱。”

他单独提到美国金融家索罗斯是马来西亚金融市场混乱的幕后策划者。但是，分析家和外国基金管理者说，对马来西亚缺乏信心是最大的不利条件。

马哈蒂尔说：“所有基本因素都是正确的。我们的步伐是非常恰当的，只有国际收支是例外，但也已作了纠正。”

他说：“我会以我自己的方式反击。但是我知道我的能力已受到某些人的破坏。我们的情况一直很好。我们预测我们今年的增长率仍能达到 8%。”

9 月 22 日至 26 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在香港举行，面对国际金融界的巨头，马哈蒂尔和索罗斯分别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个冤家却始终没有在香港会面（具体情形见引言）。

*

*

*

1997 年的夏季对于印度尼西亚人民是灾难的季节，当印尼盾和雅加达股市狂跌不止时，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接二连三地使这个国家深陷于悲痛之中。

从7月开始，印尼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就出现了零星无法扑灭的森林大火。由于印尼热带森林众多，而且岛屿林立，因此刚开始出现的火苗并没引起太大的关注。

然而熊熊燃烧的大火很快侵入居民区，当地居民四处逃散。在苏门答腊岛上出现了死亡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有30万公顷的林区被完全烧毁。

3个多月的森林大火给印尼和东盟整个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最具破坏力、影响最大的是由森林大火引起的烟雾。森林大火产生的烟雾最远扩展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和泰国南部的旅游胜地普吉拉岛。在三个月内已有近千人受火灾影响而死亡，驻印尼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各国大使馆纷纷宣布休假，携家带口地出外旅游，远离东盟，而国外的游客更是对东盟的热带风光敬而远之。

10月初，印尼国人终于盼来了迟到的雨季。尽管当雨季的大雨降临在浓烟滚滚、遮天蔽日的印度尼西亚时，人们拥到拖着长长的水龙带的街道上跳起舞来，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然而，真正的问题或许才刚刚开始。

对于受灾最重的苏门答腊岛占碑省进行的一项非公开的空气污染的分析报告表明，空气中的尘埃量为英国认定的安全量的50倍，约为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认定的安全量的20倍。同时也是马来西亚认为“极为有害的”尘埃量的将近4倍，甚至到达受灾最严重的东马来西亚的古晋测得的最高含量的2倍多。香港《南华早报》根据这些数字进行粗略计算的结果表明，如果将其它因素考虑在内，印尼一天的死亡人数有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会达到几百人。但是它的土地损失、收成不好以及经济灾难带来的长期影响有可能会延伸为全国、全地区，甚至最终变成全球性灾难。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迈拉特·安德烈埃带领着一支由欧盟资助、专门研究全球每年发生的大面积森林火灾对气候影响。他说，印尼政府更应该担心的是明年，而不是今年。数以万计的人可能会死于呼吸道疾病，但是更多的人可能会因为吃不饱而饿死。

据估计，印度尼西亚大火面积为 80 万至 150 万公顷。位于西瓜哇省的国际林业研究中心的副所长丹尼斯·戴克斯特拉说，印尼正在失去珍贵的热带树木和泥炭——泥炭在这个国家起着潜藏的水库和稻田生命线的作用。大火将大量的泥炭变成了空中的浓烟。田里将不会有水供应了。

他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当雨季最终来临时，雨量可能会太大，以致于将在炎热中生存下来的树籽冲走，导致今后大面积的土壤流失和塌方。

但是如果雨量太小，闷着燃烧的地下泥炭和距地面约 10 米的煤层将会在明年一年里继续燃烧。

马来西亚气象局环境部的一位科学家说：“地火可不是开玩笑的。加里曼丹的地火已经延续了数百年。”

几个月以来，对于森林大火的起因，众说不一。印尼官方的说法是由于该地区旱季干燥以及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然而东盟有关环保专家却指出，这场大火的主要原因是印尼国内一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开荒公司无节制地纵火烧荒引起的。

然而，不管怎么样，持续三个月的森林大火却给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帮了忙。由于大火搞得人心惶惶，基金的操作就更易于左右整个东南亚地区普通百姓的人气，而汇市、股市最重要的无非也就在于人气的盛衰。

可是对于印尼来说，7 月份开始的森林火灾只是灾难的开

始，当9月份森林大火即将被雨季的暴雨浇灭时，新的灾难又降临到这个在1997年命运多舛的国家。

9月26日，印尼鹰记航空公司的一架空中客车A-300型民航客机在北苏门答腊首府棉兰市附近坠毁。机上包括乘务员在内共234人遇难，据鹰记航空公司宣布，机上共有十几名外国人，其中包括2名美国人，6名日本人，3名德国人和1名荷兰人。

26日发生的这起空难是印尼1997年以来的第四起空难，也是印尼历史上最大的一起空难。空难发生后，东盟各国的航班被迫取消。

对于空难的原因，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详细的调查报告，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由于地面上森林大火导致的浓浓烟雾是这次空难的重要因素。

俗话说“祸不单行”。

9月26日晚11点左右，在马六甲海峡上又发生了货船碰撞事件，至少有5人失踪，其中一艘货船被撞沉。

9月28日，印尼苏拉威西岛上的巴里巴里小城晃动了30秒，原来是发生了里氏6级的强烈地震，这次大地震至少造成了300人以上的死亡。

7月直到9月，印尼全国上下可谓多灾多难，当地的媒介甚至惊呼“上帝别再惩罚我们了。”

第十八章 香港的秘密行动

香港股市十天跌去 5000 点，十大富豪的巨亿身家在数日间迅速“缩水”，千百亿的资产在股市中被蒸发了，而乔治·索罗斯却依然大赚其钱。

香港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回归前后，股市表现优良，一路上扬，到 8 月初创出历史新高 16820 点。而到 8 月底，由于受连续两个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拖累及美国股市走势不佳的影响。港股走出了一轮宽幅振荡的行情。

8 月 28 日（周四），由于马来西亚采取措施，限制沽空地一百种股份，打击了欧美机构投资者对整个亚洲市场的信心，导致亚洲股市纷纷大幅滑落，欧美资金有调离亚洲的趋势，港股亦难幸免，恒生指数下跌 657 点，收报 14786 点，全日成交 387.7 亿港元。

8 月 29 日（周五），由于以基金为主的沽盘全日沽货，不断配合东南亚地区股市回落，调减所持港股比重，使港股继续滑落 740 点，恒生指数收报 14134 点，成交额亦创下历史性高位，达 460 亿港元，是典型的羊群心态下的基金套现离场讯息。

9 月 1 日（周一），港股承接前周四、周五跌势继续下跌

288 金钱与梦想

710 点，收报 13425 点，超卖讯号出现，反映大市随时会有反弹。前周仍能企稳的红筹股 H 股跌幅较大，其中恒生中资企业指数下跌 8.75%，恒生国企指数下跌 11.74%，全日成交额只有 348 亿港元，承接力较前两个交易日有所减弱。

附：8 月 28 日亚洲区股市表现

股市	收市点数	跌幅 (%)	今年以来 升跌幅 (%)
菲律宾综合指数	2072	- 9.28	- 42.52
雅加达综合指数	530.4	- 4.52	- 32.8
恒生指数	14876	- 4.23	+ 10.4
吉隆坡综合指数	812.2	- 4.22	- 43.3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	1846.6	- 3.62	- 23.5
印度三十种成份股指数	3963	- 3.28	+ 26.5
泰国证交所指数	511.8	- 2.29	- 53.5
台湾加权指数	9827	- 2.22	+ 35.8

9 月 2 日 (周二)，在传闻影响下，港股无论蓝筹股、国企股及红筹股均出现较大幅度波动，早市恒指最低见 12899 点，下午开盘后有所好转，三点过后更急速弹升，全日波幅近千点，恒生指数收报 13735 点，成交 339 亿元，证券界人士认为，后市仍需观望，港股走势主要视外围股市走势及香港息口的去向而定。

9 月 3 日 (周三)，在上日美国股市出现罕见的大升势带

动下，加之港股已连续下跌数日，严重超卖，亦使港股出现技术性反弹，全日港股上升近千点，恒生指数收报 14713.99 点，升幅为 7.13%，成交则为 346 亿元，以点数计创下历史最大的升幅。在此日的大升势中，红筹股及国企股的升幅尤其突出，恒生国企指数上升 17.08%，收于 1325.7 点；恒生中资企业指数收报 3691.77，升幅为 12.91%。

9 月 4 日（周四）经过两天的强劲反弹，港股开低走低，无视纽约股市与伦敦港股走稳刺激，恒指重创 514 点，报收 14199 点。鉴于东南亚市场仍未稳定，加以散户参与明显减少，导致成交额大幅萎缩至 249.6 亿港元，各类股份中，跌幅最大的依次为国企股、红筹股及地产股。

9 月 5 日（周五），在东南亚股市回稳的带动下，港股显著反弹。早市港股开盘后即出现选择性逢低吸纳买单，大市回稳，午盘后更进一步扬升，恒指最高曾涨至 14576 点，上升 364 点，终场收报 14563 点，但成交额只有 180 亿港元，是今年 7 月 29 日以来的最低日成交额，显示观望气氛十分浓厚。

随后不久，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表示，这种现象是暂时的，香港股市应有机会恢复正常。

他强调，现在香港经济稳定，股票市场亦有足够流通量，市盈率水平也相当合理，市场交投畅顺，再加上投资环境在汇率稳定下也显得良好，因此，他相信香港股市将回复正常。

不过，他认为由于股市的波动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平息的，因此港股还会有短期性波动。

据悉，港府年中已制定方案应付金融危机。早在今年五、六月，曾荫权已联络香港金融管理局行政总裁任志刚、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香港联交所行政总裁徐耀华、财政事务局局长许仕仁及香港中央结算行政总裁盛善祥等，商讨香港一旦遇

上各类金融风暴时，有何应变措施。这些假想金融风暴包括一间银行倒闭，或港股大跌二成等。

据透露，曾荫权当时组织各金融机构负责人共商应变措施，是因为见到港股已上升了不少，而且交投金额不断增加，须考虑股市大幅回落时可能出现的振荡，最重要的是确保香港的金融系统不受影响。港府的应变措施包括，在港股大跌市时，确保银行有足够资金提供给予投资者补仓或履行合约责任。各监管机构希望，制定此类应变措施后，当遇到上述金融风暴时，各机构能在短时间内互相配合采取行动。

9月初，香港金管局副总裁简达恒也曾表示，金管局一直在监察银行股票融资的情况，最近也曾与数间股票融资业务活跃的银行谈过，检查其手续及信贷评估是否恰当。他说，这并非恒生指数的首次大幅下跌，而金管局的做法也只是一贯的做法。金管局一向与联交所联系密切，定期开会研究不同情况对香港经济的影响。

9月初，当恒生指数从8月28日起连续三个交易日大幅下挫，累计跌去2100多点时，曾荫权表示，香港市场资金雄厚，一些公司的业绩也相当令人满意，他相信港股最终能够抵抗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冲击。

曾荫权的讲话使香港股市有所企稳反弹。而且9月底，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将在香港召开年会，因此市场人士信心有所增加。

*

*

*

而此时，据称已从东南亚获取15亿美元利润的索罗斯则开始对香港表示出兴趣。他决定利用这次年会摸一摸香港特区政府的底细。

在动身香港之前及停留香港之时，索罗斯对香港的金融市

场一直保持低调。据可靠消息，索罗斯之所以刻意低调，是因为他拜访了一些超级富豪，其中包括李嘉诚。

消息称，索罗斯来港前，曾有意邀约董建华会晤。他统领的“量子基金”，与近年崛起的香港基金公司 Value Partners 有业务往来。Value Partners 的主政者叶维义，是新昌营造主席叶谋遵之子（叶维义同时也是新昌的副主席）。叶家与董建华家族是世交，董建华任特首前是新昌董事局成员之一，任特首后由其弟董建成继任董事。可见叶董两家交情不薄。由叶维义出面任说客，撮合董建华与索罗斯会晤，自然最好不过。

只可惜，早些时候港元受到东南亚货币汇率风暴拖累，连带港汇也受到冲击，搞得金管局急忙扯高银行同业拆息，以保卫联系汇率。在这种政治敏感形势下，董建华若宣布与索罗斯会晤，无疑令港汇投机市场火上浇油。为免市场作出无谓揣测，董建华通过其特首办，公开表示无意与索罗斯会晤。可谓用心良苦。

显而易见，索罗斯作为美国避险基金的殿堂级代表人物，对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感到兴趣，自不待言。尽管在 9 月 21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并没有公开评论货币汇率问题，但美国基金界内已有共识，认为港元与美元脱钩，势在必行，问题只是迟早而已。

事实上，联系汇率自 1983 年 10 月推行以来，美国的避险基金一直虎视眈眈，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这些避险基金财雄势大（单是美国就有近 1000 个这类基金），它们一方面利用大量借贷的杠杆原理；另一方面则借货沽空，待某种投资工具价值下跌，伺机再在低位吸纳，一来一回，往往赚到盘盈钵满。

*

*

*

10月初市场传闻索罗斯又在香港做空，香港股市顿时人心惶惶。

港股在10月4日到10月9日的一周内先是上升而后急挫，从周初的15242点跌至周末的14273点。在一周内下跌855点，香港股市新一轮大幅下挫已初露端倪。

10月13日，恒生指数跌去200.02点，报收14072.9点；恒生中资企业指数下跌177.98点，收于2687.13点，跌幅达6.2%，远远超过恒生指数1.4%的跌幅。北京市政府的唯一在港上市公司——北京控股因受传言影响大幅下挫，跌破首日挂牌市价，收报35.5港元。

10月16日，外资基金继续抛售港股，港股大市破位而下，恒指下跌452点，创出5月以来的新低，恒生指数最低跌去688点，成交量放大至186亿港元，最终以13384点收市，恒生指数250天线失守。250天线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口，被技术派人士视作牛熊分水岭。“熊来了”成为大多数股民心头难以拂去的阴云。

当时香港很多证券界人士仍然持乐观态度。香港宝达证券董事苏国坚表示，恒指在冲破14000点支持位后已陆续出现斩仓盘，短期内恒指于12000点将有强劲支撑。美林证券也对港股后市看好。认为港股已比合理水平更低，虽然股市积弱一时难返，但美林证券大胆预言至明年年中恒指可望上攻18570点水平。

10月17日，在证券界人士的大力唱好下，加之市场盛传中国证监会愿意加快红筹股注资等利多，香港股市当日反弹183点。红筹股和国企股大幅反弹，地产股也全面回升。中银证券知名分析师宋燕霞发表分析意见，认为红筹注资及国企重组之活动将会慢慢增多，从中长线看，红筹股仍将跑赢大市。

于10月13日开始招股的中国电信在这样的背景下，以30倍的超额认购完成招股工作，但较之5月29日北京控股1270倍的认购售数不啻霄壤之别；北京控股认购时冻结资金2388亿港元，而业绩前景不逊于北京控股的中国电信仅冻结资金539亿港元，光在利息收入方面就少了7亿港元之巨。

在连日大跌后港股回升的第一天，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露面讲话，安定人心。他说，香港股市成熟有序。股市大幅滑落，公众毋须过分恐慌，股市波动实属正常。他认为，香港股市不会受短期波动的影响，而会继续蓬勃发展。

10月19日，距1987全球股灾十周年。香港各家媒体纷议后市，都普遍认为短线看淡、后市乐观。更有文章称，自'87全球股灾之后，香港股市过去十年的回报率居全球25个股票市场之冠，每年平均高达25.9%。有文章还说，虽然香港股市近期出现较大波动，恒指在10月份以来（截至10月19日）跌去了10%，仍无损香港股市过去十年建立的地位。此类连篇累牍的文章让投资者伤痛的心稍得安慰。然而台风此时正在默默酝酿，一场铺天盖地的风暴即将来临。

从20日到22日，恒生指数再次连续三个交易日直线下滑，日跌幅分别达4.63%、4.38%和6.17%，指数共跌去2100多点。港报财经版上尽是触目惊心的词句：“华创活得太疯狂”，“风高浪急跌得劲”，“基金洗仓港股四脚朝天”，“港股跌势一发不可收拾”，“亚太股市崩围、港股厄运难逃”，“跌呀跌，散户忍痛离场”——天低云暗，一溃千里。

回顾往事，香港股市由今年初的13000多点起，在4月1日曾一度跌至11951点，但是由于回归效应和十五大效应等利好带动了一个凌厉上升的行情。在回归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恒指及每日成交量屡创新高，到8月7日更升至16820点高位，

但因受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影响，港股自8月最后一个星期开始下跌，自此后反复向下，低迷难振。

如果说8月份港股的宽幅振荡主要是来自东南亚货币危机所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那10月份的狂泻则主要是缘于国际大炒家进入香港兴风作浪。

香港十大富豪的巨亿身家被股市这只无形的巨鳄吞噬了一半。从睥睨全球的郭炳湘，到财压香江的李嘉诚，个人财富在数日间迅速“缩水”，千百亿的资产在股市中蒸发了。从22日晚起，拥有881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的香港金管局开始施展力量，沽出美元以捍卫港元，到24日，香港及内地人士对港元的支持产生回音，在货币市场，隔夜拆息利率先由前日的200%回落至50%，而后尾市维持在10%左右。恒生指数亦大举反攻，直上718.04点，报11144.34点，涨幅达6.89%，红筹股指数涨幅更高达12.81%，收于2053.04点，国企指数涨9.94%，报833.41点，当日蓝筹股汇丰涨10.5港元，收在199港元。

然而10月23日，港股再次狂跌，恒指再度跌破10000点，收市时已跌去1211点，报10426.3收盘。当日盘中曾最多跌去1871点，超过了1987年股灾时的跌幅。香港股市的狂泻，带动了整个东南亚股市的暴跌，欧美股市也应声下挫。

已经由于经济疲弱而蒙上阴影的东京股市，日经平均指数收市下挫536点，或3.03%，报17151。分析家说，这是东京股市首次受到东南亚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

新加坡股市急挫81.81点，跌幅达4.72%，报1647。菲律宾股市下挫96点，跌幅接近5%，收市报1832，创下4年新低。马来西亚股市收市时虽然已自低位回升，但仍跌了3.38%，跌幅达24.72，报706.45。印尼股市跌穿500关口，

收市时跌了 11 点，跌幅达 2.2%，报 494.14。

欧洲股市星期四也连续第二天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早段已跌了 3%—4%，下午跌势加剧。

伦敦股市金融时报 100 指数在当日下午的交易中跌了 188.6，跌幅达 3.7%，报 4960。其它主要欧洲股市都受冲击，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市跌了 4.7%，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在下午早段跌了 3.3%。其它规模较小的欧洲股市跌幅也在 3% 以上，包括布鲁塞尔、马德里、奥斯陆、斯德哥尔摩。

受全球股市大跌的影响，23 日纽约股市大幅下滑。道·琼斯 30 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跌去 186.88 点，跌幅达 2.3%，至 7847.77 点收盘。

在香港股市大跌之时，香港特区政府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10 月 23 日股市收市后，香港政府新闻处突然通知当地各大传媒，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要举行临时记者招待会。曾荫权表示：截至 9 月底，香港外汇储备高达 881 亿美元，超越台湾，位居世界第三。且无外债，收支平衡，加上经济充满活力，有严密的金融制度和风险防范措施，因此完全有能力捍卫联系汇率。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也在记者会上指出，香港金管局已于 10 月 22 日晚抛售美元，击退了几个国际大炒家的进攻。

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同日结束了在欧洲的访问，当日下午由伦敦返回香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港府有决心维持联系汇率，虽然在捍卫港元的过程中，调高了利息，但加息对股市只会带来短暂影响，市场很快会自动调节。他强调待情况转趋稳定后，利率将会回落。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也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请求市民应保持冷静，理智心态，审慎入市，量力而为。如果对股市走势不熟悉，最好不要入市。

在10月23日北京举行的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表示，香港股市以往经常出现波动，今后也会出现波动，所以这不足为怪。港股波动是特区政府自己应该处理的事。中国政府遵守一国两制的原则，不会干预香港的股市和港元汇价。沈国放承认，港股大幅下跌，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些微的影响，但只限于投资情绪。

10月25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会见美国驻京新闻机构负责人，谈到香港股市时说，证券交易有涨有落，这在全世界都是普通现象。他强调，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经济是稳定的，相信任何一个有理性的投资者都绝不会因为一时的股市波动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香港的经济失去信心。

美国财政部长鲁宾表示，美国近几个月以来一直关注东南亚金融形势的发展。美国官员霍尔夫说，东南亚货币危机将被列为下月将在加拿大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世界银行东南亚地区事务资深顾问巴特利尔也公开表示，香港金融市场出现的风暴“相当不理性”，香港基本面仍强劲；同时，香港银行货币体系完善、汇率制度严格，不会出现“墨西哥式”的金融风暴。

面对股市风暴，香港的上市公司则身体力行，发起了一场回购救亡活动。郭氏家族的新地公司率先自救，其它地产商也积极筹措回购计划，不让资产无理“贬值”。

联交所23日上午宣布，10月22日有多达26家上市公司在市场回购股份，包括国泰航空以8.55元至8.75元回购230万股；信和以6元至6.2元吸纳近80万股；太古以46.7元至49.8元购回360万股；九仓亦回购700万股，每股作价18.7元至21元。

红筹方面，越秀投资于市场，以 2 元至 2.1 元回购近 2000 万股，控制性大股东越秀企业（集团）另外再吸纳近 900 万股，增加持股量至超过 42%。

此外，长实主席李嘉诚表示亦不排除回购长实股份，新地副主席郭炳联则表示，港股这次非理性波动属短期性。他表示，近日将回购集团股份，数目仍在计算中。但他对香港经济仍有信心，认为联系汇率必须维持。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亦指出，已回购 2000 万股中信股份，借以支持股价。

另外，置地也公布，于 10 月 21 日回购股份 705 万股，每股作价介乎 2.76 美元至 3 美元，涉及资金超过 2000 万美元。

证券界人士认为，公司回购对短期股价仍会有一定支持，不过现在大市关键在于投资者对港元地位缺乏信心，而争相抛售港元资产。此外，利率上扬吸引了不少投资者将资金存入银行收取高息回报。就基本因素来说，港股在 11000 点水平已极具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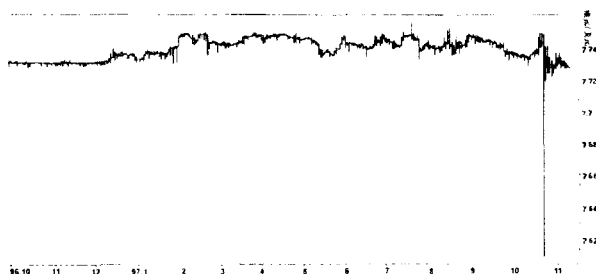
在连跌四天，累积跌幅 3174 点后，港股 10 月 24 日在拆息回顺下，出现 718 点的强劲反弹，恒指重上 11000 点水平，收报 11144.34 点，升幅为有史以来第二大点数升幅，成交达 303 亿元。红筹股反弹最为犀利，中资企业指数上升 12%，优质红筹股严重超卖，反弹力度极强。如上海实业收报 27.65 港元，涨 20%；招商国际收报 12.25 港元，涨 13%。生不逢时的中国电信以 11.68 港元招股，首日上市就跌破发行价。10 月 24 日这只最具潜力股劲升 15.1%，成交 4 亿股。

第二日港报一扫愁云，各类证券从业人员开始登场唱多。有言“买股作投资是时候”者，有言“长实质优值得吸纳”者，还有如“中油价低适度建仓”、“招商海兴看高一线”、“港股万一点有强劲支撑”云云。但大多数股民仿佛并未从沉重的

298 金钱与梦想



香港恒生指数图



港元兑美元汇率变动

打击中完全恢复，仍然心有余悸，呆呆望着电子屏难决取舍。据港报称，散户们仍以观望为主。10月27日港股承接美股跌势低开200多点，最多跌了700多点。投资者仍担心银行同业拆息再被抬高，以及港币再受冲击，投资情绪低落。恒指早日段已跌了668.81点，午市好淡争持，恒指收报10498.2，挫646.14点，金融、地产股沽压较重。

董建华先生身为特首，谆谆藐藐自有另一番言语。他认为港股仍然动荡未稳，股民们仍要理性审慎。大多数证券界高层人士赞同这一观点。因为港股在下滑后需要一段时间休养生

息，重聚能量，加上东南亚货币危机并未全面解除，国际金融“狙击家”贼心未死，随时可能卷土重来。专家们建议投资者改作中长线投资，购入有潜质的稳健股份或有实质注资概念的红筹股。

11 月份以来，港股和港元汇率开始基本趋于稳定。

*

*

*

而华尔街上不少人都盛传在香港这次股灾中，索罗斯又成大赢家，至少卷入了 5 亿美元的净利润。华尔街人士称，索罗斯在 10 月份除了不断狙击港元和其它东南亚货币之外，还悄悄地购入了总值不少于 100 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因为索罗斯认定，东南亚的货币和股市风潮最终会蔓延到美国，到时华尔街股市投资者将一窝蜂地抛售美股而将资金转移入债券市场。

尽管索罗斯基金的高层人员 10 月 27 日公开拒绝对此传言作出评论，但 10 月底美国投资者确实如传言般将资金注入债市。

据美国芝加哥一家金融贸易研究所的负责人布朗克表示，索罗斯 10 月份购入了近百亿的政府债券，并在 10 月底股市大跌时乘机出售手中的债券，大赚其钱。

第十九章 股市投资理念

一、人气为股市根本

很多投资人相信金融市场有理性，股票有与生俱来的逻辑。对于这样的看法索罗斯嗤之以鼻。这些人深信，只要找出那里面的逻辑，就能致富，索罗斯却不以为然。在索罗斯眼里，金融世界既不稳定又一团乱。投资要诀是找出乱在何处。只有这么做，才能致富。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数学公式，只要解出来，就可以说明股价将有何种表现。索罗斯以为，股票市场运作的基础，不是逻辑面，而是心理面。讲得更精确些，是群众本能。

对索罗斯来说，要确定他的理论在市场的某种情况中能不能帮助他，首先必须找出“市场正往何处走”，也就是说，群众将何时以及如何拥到某种股票、货币或商品前。过去几年，他一直把那套理论应用到欧洲的金融世界，背靠座椅，等着正确的时机到临，好奋力一击，等着群众本能掌控一切。这样的事件出现时，他随时可以饿虎扑羊，随时能够把握机会。

索罗斯认为认知和真实的差距很大时，事件往往失去控制，这种状况通常可在金融市场连续涨跌不停时看到。他认为这种连续涨跌不停的情况，是一种疯狂，“这种过程刚开始能

自我强化，却无法持久，因此最后必然反转。”

当然了，最困难的部分，是找出连续涨跌不停的情况。投资人想找出这样一种状况，必须先了解其他投资人对各式各样的经济基本面有怎样的认知。索罗斯的投资技巧本质就是能在任何时候确定市场——这些投资人的集合体——在想些什么。待到投资人晓得“市场”在想些什么，就有可能往反方向跳跃，赌意料之外的事件将发生、赌某个连续涨跌的周期将发生或者已经展开。

但是连续涨跌的走势，要怎样才能产生？

他说，有些时候，金融市场本该“反映”（affect）基本面，却有可能“影响”（reflect）基本面。“那样的事发生时，市场就进入动个不停的不均衡状态，它的行动和高效率和市场理论认为的正常状态很不相同。”

这一种连续涨跌不停的状况不常发生。如果发生，由于它们会影响到经济基本面，所以具有破坏作用。连续涨跌不停的现象，只会在追随趋势的行为主控市场时才发生。“所谓追随趋势的行为，我是指人们在价格上涨时买进，价格下跌时卖出，而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现象。一窝蜂追随的趋势行为，是使市场急剧崩跌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索罗斯——以及我们所有人——想问一个重要问题：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追随趋势的行为？

乔治·索罗斯的答案是：投资散户有缺陷的认知，会使市场自行壮大。所谓“自行壮大”，是说投资人使自己陷入盲目的疯狂，或者产生群众心理。

市场靠本身的疯狂壮大，总会反应过度，走上极端。这样的过度反应——推向极端——产生了连续涨跌不停的现象。因此，投资要成功，关键在于认清在哪个时点，市场开始靠自己

的动能壮大。这样的时点找出之后，投资人便知道连续涨跌不停的走势即将开始，或者在进行中。

索罗斯这么解释：

根据辩证形态而进行反射过程的理由，可以用普通话来解释：不明确程度愈高，则愈多人受市场趋势影响；追随趋势的投机行为影响力愈大，则情况变得愈不明确。

典型的涨跌不停走势，主要特色如下：

★趋势还没被确认。

★等到趋势已被确认，趋势往往会被强化，自我强化的过程于此开始。随着当时流行的趋势和流行的偏见彼此强化，趋势变得愈来愈依赖偏见。偏见慢慢变强，愈来愈夸大。随着这样的程序展开，远离均衡的情况便出现。

★市场走向经得起考验：偏见和趋势可能经得起各种外部冲击一而再、再而三的考验。

★信念增强：如果偏见和趋势受到冲击后存留下来，按索罗斯的说法，他们便“无可动摇。”他称此为加速期。

★真实和认知分歧：到了信念和真实之间的背离很大时，便可看出参与者有偏见。这是认清真相的时刻，或叫极点。

★最后，自我强化的连涨或连跌走势，有如镜像般，开始往反方向走。

这个趋势可能不需要其它理由，就能靠惯性而前行。但是等到信念不再强化趋势，整个过程就开始迟滞不前。失去信念会使趋势反转，而且这个过程会到达索罗斯所说的交叉点(crossover point)。于是动作往相反方向前进，出现了索罗斯所称的灾难性大涨或大跌。

总而言之，索罗斯认为，随着趋势持续进行，投机性交易的机率跟着增加。只要趋势存在，偏见和趋势就会彼此交互作

用，使得偏见变得愈来愈强。一旦趋势确立，就会开始一路前行。

索罗斯虽然被认为是反向意见者，但必须承认他与群众为敌时，总是小心翼翼。大部分时候，他会跟着趋势走，但一直在寻找趋势的转折点（也就是趋势改变的时点），这个时候与群众为敌才有意义。

索罗斯一直在寻找他称之为“反射”的关联性。比方说，他写道：“当人们对某种货币失去信心时，它的跌势往往强化国内的通货膨胀率，而使得跌势顺理成章。当投资人对一家公司的经营管理阶层有信心时，股价上涨使得经营管理阶层更容易满足投资人的期望。”他指出，刚开始这种关联性有自我强化的能力，但终有一天将自取其败。

索罗斯最大的利润，来自他能够察觉个股和类股“自我强化”的走势。投资人突然间改变他们对某种类股的态度，大量买进。随着某种类股的买盘激增，自我强化的现象便出现，使得该类股的财富增加，因为那种类股里的公司会透过更多的借贷、出售股票和以股票收购的方式，导致盈余增加。这就是连续涨跌不停现象里的上涨部分。

而当市场饱和，以及竞争加剧，伤害到该类股票的前景，以及个股价格过高之后，游戏便告结束。这个过程开始之后，空头排列就随即出现了。

二、利用股市的低效赚钱

传统证券市场理论，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金融市场必然在波动之后如其它市场一样，走向均衡状况。由于市场达成了均衡，所以可以假设完全的知识和完全的竞争能够得到。

索罗斯对效率市场理论同样嗤之以鼻。他断言：人实际上

是透过一组遭到扭曲的透镜来看金融市场的。正因为绝大部分投资者都是这样，所以人们应该利用股市的这种低效性来赚钱，当然赚钱的人必然是少数，所以要充分了解股市的这种低效性。

支持高效率市场理论的人真的相信，给了正确的分析工具和取得正确的资讯，他们有可能预测市场未来的走向。他们依据两个前提建立理论：一个人能在任何时间彻底了解金融市场，以及股价反映所有可以获得的资讯。

相信市场按照逻辑运作，让他们放心。如果置身市场的真实情形不是这样，想起来便叫人坐立难安、紧张万分，更不要提那样的市场充满了风险。相信只要够勤快，做适当的分析，从正确的地方取得资讯，便能准确猜测股价走向的想法，让人觉得舒服。

这些理性主义者声称，由于投资人能针对一家公司取得完全的知识，所以每支股票的价格都恰好定在正确的价位上。也就是，每支股票的价格，都是一组计算的理性结果。这组计算如果做得正确，便会导致“正确”的价格，和我们解答数学问题的过程大致相同。高效率市场学派认为，任何人只要依照这些规则行事，碰到选股问题时，必然能选到最好的股票。股价仍将定位在一公司未来盈余的估计值上，或者与这个估计值有合乎理性的关联。

这种高效率市场的假设很简单；正由于简单，所以谈到股票市场如何运作时，它是最受欢迎的理论之一。对乔治·索罗斯来说，它不只太过简单，而且大谬不然。

索罗斯从不同观点，看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希望为他的信念找到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合乎理性的，不可能完全了解任何事情，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简而言之，那些分析师对

股价涨跌原因的看法是错的。

索罗斯以不同的一套假设，观察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

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的运作，没有什么事情是合乎理性或逻辑的。假使如他所说，我们所有的认知都遭到扭曲或有缺陷，那就无法完全了解市场、无法取得完全的资讯，帮助我们算出股价。

他坚持说，在现实世界中，人只能对事情获得不完全的了解。索罗斯写道：我对一般事物所得的了解，最重要的见解为，不完全的了解在塑造事件时扮演重要的角色。传统经济学是以均衡理论为依据，也就是供给和需求相等。但是如果你发觉我们的不完全了解扮演着重要角色，你就会知道，你面对的是不均衡的状况。

他表示，在现实世界中，决定买进或卖出一支股票——或其它任何事物——不是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均衡理念，而是根据市场处于不均衡状态的见解。索罗斯问：如果有均衡存在，为什么在看不出任何逻辑的情况下，市场价格会波动？因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存在偏见，所以不可能有均衡状态。依索罗斯之见，我们不能主张均衡状态存在，因为在迈向那个均衡状态的行动过程中，人的偏见总是掺杂其内，而且由于这个过程中，偏见可能变动，所以不可能定着于一个“均衡的市场”。

金融市场是在不均衡的状态中运作，而且参与者的认知和实际的事件间，总有差距存在，如果差距微乎其微，就不值得担心害怕，因为那不会改变参与者的认知。如果差距很大，这样的差距就必须纳入考虑，因为它会改变那些参与者的认知。

索罗斯一贯宣称市场天生就不稳定。造成市场不稳定的原因，在于我们的认知。更精确地说，我们的偏见或有缺陷的认知，导致市场波动。

依乔治·索罗斯的看法，投资人对某支股票抱持的“偏见”，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会导致价格上涨或下跌。这样的偏见有如“自我强化因素”，这个因素又和“大势所趋”交互作用，影响了投资人的期望。投资人根据所能获得的资讯，做出敏锐的反应，但这种反应不能决定一支股票的价格。只有投资人的认知才能决定股价；他们的认知，不只受到事实资料的左右，也是情绪的产物，因此产生的价格波动，可能促使管理阶层买回股票，或者采取并购行动，从而影响到这支股票的基本面。

索罗斯的理论是基于一个见解：投资人所支付的价格，不只消极被动地反映价值；更有甚者，它们是一个积极的因子，能创造股票的价值。认知和现实间这种双向的反馈——也就是索罗斯所称的反射（reflexivity）——成为他所持理论的关键。

要提出良好的经济理论，必须先查明“事实”。但是正如索罗斯所说的：“事件碰到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介入时，主体便不再只有事实，也包括参与者的认知在内。因果关系链不是从某个事实直接引导到另一个事实，而是从某个事实到认知，再从认知到另一个事实”。

在解释股市缺乏效率时，索罗斯认为关键是误解或偏见在塑造事件时所扮演的角色。他所说的误解，是指参与者的认知和事件的结果两者之间的差异。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没办法只把思想局限在事实上。相反的，他们必须把每个参与者的想法都纳入考虑——包括他们本身的想法。由于参与者的想法与事实不符，便有不确定性存在。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几乎必然看到参与者的认知和事件的结果之间有差异——而不是吻合。这种差异就叫做误解或错误。

误解，或者如他有时所说的，参与者的想法和实际事件状

态的背离，总是一直存在。有些时候背离很小，能够自行矫正。他把这种状态叫做近均衡。有些时候，背离很大，不能自行矫正。他把这种状态叫做远离均衡。

背离很大时，认知和真实相距十分遥远。没有什么机制能把它们拉近。反之，其中有某些力量在运作，把它们分隔得更远。这种远离均衡的状态有两种形式。

在某个极端，虽然认知和真实相距甚远，整个状态却很稳定。索罗斯这样的投资人，对稳定状态不感兴趣。在另一极端，整个状态不稳定，事件发展得很快，参与者的看法根本赶不上。索罗斯对不稳定状态很感兴趣。

三、不断审视市场预期

投资人观察金融市场时，期望心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买进和卖出某样东西的决定，是以他们对未来价格会怎么演变的期望为依据；未来的价格走向又取决于目前所做的买进和卖出决定。因此，索罗斯说，我们不能假设供给和需求只由外部力量决定。

索罗斯说：“在价格不断变动的市场中操作的人，都知道参与者深受市场动向的影响。”价格上涨时固然会吸引买者进入；买进这个动作也有助于价格上扬，而使得趋势自我强化。如果供给和需求所依据的因素和市场价格无关，就不可能有自我强化的趋势出现。

索罗斯说，这种矛盾的行为，是所有金融市场的特质；金融市场会预先考虑未来情势的发展。股市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外汇市场、银行业务以及任何形式的信用，都一样。简而言之，索罗斯表示：“市场走向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状况的演变，而不能反过来说。”

大部分投资人相信他们能预料将来市场会怎么做，也就是，预先把未来的发展纳入考虑。

依索罗斯之见，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对他来说，“根据定义，关于将来市场会是什么样子的任何想法，都是有偏见和不完整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事实和信念各自独立存在。相反的，我在解释反射（reflexivity）理论时主张：信念会改变事实。”

事实上，市场不会是对的，因为它们总是忽略那些来自和将来自于未来发展的影响力量。市场价格总是“错的”，因为它们所提供的不是关于未来的理性看法，而是有偏见的看法。

“但扭曲是往两个方向发生作用，”索罗斯辩称，“不只市场参与者带着偏见操作，他们的偏见也能影响事件的进展。这可能产生一种印象，让人觉得市场准确地预测了未来的发展，但事实上，不是目前的期望吻合未来的事件，而是未来的事件被目前的期望所塑造。参与者的认知本质上有缺陷，而且有缺陷的认知和事件的实际推进之间，形成了双向关联，使得两者间又能对应。我把这种双向关联性叫做‘反射’。”

索罗斯相信，高效率市场的假设，不能解释金融市场的行为；投资人的偏见与事件的实际进展间的反射关系，才能解释。所谓事件的实际进展，是指企业的经济基本面。

索罗斯认为在市场高涨或低迷时，股市本身会影响到基本面。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基本面和评估这些基本面所给的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创造了一种过程，先自我强化——繁荣期——然后恶化成自取其败——崩跌期。

索罗斯在投资中往往静静地等待这种循环的开始和结束，依靠这种理念和敏锐的直觉，他获得了少有的利润。60年代末企业集团欣欣向荣时，发生过这样的事。索罗斯在市场繁荣

和崩跌时，都赚过钱。起初，他见到高科技公司将掀起收购风，利用它们价格过高的股票做为购买盈余的货币。买到的盈余又使得股价偏高变得合理。机构投资人对这些企业集团产生兴趣。企业集团的股价居高不下，鼓舞企业集团买进更多的公司。机构投资人有个错误的观念，未能了解每股盈余的成长可以经由收购而产生。索罗斯相信，手舞足蹈的基金经理人的这种错误观念，或叫“偏见”，会影响企业集团的股价。确实如此，股价涨得高，因此他买了很多。稍后跌势开始，他改为放空，获得不少利润。

四、一般反射理论

索罗斯在其重要著作《金融炼金术》中多次提到他的“一般反射理论”。基本上，这理论谈的是思考的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的思考和他所参与的事情两者之间的关系。

索罗斯认为，假如一个人参与某一件事又进行思考，则他的处境就会变得很困难，因为他要了解的是他参加演出的那件事情。传统的想法是，了解是一种被动过程，而参与则是一种主动过程。事实上，这两种角色彼此影响，所以对参与任何一件事的人都不可能根据纯粹或完整的知识做任何决定。

古典经济理论假设，参与市场者是根据完整的知识行事，这个假定显然是错误的。参与市场者的知觉已经足以影响他们所参与的市场，而市场的动向足以影响他们的知觉，他们无法得到市场的完整知识，因为他们的思考也不断影响市场，而市场也回过头来影响他们的思考。假如关于完整知识的假定是对的，市场分析就容易得多了。

索罗斯坚持认为经济理论必须重新从根本反思，原因是经济过程中还有诸多不肯定因素，至今仍未得到解释。值得注意

的是，社会科学永远得不到像自然科学那么肯定的结果，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因此索罗斯认为人们必须对思考在影响事情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彻底重新评估。

我们习惯把事情视为一连串的事实：一个事实接着另一个，永无休止。但假如某一情境是有人参与的，事实与事实之间则不必然是直接衔接的。于是在这种处境中，事实首先和参与者的思考相接，然后参与者的思考又和别的事实相接。

而如果我们了解参与者扮演的角色，索罗斯以为我们必须先了解的一点是参与者的思考并不只是囿于事实，他们也要考虑其他人和他自己的思考。如此就会出现不肯定因素。换句话说，此时参与者的思考就不再和事实完全相符，但却可以在影响和塑造事实方面起某种作用。思考和事实不但相符，而且参与者的知觉和实际情况之间总会有差距，参与者的盘算和实际结果也会有出入，这就是了解历史过程以及金融市场动力的关键所在。索罗斯的看法是，错误观念和错误在人事方面扮演的角色，一如变异在生物学扮演的角色。

在多种不同场合，索罗斯一直强调，以上这些观点是他的一些核心概念，并对他产生了不少影响，他说这些影响对别人未必重要，对他却很重要，他的一切都源自这一点。索罗斯说他自己也察觉到，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流行的看法，在很多方面都很不一样。

因此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的本质之一就是参与市场者的知觉本来就和实际情况不相符，有时这种分歧是可以不予理会的，但有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种分歧，我们才会明白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乔治·索罗斯并没有按照传统的规则在金融市场上操作。别人却这么做：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有理性，这个世界包含的所

有东西也有理性，股票市场当然包括在内，索罗斯对游戏规则很感兴趣，但只想了解这些规则何时将改变。

这是因为规则改变时，可能促使反射关系开始出现，而且反射能够开启荣枯相生的过程。索罗斯相信，有时金融市场的特色是由这些反射关系塑造的，一旦察觉，他就能比其他投资人更快拔脚上马。

但是拥有这个投资秘诀，不保证索罗斯能够一直赚钱。有时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他本身的投资才华无关，有时却和那些才华关系紧密。比方说，有时反射过程根本不存在；有时，这此过程存在，但索罗斯没有及时发现。

最糟的是，索罗斯寻找反射过程中，认为已经找到一个，后来却发现找错了。有些时候，他决定建立仓位之前，没有彻底思考某个金融市场是怎么运作的——也就是说，在那个金融市场里，反射过程能不能够运作。但是他总是在寻找反射过程。当他发现有反射过程存在，而且能善加运用时，就赚到很多钱。

五、大起大落理论

索罗斯曾经给股市的波动建立了一个模式，并称之为“大起大落理论”。

索罗斯的模式首先假设整个过程可以在任何阶段打断；其次，这个模式只单独描述整个过程。由于在现实中，有太多过程交互作用、互相干预，于是大起大落的序列遭到外来震荡打断了。因此，在实际中，和孤立模式相符的情况是不常出现的。但模式仍然代表了某种顺序，其中包括若干阶段，假如各主要阶段不是顺序出现，大起大落的过程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不是按照一定的具体模式发生的。

在一般情况下，整个过程开始时是一种不为人所察觉的趋向，到了人们开始察觉这种趋向后，这些警觉就会开始加强这种趋向，这就是最初阶段。在最初阶段，流行的趋向和人们的偏见会互相作用、互相加强。索罗斯认为在这个阶段，还不能说极不平衡的状况已经出现，要等到整个过程进一步演进，极不平衡状况才会出现。潮流逐渐变得依赖偏见，偏见则变得愈来愈夸张。在这段时期，偏见和潮流都受到外来震波的考验，假如这潮流和偏见都经得起考验它们将变得更巩固，几乎无法动摇。索罗斯把这个阶段称为加速阶段。到了这个时候，假如信念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很大，参与者的偏见就无所遵循，这可称为关键时刻，由于惯性关系，潮流趋向仍然可以持续下去，但信念再也不会加强，于是便开始走下坡，索罗斯称此一阶段为黄昏时期或停滞期。最后，信念尽失，使变得依靠更强偏见的潮流趋向产生大逆转，这个逆转可以称为更迭点。相反的偏见则酿成相反方向的潮流趋向，并进而引起灾难性的加速运动，这可以称之为大崩盘。

索罗斯通过图表显示，大起大落并非是一个对称的模式。一开始时步伐是很慢的，后来逐渐加速到离谱程度，于是黄昏时期出现，跟着来的就是大崩盘。整个过程结束后，偏见潮流趋向已经不是本来面目了，这种过程不会重演，原因在于这是一种体质的转变。

六、勇气为股海沉浮之要素

乔治·索罗斯相信他做的某个投资是对的时，投资仓位绝不嫌大。这是因为他和别的投资人不同。

投资人对市场趋势的观察往往是对的，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索罗斯的自信，到了某个时点，害怕之情油然而生，担心所做

的投资变糟。他们在股票市场建立的仓位，看着价格上涨几天或几个星期——接着便感到脚底发凉。“这个事简直太好了，不可能是真的，”他们会这么说，“我得赶在事情转变之前出场，要不然会失去所有的利润。”

索罗斯对这样的想法嗤之以鼻。依他的看法，投资人所能犯的最大错误，不是太过大胆，而是太过保守。有人告诉他，他（她）投资了多少钱在股票上时，索罗斯会问一个很要紧的问题：“你有信心，认为价格上涨吗？”

如果答案为是，索罗斯接着问：“那你为什么投资那么少？”

在谈到股市搏击的成功要素时，索罗斯认为也许到最后，直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勇气始终是成功的要素，这种勇气不仅体现在建仓时的大胆，更体现于斩仓时的果断。而后者，他认为正是许多股海沉浮人士中最难克服的瓶颈，机会主义使许多人在关键时刻畏缩不前，希望用等待来躲过灾难，然而结果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

乔治·索罗斯投资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他晓得何时该“割肉”离场。有时他的行动看起来像最嫩的新手所做的奇怪又错误的事情，也就是卖到低点，买到高点。1987年他在股市低点时卖出期货，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从他公开宣布的使命来看，则很容易理解。他的使命是：有朝一日能卷土重来再战斗。他说：‘我不想有一天醒来时已经破产。’

比方说，1987年10月股市崩盘时，他要确保的事情便是，早上醒来时不致破产。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19日）之前的那个星期三，索罗斯在哈佛大学的约翰肯尼迪公共行政中心演讲，谈到他的荣枯相生理论。从会场出来，他发现市场中的证券卖压很大。他但愿能处身办公室，把自己持有的东西

卖掉。他已看到前头的麻烦，但是认为会从日本先开始，因此早已建立日本金融市场的空头仓。但是他建立多头仓的美国股票市场却先行分崩离析。他在日本所做的空头仓做得很辛苦，迫使他先摆脱了美国的多头仓。为了避免追缴保证金，他马上又从日本市场撤出。他恪守一个神圣的原则：确保你能生存下去，之后再烦恼赚钱的事（1987年他赚到的钱仍比上一年多14%）。

事后来看，索罗斯似乎在市场崩跌时太早摆脱某些投资仓位，但是马凯斯认为，那正是典型的索罗斯的行为，也就是：放弃战斗，活下来，以便有朝一日再上战场。索罗斯退场，承受庞大的亏损，如此才能避免仓位赔得更多。“许多人很难接受那样的结果，”马凯斯说：“可是索罗斯做得到，因为他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能够卷土重来。当然了，他确实是这么做的，最大的成功是在1987年以后出现的。我想，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里面一定有某个重要的讯息。”

索罗斯自己认为这种勇气来自勇于忍受痛苦和承认错误的人生哲学和投资观念。

乔治·索罗斯承认他讨厌赔钱。一个人赔钱时，所做的最糟事情，是压抑自己的感情。当然了，赔钱时，既羞且愤是自然的反应。你会想把自己的错误埋藏起来，不要公诸于世。你的名声岌岌可危，客户的钱越来越少。

索罗斯说，把赔钱的反应深埋心里，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你必须清楚该怎么承受这些损失，如何忍受那样的痛苦。否则，你没办法长久玩下去。简而言之，你必须保持冷静，泰然自若，不怕和别人谈那些损失。发现别人也曾经赔钱，而现在还记恨在心，你会觉得很安慰。

每一天，你都在冒险。那是痛苦的一部分，因为你晓得，

某个时点，你可能面对严重的亏损。索罗斯说，如果你没准备好忍受痛苦，那就不要再玩这种游戏。别妄想你能长久玩下去。如果还想玩，就要保持冷静。

索罗斯十分冷静沉着，他的做法值得效仿。想要冷静沉着，必须有勇气和魄力。索罗斯不动声色地买卖许多超乎想像的东西。他本人则否认自己拥有勇气，因为他会说，投资的关键是晓得如何求生。有些时候，求生的意义是指保守地进场玩游戏，必要时认赔出场，永远不要把资产中的一大部分拿去玩。

当其他人的决定，可能影响数亿美元的得失时，他们双脚总是抖个不停，而且夜不成眠。而索罗斯有钢铁般的意志，下了豪赌依然安之如素。

其他人有时碍于自尊，无法做出明智的操作决策，索罗斯却认为聪明的投资人必须不动感情。宣称自己永不犯错，是没意义的事。股价往相反方向走进时，还欲扳回一城，重新证明自己没错，一点好处也没有。最好承认自己犯了错——并且毅然平仓。

乔治·索罗斯了解自己建立的投资仓位可能有错，虽然这令他失去安全感，但也使他提高警觉，准备随时矫正错误。有些人认为，对于金融市场的动向看走眼，是件丢脸的事。在索罗斯眼里，这样的事或许不值得自豪，但那是整个游戏的一部分，所以当然不能算丢脸。因此，他就像棒球选手，打击率是0.300，也就是出场打击十次，七次没击出安打，还是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或者，就像科学家通往重大发现的路上，总是布满无数的失败。

由于索罗斯接受，不完美的了解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对失败或犯错不抱负面态度。他指出，做错事不丢脸，错误变得

明显时不去矫正才丢脸。

索罗斯喜欢自夸，他所以和其他投资人不同，不在于他常常做对，而在于他比其他多数人更善于发现自己何时做错。确实如此，他喜爱运用的一种投资策略，是不断检查所建立的投资仓位是否出错。他总是建好仓位后不断测试自己的投资假设，希望找出事件的真正走向，看是否和他对市场动向的期望相符。如果事件和他期待发生的不合，他便晓得自己犯了错。他会进一步探索，找出自己什么地方算错了。一旦他认为自己晓得答案，便有可能被迫修正原先的命题——或者完全舍弃，但他不喜欢只因环境变化而改变命题。毕竟，新的环境可能只是一时现象，或许不是真正变动的讯号。索罗斯会设法找出有什么新因素（如果有的话）已经进入整幅图画中，可能冲击到他建立的投资仓位。他最反对静如磐石，忽视事件负面的转变。最要紧的是不断张开眼睛观察、不断监视、不断检查——如此一来，影响仓位的事情真的发生时，他已提高警觉，随时做好准备设法了解周围到底正发生什么事。

七、大户应有别于散户

索罗斯素有金融界“坏孩子”的称号，在股市中他的一些观点颇引来一些非议。例如他坚持认为大户应有别于散户，在正常情况下。大户必须也应该捞取散户手中的财富。他认为绝大多数的散户是股市的主体，他们就是这个市场，而大户只有超越这个市场、才能赚到钱。

首先，索罗斯认为大户应拥有信息上的优越，而这是散户无法做到的。而获取信息最直接的途经则是用已有的金钱交更多的“有用的朋友”。

他和其他大多数人不一样，能从世界金融领袖的公开声

明，以及这些领袖所做的决定，察觉出趋势、动向和节奏。

索罗斯比大部分人更了解全球经济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假设 A 发生，B 必定随之而来，再下来则是 C。不要认为这没什么了不起。在索罗斯的成功中，这的确是十分重要的操作秘诀之一。

有些人指责索罗斯拥有某些邪恶的技巧，而这些技巧因为他在全球各地人缘广布而有扩大作用。这个人当然有朋友，批评他的人很快便承认，这不等于犯罪。但是他的朋友都位高权重。同样的，他们很快就承认，不会单因一种行为，就使人锒铛入狱。可是某些人还是强烈认为，索罗斯广阔的人缘背后，有某种邪恶的影子。

比方说，《观察家》谈到索罗斯和企业购并专家高史密斯、罗斯柴尔德的首席投资家陶伯之间过从甚密时说：“这类关系，给人圈内人结党成派的印象，比较主流的投资人听到索罗斯的名字时，有时难免皱起眉头。他的同事可能说他凭借的是第六感，可是连他自己的话，也给人留下印象，觉得他为自己建立了广泛的人缘以搜集情报。”

可是，在正确的地点拥有朋友到底错在哪里？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企业经理人格雷斯坦十分乐意谈起索罗斯大师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发现总体经济趋势的能力，因为这个人交游广泛。“乔治有一些头脑灵光的朋友，在全球各地有很广的人缘。

他会走进办公室，说道：‘我对 A 国有兴趣，打电话问 X ……。’而且在他整个事业生涯中，一直依赖各地的独立顾问师。你该看看他的通讯录。”

除了拥有信息，索罗斯认为大户应该做的还包括扩充自己的研究，挑选最差和最好的股票，并且不断地进行调整以利于

深思熟虑之后的出击。

乔治·索罗斯做的是总体分析，注意大格局，国际政治、各国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利率、汇率的变化。一旦索罗斯分析出“大势”，索罗斯就要着手分析将受此“大势”影响最深的行业，并坚持从那个行业中挑出两家公司，但不可以随便选两家，其中之一必须是那个行业中最好的公司，这家公司是业界翘楚，它的股票，其他每个人都想优先购买。买盘起来，自然就会推高股价。索罗斯会做多这支股票。

他们投资的另一家公司，是业内最差的，负债沉重，财务报表糟得一塌糊涂。它的股价偏低最严重，因此如果终于否极泰来，股价翻扬，可以赚很多钱。索罗斯也做多这支股票。

找出最好和最坏的两家公司之后，就不需要再投资那个行业的其它任何公司。

索罗斯在工作时，还要求身边的高级主管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状态。

索罗斯拥有的耐性，往往是其他投资人所欠缺的。索罗斯曾表示：“要成功，你需休闲娱乐。你需要一段时间，紧紧缠住你的双手”。

一位很亲密的同事，叫做拜伦·伍恩，察觉到索罗斯有这个特质，也就是对人生和金融市场，抱持着类似“顺其自然”的方法。

伍恩说：“他觉得，不能依赖别人。有些人一天到晚找营业员交谈。他不认为那是度时日的正确方式。相反的，他宁可找一些真正有帮助的人来谈，也花时间去思考、阅读和自省。他希望所找的人，拥有哲学上的敏感。

一个只能赚大钱……却没灵魂的人，他不感兴趣。他不得，那个人必须在办公室里做那样的事。”

“他…曾对我说了很有用的话：‘拜伦，你的毛病在于你每天工作，而你想，由于每天工作，所以必须做些什么事情。我不是每天工作。我只在工作有意义的日子里工作……而在那样的日子里，我真的做了某些事。可是你每天工作，即使做了某些事情，也不觉得那是个特别的日子。’”

附录

(一) 来自资本主义的威胁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让自由的市场来决定！”是公认的答案。一个优秀的资本家认为这一回答揭示了开放社会所依靠的价值观。

尽管我在金融市场上赚取了巨额财富，但我现在很怕无限制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市场价值观念会给开放社会带来威胁。我觉得，开放社会的敌人将不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资本家本身。

“开放社会”一词源于亨利·伯格森的著作《道德和信仰的两种源头》，后来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他的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大加发扬。波普尔说，象纳粹主义这样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有一个基本特点，它坚持不懈地追求终极真理。因为终极真理是人类无法达到的，所以在这些意识形态下，政府不得不采取压迫的方式来达成他们所期望的东西。波普尔提出与之对立的另一种社会观念：没有人可以独享真理，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兴趣，存在一个维持人们和平共处的机构，这一机构保护人的权利、确保言论和行动自由。波普尔把这样的社会观念下的组织称为“开放社会”，它的敌人是极权

主义意识形态。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成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高度抽象地解释了西方民主的含义和目标。“开放社会”的观念从未为人所公认，然而波普尔的分析确实非常透彻，当我作为一名学生于四十年代第一次读这本书时，由于已经有过在匈牙利纳粹统治和共产主义统治下生活的经历，它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我被吸引着去认真钻研卡尔·波普尔的哲学。为什么没有人能找到终极真理？答案不言自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我们试图去彻底认识它，但我们的意识会影响我们参与的事情。如果我们的思维完全统一，且思考对象彼此相关，也许会得到真理，这样我们能够发掘与结论相关的事实，这些事实是判断结论是否正确的可靠标准。

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个条件会成立。但在人文领域里诠释事实和结论的关系就有些费力了。在社会政治事务中，意识会作用于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不一定是检验结论是否正确的可靠标准。现实和意识存在一种双向联系（一种反馈机制），我们称之为“反射”，我曾经用它建立了一种历史理论。

不管这一理论是否有效，事实表明，在金融市场上，它帮了我大忙。当赚了太多的钱时我就决定建立一个基金会。在经历过纳粹的迫害和其他政府的压制之后，我发觉“开放社会”才是至高无上的东西，所以我把我们基金会起名为“开放社会基金会”，它的使命是促使封闭社会开放，使开放社会更加可行，支持激进思想。这些都发生在 1979 年。

我的第一个重要对象是南非，但没有成功。这里的种族隔离制度太强大了，我所做的一切都只能服从这一制度的规定，我无法改变它。随后，我的注意力转向东欧，这里的工作可以

322 金钱与梦想

说比较成功。1980年起，我开始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宪章七七运动和波兰的团结工会。1984年我在匈牙利建立了好几个基金会，紧接着，1986年在中国，1987年在苏联，1988年在波兰都建立了基金会。我的工作随着苏联体系的垮台而加速。目前，我已在全球25个国家建立起了一个基金会网络。（不含中国，中国的基金会于1989年关闭）

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工作时，我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什么是“开放社会”。那些赞同基金会目标的人尽管不了解这一概念，但都做得不错。我在匈牙利的基金会的目的是支持异议人士。我很清楚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信条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另一种教条，当面临一种选择时，就无法维持下去了。这种办法看来很管用。基金会非常支持匈牙利反对力量。以后，反对力量获胜了，这种体制也就垮台了。

在一些东欧国家解体之后，基金会的使命有所改变。由于意识到开放社会是一种比封闭社会更先进，更成熟的社会组织形式，基金会的任务从颠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变成建设开放社会，这一转变并不容易，因为开放社会的信徒已经习惯于从事颠覆活动了。许多基金会做得很好，但很不幸的是，很少有人追随它们，西方开放社会不愿帮助我把苏联建成一个开放社会。相反地，比较流行的想法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冷战结束后的情形和二战结束后的情形截然不同，不能再出现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了。当我在1989年的春天出席在波茨坦召开的一个研讨会时，就提出了这一想法，但大家不以为然。

前苏联和东欧体系的崩溃为广泛的开放社会奠定了基础，但西方民主国家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新体制根本不象开放社会。西方国家的联盟由于不能再把自己定位

成共产主义的对手，他们就忘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

那些曾在波斯尼亚等地鼓吹开放社会观念的人现在不愿提供帮助，而那些教条主义国家里的人则是在受到压抑时向往开放社会，而一旦这种制度崩溃后，又不得不忙于生存的问题。教条主义失败之后，开放社会这样的国际化观念又成了泡影。

这一情形促使我反思我对开放社会的认识，柏林墙倒塌后的五六年中，我实际上是全心投入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变革。近来我的视线转回了自己的国家。尽管我的基金会做得不错，我觉得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建立它们的理论框架。重新考虑之后我认为，开放社会观念还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和卡尔·波普尔的著作的时代相比，当理解现实实情和指导政治运动时，开放社会这一观念更为有用，但必须彻底重新认识它。假如开放社会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它就不应当仅仅被局限于摆脱教条主义的威胁，必须被赋与更加积极的内容。

新的对手

波普尔曾说尽管法西斯主义是极右，教条主义是极左，但因为两者都是压抑个人自由的政权，所以有许多相象之处。我想把这一观点扩展一下，开放社会也可能从过度自由化这一截然相反的方向受到威胁。太多的竞争和较小的合作会引致难以接受的不公平和不稳定。

现实社会中，我们对市场的魔力坚信不疑。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法则是对个人利益的无限追求会带来商品的最佳分配。然而如果不能意识到公共利益应当高于特殊利益，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将会崩溃。

我想强调一下，我不是想把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纳粹主义归入一类。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彻底地破坏开放社会，而放

任政策只会无意中威胁到它。弗雷德里奇·哈耶克这个放任政策的拥护者，也就同时是一个开放社会的热情支持者。然而，因为教条主义受到的是彻底的否定，所以我认为来自放任政策的威胁比来自极权主义的威胁更为强大。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个真正的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商品、劳务、资本和人口都自由地转移，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应当维护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和机构。

上个世纪末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自由放任是那个时代的规则，现在也差不多是这样。那一时期十分稳定，强大的大英帝国为了维护这一制度而派出舰船到远方去征服，因为他们是自由放任的受益人。而今天，美国不想成为世界警察。早期各种货币都是以黄金为标准，而现在它们是浮动的，并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盛行一百多年的自由市场体制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上台执政，国家之间实际上就没有资本流动了。只要看看历史就能发现，这种体制太容易崩溃了。

尽管自由放任政策不象教条主义或纳粹主义那样和开放社会的基本要求相违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想用科学来证明他们对终极真理的追求。波普尔的成就之一就是分析得出，终极真理这样的理论不是一门科学。因为自由放任政策是建立于理论上，并且经济学是最受尊敬的社会科学，所以对这一观点难以产生争议。人们不能在市场经济和教条主义之间划等号。我认为自由放任理念和教条主义一样，是对科学规律的歪曲理解。

自由放任理念的主要科学依据是这样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会促使需求和供给形成均衡，保障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一观点已被普遍接受。经济理论是一个无须证明的

体系：只要基本假定成立，就会有结论产生。但当我们仔细检查一下这些假设，就会发现它们不适用于现实情况。例如，完全竞争的理论假定知识完美，产品单一且可任意分割，市场参与者很多，以至于没有人可以操纵市场。但完美知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市场上存在各种阴谋诡计。供给和需求被认为是分别给定了的。这个前提条件是研究方法的需要。因为经济理论要研究供给需求关系，所以必须认为两者都给定了。

如前所述，供需被分别给定的假设与现实不符，至少在金融市场是这样，而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关键作用。金融市场的买者和卖者按自己的决策看待未来。这是一种市场参与者的意识和他们所想的现实之间的双向的反馈，我被之为“反射”。它同时考虑到了对市场参与者和他们所参与的不确定过程的不完美认识。

如果供需曲线没有被分别给定，怎么能决定市场价格呢？如果看一下金融市场的运作，不难发现价格随卖者和买者的预期而波动，而不是趋向均衡。价格一直在理论均衡点之外波动，即使这一运动最终呈现朝向某种均衡的趋势，这种均衡也和给定供需曲线所决定的均衡不一样。然而，均衡理论仍然存在，其原因很简单：没有它，经济学就说不清怎样决定价格了。

若不存在均衡，则自由市场能否产生最优资源配置的争论就失去了意义。这种看起来很科学的理论是一种推理，它的结论由假定得来，但假定不一定符合现实情况。马克思主义也同样为它的信仰寻求科学论证，这二者有点过于相象了。

我不是说经济理论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故意歪曲现实。但为了模仿自然科学的工作，经济理论做了不合实际的尝试。社会科学理论所反映的东西内部有反射存在，这就是说，事物影响

的方式与自然科学理论中的有所不同。海森伯格的量子物理学著名的不确定原则说明了考察对象的活动会影响微粒的运动。在社会领域中，理论能够影响理论所想揭示的实际。经济学为了研究方便而有意识地避免考虑反射，但这样做了之后，它就扭曲了事实。

导致经济理论成为开放社会意识形态的敌人的诱因是完美知识的假设。支持市场机制的结果和纠正错误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反馈机制。

不管以什么形式表示出来，完美知识的主张和开放社会观念相互矛盾，开放社会观念认为，对环境的理解天生是不完全的。以上所说都很抽象，以下我要分析自由放任观念对开放社会产生威胁的几个特定途径。主要是三方面：经济稳定性、社会公平和国际关系。

经济稳定性

经济理论试图造就这样一个世界：参与者的倾向（需求）和面临的机会（供给）是互相独立的，价格趋向均衡以使这两种力量达到平衡。但是在金融市场上价格不仅仅由分别给定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它也在改变参与者倾向和面临的机会中起到积极作用。这种反射作用导致金融市场内在的不稳定。自由放任否认不稳定，反对任何形式的、以保持稳定为目的的政府干预。历史证明金融市场会崩溃，并导致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这一崩溃引起中央银行和其它规范的产生，自由放任观念认为崩溃是由错误的规范而不是动荡的市场导致。这种观点也有可取之处，因为我们的认识天生是不完全的，规范也一定会有缺陷。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强大说服力，因为它不能解释规范为什么会出现。从这一观点可以推理出：既然规范有缺陷，那么不

受约束的市场是完美的。

这一观点立足于完美知识的假设：如果解决方法是错的，那么与之相反的方法一定是正确的。然而在没有完美知识的情况，自由市场和规范都存在缺陷。只有在外力维系之下，才能保持稳定。即使这样，崩溃也可能会发生，因为政策也有错误的时候。如果崩溃太严重的话，就会导致极权主义制度的出现。

不稳定的后果扩展到金融市场之外：影响了指导公众行为的价值观。经济理论认为价值观是既定的。在经济理论产生初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时代），因为人们确实有严格建立起来的价值观，这一假定是合理的。亚当·斯密使道德哲学和经济理论相结合。与表现在市场行为中的个人倾向不相称的是，人们是由一系列表现在市场机制之外的行为中的道德规范来指导的。在所有选择对象中进行有意识地选择时，这些扎根于传统、宗教和文化的规范未必合理。事实上，当存在选择余地时，这些规范就难以持续下去了。于是市场价值观就会改变传统价值观。

市场价值观和传统价值观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传统价值观曾引起强大的震动和反对。随着市场机制日渐扩展，人们按非市场价值观指导行动就越来越不可能。广告，营销和包装开始去影响群众口味，而不仅仅象自由放任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去迎合群众口味。人们越来越认为钱是价值尺度。什么越贵，什么越好；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可由它的价格来体现；人们因为富裕而受到尊敬和羡慕。交易的媒介变成了价值的标准，这和经济理论所设想的关系恰恰相反。对成功的追逐取代了对规范的信仰，整个社会失去了方向。

社会达尔文主义

通过假定供需是给定的和宣称政府是有害的，自由放任主义完全取消了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我同意再分配会影响市场的有效性，但我不认为应当什么也不做。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如果再分配导致低效和扭曲，可通过消除再分配来解决这些问题，就象共产主义者认为如果重复竞争造成浪费，就可以通过中央计划经济来解决一样。财富在所有人手中会积累下来；如果没有再分配机制，不公平会令人难以容忍。一位资深经济学家弗朗西斯·贝肯这样说：“除非被分配好，否则钱就一文不值，没有任何作用。”

自由放任主义反对收入再分配，倡导适者生存。但这一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财富可以被下一代继承，而第二代很少能象第一代那样适于生存。

无论怎么说，让适者生存成为文明社会的指导法则有些不对劲。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建立在过时的演进理论之上的，就象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是模仿牛顿物理学一样。支配物种演化的法则是变异，变异过程十分复杂。物种和它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一种物种是其它物种的环境，这是一种和历史中的反射相似的反馈机制。两者的差异在于历史由错误观念而不是由转变推动的。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至今还在影响人类事务的错误观念。我最想说的是合作和竞争一样，都是系统的一部分，“适者生存”歪曲了事实。

国际关系

自由放任主义和地缘政治现实主义存在一些共同的缺陷。地缘政治学家们认为，政治没有原则，只有利益，这些利益由

地理位置和其它要素共同决定。这种决策方法植根于十九世纪那种过时的方法论，它至少存在两个缺陷：其一是把政治看作单独的个体来分析，就象经济学看待个人一样。把政治从经济中独立出来的同时，把它尊为国际关系中权威的来源，其结果是出现一些矛盾。我们暂且忽略这一点，考虑一个更为紧迫和实际的问题：国家解体之后会怎么样？地缘政治家发现他们对这一问题毫无准备，这就是苏联和南斯拉夫分裂后的实情。地缘政治现实主义的另一缺陷在于它没有认识到在国家利益之外还存在着公共利益。

东欧及苏联崩溃之后，目前状况可以认为是全球开放社会，尽管远未称得上完美。再没有外部威胁了，也没有极权主义追求世界霸权了。开放社会的威胁来自内部，来自于地方当权者通过外部冲突来建立内部威望。民主而强权的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损害公共利益也是对开放社会的威胁。国际开放社会的最大敌人也许就是它自己。

冷战是极度稳定的情形。代表不同社会观念的两个强大集团各据一方，但由于在一场毁灭性战争中每一方都有能力消灭另一方，所以他们都尊重着对方的利益，这使得冲突程度很有限。随着一个集团的内部分裂，这种极端稳定的秩序走到了尽头。没有新的世界秩序出现，我们进入一个混乱时期。

自由放任主义没有准备好去迎接这种挑战，它没有发现自己需要一个新秩序，它假定国家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会自动产生一个新秩序。但根据适者生存的法则，国家越来越忙于应付竞争，不愿为公共利益作出任何牺牲。

我们没有必要用描绘全球贸易体系彻底崩溃的恐怖景象去证明自由放任观念与开放社会观念的格格不入，我们应当反思东欧及苏联崩溃之后，自由社会没有伸出援助之手。接管俄罗

斯的强权资本主义体制带来了不公平，以至于人们宁可付出丧失自由的代价，转而求助于某个承诺有能力恢复国力的领袖。

应该吸取的教训是：在封闭体制崩溃之后，不会自动形成一个开放社会。开放社会不只是没有政府干预和压制，它是一种复杂结构，实现它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因为它比原先体制更为复杂，所以需要外部帮助以便迅速转换得以实现。美国和英国盛行自由放任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地缘政治现实主义，这些都阻碍了俄罗斯实现开放社会。如果这些国家的领袖有一种不同的世界观，他们会建立起倡导建立全球开放社会的强大基金会。

苏联分裂时联合国有机会按其成立时的宗旨表现一下，戈尔巴乔夫 1988 年访问了联合国，描绘了两个大国为国际和平和安全而合作的景象。而后来机会失去了，联合国作为维和机构失去了信任，波斯尼亚对联合国的冲击就象 1936 年时阿尔巴尼亚对国际联盟的冲击一样。

我们的全球开放社会缺乏维持自身的机构和机制，然而没有人愿意弥补这一点。我反对目前流行的观点，它认为对自己利益的不懈追求会带来国际均衡，这是一种错误。由此不难想象目前的全球开放社会很可能是一种暂时现象。我认为开放社会的观念会给下一步行动提供很好指导。

可谬误性的预兆

为实现开放社会而积极行动比认清它的敌人更加困难，不行动的话，开放社会就会失败。但开放社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团体，必须承认，全球范围的团体确实存在，象环境保护和维持和平这样的全球共同利益也存在。但这种利益和特殊利益力量相比弱了许多，不会在这个强权世界中获得多少支持。此

外，开放社会作为一般概念超越了所有界限。公共利益把大家联结到一起来。社会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产生凝聚力，这些价值观植根于文化、宗教、历史和传统。当一个社会不存在边界时，如何去找到共同的价值观？我觉得只有一个可能的来源，那就是开放社会本身。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重新定义开放社会的概念。我认为开放社会的中心是个人权利被保障并有共同价值观使社会成为整体。这二者受到各方面的威胁。一个极端是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它们导致国家至上，另一个极端是自由放任主义，它引起极度不稳定和最终崩溃。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威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创造一种所谓的亚洲模式，就是把市场经济和政治压制结合到一起。在世界许多地方，国家的治理和私人财富的创造紧密相连，从而可以认为强权资本主义是开放社会的新的威胁。

我把开放社会想象成追求进步的社会。让我们从认识自身开始，这种可谬误性不仅涉及心智构建，而且包括风俗习惯。不完善的东西可以通过反复试验过程而得以改进。开放社会不仅允许这类过程存在，而且以言论自由和保护持不同意见者的方式鼓励这种过程。开放社会展示了一个无限进步的景象。在这一点上它和科学研究方法有所类似。科学有事实这一客观标准可用，然而不幸的是，事实不能够给人类事务提供可靠标准，从而我们需要一些公认标准来衡量反复试验的过程。所有文化和信仰都提供了这类标准，开放社会不能缺乏这类标准。大多数文化和信仰认为其价值观是绝对的，而综合考虑了多种文化和信仰的开放社会，认为共同的价值观是可以商榷并选择的。要使争论成为可能，至少应达成一点共识：开放社会是社会组织所期望达到的形式，人们必须言行自由，只受共同利益

所限制，并且这种限制必须由反复试验决定。

《独立宣言》可以近似看作是开放社会的准则了，但我们不能说这些准则无须证实，意识到认识不完美会有助于把开放社会建成所期望的社会组织形式吗？我认为是这样，尽管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但如果终极真理不可达到，我们怎么能认为可谬误性是终极真理？

从历史来看，信仰是用来判定特定行为的。可谬误性应当造就一个不同态度。信仰应用来改变生活，而且不是让我们遵循一系列规矩，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信仰是自己选择的表达方式，而不是终极真理，我们将无法容忍其它信仰并修正自己的信仰。但大多数人不是那样做的，他们试图使自己的信仰等同终极真理。如果开放社会的生活经历迫使他们放弃追求终极真理，他们会觉得有所损失。

我们的潜意识是笃信我们拥有终极真理。我们可能被赋予非凡的才能，但总是局限于自身范围的。我们能够发现真理和道德，但我们的道德是代表自己的利益和自己本人，因此，如果有真理和公平，我们就想拥有它们。我们从信仰和科学那儿寻求真理，对可谬误性的信仰却难以做到。这是非常复杂的概念，比起自己祖国（公司或家庭）来，对对错这样的原始信仰更加难以理解。

如果可谬误性如此难以被接受，是什么使它有吸引力？支持它的最强有力论据来自于它所产生的结果。开放社会比封闭社会更有前景、更加革命、更令人激动。因为如果我的反射理论是有效的，那么成功并不意味着正确，所以把成功作为坚持这一信仰的唯一基础就很危险。自然科学里，理论必须正确（正确即预测和解释和事实一致），它才能有用（有用即产生有用的预测和解释）。但在社会领域中，什么有效并不等同于什

么正确，因为在意识和现实之间存在反射。如前所述，崇尚成功会成为开放社会不稳定的源泉之一，因为它会破坏我们对正确和错误的认识。这就是今天社会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对错观念受到例如用钱来衡量成功这类观念的冲击。

如果成功是唯一标准，开放社会对抗极权主义时就会失败，就象事实表现得一样。和理解以上有关从可谬误性到开放社会观念的抽象道理见长的叙述相比，维护自己利益要容易多了。

应当更坚定地宣传开放社会观念，必须为开放社会这一目标作出保证，因为它是正确的社会组织形式。然而这种保证很难达成。

我信仰开放社会，因为它比追求终极真理的社会体制更能发挥个人潜能。承认真理不可能促使人更加向往自由和成功。但我意识到问题在于：我对开放社会已经充分认识并尽力去实现它，而我不能确信其他人是否持同样想法。既然有了意识和现实之间的反射，真理就不是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了。通过歪曲和否认真理来达成特定目标也是有可能的，人们会更致力于达成其特定目标而不是取得真理。只有当我们思索人生的意义时，真理才十分重要。但即使那时，欺骗也可能比真理更受欢迎，因为生命必定会终止，而死亡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事实上，可以认为开放社会是充分利用生命的最佳社会组织形式，而封闭社会是最适合接受死亡的形式。分析结果是对开放社会的信仰只是一种选择方式而不是逻辑的必然。

即使开放社会观念被广泛接受了，也不能保证自由和成功将获胜。开放社会仅仅提供了使各种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观点统一起来的框架，它不能提供有关社会目标的确定观点。如果它做到了，就不是开放社会了。这意味着，在信仰开放社会之

外，必须要有其它信仰。只有在封闭社会中，开放社会观点才足以指导政治行动；在开放社会中，仅仅成为支持民主政治的人还不够，必须成为自由式的、社会式的、基督徒式或其它某一种形式的支持民主的人。共同的开放社会信仰是自由、成功和（开放社会带来的）所有美好事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可以看出，开放社会观念本身是困难的来源，毕竟，开放社会建立在对可谬误性认识的基础上的。事实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开放社会的理想是不可及的。为之设计蓝图是自相矛盾的，但这不意味我们不应当为之而努力。在科学中，终极真理也是不可及的，看一看我们已经取得的进步，就会发现，开放社会或多或少离我们近了。

按哲学、逻辑观点构造一个政治、社会日程表看起来是没有希望的事，但确实可行。历史上已有先例。思想启蒙运动是理性力量的反映，它导致了《独立宣言》和《人权法案》的产生。法国革命时期，信仰理性发挥到了极致，带来了令人不快的副作用；然而它成了现代化的开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200 年的理性时代经历，作为理性的人，我们应当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在可谬误性之上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理性失败的地方，可谬误性仍然会成功。

(二) 反射理论

1994年4月26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世界经济
济研讨会演讲。

鲁迪·多恩布施教授邀请我来此发言时，并未特地要求我讲什么，他给了我自主权。我想讲一个一直吸引我去钻研的题目，也许你们一些人会不感兴趣。那就是反射理论，它既指导我去赚钱，又指导我捐出钱，但别人没有关注过它。我个人因为赚了很多钱而很受关注，甚至是过于关注，而我进行决策所依据的理论却被完全忽视了。我在1987年出版了一本《金融炼金术》，但没有人作出好评。后来随着我出名，这本书开始脱销，现在这本书又被重新出版。我认为现在是推广这一理论的好时机。

上周我被邀请去国会出席听证会。我是这样开始说的：“我首先必须指出我对现行观念很有看法。被广为接受的观点是金融市场趋向一个均衡，并且未来事情被正确无误地反映到现在来。我用一种不同的理论指导操作，那就是金融市场不可能正确无误地反映将来，因为它不仅反映将来，而且会改变将来。某种特定情况下，金融市场会影响所谓的基本面，而通常观点认为它只反映基本面。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市场进入了一种动态不平衡，市场运作状况和按有效市场理论所认为的情形大有不同。这种大起大落过程并不经常发生，但一旦出现，就

会变得十分具有破坏性，因为这一过程影响了经济的基础。”我在国会时没有时间展开论述这种理论，所以我现在利用这个机会来做这件事。很抱歉给你们带来了这个非常理论性的讨论。

这种理论认为当事件中存在思考着的参与者时，哲学和自然科学所教给我们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基本上不适用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时都把事件从有关考察对象中独立出来。事件是真实存在的，而考察对象的真与假则取决于它是否符合事实。

这种认识方式也许非常有价值。自然科学的成就令人惊叹，事实和结论的分离为检验真理提供了可靠的标准。我不能否认这种方法。而思想领域中的事实和结论的分离方法的引入可能比轮子的发明更加伟大。

这种方法事实上非常成功，其应用越来越广泛，但当事件中存在思考着的参与者时，理论便扭曲了现实景象。问题的关键在于参与者的意识会影响事件本身。事件和意识不能再象自然科学中那样被分离开，更确切地说，事件和意识的分离会带来扭曲，而这种扭曲不会在自然科学中出现，因为在自然科学中意识和结论独立于主体，在社会科学中则是客观主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对事件的研究仅局限于事实之中，就会忽略一个重要的因素——参与者的意识。这一点尽管很怪异但却是确实存在的，尤其在社会科学中最科学的经济学领域。

古典经济学以牛顿物理学为模式，它利用差分方程去建立均衡，为使这种方法成为可能，经济理论中假设参与者具有完美知识。完美知识意味着参与者的意识只反映现实，因而可以忽略掉。不幸的是，事实与理论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被解释为：均衡状态是最终结果，而偏离代表着暂时的影响。但实际上，完美知识的假定是站不住脚的，它已被莱昂内尔·罗宾斯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师)发明的方法所取代。罗宾斯坚持认为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因此必须假定两者都是给定的。这种方法直到今天都在试图避免现实对均衡理论的冲击。

我对现在通行的金融市场理论知道得不多,就我所知,它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这意味着金融市场起着关键的积极作用,它高度准确地反映了未来,金融市场里参与者作为一个整体,其认识能力远远超过任何单个参与者。我认为这样解释金融市场运作方式是严重扭曲的,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愿意了解有效市场理论和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原因,同样也是我厌恶复杂衍生工具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数学很糟糕。

很奇怪为什么明显不正确的理论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可能是因为所有有关社会现象的理论或多或少都是扭曲的吧。我的反射理论的出发点是认为我们的认识天生会有偏差。思考中的参与者不能按知识行事,知识假定事实独立于结论而出现,但是参与者的决策会影响结果。因此,参与者所面临的情况不仅包括独立的确定的事实,而且包括参与者的决策所改变了的事实。在意识和现实之间存在一种能动关系,而自然科学理论和错误的经济学理论中,只表明了前者反映后者的消极关系。

我把这种消极关系称作“认知作用”,把反向的能动关系称作“参与作用”,把两种作用的交互作用称作“反射”。反射是一种双向反馈机制:事实改变参与者的意识,参与者的意识也改变事实,这一过程没有穷尽,二者可能会越来越接近但不会变得一样。知识是结论和事实、意识和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而这是不可能的,关键原因在于参与者观点和事件现实情况之间缺少对应,甚至有内在分歧。正是这种分歧(我称之为“参与者认识偏差”)为理解事件过程提供了线索。这也是我的

反射理论的精华所在。

这个理论含义深远，它严格区分开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社会研究中引入了自然科学中所没有的不确定性要素。它把社会事件解释为没有终止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均衡状态。由于这个过程有参与者认识误差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以不能用自然科学那样的广泛有效的法则来解释或预测。

我无法一一列举出反射理论的作用之处，从金融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到开放社会观念都有反射。开放社会的观念立足于没有人可以认识终极真理。大家也许都知道，我是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和捐助人，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反射理论既教我赚钱又教我花钱的原因。

但能不能建立说明意识和现实关系的有效新理论呢？看起来不行。它已被彻底研究过了，该说的都说了。我的理论不是无中生有。克里特岛的哲学家艾彼蒙尼迪首先说过：自我指涉结论逻辑上是不确定的。他说：“克里特人永远在说谎。”说谎者悖论是伯特兰·罗素的阶级理论的基础。但我不只停留于逻辑不确定性，反射是双向反馈机制，它同时对应因果不确定性和逻辑不确定性。因果不确定性和海森伯格的不确定原理有些相象，但主要区别是；海森伯格的理论针对观察对象，而反射是针对意识的作用。

我为有可能发现深奥的新观点而兴奋不已，也很害怕，因为这种主张通常是由狂人提出的，并且世间的狂人也很少能发现深奥的新观点。我很怀疑我的观点是不是只有客观有效性或是主观重要性。

这是我如此渴望把我的理论公诸于众的原因，也是我发现现实情形如此令人沮丧的原因，因为现实情况是我个人被重视，我的理论则少人问津。就象前面所说的，根本没人关注反

射理论，它被看成一个在股票市场上赚了大钱的人的自我陶醉。通常说法是市场受心理因素影响，但这样说太简单了，不是理论分析的结果。理论认为，参与者的认识误差能改变决定市场价格的基本面因素。

我常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很好地表达我的意思？原因是我想尽快，尽可能多地说出来。我试图在反射这种现象还未被认识到时就提出反射理论来。我认为应当更加谨慎地开始，首先应当证明反射的存在，再来修正对这种现象的看法。做到这些很容易，金融市场就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室。这也是我今天在这儿所要说的。

我所要做的只是去证明存在一些实例，表明参与者认识误差不仅会改变市场价格而且会改变市场价格所反映的基本面。在《金融炼金术》中我已经搜集并分析了这些实例，所以现在我只需要列举出来就可以了。我分析了股票市场的两个很不错的例子：一个是六十年代的大起大落现象，另一个是七十年代的房地产投资信贷的大起大落。其它例子还有八十年代的杠杆收购狂潮和外国投资引起的大起大落，但这两个例子说得不是那么明白易懂。

我所提及的这两个例子的主线是所谓的杠杆融资，就是说，公司可以凭夸大的预期以高价发行新股，由此带来的每股盈余的上升会使夸大的预期成为现实。杠杆融资是把参与者的认识误差传递到基本面的所有可能的机制之一。再比如，七十年代国际借贷的大潮及其所引起 1982 年的大衰退。大涨时期，银行把债务比率看作借款国家还债能力的客观标准，然而事实证明债务比率，会受到银行借贷活动的影响。

所有这些例子中，参与者的认识误差是一种错觉：在合并和抵押信贷的繁荣时，人们认为每股盈余的上升和杠杆融资无

关，在国际信贷繁荣时，人们认为债务比率和银行借贷活动无关。也有一些例子，并不存在这类错觉，例如在自由浮动的货币市场中，汇率的波动能够影响决定汇率波动的基本面因素，如通货膨胀率等。所以从理论均衡点偏离本身进一步造成偏离。这种自我诱发能力鼓励了跟随趋势的投机，这种投机使得以理论均衡点的偏离得以产生。结果是自由浮动的货币市场出现过于剧烈的波动，跟随趋势的投机得到调整。

我相信这些例子足以证明反射确实存在。它不仅仅是一种看待事件的不同途径，而且是解释事件的不同方法。不是每个事件中都会有反射，但一旦发生，便改变了局势的性质。参与者的意识和事件实际状况处于一种动态不平衡过程而不是趋向某种理论均衡点，这一过程首先自我加强，使意识和现实朝某个方向变化，但时间一长，便无法坚持下去，并产生朝相反方向的变化。结果是参与者的观点和事件实际情况都不会回到原始状态。一旦把反射现象独立出来加以认识，就会发现它在许多领域都起作用。我在《金融炼金术》里研究了一些写书时发生的事，我称之为“里根帝国圈”，它是从外国尤其是日本借钱来建立一个巨大军队的计划，我认为，这一过程开始会自我加强，但一定无法支持下去。德国统一之后，相似的情况正在出现，它最终会导致欧洲汇率机制的崩溃。欧洲汇率机制在近平衡状态中运行了近十年，但德国统一引发了动态不平衡。

反射只会间歇地出现，这一特点使它更显重要，如果它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就仅仅会产生认识事件的不同方式而不是事件发展的不同方式。这一点在我的书中没说清楚。我把反射理论视作基本理论，不存在反射的事件是特例。我仿效凯恩斯，他推行他的一般就业理论，他认为充分就业是一种特殊情形。但凯恩斯是在失业已成为明显事实时提出理论的，而我则是在

认识现象之前就提出了反射。正因为如此，我有时描述得过了头，有时却不够充分。我强调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标准完全地不适合于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我认为社会科学是错误的比喻。那是夸大了的，因为每天身边有许多重复的普通事情能被广泛有效的法则所解释和预测，其有效性可以用科学方法加以验证。即使从历史上看，反射过程也存在重复的地方，使统计它成为可能。举例说，贸易周期以反复的形式出现，尽管每一周期有各自特点，共同之处也不少，但理解独特之处总比理解共性给我们带来的收获大。

我在有的地方解释得不够，我仅把反射看作认识社会事件的不同方法，而不是解释事件的不同方法。我指出，在自然科学中，不管人们想些什么，事件还是接二连三地出现。而在社会科学中，在意识和事实之间有相互作用。我也把日常事件和历史性事件作了区分，日常事件中反射关系引致的不确定可以被看作是噪声，而历史性事件中反射作用给参与者的意识和事件真实状况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些东西既深奥又重要，但真正有趣的事是去研究日常事件和历史性事件的区别，并对历史过程有个更好的认识。

自从写了《金融炼金术》后，我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主要在历史领域而不是金融市场。我开始区分普通状况和极度不平衡状况。普通状况下，参与者的意识和事件真实状态有统一的趋势，而且存在一种机制阻止两者分歧太大。之所以称之为“普通”是因为我们的习惯知识（哲学和科学方法）是这样教我们的。极度不平衡状态与之相反，参与者意识和事件真实状态差距很大，没有使两者合二为一的趋势。我发现极度不平衡状态更加诱人，我不仅在理论上研究它，实践中也是。

有两种极度不平衡状态，一种没有变化，一种是剧烈变

革。这两个极端象“奇异吸引子”一样作用，自从噪音理论成为时尚以来，这个词已广为人知了。

从而我们可以看出三种不同的历史状态：“普通”，这种情况下参与者意识和事件真实状态趋向统一；两种极端不平衡状态，静止状态，这种情况下意识和现实差别很大，但并没有统一的趋势；剧烈变革状态，这种情况下现实变化如此之快，如此不可预期所以参与者的意识跟不上发展。

有趣的是，苏联体制的诞生和崩溃体现了两个极端。斯大林时代里，现实和信仰差别极大，但两者都很僵化，没有统一的趋势，事实上，这种差异随时间流逝越来越大。当这个体制最终崩溃时，人们跟不上变革的步伐，事情发展失去了控制。这就是我们最近所看到的。

这两种极端也可能在截然不相关的事件中看到。例如美国的银行业：大萧条之后，银行业受到严格规范，但限制一被放松，银行业就走向另一极端，进入了变革时代。我可以准确指出转折点是在 1973 年的一个夜晚，那天第一国民城市银行的管理层召集了证券分析家参加的临时会议。美国银行体系的崩溃和复活及苏联体制的诞生和崩溃十分相象。

用类比可能会更好地解释这三种状态。自然界里的水有三种状态：固态，液态和气态。我所要描述的三种历史状态就象水、冰和水蒸汽。我们可以用温度来界定水的三种状态，但我们能不能为历史变革找到一种类似的界限呢？我认为可以，那就是指导人们行为的价值观。但我现在还不能给出确定的答复，因为这是我目前正在研究的问题，但我很乐意去研究这种神秘的问题。我想知道我所说的这些东西能否在你们中引起一点共鸣，这也是我给你们做这么高度理论化的演讲的原因，很欢迎你们现在或在其它场合提出宝贵意见。

风暴并未止息（代后记）

目前，这场由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与股市危机已愈演愈烈，各大洲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尤其是东亚地区，作为风暴发源地的近邻，更是首当其冲：

11月1日：韩国央行官员说：韩元将“永远、永远、永远”不会贬值到1000韩元对1美元之下。

11月2日：印尼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改革方案下，宣布对16家有问题银行停业。

11月4日：日本三洋证券公司破产。

11月7日：东京股市、汇市双双大幅下跌。受全球金融动荡影响，拉美主要股市和汇市均告下跌。

11月12日：美国标准普尔公司指出，东南亚经济风波对国际金融机构造成伤害，并使许多银行的债务产生问题，这种危险情况可能从亚洲扩散到世界上其它地方。

11月17日：韩国金融出现最严重的危机。央行宣布将不再守卫986韩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位；日本十大商业银行之一——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宣布清盘，这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最大的银行倒闭事件。

11月18日：韩元继续跌停。韩中央银行建议财政部应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贷款援助。

11月19日：韩国财长因金融危机宣布辞职。韩国同时宣布放大韩元跌停板限制至10%。韩元继续跌停。

11月21日：韩国财政部宣布韩国正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讨有关20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事宜；香港八佰伴百货公司以无力偿还债务为由向最高法院申请自动清盘。

11月23日：韩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院长从昌烈宣布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将降低发展速度，压缩预算和大幅度提高税率。

11月24日：日本历史最悠久的证券商——山一证券宣布停止营业。

在亚洲金融风暴余波未平之际，亚太经合组织第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温哥华召开。十余位领导人穿着整齐化一的棕色皮茄克面对公众，似在表明共抗风险的信心，他们普遍认为，经过适当调整，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此前，11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一再强调要“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愿中国这艘巨轮，在周边海域狂风大作时，走稳，走好！

致 谢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金钱与梦想》一书终于付梓出版了,希望献给读者朋友们的是一本令人赏心悦目,融文学性、学术性、时效性于一体的图书精品。

作为本书的编译人员,我们首先要感谢深圳万科集团的王天广先生,是他最早提引了我们对乔治·索罗斯这个人物的关注。本书的创作过程,得到了王先生大量的支持与帮助,可以说,没有他的善意与关心,本书的创作就不可能如此顺利。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的边静小姐,她对本书的宏观构想,对我们的编译工作直接起到了决定作用。她的许多杰出的观点都被我们采用了。

中央电视台的苏超和王霞两位小姐、中国农业银行的翟冀先生以及新加坡友人李耀成先生、伦敦友人 Linda 小姐,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生动、详实的原始资料,使本书的内容更具真实性和时事性,在此一并感谢。

新华社摄影部国际编辑室的龚兵、王建华两位先

生，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原版照片，使本书无可争议地成为同类图书中的精品，对他们非凡的工作成效，我们由衷感到钦佩。

国家海洋局的宋清涛先生，以他精湛的计算机技术，带领我们在 Internet 网上自如地漫游，使我们更好地了解索罗斯其人，也使我们的叙述具有了索罗斯般的“国际眼光”。这本书如果得到读者喜爱的话，宋先生功不可没。

中国智力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的贾琳小姐、全国政协外事局的钟吉鹏先生是那种在朋友困难之时提供平淡真情的人，希望本书的成功能够给两位朋友带来一份欣喜。

我们不能不提到的还有北京宇恒德科技文化有限公司的宿春礼先生，他的鉴赏力极大地鼓舞了我们，使我们发挥潜能，夜以继日地完成此书。

最后，还要感谢北京大学的张会、徐涛、马翔宇小姐、周蔚文先生，他（她）们精心的校对，使本书的用词更准确，表达更通顺，在此一并对他（她）们表达深深的谢意！

1997 年 12 月